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

[美]詹姆斯·坎农著

(供内部参考)

33

00048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

一个参加者的报告

〔美〕詹姆斯·坎农著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James P. Cannon
**THE FIRST TEN YEARS OF
AMERICAN COMMUNISM**

Lyle Stuart, publisher

New York

1962

(供内部参考)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

一个参加者的报告

[美] 詹姆斯·坎农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紫竹院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11017·210

1963年12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68千字

4张 11 $\frac{10}{16}$

印数 1—3,000册

定价(10) 1.70元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是美国老牌托洛茨基分子詹姆斯·坎农。他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主要成员之一，曾于1922年赴莫斯科会见托洛茨基，后即成为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1928年他因在美国共产党党内进行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34年他就在托洛茨基本人的鼓励和支持之下，糾合了美国的一小撮托洛茨基分子，创办了《新国际》月刊（它是所谓第四国际成立以前在美国出版的最早的托派理论刊物，1940年改名为《第四国际》，1956年坎农集团同第四国际分裂后，又改名为《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大力鼓吹成立第四国际，并于1938年创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的美国支部。至今坎农仍任该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56年以坎农为首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因同第四国际的巴布洛集团意见分歧，而从第四国际分裂出来。今年6月，在第四国际召开的所谓“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上，坎农集团已宣布同巴布洛集团重新合作。

本書主要是由作者写给西奥多·德莱柏的一些信輯成的。德莱柏是曾被美国共产党开除出党的叛徒，后来成为美国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曾撰写《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一书，于1957年出版。当时，为了搜集资料，德莱柏曾去信请求坎农合作，回答他所提出的一些有关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活动方面的问题。坎农的复信和本书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后来大多已在美国出版的《第四国际》及《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两杂志上发表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1962年又将这些东

西加上德萊柏写的引言編輯出版，显然别有用心。在国际上出现了反“斯大林主义”的逆流，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大肆活动的时候，被历史丢弃到垃圾箱中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叛徒，誤認為时机已到，又都蠢动起来。坎农这个老牌托派分子也来搖旗呐喊，妄想为托洛茨基翻案，也为他自己翻案。在本书中他說：“美共领导人过去用斯大林伪造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来填充好几代青年党员的头脑，他們現在假惺惺地承認斯大林的‘錯誤’——在俄国；但是，对于他們自己伪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錯誤’，他們却一字不提。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和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一样是歪曲的。”于是，他就来顛倒黑白，大做翻案文章了。并且，尽管他不得不承認德萊柏的反共立場，例如他說，“不幸的是，……德萊柏在最后擺脫斯大林主义后並沒有能改正他原先的錯誤——把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当做是同一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对叛徒德萊柏的反动透頂的《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一書大为捧場。他認為，“相反地，德萊柏的著作則是一部具有誠实学者风度的真正卓越的著作。对于一切希望知道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从何处来以及其開創时期情况的認真的研究者來說，这本书肯定会成为主要資料来源。德萊柏不費吹灰之力就把福斯特的别有用心心的伪造‘历史’打落到廢紙簍里去了。”由此均可看出作者居心何在。但是，对我们說来，本书无异是一份供状，可以从其中看出美共早期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分子、个人主义野心家、叛徒，是如何向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猖狂进攻，并最后走向可耻的失败的，以及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美国修正主义分子与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的渊源关系。

为便于排校起見，本书索引所用頁碼为原書頁碼，查用时請

以排在頁边的原書頁碼为准。

本書譯者为张鼎五同志。

商务印書館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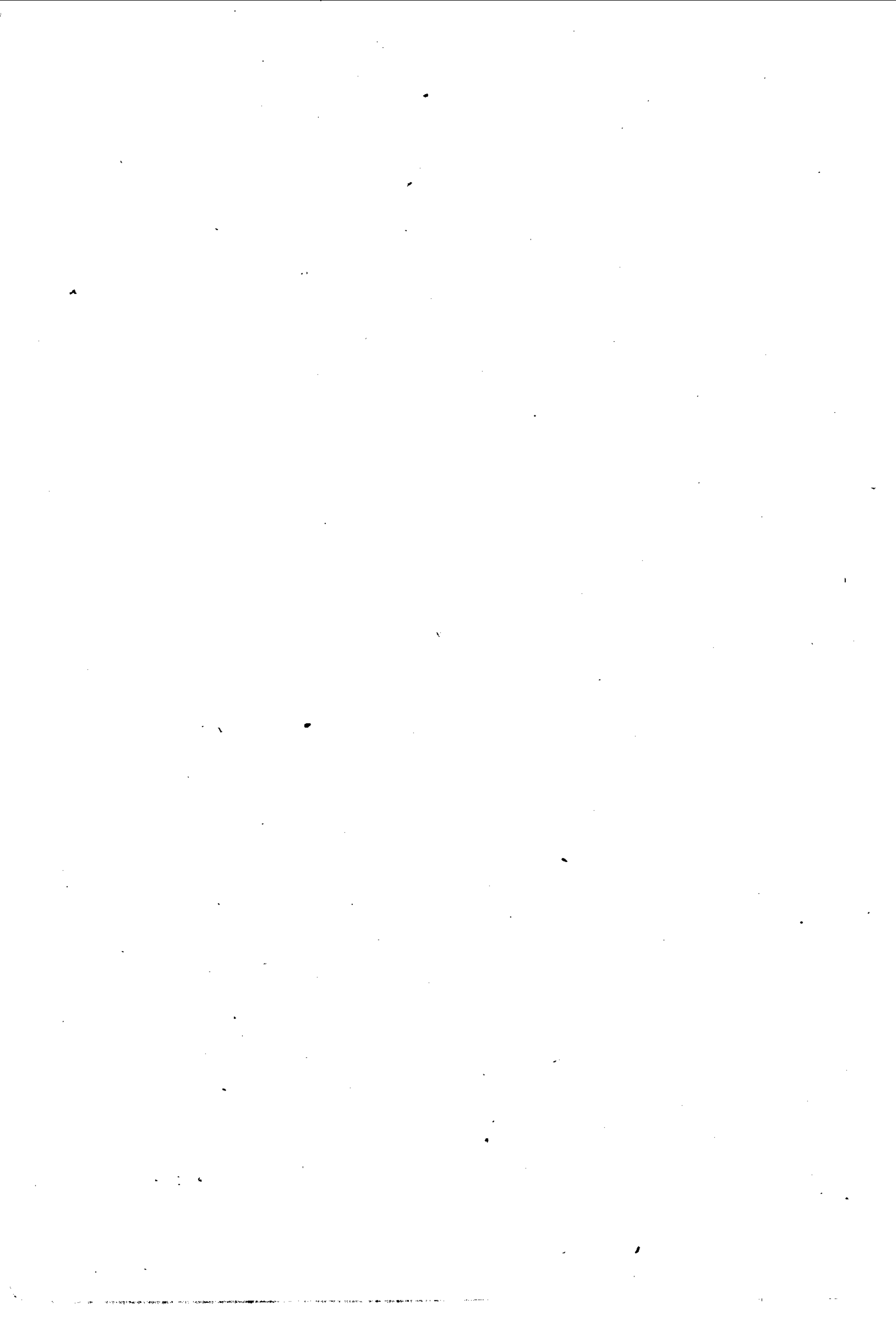
1963年11月

目 录

序 言 西奥多·德莱柏	5
志 謝	10
緒 言	13
第一編 給一位历史学家的信	33
我的論点	33
考察早期共产党的四种方法	37
头几年——在地下的党	39
弗雷納——創建人	45
早期的領導	50
关于劳工党的政策的起源	57
再談談劳工党政策	61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美国問題”	64
在党取得合法地位以后領導的改組	75
佩帕尔的領導	80
佩帕尔領導的傾复	87
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瑣記	99
战前的社会党	100
战前的无政府主义者	102
战前的左翼	10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福斯特	111
福斯特和白劳德	114
洛夫斯东和毕特尔曼	122
福斯特—坎农集团	124

白劳德的作用	134
共产国际的五届四中全会——1924年	136
1924年的选举以后	137
1925年：“平衡委员会”和“莫斯科来的电报”	140
二十年代的“党的生活”	147
巴塞克罢工	149
1925-1928年派系斗争中的占压倒地位的问题	154
1925年以后：永久性的派系斗争	157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	171
1927年：从鲁登堡到洛夫斯东	178
1927年的若干遗闻轶事	188
洛夫斯东的领导	196
关于季诺维也夫的一点想法	199
党内六七人	201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	209
洛夫斯东在莫斯科碰到的麻烦	216
斯大林的迂回的阴谋	217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220
关于批评者和批评	232
“第三时期”	233
福斯特的最后挣扎	234
福斯特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	235
斯佩克特的作用	236
我们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罪而受审	238
关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诞生”	241
黑人问题	244
第二编 俄国革命和美国黑人运动	247
第三编 先驱者	261

尤金·德布斯和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	261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伟大的序幕	293
第四編 西奥多·德莱柏历史著作評介	327
一《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	327
二《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	340
索 引	349



序 言

9

西奥多·德莱柏

許多年以前——現在看来是許多年以前了，当我第一次想到同詹姆·坎农^①联系，要求他对于写一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初稿給与合作的时候，对于他是否会同意，我是不抱很高希望的。我当时可以想到好几个理由，說明他为什么可能对这个主意不怎么热心。我从来没有見到过他，我觉得他没有理由信任我。我还把我无论如何要請他合作的打算，試探性地告訴了一些也認識詹姆的我的友人，他們异口同声地表示坚决相信，他决不会願意同我有任何来往。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試一試。如果他拒絕，那是他的事，不是我的責任。詹姆斯·P.坎农来了回信；这封信滿足了我的要求而有余。但是，在我把第一批問題寄給他和得到他的答复之前，我仍然沒有把握。我花了好几天功夫准备第一批的問題。这里，讀者可能对于这部历史著作的“方法学”感到兴趣。

按照传统的方法，历史学家并不“創造”史料；他的材料是已存在于某种具体形式中的。他寻找文件、回忆录、信件等等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当代历史这个題目是不能用传统的方法来处理的，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來說尤其是如此。（有些历史学家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关于記述 1789 年以后的事件的一切著作，真正的純洁派似乎要以文艺复兴为分界綫。）共产党的文件往往特別

^① 詹姆，是詹姆斯的昵称。——譯者

10 曖昧，常常是你怎么解释都通。但是，主要的是，各种各样传统的历史材料——以传记、自传、信件、日记等形式出现的个人回忆和解释，几乎完全阙如。可以肯定，这些材料是有一些的，但是你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只有在同共产主义运动无关的时候才是有意思和有内容的。例如，查尔斯·E. 鲁登堡的正式传记正好在他成为共产党领袖时结束。许多前共产党人的回忆录，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其中大多数写回忆录的基本动机是为了要说明作者为什么决定同共产主义运动决裂，而不是要说明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干了一些什么。

因此，从事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他希望在他的作品中利用领导人物的回忆录，他就应该出去找它们。历史学家不能消极地等待这种材料送上门来；他必须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来创造这种材料。就我来说，这样一个角色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早期领导人物中已有很多人脱了党——有些人在许多年以前就脱了党，他们不再有必要在忠诚和纪律的基础上回答我的问题。此外，他们不论在当时或现在都代表不同的意见，因此，我写的东西不可能使他们全都感到满意，或者说，使他们任何一个人感到满意。时间在飞逝，我决定试一试，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抱乐观态度。而且我也深切地意识到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中可能遇到的危险。

这些事件是在三十多年以前发生的。时间的消逝，记忆的衰退，再加上人都愿意为自己辩护，这一切都是明显的障碍。这种障碍是否能够避免？我想答案是，没有绝对的保证——但是在过去的文件中也是没有什么绝对的保证的。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总是求助于所谓“直接接触”，不是用它来代替文献来源，

而是作为后者的补充。文献仍有它固有的确实可靠性，而且占优先地位——只要它有足够的数量和質量。的确，只有掌握可以弄到手的文件，訪問或者通信才可能有良好結果。历史学家¹¹如果对于三十多年前的事件仅仅問一句“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定会失望的，而且甚至更糟糕——会受騙的。这项工作要困难和复杂得多。

在我还根本沒有給詹姆·坎农写信以前，我已設法从可以弄到手的材料中尽可能了解他和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这么做有好几个理由。我只想向他提出一些我用任何其他方法不能得到解答的問題。我也希望在提出問題时表明我已經知道了多少情况。因此，我在准备提出每一个問題之前，先要弄清产生这个問題的背景。这就必然使得我发出的信很容易同我收到的信一样长，一样詳尽。这些信，有时我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写成，但是这样不嫌麻煩是很值得的。为此，我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組織現有的材料，在我的思想中弄清楚我到底希望知道什么东西。对于对方來說，这些信刺激了記憶，使他重新想起往事。而且这些信也暗示，任何答复必須同一批公認的事实和文献証据相一致。

至于詹姆·坎农，我一直到我們通訊很久以后才見到他本人。我願意这样；我們相隔两地并且沒有个人来往，这就使得相互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客觀性；反之，就可能在同样程度上缺乏这种客觀性。起初，他的信同任何人在答复一个陌生人的詢問时可能写的信沒有两样。但是不久我就注意到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变化。这些信变得比較正式了，組織得更好了，每封信都各具特色，深为可貴。过了一个时候，我感到詹姆已經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写自传的阶段——这是我們从一个美国共产主

义运动老前辈那里所能得到的第一部自传，也许也是唯一的一部自传。美国共产党的官方人物也出版过所谓自传，但是这些自传大半是假的。坎农的信却是真实的东西。我认为研究一般美国工人运动的人，特别是研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在今后好多年中一定会珍视这些信件。

12 为什么呢？因为，我想，随着时间的消逝，恩怨俱泯，昔日的仇人也就不再互相斗争，而是要互相了解。一个人在回顾他漫长的一生中可能是最丰富也是最痛苦的岁月的时候，他就会以一种以前也许是不可能的悲天悯人的心肠和公平态度回想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我不知道坎农的其他著作是否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我相信这本书是经得起的。它摆脱了党同伐异和个人恩怨的偏见和情绪。这是一部“过去事情的回忆”，很可能是作者献给他曾为之贡献了一生心血的运动的最好礼物。

我可以作证，他的记忆力非常清晰。有一件事在我的脑中特别突出。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有关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詹姆·坎农。两个人都把他們所记得的情况告诉了我，但是总是对不上头。我接到詹姆关于这件事的信后，就去见另一个人，把詹姆的记述读给他听，而没有告诉他来源。我读完后，他点点头说道：“对了，我想当时情况就是这样。我一定弄错了。”类似的情况有好几次，事实证明詹姆都是正确的，我从这种屡试不爽的经验中得出结论，他的记忆力大大超过了与我有同样来往的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詹姆·坎农对二十年代的事件的记忆会比所有其他的人清楚得多。仅仅是因为某种天赋的心理特点吗？重读这些信件后，我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还是因为某种其他的原因。和与他同辈的其他共产党领袖不同，詹

姆·坎农要想記住这段生活。他的这部分生活对他來說仍是活的，因为他沒有在自己的心中扼杀这部分生活，我很高兴我也出了一些力来帮助他把这部分生活重新展現在人們面前。

西奥多·德萊柏

紐約

1961年2月3日

志 謝

这部关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头十年的書，从它的副題可以看出，是一个参加者根据记忆所写的証辞。最初，我并没有写这些詳尽的回忆和評論的打算。这些东西是在別人的促动下写出来的。

1954年2月，我接到西奥多·德萊柏的一封信，說他正在从事一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著作，希望同一些初期运动的参加者核对一下他的研究結果。他問我是否願意“討論一些問題，浏览一些材料”，这些問題和材料是同头十年有关的。我当时正在从事其他工作，不过我想答复一些問題不是什么难事，我就貿然同意了他的要求。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件事情将怎样結束，我当初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因为我大大地低估了这位历史学家对待工作的严肃态度，和他那寻根究底的探索精神。他在巨細无遺的研究过程中挖掘出不少材料，也遇到不少属于解释方面的問題，他就根据这些材料和問題，坚持不渝地向一切可能的方面去了解情况和征詢意見。

德萊柏的第一批問題要求答复的詳尽程度，大大出于我当初的意料。因此我的第一批答复引起他提出一系列新的問題。而这仅仅是开始而已。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在1957年出版以前的三年期間，我們在事实和看法方面提出和答复了更多的問題，其中还穿插着好几次訪問。在1957年
14 后恢复了問答通信，这样又繼續了三年，一直到他的第二部著作

《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在 1960 年出版。

在德萊柏的坚持不断的鞭策一样的詢問下，我不得不逐步作了一部相当完全的纪录，記下我作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头十年的参加者和目击者的回忆、我对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的看法和我对我的記憶中的有关人士的看法；甚至写下了一份我也参加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激进运动的扼要报告。

本書大部分材料——《第一編：給一位历史学家的信》——是为了回答德萊柏提出的問題而写給他的信。所有其他部分，包括《緒言》，都是以自成首尾的文章形式叙述专门問題，都是同德萊柏通信的副产品，多多少少都受到通信的直接启发。

我認为，我們的六年通信是忠实合作的很好的榜样，双方尽管有根本性的意見和看法分歧，却仍然要努力弄清楚事实。《第四編：西奥多·德萊柏历史著作評介》是我對我們意見一致和不一致之点的看法。

我特別感謝三位同志——詹妮·摩根、呂芭·汉森和朱莉婭·侯德克。她們担任了全部打字和其他有关的技术工作，因为她們相信这有利于事业；我也感謝罗斯·卡尔斯納，她曾經经历了过去日子的艰苦斗争，然后在我回忆和报告这些斗争的时候，又同我一起再次经历了这些斗争。

这一文集的大部分材料原載《第四国际》杂志及其前身《国际社会主义評論》。

J.P.C.

洛杉磯

1961年12月1日



緒 言

15

头十年透視

一

共产党按其今天的情况來說无疑是美国激进运动史上最孤立无援的一个政党；而且不欢迎他們的絕不只是因为进行冷战而竭力迫害他們的反动統治集团。共产党还受到工人的輕視和唾弃，而且不仅仅限于无知的和落后的工人。比較进步的工人对于任何受到統治势力迫害的政党或团体一向是給予声援的。可是，共产党在遭受迫害时，甚至得不到比較进步的工人的道义上的支持和同情，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

共产党在其后期的发展中写下了一部始終是进行无耻叛卖和說謊欺騙的历史，因此很少有人能够相信它以前是另外一个样子。历时四分之一世紀的斯大林主义，起了很有力的作用，使得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其草創时期的光荣紀錄湮沒无聞。

尽管如此，共产党事实上还是写下过这样一章历史的。新的一代的年青战斗者应该知道这一章历史，而且把这一章历史視为自己的历史。这一章历史是属于他們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六年，1918-1923年，是一个英雄时期，我国所有未来的革命运动都将是它的直系后裔。这是无法避免的。任何革命家如果否認它就等于否認自己的祖先。这是他出身的地方，沒有这个地方就不会有他。

共产党并不是在一夜之間改变了它的本性和顏色的。在它

的純潔的早期和腐敗的后期之間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这个一度是革命的組織轉化成了反面的东西。这个过渡阶段开始于二十年代后半期，它正是本書要研究的时期。

16 美国共产党在这个关系重大的时期开始退化并不是偶然的事。它的退化有着深刻的原因，必須全面地来加以考虑。为复兴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而在1928年开始的斗争也是如此。

共产党企图影响的一系列复杂的外部因素反过来对党也发生了作用，最后决定了它的命运。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遇到了国内外形势所造成的不同的問題。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国内外影响占支配地位。党的领导人的行动不能不同他們的具体环境与時間有一定关系。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們才能了解共产党倒退的轉化。否則就只是恶意的謾罵或一味的辯护，除了造成一团疑云之外，不解决任何問題。

二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头十年的历史显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概括如下：

从1917到1919年，社会党左翼——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批力量就是从这里产生的——的活动主要受到国际事件和影响的支配。两个“外部”因素，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所造成的問題加深了美国社会党左翼和右翼之間的分歧；俄国布尔什維克和共产国际对这些問題的理論上的提法使得左翼有了它的綱領。

这一时期的派系斗争是在明确的政治原則界綫上进行的。在斗争初期，左翼是个理論上徬徨不定、成份上有些庞杂的少数派，現在有了布尔什維克的伟大思想的武装，就在一个新的基础

上團結起来。整个左翼在一些最根本性的理論問題上同社会党原来的領導集团发生了冲突，这些問題在大战和俄国革命中受到了考驗。

撇开左翼領導人的一切錯誤和偏差、在斗争中造成的个人怨仇等等不談，他們同社会党原来的領導集团之間的原則界綫是划得很清楚的。1919年的分裂的結果，共产主义运动正式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这次分裂是从最广义和最明确的意义上來說的国际原則問題上的一次分裂。

三

从1920到1923年这一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在同右翼社会党人分裂以后，左翼自己队伍中又产生了各种意見分歧，派系斗争所牽涉的已是另一些問題。国内問題的考虑支配了这个时期年輕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

这个时期发生爭論的一些大問題——党的美国化、合法化、工会工作、劳工党、領導工作——都是具体的美国問題。内部爭論的都不是原則問題——因为各派系都拥护布尔什維主义的綱領，都表示忠于共产国际——而是策略問題。

尽管如此，那个时期的分歧的政治性質仍旧很清楚地超出个人对立和爭权夺利等等一切次要問題之上。国际因素——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是以作为解决国内問題的良师益友的姿态出現的。美国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本国的領導，进行了自己的战斗，而不是像上一个时期那样，簡單地在美国場地上反映和重演国际斗争。

1924年到1928年是美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进步和退化的重大分界线。

在这个时期以前，整个来说，国内条件有利于一个革命政党的巩固，即使这个党是个小党，而且这个过程也由于俄国革命的伟大鼓舞和共产国际在理论和政策问题上的善意干预而得到很大的帮助。像所有其他的政党一样，党是在内部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斗争已成历史事实，它们所牵涉到的问题现在回顾起来是尖锐的和明确的。在早期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有政治意义的，是很容易理解的。历史本身就可证明。

党在二十年代后半期的发展，对于一个企图弄清楚这个时期的正式纪录的研究者来说，一定是个谜；因为这个时期的情况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受到了一部分的歪曲，而在后来的记述中又受到进一步的歪曲。在这些年中，各派系在国内政策上的真正分歧实际上已经缩小，他们往往能够在共同的决议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派系斗争之激烈却有增无减。

反正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党开始像一具无法控制的机器似的乱转起来。早期暂时结成的派系之间的内部斗争是有一定目的的，是能够予以解释的，尽管参加斗争的人有种种错误和缺点，这种斗争仍然推动党向前发展。现在这种斗争却让位给一种固定化的派系所进行的“权力斗争”了，这些派系为了压倒别人或保全自己而进行了一种政治帮会斗争形式的盲目斗争。

最初是为了共产主义而进行斗争的人开始丧失了他们的目标。派系斗争那时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如今却成了目的本身。忠于共产主义和忠于党的精神逐步地、不知不觉地让位于

忠于派系的精神。在这种疯狂的斗争中是不可能有什么胜利者的，¹⁹这场斗争终于以分裂成为三个方面和一个新的开始作为收场，这是当时的参加者所没有想到的。

五

是什么事情使得机器失去控制的呢？问题就在这里。关于这个多事之秋发生的不体面的争吵和丑闻有很多说法，这些说法不论是真是假，都没有解决根本原因问题，都只是绘声绘影，并不能说明问题，不折不扣应归入流言蜚语一类。

这种流言蜚语把这个时期的各项事件的个别当事人说成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宰。这未免有点过奖——也可以说有些过责。党的领导人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造成的环境中活动的。他们的行动比起对他们发生作用的因素来说要次要得多。当然，他们是共产党人，献身于一个伟大的事业。仅仅这个事实，就使他们比他们同代中那些毫无大志的人优越。但是他们不是神仙也不是魔鬼，他们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创造历史。他们甚至不能够坚持自己原来的打算。

共产党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历史也是不同的人们的历史，即使姓名没有换，可是人已经变了。在考察早期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人物看成是当时的人物，而不是看成是由于时间的消逝和种种的压力后来发生了变化的人物。本书所涉及的这个共产党历史时期是一个多变的时代——不论是在党内，还是在领导这个党的人们中间。

为了要了解他们的变化，必须认识到当时整个世界的情况和这种情况对他们的影响。像他们以前的许多人物和以后的许多人物一样，他们本来是决心要改造世界的，结果却不知不觉地²⁰

被世界所改造了。他們的用意是好的（当然也可能也有一些例外）。他們的錯誤在于，他們並沒有充分認識到對他們發生影響的力量，這是他們毀滅的原因。

這就使得當時比他們的意志更為有力的國內外形勢中的客觀因素更加容易把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變成——起初是不自覺的——一種過程的工具，這種過程與他們原來的設想是背道而馳的，並且最後使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經過不同途徑墮落成為叛徒。

六

前共產黨人一面忏悔他們年青時代理想主義的錯誤和激烈的行動，一面——同沒有這種特殊榮譽的其他人一起，把本國左翼運動所遇到的一切罪惡和不幸都歸咎於通過共產國際實行的“莫斯科控制”，這種做法很久以來就成為一種時尚了。這種指責的含意是，要是美國激進運動採取一種孤立主義的政策，摒棄外部世界的“外來影響”，它本來會是一帆風順的。

同時，這一派思想——如果你願意這麼稱呼它——的代表們却自相矛盾地向美帝國主義熱烈地推薦一項“天下一家”的國際主義政策。他們終於發現了（為時未免已晚）美帝國主義的優點，其中有些人便充當非正式的傾向，在有些情況下甚至充當了它的直接的代理人。

在斯大林統治下，俄國共產黨本身已由於腐敗而陷入保守主義，毫無疑問，共產國際中要它領導的其他共產黨也受到了感染。不過這只是一部分的情況。還有其他的影響也在起作用，侵蝕着美國共產黨的革命純潔性。這種影響就存在於國內。僅僅外來的影響，不論來自俄國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足以毀滅美

国共产党。

事实上,在现代世界中,国际主义一点也不是外来影响。整 21
体同部分并不是无关的。美国,尤其是在1914年以后,就一直是“天下一家”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大的一部分。美国受到其他国家的事件的影响,也对其他国家发生影响。不可能有独立存在于这个国家之外的“国际形势”。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受到国际影响而发生反应的时候也必然免不了同时受到国内情况的影响。

当初产生共产党的偶然因素就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两个方面。它后来每一阶段的发展也是如此。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俄国革命和美国国内激进主义运动的结合的产物。“一切来自俄国”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俄国革命的思想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才能生根,需要有敏悟的人才能发展它们;就我们所知,俄国革命并没有使得在月球上创建一个共产党。

对于美国共产党的产生,国际事件和思想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事件和思想需要人做媒介。从美国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早在俄国革命之前就已经成长的美国的革命家运动提供了这种媒介。

七

上述国际的和国内的混合因素,在美国共产党后来逐步退化的过渡时期,同样也交互对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开始于二十年代中期,到二十年代结束时实际上已完成。在这个时期,美国资本主义由于在战后的空前繁荣造成了美国生活的日趋僵硬的 22
保守倾向,这种倾向与同时的俄国国内出现的反动倾向,好像一把使人无从逃脱的箱子一般从两个方面夹击了襁褓中的美国共

产主义运动。

在这个时期里，反动的俄国影响通过共产国际在美国党内造成了絕大的祸害。关于这一点，有很充分的証据。但是，把全部责任都推在俄国人身上，把他們当作一种外来的不能控制的势力，仍是不对的，因为他們反过来也受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影响。这个时期美国的繁荣把欧洲资本主义带到了战后危机和革命高涨后的新的稳定状态，这是在俄国造成退到国内实行改良主义的情緒和促成斯大林主义的兴起的主要因素。

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美国资本主义惊人旺盛的精力似乎堵塞了美国国内革命运动的一切前途。随着劳工激进运动浪潮由于日益繁荣的景气而退落，党开始在各方面遇到了困难。

佩帕尔冒险主义的一切欺詐計劃，一切虚张声势和自欺欺人的“政治手段”，都一败涂地。甚至以前踏实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也开始逐步丧失。前一时期工会取得了颇为可观的胜利，这时却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实际上已到了潰败的程度，而龔柏斯之流的“反共迫害”却在工会运动中横行无阻。党在1924年总统竞选中得票之少极其有力地証明了党的孤立。

当初使得党的领导人雄心勃勃地要通过一系列的强行軍在短期內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美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光明前景，到了党在1924年竞选运动后收拾残局时已逐渐消失。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23

这个时候，党应该根据根本理論来重新研究它的前景，准备坚守；党应该認識国内新的不利的形势，但是也不要把这种形势看成是永久不变的。当时，党需要进行一次認真的理論上的教育工作，需要一个历史的观点，以此为基础来满怀信心地进行耐心的工作，为将来进行准备。但是党却没有这样做。

三十年代的經濟大危机和它为革命的政党所带来的无限机会已經快要出現了，但是党的领导人沒有看見。他們口头上虽然談到了这个危机，那完全不过是出于旧习惯罢了，在实际上他們却开始怀疑起来。作为一个革命組織的党的退化过程这时肯定地已經开始了，而且退化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当危机最后来临时——相当符合馬克思主义預測的日期——党已不是原来的党了。

八

当时党需要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像原先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所得到的那种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援助。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代，共产国际干預的目的确实实是为了帮助年青的美国共产党人建立一个美国革命的政党。但是現在这种帮助却沒有了。因为共产国际本身也跟着俄国党而陷入在各国国内实行改良主义的境地，把所有其他政党都拉了进去。

由于国际革命前景的黯淡，由于对于先进国家工人阶级改造社会的能力丧失信心，这就促使苏联在国内退到实行改良主义，希望同世界資本主义达成妥协、同它“共处”，并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为滿足，这无异表示放弃世界革命的綱領。

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由于本身的厌倦和丧失历史观点而接受这一理論，也无异表示它們放弃在本国进行革命的綱領。²⁴同时，为了聊以自慰起見，它們也得到了一种代替的綱領。这个綱領使它們在轉入改良主义时不失体面，能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仍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个“社会主义”不过是在別的国家里而已。

不可能再想出更加有效的办法来使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丧失革命斗志了。这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同一切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共处”的反列宁主义理论使苏联的官僚机构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保守、反革命势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从革命的机构退化成为苏联的边防军和为它的外交政策服务的压力集团。

在这个修正了的新纲领指导下，共产国际对美国党的干预只有加重它在国内的困难形势和增加混乱。

九

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受到影响，而这一次，不论国内或国际都是不利的影晌。它在这个时期的衰落和退化，正如它的早期的兴起一样，首先必须归咎于国内和国际加在一起的两方面因素，而不能只归咎于国内的或国际的一方面因素。这两个混合因素现在起着有利于保守主义倾向的作用，以千钧重量压倒仍然处在襁褓阶段的美国共产党。

在这些日子里，要在美国做一个积极的革命家，进行孤掌难鸣的宣传，叫喊没有回声的口号，是很困难的。党的领导人倒没有因为在普遍繁荣中分享到的个人利益而腐化，但是他们受到了四周一片冷淡的汪洋大海的间接影响。

25 在这个不幸的时候，“莫斯科的控制”的确起了不利的作用，但是它并不是在一种真空的状态中起作用的。二十年代后期美国生活中的一切条件包围着毫无准备的襁褓中的党，消磨了党内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的斗志，使他们经不起俄国的打击。党变得很容易接受浸透了保守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因为党内干部也不自觉地屈服于他们自己的保守的环境。

一些原来的领导人成了斯大林主义者，因此他们把出卖美

国工人来为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服务当做职业。也有一些人终于逐步堕落，经过斯大林主义的桥梁而直接为美帝国主义服务。也有一些人在中途掉了队。这些事情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互相有关的过程。这需要时间。但是一旦这个过程开始了以后，时间就起了无情的作用，使这些人斗志涣散，使他們变成叛徒。

我认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草創时期干部的堕落，不論从規模来看，还是从所触发的自我否定以及背叛他們一度拥护的崇高事业这种极端行为来看，都是美国历史中最可耻和最可怕的一章。任何一种社会理想主义的运动都沒有遭到过这样道德上的灾难，都沒有讓它的人材遭到这样的腐蝕。但是仍然必須認識到，除了其深度和規模以外，在这种时间和环境腐蝕人和理想的丑恶景象之中，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总而言之，这就是工人运动历史上一切堕落者的逐步演变的历史，从早期的英国工党改良主义領袖一直到最近变得老于世故和心广体胖起来的产联干部都是如此。前者一度还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属于第一国际的；后者会告訴你，他“过去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自我否定的語句中还有一种羞答答的引以为荣的情緒。

对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草創时期領導人的可耻叛变所作的 26
这一唯物主义的分析，使他們既沒有神的荣光——这种荣光他們本来是不配的——也不致于被視為魔鬼，而只是暴露了他們作为在压力之下可能犯錯誤的人的本色。他們比他們同时代的人表現得好一些，時間也久一些，但是到最后他們还是屈服于时代压力之下。如果可怜地宣布不再忠于少年时代的伟大理想的行为可以称得上是悲剧的話，这就是他們沒落的悲剧。但是，这

并无任何神秘之处。

十

共产党的退化并没有吞噬它的队伍中所有的人。有一小部分人反抗了斯大林主义而没有向美帝国主义屈服。这也是有其原因的。

有些人把多数人的堕落解释为是他们个人的特性和过失的必然结果，或者是不道德的共产主义的必然结果，但是上述少数人却是明显的例外，这使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人大惑不解。他们无法说明，为什么有少数的共产党元老既没有变成斯大林的仆从，又没有成为政府的告密者，而仍一如既往，继续在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的领导下为革命纲领而斗争。

使得道学派评论家感到特别不解的是，我也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事实上还是始作俑者，而且使他们更加费解的是，我居然在二十五年的斗争中始终如一的坚持这个地位。这些喜欢对别人的行为和动机妄加评论的高尚的评论家从来没有忘记指出：在党内一切幕后派系斗争中，我总参与一份，不论在当时或者事后，都从来没有假装超然清高，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提出任何的辩解或作任何的忏悔——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没有说谎。27 既然这样——他们不免问道——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在托洛茨基遭到彻底失败，被开除出党，而且被放逐到遥远的阿拉木图以后，怎么可能“出来拥护托洛茨基”呢？

这个问题的确使这些多管闲事的人很感兴趣，因此对于我采取这个行动的原因，不乏种种猜测。我在阅读政治报刊——这是我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的时候看到，对于我在1928年的反抗共产国际斯大林化一事，有的称之为一个“错误”，有的称

之为一个“偶然事件”，有的称之为一个“謎”。不論說是錯誤也好，偶然事件也好，謎也好，他們不了解的一点是：一个二十年代的共产党派系斗争者，既然像其他的人一样，都是为了要取胜才进行斗争的，为什么竟然有意識地参与一个“失敗了的事业”，而且还坚持到底。

关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这既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个錯誤。在我所著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的开头几章中，我已經談到了我在1928年的行动的事实真相，以及采取这个行动的原因。我当时認為，这些原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当时是，現在也仍旧是共产主义者）的起碼責任，因此，是正确的和合乎邏輯的，二十五年的反省，再加上我为了执行这个决定而进行的不断斗争，仍旧沒有改变我的看法。

当我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間第一次讀到托洛茨基的《綱領草案批判》的时候，我就馬上——而且永远——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基本上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代表着真正的革命綱領——原来的馬克思主义綱領。除了支持他們以外我还能做什么？他們是一个被打敗的、被开除的、被放逐的很小的少数派，这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原則問題。对于市儈來說，这也許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对于一个一旦認清了原則以后就按原則行事的共产主义者來說，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在1928年决定支持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并且在这个問題上同共产党內一切派系决裂，并不是我这一方面的突然“轉变”；我在1917年决定支持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維克而抛弃世界产联也是如此。

在作这两次决定的时候，我都仍是我年青时候要做的

人——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家。不論前一情况下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也好，后一情况下的左派反对派的英勇斗争也好，都使我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也是我自己一直所不能弄清楚的东西。这使得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更有力的战士，来为我自己的事业进行斗争，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使我成为另外一个人。它们并没有“转变”我为革命派；我本来就是革命派。

十 一

关于这一点，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在这里，在叙述了共产党退化的根本原因之后，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反抗的和新开端的创始者和组织者来自、而且不得不来自那个其大多数已屈服于外来压力的党，因此，为什么目前和将来的革命运动必须承认这个党是它们的祖先。

客观环境是有力的，但是并不是全能的。在正常的情况下，现状往往会强使人从俗随流，但是这一法则并不是自动生效的，也不是普遍有效的。否则就不会有反叛者和持异议者了，也不会有进行社会变革的人的因素了，世界也就不会有进步了。

例外的人是存在的；而这些例外的人在大多数人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之前很久就成了革命者。这种例外的人是有历史觉悟的分子，是组成先锋队党的阶级中的先锋。做²⁹革命者和参加革命政党的行动是一种反抗当时客观环境的自觉行动，是要改变这种客观环境的意志的表现。

但是革命者在反抗他们的社会环境和努力改变这种环境的时候，仍旧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仍然要受到它的影响和压力。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这样的情况：时机的不利转折和预期中

的革命的推延，加上日常單調的生活所造成的疲塌情緒和喪失遠見的情況，往往會使革命政黨的幹部也趨于保守，為他們的退化準備了條件。

根據長期的歷史經驗，可以歸納出一種規律：反抗社會環境和組織政黨來領導一場革命的革命幹部，如果革命推遲太久的話，可能在同一環境的不斷影響和壓力下退化。

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原來的領導人本來是馬克思直接教誨的門生。這種情況在俄國共產黨中也發生了，他們的領導人本來都親聆過列寧的教導。在俄國人的大力推動下，這種情況在美國共產黨內又發生了，因為他們的領導人缺乏有系統的理論修養，又不得不在世界上最富饒和最保守的國家所造成的最不利社會環境中進行活動。

十 二

但是這個歷史經驗又表明，這個規律也有例外。譬如一些始終如一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仍舊忠於這個旗幟的革命者。革命的政黨只能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的適用性是延續不斷的，一百年來一直是如此。創造了革命政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比它所創造的政黨更加有力量，決不會因為這些政黨的沒落而喪失生命力。它總能夠在原来的組織中間找到代表來領導重新建黨的工作。

這些人是承先啟後，繼承傳統的人，是正統理論的保衛者。不受腐蝕的革命者由於形勢所迫必須開始組織上的重建工作，他們的任務從來不是宣布新的天啟——這種救世主一直不少，但後來都被淘汰得一干二淨了——而是要恢復原来的綱領，並且使這個綱領符合新的情況。

他們從來沒有企圖摧毀和拋棄原來的組織的好的經驗和成就，而是要將其保存下來，並加以擴大。他們從來不是向真空發出他們最初的號召，也從來沒有企圖在不明身份不明來歷的人中間征募一支莫名其妙的隊伍。相反，他們總是在原來的組織中尋求——並且終於找到——新組織的創始幹部。

這一點的證明是，第二國際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十分可恥地垮台了，但它還是從自己的隊伍中為新黨和新國際提供了力量。有些社會主義者仍忠於社會主義；並不是人人都叛變投降了。首先，在俄國黨里，在德國黨里，在全世界的每一個其他國家的黨里，出現了不受腐蝕的社會主義者，他們仍忠心耿耿，起來反對原來組織的退化，開始建立新的組織。甚至第二國際的丑惡產物、根本談不上是個黨的美國社會黨，也提供了一批在這些光榮的隊伍中值得一提的幹部。

31 在共產國際中，同樣的事情幾乎以同樣的方式發生了，而且是根據同樣的規律，有着同樣的例外。俄國黨以及共產國際所有其他黨（包括美國黨）的領導幹部的退化，同第二國際的退化情況相同，所以根本原因也是一樣的。俄國黨和共產國際所有其他黨的絕大多數領導幹部都背叛了綱領。

但是並不是全都如此，原來的組織再一次從自己的隊伍中提供了力量，開始為恢復原來的綱領而堅決鬥爭。俄國黨再一次提供了領導人，共產國際的所有其他黨再一次提供了得力的幹部。美國共產黨儘管有理論欠缺和經驗不足的一切不利條件，儘管有年輕幼稚而又未老先衰的一切缺點，也還是為新的鬥爭和新的開端提供了一些未受腐蝕的共產主義者。

十三

有人認為目前和未來的革命政黨的這種起源是一個“謎”，是一種“偶然事件”，他們不明白高舉原來旗幟的人怎麼可能來自我們在這裡加以無情揭露的二十年代後期的共產黨，對於這樣的人，應該向他們反問另外一個問題：除此之外，他們還可能來自何處？

要進行復興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鬥爭的人，必須能夠了解這項任務的責任和風險，必須有過去的經歷足以承當這樣的責任和風險。在美國共產主義運動頭十年結束的時候，在它的隊伍之外，在什麼地方能夠找到這種人呢？

在社會黨或世界產盟中當然找不到，更不用提社會勞工黨和目空一切的空談家組成的無產者黨了。到1928年的時候，這些組織已是不能發芽的空殼，一點革命的胚胎都沒有了。到1928年，當偉大的鬥爭開始的時候，所有有組織的革命者——32那就是說，所有表示忠於社會主義和願意為社會主義努力的人——都組織在共產黨里，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

在1928年的時候，在美國的所有政黨之外，可能也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的理論修養，以及在智力和性格方面的條件，比那些從共產黨內激烈派系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導這場新鬥爭的人，還要好一些。我不能否認這種可能，因為我無法知道。但是有一點我是知道的，那就是，如果真有這樣人的話，他們就是一直在隱居中，而且直到今天還沒有線索可以找到他們的下落。他們沒有出來進行鬥爭，正如他們當初沒有出來為美國共產主義運動進行工作和鬥爭一樣，而以前的工作和鬥爭卻為新的使命挑選和考驗了人材。

这些假設的优秀力量沒有投身于斗争；正如法国人所說，他們沒有“委身”于斗争。因此不能把他們計算在內。在牽涉到責任和風險的時候，迴避者是不能計算在內的。斗争必須由在場的、准备参加的人来开始。要是由一些以前不明来历和沒有投身于斗争的人——不知来自何处的一些陌生人——来完成这个任务，那才是一个“謎”和一种“偶然情况”。

美国的托派創始者，未来胜利的革命政党的創始核心，来自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拥有由于过去的經驗能够担当重建工作的人材。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自告奋勇的人，能够承当这个重負和危險，沒有其他的人堪当这个荣誉——这絕非什么过讚之詞。

十 四

33 革命运动首先产生于經濟条件，而且其发展成长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經濟条件。长期經驗証明，經濟条件在客观环境改变后也可能制止革命运动的进展，并且把革命运动推回去。阶级斗争双方中的个人所能起的作用是有个最高限度的，因为个人必須在这一总的条件下进行活动。如果你要弄清楚早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伏，如果除了个人的缺点、爭吵、偶然情况之外，你还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一些东西的話，最好記住这一点。

目前美国的政治迫害，虽然产生于这样的一种看法：革命运动是由阴谋家的意志所制造的，因此能够用警察措施来消灭。这种假設在我国共产党头十年的历史中是得不到什么証明的。

美国激进主义运动不論是什么派系，在战时和战后时期（1917-1920年）都受到了疯狂的迫害。警备团员袭击激进分子

的集会是屡见不鲜的事。几乎所有的著名领导人都被起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逮捕。整船整船的外国出生的激进分子被放逐。成百上千的人遭到监禁。

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无畏地面对这一切，但是创始的共产党人是相当勇敢的，历史就是明证。迫害只能减少参加运动的人数，但并不能摧毁运动的基本干部。党在1921年年底从地下转为公开时，斗志昂扬，它的领导在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受到过考验，包括迫害的考验。

随着美国经济在1921年危机后的迅速恢复和长期繁荣的开始，政治局势也和缓下来，警察对激进分子的行动实际上也停止下来。但是这并没有帮助革命的政党，一点也没有。相反，它却是这个革命的政党遇到真正困难的开始。

繁荣似乎把革命的前景推到遥远的将来，这较之以前的迫害使党受到更重的打击。迫害虽然使党的人数有所减少，但是党的干部仍完整无损，充满信心。而繁荣却使干部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迫害使党的躯体受到损害，而二十年代的长期繁荣却扼杀了它的灵魂。 34

在大洋彼岸，同样的根本客观因素——美国繁荣所带来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新稳定——对俄国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派起了同样的影响，并且通过他们，对共产国际起了同样的影响。而保守的共产国际又对美国党产生了严重的退步影响，美国党还没有渡过自己的青春时代就已经开始得了保守主义的衰老病了。

党在二十年代后期的历史，必须参照这个背景情况来研究。在这里，对于我们目前的时代，也有一个有益的教训。从全部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美国激进主义运动的衰落

主要是由于长期繁荣而不是由于政治迫害；不論有无政治迫害，新的經濟危机将为运动的复兴准备条件。

我們也可以期望，新的复兴将会得到更多当之无愧的领导人，他們从上代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知道要勇敢地面对不利的时刻而保持清晰的历史观点。这个历史观点是：美国資本主义的稳定只不过是暫时的表面現象；美国工人的革命才是真正的现实。

第一編 給一位历史学家的信

我的論点

35

1954年3月2日

我已經接到了你的信，得悉你正在研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对你的工作至感兴趣，并且願意尽我所能，給你帮助。

你的任务不会是輕松的，因为你将如身入一块未經发现的土地，那里大多数看得到的路标都是倒着写的，而所指的方向还都是錯誤的。我所碰到的一切材料，不論是叛徒們还是官方的辯护士提供的，都是有傾向性的和伪造的。客观的历史学家若要探求真相必須对这些互相矛盾的材料保持双重性的警惕。

斯大林主义者不但是历史上空前最有系統和最专心致志的撒謊大家，而且还博得职业反共分子的变相贊賞——受到他們的模仿，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是各色各样的撒謊者在每一場合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而大做文章的一个題目。

虽然如此，絕大部分的主要事实都是有案可查的。困难在于解释；而一个历史学家，即使怀着世界上最好的心願，如果不能正确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我就怀疑他到底能不能写出一篇真实的报告，能不能使人們理解这些事实。

你知道，在我所写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一書中我曾談到美国共产主义的草創时代。在过去一年中，我又曾在总结我

36 們运动的当前的討論时，談到了这一个时期。《第四国际》1953年5-6月合刊上刊载的我党关于“美国的斯大林主义和我們对它的态度”的決議，就是由我执笔的。

我在那里头也談到了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在我們討論的过程中，我还发表过其他文章和信件，提到这个时期。这些材料都可以給你。我打算在今后再詳細地来談談这个问题，因为我肯定地認為，理解美国共产主义的草創时代，对于教育新的一代的美国革命家有极大的重要性。

我就美国共产主义早期的历史所写的文章，目的主要在闡明我的基本論点，就我所知，这种論点还没有其他任何人加以闡述。它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

共产党原来是一个革命組織。共产党当初的所有领导人（他們后来在党内分裂成三个固定的派系）开始时都是想在美国鬧革命的美国革命家。假若不是这样的话，他們根本就不会参加到这个运动里面来，也不会同社会党的改良派分裂来組織美国共产党了。

即使有人說，在这些领导人中，有一些是追求名位的野心家（这些人后来的发展往往証实这种看法），也仍然不能解释，他們为什么要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追求名位，而不到工商企业或者自由职业的天地中，不到资产阶级的政界中或者工会官僚体系中去追求名位。在这些方面，至少对其中有些人來說，当时是大有机会的，然而他們却还是有意置之不顧。

美国共产主义創始年代的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艰难困苦、险恶万状的道路。在我看来，他們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唯一的解释是，他們起头都是革命者，甚至其中的野心家也相信工人革命会在美国胜利并且希望自己能依托这样的一个前途。

至于并无个人利益可以追求的基层党员，那就更不必说是被革命信念所鼓舞的了。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是相信我 37 国革命的前景的，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样的革命者。

美国共产党并不是以斯大林主义起家的。共产党的斯大林化毋宁说是在二十年代的长期繁荣期间开始的退化过程的结果。那个时期持续了相当久的繁荣逐渐被美国各阶级的广大群众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在共产党内也不是没有影响的。它软化了党的领导干部，而且破坏了他们原来对我国革命前景的信念。这使他们后来轻易地接受了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对于那些接受这个理论的人来说，作为革命已经胜利的“一国”的俄国，就成了美国革命为之奋斗的代替品了。从那以后，我国的共产党就把用各种各样方法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压力以“保卫苏联”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而不再有任何自己的革命目标了。此后共产党在美国的政策的一切迂回曲折的变化，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解的，都有着一个中心动机——那就是使美国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保卫”另一个国家的革命。

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头几年美国外交政策同苏联外交针锋相对的时候，共产党要展开狂热的激进活动；为什么在罗斯福承认了苏联，并且对克里姆林宫在外交上采取妥协的方针以后，共产党要同罗斯福和解；为什么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时期共产党又同罗斯福分裂；为什么后来当华盛顿和克里姆林宫在战争中结成联盟的时候，美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又采取热烈的和解态度和无节制的主战态度。

共产党目前的政策，它把阶级斗争从属于和平主义的“和

平”运动的做法，它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民主党的决心，都同以前历次的政策转变一样有着同一个一以贯之的动机。

共产党的退化是从它放弃我国革命的前景时开始的。它从此就变成了为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政府服务的一个压力集团和啦啦队。它誤以为这种官僚政府是“另一个国家中的”革命的守护者。

我不应该漏掉我的论点中的最后一点：共产党的退化不能用一个草率的结论来解释，說这些领导人一开头就是一批无賴（虽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論是成了斯大林主义者还是成了叛徒——最后确实成了头等的无賴。）；而是要以一种情况来解释，那就是他們成了一种錯誤的理論和錯誤的信念的受害者。

如果放弃在我国实现社会革命的斗争，不把这一斗争看成是我们时代的现实前景，如果把自己貶低到仅仅充当别国革命的同情者，我国共产党的下场是可以預知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不例外。

我坚信美国革命者应当真诚地同情其他国家的革命，并且尽一切可能給他們以帮助。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坚决相信能在我国进行革命的党。

沒有这样的信念，共产党或者社会党就是名不副实的党。这个党就不再是本国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推动者，而是它的障碍。这样的党对其他国家革命的同情也就分文不值了。

这一点，在我看来，就是美国共产党从兴起到衰落的真实的正确的解释。

考察早期共产党的四种方法

1954年7月20日

我随函寄上手稿一份^①。它的目的在解释共产党在二十年代后半期的变化，并且提出我对其基本原因的看法。你将注意到，我略去了你在来信中就这一时期所问到的许多事件和局势变化，我将尽记忆所及，来一一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愈是想到这一时期，我愈是感到对事实的叙述只有放在解释的框子里才能有意义。

照我看来，对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至少可以有四种看法，其中不包括共产党的官方看法，因为它不值一提。

(1)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群间谍和“坐探”的阴谋。(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唱这种调子。)

(2)可以把它说成是一批多多少少满有趣的人们所做的好事和坏事的历史。这批人无事生非，胡闹一场，最后把自己弄得头破血流。

(3)可以把它写成一种独行其是的怪人的传奇，这批人置身于美国生活的主流之外，对它什么影响也没有起。这样的一篇传奇有点像描写各种各样乌托邦的著作，只能时而引起许多教授、想写博士论文的人和那些对远离尘世的空想世界有兴趣的人的注意。

(4)或者，人们也可以把共产党在头十年的演变看成美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它注定要对此后二十年間事态的演变

^① 已作为本书的绪言加以转载。

发生强烈的影响。

最后一种看法就是我的看法。一个历史学者，如果要写一本严肃的著作的话，那么不管他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如何，也许都得考虑对这个题目采取这样一种看法。要不然的话，又何必自找麻烦呢？

只要我们去研究一下新政时期，并且试图解释一下是那些因素使得罗斯福居然能出人意料地引导美国资本主义安然渡过经济危机与二次世界大战，而在他的左面竟没有任何有份量的反对派，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看出美国共产党头十年的历史，特别是这十年中后半段的历史意义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罗斯福是被危机折磨得要死的美国资本主义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政治领袖；而他的最好的助手——我愿意说得再重一点，是他的不可缺少的助手——就是共产党。
10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并不像时下认为的那样，是由威阿—张伯斯间谍集团组成的。这批人打进了华盛顿的某些机构，并且偷出了几份秘密文件，然而这只是枝节中的枝节。

在罗斯福时代，共产党本身成了在整个政治舞台上和劳工运动中支持罗斯福的头等力量。它扮演了重要角色，先是促进和扩大了新的劳工运动，然后又帮助罗斯福来驯服这个运动，磨钝它的激进的——革命的锋芒，而且把它转变为罗斯福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最强大的支柱。

不但如此，共产党也只有在经济危机爆发前的五年中经历过那种逐步的、巧妙的，但却格外有效和不可挽回的变化以后，它才有可能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不妨假定，要是共产党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发展成为一个列宁式的党；要是它保持了当时最坚强的领袖而且这些领袖

始終信仰共产主义,同时又学会了通力合作;要是党曾利用本身对劳工战斗精神的群众性的新高涨那种近乎垄断的领导权給予新的工会运动以真正的阶级斗争的政策,那末,形势的发展本是可以大不相同的。

假定共产党去同刘易斯—希尔曼—莫莱之流争夺新工会运动的领导权,而不是为了外交政策的理由而向他们退让的话;假定在共产党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的工会运动进而建立起一个激进的劳工党,而不是淹没在民主党那样一个罗斯福式的人民阵线里面的话;假定共产党和在它影响下的很大一部分劳工运动反对战争而不是成为它的最热忱,最可靠的支持者的话,那末,形势的发展本来是可以大不相同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才会做的事情。要是情况如此的话,罗斯福时代的美国历史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它肯定是不一样了。设想历史可能走这样一条不同的道路一点也不是幻想。整个局势的关键就是共产党在二十年代后半期的演变。

在我看来,这样,研究共产主义的早期历史就不是搜奇猎异⁴¹式的玄思冥想而是把它放到了它应有的地位——美国历史的主流中。

头几年——在地下的党

1954年4月21日

我非常抱歉,对你3月5日的来信答复得太晚了。这不是因为对你的工作缺乏兴趣,或者不愿尽我所能地帮助你。困难在于我的工作日程都排满了,无法再抽出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

充分地回答你的問題。我把它們看得十分認真，以致不能率爾置答。有一些問題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思考和回憶許多久已忘懷的事情。

我要開始來尽可能圓滿地回答你的問題了。雖然我還不能一下子做到這一點。我將在這裡先開一個頭，我保證在以後再給你繼續說明。

我以堪薩斯城代表的身份參加了1919年5月在紐約召開的社會黨左翼的全國代表會議。我並沒有參加那年9月舉行的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那次代表大會的結果是發生了分裂，並且形成了兩個共產主義政黨。我所以不去參加這次大會的理由，在局勢發展下很快就不能成其為理由了，但是當時我覺得這種理由是很重要的，而且到現在也還是如此。也許還值得談一談。左翼的代表會議使我第一次領略到紐約的氣氛，也使我第一次看到說外國話的派別支配一切。我是贊成左翼的綱領的，但是各個語言分部派的領袖們那種不講究策略的不現實態度，却使我十分寒心，這些領袖們的第一個代表人就是奧爾威奇。他們公開表示決心加速社會黨的分裂，這使我深信他們並不是真正生活在美国，也並不懂得或者並不考慮當時在紐約以外的社會黨黨員的心情。

我擔心過早的分裂會大大超出國內其他許多地方基層黨員的思想準備。因此，我強烈地反對任何可能導向分裂的做法。在我的印象中，里德、吉特勞這一批人（他們是我在這次會議上才初次會面的）要現實得多。他們對工業方面的勞工運動要熟悉得多，也關切得多，而這正是我的主要興趣所在。我參加了他們那一派，這一派後來就成了共產主義勞工黨。

我所以沒有能出席9月份在芝加哥舉行的黨代表大會，原

因就在于我反对过早的分裂，从而也在于我坚持在派系斗争中要尊重党的法纪。根据我的记忆，当时的党章规定，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是有一定党龄的党员。我并不严格符合这条规定，我不愿到大会上去成为一个资格有问题的代表。我以往的活动都是在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中。我直到1918年在俄国革命和左翼兴起以后才加入社会党。因为这个缘故，我不愿被提名为代表，当选的是另外一个符合党章规定的同志。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来，以这种夸张的“合法主义”作为我不参加这次历史性代表大会的理由，也许太迂阔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而且我仍然认为我是正确的。这次轻率的分裂使左翼同成千上万在感情上是革命的，但是仍然还不能在分裂中跟着左翼走的社会党人割断了联系。他们也没有跟右翼走，他们因为对分裂感到灰心而游离脱党，几乎全部都离开了运动。

当然，右翼的领袖们也是一意要闹分裂，而且很可能是不论怎么样都防止不了分裂。但是如果左翼的领导采取更加慎重的策略，对党的法纪更加尊重，对成千上万同情俄国革命，但是仍然没有认识到有成立新党之必要的党员更加耐心，更加尊重的话，分裂本来是可以推迟的。共产党是在芝加哥大会上实行的⁴³一个不必要的，或者至少是为期过早的以剖腹产术取出的产儿，这种行动削弱了党，而且使它几乎在呱呱堕地之时就被扼杀。从这番经验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我还没有看到别人提到过。分裂有时是一桩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没有准备的分裂却是害多利少。

这样一种分裂事实上还是一种双料的分裂，它同我们的愿望相反，造成了两个共产党。在这个既成事实面前，堪萨斯城的社会党基层组织执行着共产主义劳工党的路线，而且同它结成

了联盟。这是四个月以前在紐約社会党左翼全国代表會議上我同里德—吉特劳派所結成的非正式联盟的直接延續。

我在1920年春天参加了在密执安州的布里奇曼举行的地下党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劳工党在这次大会上同共产党內的魯登堡派組成了統一共产党。我当选为中央委員，被派負責党在圣路易—南伊利諾地区的組織工作。我主要是在南伊利諾州的矿工中工作，在这个崗位上干了几个月以后，我又被任命为《劳苦大众》的編輯，到克利夫兰去就任新职，后来一直在那里作中央委員会的常駐代表。

我很快就認識到党在完全的地下状态中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那样我們就同劳工运动和整个国家的实际生活切断了联系。但是当时仍然存在着两个共产党，而且在地下派系斗争中消耗着自己的力量。到1921年春天举行的一次統一大会上才最后統一了各派力量。这次大会产生了新的领导。魯登堡和吉特劳当时正关在牢里，还有其他几个中央委員会的前任委員沒有能重新当选。洛夫斯东和伟恩斯东在这次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員会，不久以后毕特尔曼也补选了进来。

我們开始进行坚决的斗争来逐步实现党的合法化。我也許
44 比別人还要更加坚决地要求党的最后完全合法化，但是这还得要作若干試驗。

我們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驟来試驗有无合法化的可能性。其中第一个就是以合法的美国劳工联盟的名义組織了一批支部，这些組織发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竞选活动，在那一年的选举中提名吉特劳为紐約市市长候选人。我們也以美国劳工联盟的名义举办了討論会和演講会。

与此同时，姗姗来迟的社会党左翼在薩魯茨基(哈德門)、英

格达尔、欧尔金等人的率领下，也脱离了社会党并且组成了工人理事会。共产党派出了一个委员会同这个集团谈判组成一个合法的政党，我也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个党终于在1921年12月下旬成立了。

梅勒赫·爱泼斯坦在《美国的犹太劳工》一书中说，我们曾经作过保证，要解散地下党，但是这个保证后来被背弃了。事实并不是那样，也不可能是那样。我们在当时绝对没有权力同别人成立这样的协议。我们建议同工人理事会集团联合组成一个合法政党，这是受到共产党多数的支持的，同时也有一个明确的谅解——地下党仍然要保持。事实上，在共产党当时发表的文件中，就有几篇文章解释我们怎样设想一个合法的党和一个非法的党同时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工人理事会集团完全知道这一切。他们确实要求有一个单一的合法的政党而没有任何地下组织。但是他们也很知道我们当时不可能答应这一点。他们很可能指望，甚至曾经指望，事物发展的逻辑会保证合法的党获有优先的地位，而最后把地下的组织视为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已没有必要而予以解散。我就曾经这样指望过。这种看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还得再有一年的经验，还要加上共产国际的亲切帮助，才能办到这一点。

我们同工人理事会的代表曾举行了几次联合谈判委员会的会议。我记不起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因为双方都热望统一。工人理事会的代表们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会被占多数的共产党吞并且消化掉。这个困难由于我们在组织方式上作了许多让步而解决了。在代表大会和新的全国委员会中给他们的代表名额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数量上所占的比例。我们在作这种让步的时候，甚为大方，因为我们想造成一种大团结的印象来吸引未入党

的激进分子，而且工人理事会集团有一批有声望、有才干的人物，可以对新党大有好处。

建立了工人党的那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十分成功，十分融洽，并且给了运动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力。馬克斯·伊斯特曼曾在1923年1月号或者2月号的《解放者》上，写过一篇怀抱同情而且頗有見地的文章，你可以查考。你已經注意到，我是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主旨演說的人，而且由于双方協議而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所以能取得这样協議也許是出于若干特別的考虑。我是大家認為必須大加重視的所謂“西部美国”方向的某种象征。除此而外，我确信工人理事会方面認為我比其他的共产党领导人更富有“取消派”的味道——这种印象并不是全无根据的。

为了回答你的問題，我可以說我同洛夫斯东之間的政治合作是1921年党的一切活动的主要动力。毕特爾曼和伟恩斯东在这一合作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我們都是毫无准备地参加領導，在此以前沒有多少經驗的話，那末我們在那个时期的工作是很有效，很協調的。迫切需要使党的活动合法化是政治上压倒一切的考虑。这种考虑在当时証明要比出身和性格的不同有力得多，到后来的摩擦和冲突中，这种不同才起了作用。

我們在組成工人党的問題上沒有能够避免同共产党內死硬的地下派发生分裂。我还記得中央委员会中倡議分裂的两个領袖是杜尔巴和巴兰。威克斯是属于无产者党的。他加入了从
46 共产党分裂出去的那一派——这一派后来称为統一劳苦大众党——而且被任命为他們的机关报的主編。

弗雷納——創建人

1954年6月15日

弗雷納：(答你5月10日的来信)

把弗雷納列为美国共产主义形成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肯定是正确的。在我所写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里，我说过他应当被認為是这一运动的創始人。

我認為約翰·里德和《解放者》报对在美国左翼的广大群众中宣传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維克党的工作尽了最大的貢獻。弗雷納的影响相形之下范围要窄一些；他所办的《革命时代》基本上是一种党内报纸。不过，在这个范围以内，他在形成年青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体系方面，做的工作要比任何其他人都多。同时，他也給这个运动打上了他自己的浪漫主义的和宗派成見的印記。

后来几年，党的官方宣传，把“創建人”的地位給予了魯登堡，这件事是同我的历史公道感相抵触的，我总是对此感到不快。魯登堡——就他本人來說——在先驅者之中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但是他决不是发起人，“創建人”。

* * *

我自己同弗雷納並沒有私人友誼。我在1919年6月在紐約的社会党左翼全国代表會議上才偶然地第一次見到他。我第二次見到他是他作为共产国际“泛美局”的委員回国来統一两个党的时候，時間应当是在1920年底或者1921年初。泛美局的另外两个委員是查理·約翰遜（“斯科特”）和当时住在紐約的日本老社会党人片山潛，后者后来到莫斯科去了，以后就一直在那

47

里住了下去。我記得当时会見的場合是在两个党談判委員會的联席會議上。

我对这次會議唯一还記得的是弗雷納在会上講了話，代表共产国际要求两个党和解統一。他講得十分公正，毫无偏向，而当时所有談判“統一”的联席會議都是爭得相当激烈的。我还記得查理·斯科特后来告訴我弗雷納認為我在联席會議上的行为是“有宗派成見的”。這話很可能并不是不中肯的，因为我当时的确是坚决反对“語言分部派”那种公开宣布要“控制”統一后的党的野心。斯科特告訴我的弗雷納对我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使我对这次會議永志不忘。

弗雷納不久就为共产国际的工作到拉丁美洲去了。后来，我們听說他脫党了，还有消息說他对一些共产国际的經費报不出賬来。

我还記得查理·斯科特在紐約的一次講話(時間想必是1921年后期)，大意是說，弗雷納私用了共产国际的公款，因此这件事党管不了。斯科特曾說过，“他因此得向共产国际报賬”，或者大意与此相仿的話。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件事記得十分明确。在此以后，党的領導似乎就把弗雷納完全忘記了。

* * *

我記不起 1922 年在莫斯科討論过弗雷納的問題。我虽然在那里住了很久，可記不得关于他的案子有什么正式的考虑。

不过，我在这里可以說一件事情，也許对弄清弗雷納的历史有些用处。我有一次到紐約去的时候(時間应当是在 1924 年，也可能在 1925 年)，有人給了我一封弗雷納写来的信。我記不起这封信是誰給我的了，但是我可以肯定这封信是給我个人的。在这封信里，弗雷納說他在做工，并且尽力在工資中摶节儲蓄；

說想設法分期还清他的債務，爭取回到党内，要求我給他以幫助。我对这封信的記憶是十分清楚鮮明的。 48

我回到芝加哥以后，就把这封信交給了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对之进行了討論。最后作出的决定是：因为他的事情牵涉到共产国际的經費，美国共产党无权过問，弗雷納应当向共产国际申訴，在那里解决他的关系，然后党才能有所行动。我把这个决定通过一位当中間人的同志——我絞尽脑汁也想不起他是誰了——告訴了弗雷納。直到多年以后，弗雷納化名科里重新写文章的时候，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最后的消息了。

* * *

在以后的年月中，我从来没有同他有个人来往。但是頗为奇怪的是，我們竟几乎碰上面。他看来已同官方共产党的政治路綫决裂了，但是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有若干迹象表明，他后来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张。当时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組織新党的声浪甚高。在我同卡尔佛頓、悉尼·胡克和其他几个参加卡尔佛頓当时所办的杂志的人举行的一次討論中，我們曾談到了成立新党的問題。他們問，我們对像弗雷納这样的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显然，他們同他已有若干接触和联系。

我告訴他們，我确实不知道該怎么說，因为除非过去那件財務案子能够彻底解决，否則就一定又会使弗雷納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虽然如此，我对弗雷納还是感到极大的兴趣，并且希望能找到办法同他合作。当我在1934年秋天到法国去看托洛茨基的时候，我提出了弗雷納的問題，并且征求他的意見。

托洛茨基也很感兴趣并且抱有同情心，他認為我們决不應該拒絕弗雷納的請求。他最后提出了如下的策略：新的党还太

49 弱，接納一个身負貪污恶名的著名人物是吃不消的。我們为他辯解并不足以給他什么好处，反而会伤害党。弗雷納应当回到共产党那里去，解决他的財務糾紛，得到他們的正式澄清。然后，我們正在組織的新党就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他做一个黨員。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最妥善的办法。我同意照此进行。在我回国以后，就忙于同莫斯特派进行那时已进入最后阶段的談判，由于这次談判的結果，莫斯特派在12月同我們联合举行了代表大会。我記得我曾通过卡尔佛頓集团把托洛茨基的意見轉达給弗雷納，不过我对此沒有絕对的把握。無論如何，我們同弗雷納从来沒有任何直接接触；不久以后他就索性离开了共产主义运动。

* * *

弗雷納确实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他已經完全放弃了他年青时代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后，他又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被判驅逐出境，这件事給他那受到命运残酷播弄的一生又加上了最后的一下打击。他曾把一生奉献給两种彼此对立的事业，而受到了两方面的拒絕。

虽然如此，弗雷納一生中最好的一部分——年青时代的那一部分——是属于我們的。当人們考虑到美国左翼运动在理論知識方面曾处于何等原始的状态，在文化-政治力量方面曾經何等貧乏的話，那么，弗雷納在这一方面的披荆斬棘的开拓工作就真显得十分突出了。

我認為可以很公平地說，弗雷納是美国共产主义草創时期的第一个启蒙者，他在解释和宣传俄国布尔什維克的基本綱領方面做的工作比任何人都要多。直接从原始的美国左翼运动产生的美国共产主义，主要是从弗雷納那里才开始認真地注意起

理論問題來的。

虽然如此，但是要求一个人拿出他力所不及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弗雷納要做一个領袖是太弱了。他吃不住俄罗斯分部派的領袖們那种横扫一切的强大压力，他們有組織上和財政上的力量，而且像揮舞大棒一样来使用这种力量。弗雷納在1919年的社会党左翼全国代表會議已經決定繼續在社会党內部进行合法斗争以后又向奥尔威奇集团屈膝投降，肯定造成了很大的損害。

社会党过早的分裂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分裂为两个党，并且接着又匆忙地、冒失地、而且照我看来还是毫无必要地进入完全非法状态的这种荒謬行为，即使不算是領導的罪行的話，也是他們所犯的灾难性的錯誤。弗雷納在領導中与其說是首恶，不如說是胁从。50

沒有人知道由于俄罗斯分部派狂人把这种疯狂的做法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結果，有多少美国激进的社会党人——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因而脫离了这个运动并游离流散。我一直認為这批敗事之徒缺少了两个人就不能造成这样大的禍害。他們既需要弗雷納，也需要魯登堡，而且由于不同的原因这两人都被弄到手了。

依我看来，魯登堡的責任更甚于弗雷納。弗雷納太軟弱，这是一件沒有办法的事情。魯登堡要坚强得多，但是他受到了过大的个人野心的支配。我之所以对他責备更多，原因完全在此。如果弗雷納在1919年能得到那些知道运动的需要而且有足够的力量来实施自己的政策的人們的鼓勵和支持的話，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很可能已經大不相同了，而从长远看来将会有更大的好处。

事实与此相反，弗雷納被俄罗斯分部派的头子們无情地傾复了，而他沒有得到魯登堡的絲毫支持，后者当时（也是一貫地）对自己，对自己的地位，对自己的作用考虑得太多了。如果有人告訴魯登堡在那段决定大局的日子里，他对美国共产主义所能作的最大貢獻就是加强弗雷納的地位，給他創造条件，讓他能做一个有相当自由的政治启蒙者，魯登堡大概会大吃一惊的。

当时，刚刚从史前时期那种理論上的蒙昧状态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左翼运动，需要時間来研究、学习、消化从俄国革命中爆发出来的伟大的新思想。自以为天下第一的魯登堡不懂得，在当时，弗雷納的启蒙工作要比他的工作更加重要，不懂得他应当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弗雷納的工作。

早期的領導

1954年5月5日

你的来信触发了我对早年的許多事件的鮮明的回忆，这些事件久已沉睡在我的心底了。我将热誠地、尽可能充分而完善地来答复你所提出的和你想要补充提出的問題。

在你的問題里面，有几个使我痛切地感到你对我多年来所淺漬其中的問題研究得要比我深得多。你大概知道許多我不知道或者目前記不起来的事情。虽然如此，我的回忆和我对事情的看法也許可以帮助你得出一幅更完整的图画。

在你就从1922年起的那段时期所提的問題中，我沒有看見你提到約翰·佩帕尔。这确是一个很大的缺漏。难道你竟可能沒有碰到关于这个突出人物所起的突出作用的任何材料嗎？

旧派系的分裂和注定是“带有永久性的”新派系的結合；“联

合农工党”的全部冒险事业和与之有关的异想天开的政治活动；以及 1922 年到 1924 年間的許多其他事情，——所有这一切都是圍繞着佩帕尔发生的。

我自始至終都是他的反对者。但是如果他当时的朋友中活到现在的人沒有对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在党务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什么材料的話，那末，为忠实于历史起見，我就感到有义务来填充在你所掌握的材料中这一段令人驚訝的空白。如果你能讓我知道你对佩帕尔的活动到底知道些什么（如果你还知道一点情况的話），和你目前如何估价它的話，我将能更好地从我的角度出发来填滿这幅图画。

在你 4 月 26 日的来信中，你曾就工人党刚成立时的领导問題問了两个补充的問題。你和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的。你显然对文献記錄本身要熟悉得多，而我却不得不完全依靠我的記憶，依靠我对当时的人物和事件的亲身經驗以及他們留給我的印象。⁵²

我們的运动当时还属草創，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对派系斗争缺乏充分的記錄。在实际行动、个人談話、委员会會議和未公开发表的演說中所做的和所决定的事情要比在文件中所記錄的多得多。这不是最好的方法，然而当时却就是这样办的。不过，我也許可以为我們辯解一下，我們是还没有出师的学徒，还没有学到必要的本領就被选入领导机构，并且被迫担当起领导工作来。

我担心美国共产党头十年——直到形成托洛茨基派和我們在 1928 年被开除时为止——历史的空白太多，以致一个历史学家如果一味信賴文献記錄，就会很容易感到迷惑不解，或者被引入歧途。我相信你現在搜罗各个参加者的回忆来充实你所看到

的文字資料，是很明智的。雖然你這樣做很可能又會碰上彼此說法互相抵觸的新問題。

當時參與其事的人，即使是願意按照他們所記得的實際情況來談，彼此的解釋也很可能會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他們的記憶也可能會因為他們後來的演變而染上濃厚的色彩，以致你會發現他們提供的材料很少有共同之點。在我來說，我只能保證，我在提供我所記得的任何事實的時候，一定嚴格尊重實際情況，同時也不隱蔽我對美國共產主義頭十年的真實意義的看法以及我對於各種具體事件如何體現和反映這種真實意義的看法。但是，我想你也會承認，各個當事人在事過境遷而又心平氣和地回憶往事時所提供的經過深思熟慮的解釋，也能從各個不同角度來說明這一個時期。

* * *

我（在4月21日的信中）所說的1921年春天的統一大會“產生了新的領導”（洛夫斯東—坎農，再加上偉恩斯東和畢特爾曼），需要作某種解說。它肯定是“新的”，因為在這四個決定性的人物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從前曾擔任過中央領導工作；但是它也應該被看成是臨時性的。

它在那樣一個時候是有決定意義的。它後來證明大體上還能夠勝任當時要它擔當的緊急的歷史性任務——即打破對地下組織的迷信，並且建立工人黨來作為展開共產主義政治活動的合法中介。

在我看來，這一成就的重要性無論怎樣估計也是不會過分的，因為這一成就，再加上也是由這個領導機構所倡議和支持的現實的工會綱領，標志著一個轉折點，美國共產主義的美國化就是從此發端的。“洛夫斯東—坎農聯盟”並沒有維持很久，但是

当它还存在的时候，是极有建設性的。

这一合作是政治第一的原則的胜利，是政治上的一致压倒个人間的对立的胜利。很难再找到两个人在出身、性格、脾气上能比洛夫斯东和我差别更大的了。在我們的关系中，沒有一絲一毫个人气味相投之处，而且——至少，在我这方面——也沒有一絲一毫个人的好感、信任和尊重。虽然如此，在压倒一切的政治上的必要性之下，在一致同意应该做什么的合理的協議之下，我們一起工作得很有效，很协调。

如果有人問，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头十年的一切派系斗争中，个人的对立和抗衡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那末就該承認，它們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但如此，我还要根据四十多年的观察和体会进一步說，它們似乎在每一次派系斗争中都起了作用。但是在这一次，在为使美国共产主义打破其地下孤立状态和使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美国化而进行的斗争中，政治考虑和政治上的必要性显得比个人的对立更有力，——而这是对党有利的。

上面曾經提到，魯登堡和吉特劳当时是关在牢里的；福斯特是直到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在 1921 年秋天才入党的，当时还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佩帕尔后来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却还没有成名，也沒有人听說过。在魯登堡于 1922 年春天出獄以及福斯特和佩帕尔相繼参加党的活动以后，这三个人就开始担当最显要的职务。为成立工人党而进行了斗争的临时领导机构在那以后就被吸收到了更大的领导机构中去了，不过后者再也沒有能团结一致地工作过。

当然也有別人曾在 1921 年的斗争中起过作用。貝达特就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許多人，但是直到現在，我的印象是，他們的作用虽然重要，却只起了支持的作用，而不是决策者的作用。

洛夫斯东在此以前确实已在紐約基层組織中嶄露头角，但是，除其他原因而外，他当时身涉嫌疑，使他直到 1921 年春天的統一大会以后一直不能参加中央領導工作。我想你知道在威尼茨基案件中他作为国家方面召来的証人作証的事情。如果有人打算在一本历史著作中着重写有关的人物的話，那末，洛夫斯东的事情，包括威尼茨基案的插曲和它的余波在內，肯定是值得写一章的。

毕特尔曼以前曾在紐約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嶄露头角，特别是在犹太人黨員中間。但是到 1921 年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才真正标志着他开始担任全国性的領導工作。我个人在 1920 年末到紐約以前就不曾見過他，而且連听也沒有听說过。

我把 1921-1922 年的領導机构說成是“新的”这一点肯定是正确的，只要人們所指的是那一个时候的那个全国性領導机构的中心和决策的核心而言的。我第一次見到左翼原来的全国性領導人是在 1919 年春天在紐約举行的社会党左翼全国代表會議上。我和他們全是初次見面，面孔都是陌生的。我認為那里有四派領導人，每一派都代表着很大实力，彼此間显然很少合作。这次會議給我这个地方代表的印象是，政治路綫的斗争往往同个人地位的竞争混在一起。

55 第一个派別是，外国語言分部派，領袖是奥尔威奇。他們要求立即同社会党分裂，立时立地成立共产党。他們簡直不是生活在美国，我坚决反对由他們来領導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个派別有的是像下面这样的一些人物：当时杰出的“理論家”和政治領袖弗雷納；代表着强大的克利夫兰党組織而已經名聞全国的魯登堡。他們反对立即分裂。弗雷納毫無疑問是最有效的首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我对他所做的工作評價极

高。我尊重魯登堡反对战争的斗争，尊重他公認的能力，但是他的性格，無論在当时和以后从来都对我沒有吸引力。

第三个派別是密执安派，領導人是后来組成了无产者党的巴特和克拉彻。他們同弗雷納就后者起草的綱領展开了在我看来似乎是十分煩瑣的辯論，一定要把“群众行动”这个詞改成“群众的行动”。我对这种辯論莫明其所以，对这些繁瑣学者实在不太同情。

第四个派別是里德、拉金、吉特劳、华根納赫特、卡特菲尔德和其他人。在我看来他們似乎主张更合乎美国国情的方針。他們直言无隱地反对以奥尔威奇为首的說外国語的那一派的操縱把持而且对工会問題有較大的兴趣。我同里德、拉金和吉特劳一起参加了这次會議的工会委員會，感到他們是我的同类人。我发现我自己同情这一派。这一派后来成了共产主义劳工党的領導核心。

* * *

上面所說的就是在 1919 年春天，亦即在正式成立两个共产党以前四个月的时候，左派的全国領導人在我心目中的大致面貌。当然还有許多其他十分活跃，十分出名的人。其中有些我并不認識，其他的我已經忘掉了——但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是創始时代的舞台中心人物。他們給我这样一个第一次到紐約 56 来的“政治”上的新进者和外地人的印象是十分明确而且經久不灭的。

两年以后，当爭取党的活动合法化的斗争，已經提上議事日程以后，原来的这批最著名的領導人就全都退到旁边去了。魯登堡、吉特劳和拉金入獄了。巴特和克拉彻自己成立了一个单独的組織，叫做无产者党。里德是在莫斯科。华根納赫特和其

他几个人沒有能在 1921 年的选举中重新当选。卡特菲尔德也到莫斯科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领导责任就落到了我上面提到过的四个人身上，或者說是被这四个人拿了过去。他們是：洛夫斯东一坎农，再加上伟恩斯东和毕特尔曼。这个四人班子领导着党进行了同工人理事会派合并并且組成了工人党的斗争。这个四人班子起决定性作用的时期大約有一年光景。它沒有被推翻，而是像上面說过的那样，并入了一个更大的领导机构。

很难証明这个新的机构曾在什么时期真正得到过党内大多数的支持。有一些在統一大会上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人，諸如华根納赫特、阿姆斯特、林德格伦等人，在基层党员中仍然保持强大的影响。他們很快就組成了一个反对派，后来被称为“笨伯會議”，卡特菲尔德也参加了进去，而且成了很可能是最有影响的領袖。吉特劳在出獄以后也加入了“笨伯會議”。米諾尔也是其中的一个成員。

他們勉强地支持了成立工人党的建議；在这个范围以內，他們支持了我們来反对在这个問題上分裂出去的死硬的过左分子。但是他們把新党看成只是一个影子組織，不願意賦与它我心目中認為它应有的广泛的政治上的职能。他們心爱的还是地下党。因此就产生了两个新的派別——原則上的地下派(笨伯會議)和力爭运动完全合法化的一派(“取消派”)。魯登堡在
57 1922 年春天出獄以后，就参加了“取消派”。福斯特、白劳德、邓恩和其他那些在党的事务方面刚刚开始活动的工会派人物也都参加了“取消派”。

* * *

我在 1922 年 5 月动身去莫斯科，作为取消派的先遣代表去

爭取共产国际支持我們的政策。我在莫斯科一直呆到第二年的
一月。这个时期党在国内发生的事情,我只是耳聞。在这个时
期,为控制地下党的斗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最后的一幕就是
1922年秋天著名的布里奇曼大会。这次大会受到了警察的袭
击。我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始終也没有弄清楚会上到底发生
了什么事情。

我的印象是,当时双方的力量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笨伯
會議”稍占优势。但是他們想控制领导机构和强使党接受他們
自我閹割的政策打算,受到了当时两个新因素的阻挠。这两
个因素确实是相当可观的因素——那就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和約
翰·佩帕尔的个性。

关于劳工党的政策的起源

1954年5月18日

这封信要回答你在5月15日提出的关于組織劳工党这一
政策的起源問題。

我認为二十年代前半期党在农工党方面的活动的全部問題
应当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原来的政策和党怎样采納它的;
第二部分是,这一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歪曲,更正确地說,
是在佩帕尔的指导下,在这一方面异想天开的冒险。在这封信
里,我将仅限于这个問題的第一部分——劳工党政策的起源⁵⁸
——而把第二部分保留到另一封信里去談。

关于这个問題的文字資料很少,而我发现自己对許多詳情
細節的記憶并不像对爭取合法化的斗争那样鮮明。这也許是因
为真正的斗争是环繞着合法化的問題进行的緣故。組織劳工党

的政策，工会工作的发展和把共产主义运动美国化的整个过程都包括在使党合法化这个总问题里面了。只要这些派别在上述问题上有所主张，它们也都是照例分裂的。

我用了很大的努力来恢复我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劳工党问题演变过程的回忆。我很可能在某些细节上弄错了，或者漏掉了一些细节。不过，我的总的回忆是十分清楚而且不会有大的错误的。要明白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一些主要之点，其顺序大致如下：

(1)首先，美国社会主义的左翼就传统说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固执而教条主义的——革命对改良问题，直接行动对议会行动问题，新式的工会对旧式的行业工会问题等等。列宁关于左派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出版以后才使他们开始领悟到可以把现实的策略同这些领域内的活动灵活地结合在一起，而不致离开革命的根本原则。我们需要俄国人教会我们这一点。

(2)左翼对劳工党的问题最初的态度是毫不通融地宗派主义的而且是敌视的。我还记得弗雷纳在1919年或者1920年初曾在《革命时代》上或者在《共产党人》上写过一篇社论反对“工党主义”，即反对英国工党的政策和实践，并且反对鼓吹在美国组织类似的政党的人，这批人在当时还相当多，呼声也相当高。在那个时期作为左翼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发言人的弗雷纳是一个极端过左派。他似乎同在共产国际内部以荷兰共产党和一些德国过左分子为中心的那派思潮有联系。你知道，这派思潮曾在1921年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有力打击而且被打败了。

〔附带说一下，你可以在前鋒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所著的59 《共产国际的头五年》一书中找到关于这一时期的丰富材料。这

本書涉及美国的地方至少有：托洛茨基曾同佩帕尔(波加尼)进行过論战，后者正随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在德国，当时他自己就是一个极端过左分子。]

弗雷納写的这篇文章或者社論，表达了党内总的态度，当时这种态度彻头彻尾都是极端过左的。我之所以到現在还記得这篇文章或者社論也許是因为我在初期的共产党内是一个出了名的“右翼分子”，而且我認为主张成立劳工党的人已經走在我在中西部所看到的劳工运动前面很远了。不过，我应当說我当时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們可以参加一个更大規模的劳工党的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做共产党人。恩格斯关于这个問題所写的精辟的信件我們当时都还不知道。

(3)从理論上論証这样一种复杂的策略——革命党人有条件地支持改良主义的劳工党的策略——的工作首先是列宁作出的。列宁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里建議英国共产党人应当“鼓励选民投票选举工党的候选人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候选人”。他后来又建議英国共产党人应当設法加入工党。列宁的这两个主张給了在美国主张实行这一政策的人以最初的鼓励，并且标志着这一政策真正的起源。这一点在我看来是不可爭辯的。

我并不認为这同你从1924年11月26日的福斯特一坎农文件——这个文件很可能是我执笔的，我早就把它忘却了——中引述的話有什么矛盾。这段話說，我們所以能促使共产国际在1922年批准組織劳工党的政策“主要是靠了我們的代表提出的报告，这项报告說美国存在着趋向組成一个农工党的强大群众运动。”

列宁对英国的干涉給了革命党人以理論根据，使他們得以

支持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党。我們 1922 年在莫斯科提出的論点只不过是說，把这一政策适用于美国是有现实基础的。当时国内要求組織一个农工党的呼声甚高。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就贊成成立这样一个党。农工党曾在 1920 年提出了一个总统候选人，得了五十万张选票。

在我們看来——在我們領会了列宁对英国人的建議以后——这种做法似乎可以形成一个极好的基础来同工会运动中比較进步的一翼結成联盟，并且可以打开新的可能性使共产党成为美国劳工运动的一部分而取得合法地位。但是我認為，要是我們以前沒有受到列宁的教誨的鼓励的話，我們是不会这样主张的，是列宁向我們闡明了革命党人可以有批評地支持一个改良主义的劳工党，甚至可以加入它而不致成为改良主义者。

(4)使党分为左右两派的是爭取党合法的問題，而不是組織劳工党問題。就我所記憶的，所有的取消派都很容易地就接受了組織劳工党的政策。在过左派在爭取党合法化的中心問題上被彻底击败后，他們对組織劳工党这一政策的一切抵抗就都瓦解了。我不記得在劳工党問題上有过什么特別的派系斗争。

(5)不但如此，共产国际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听取了我們的报告和我們主张成立一个劳工党的建議，并且把这一政策規定得极其清楚而毫不含糊。我还十分肯定地記得共产国际在給美国共产党的信中除了宣布它贊成使共产主义运动合法化的决定外，还談到成立劳工党的政策。那封信說在美国以工会为基础組成一个劳工党，将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

如果你可以查一查这封信的話(我記得似乎是在 1923 年初发表的，不是刊載在《工人》上就是刊載在《共产党人》上面)，我相信你是可以給劳工党政策的起源的問題找到肯定的答复的。

(6)佩帕尔肯定沒有“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和开会 61 期間”在莫斯科参加倡議这项政策。他当时是在美国。你問：“他是否接受了这个主张在回到美国以后来大加鼓吹？”对这个問題，我只能說是的，他接受得很快，事实上，他是把这一主张搶过去了。

* * *

再启者——我从来沒有听說过列宁早在 1920 年就曾同弗雷納在莫斯科提起过劳工党的問題。这件事情十分有意思。我認为它也証实了我在上面談到的看法——列宁是这一政策的倡議人。不过要是他看到后来就他的建議干出了什么样的事情的話，他一定将在陵墓里都躺不安穩了。

再談談劳工党政策

1955 年 3 月 17 日

我認为有足够的証据来不容爭辯地証明，对在美国組成一个劳工党采取积极态度的倡議是从莫斯科来的。至于共产国际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作出这一决定的，美国党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又是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具体步驟的，可就不容易弄清楚了。

我自己的回忆就很不清楚。我的印象是，共产国际关于这一問題是直到 1922 年底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才作出明确决定的。我想 1924 年 11 月 26 日《工人日报》上发表的福斯特—坎农集团的声明就是指的在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在莫斯科进行的討論，而并不是指更早的討論。这一声明的大意說，所以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主要是靠了我們的代表所提供的报告”。

很可能是 1922 年年初去莫斯科的美国代表团——貝达特⁶²和卡特菲尔德——曾在 1922 年 2、3 月間在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會議上討論过这个問題，而且由于这次討論曾发出过某种指示。但是我已一点都記不起来了。

我也記不得美国党在 1922 年 5 月曾就組織劳工党的問題发表过声明。只記得在我于 5 月中旬动身去莫斯科以前，对这个主张有过一般的討論，并且“在原則上”得到了一般的同情，但是並沒有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来加以实施。但是你現在喚起了我的記憶，我可以說，你猜测进步政治行动會議(CPPA)在 1922 年 2 月举行的會議刺激党采取了第一步行动，很可能是正确的。我还記得曾就这个問題同洛夫斯东有过一次由他发端的談話。照当时党的标准來說，我們两个人都是“右翼分子”，都在为党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打破它的孤立而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个因素。这很可能是他所以首先找我的原因。

洛夫斯东說党应当設法打进进步政治行动會議运动里去。我对这个主意是抱同情的，不过在他提出来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記不起在我动身去莫斯科以前曾做过什么具体的事情。但是把这个問題的演变过程一步步回忆起来以后，也許可以有把握地猜测，洛夫斯东在我走了以后还在积极鼓吹他的主张，而由于他的坚持，才首先有了 1922 年 6 月 24 日发表在《工人》上的关于劳工党問題的积极的声明，后来又有了派魯登堡出席 1922 年 12 月进步政治行动會議在克利夫兰举行的第二次會議的决定。

因此，在我的記憶中，洛夫斯东是首先提出接近进步政治行动會議运动的积极建議者，这一建議，在一系列情况的交錯影响之下，导致了 1923 年 7 月的芝加哥农工党大会，那个大会是由

工人党和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費茲帕特里克领导集团联合举行的。

* * *

虽然如此，必須記住，在这个时候，佩帕尔已成了美共党内⁶³的一个有力因素了(这是怎么样一个因素啊!)——而且他毫无疑问是以后有关劳工党問題的一切試驗和一切冒险的主要动力。当他一出現以后，建議和决定就源源而来，而事情也确实动了起来。我現在記起在1922年年底或者下一年年初的时候，在他在我国还没有声名狼藉的时候，他曾写过一本关于在美国組織劳工党問題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1923年曾广泛散发，来說明党的态度。

我在莫斯科住了很久，回国以后又作了好几个月的旅行，在这段时期內，我一直是这些事情的局外人。因此，我并没有直接参加作出任何决定，但是我还是同它們有关系的，因为我对每一步向外发展的行动都抱有总的同情。甚至冒犯机会主义的錯誤也在所不惜。我必須承認，我在当时对这种錯誤是还不太敏感的。

我記不起劳工党的問題曾成为取消派和过左派之間爭論的一个特殊問題。但是取消派有着要扩大党的活动的更积极的主张，而且毫无疑问是一切具体行动的发起者，即使过左派并不專門反对他們的話也是如此。到1923年年中，左派的“笨伯會議”已經被打破了，剩下的几个桀驁不馴的人所形成的反对派已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就我所知，所有的取消派都是同意导致了7月3日在芝加哥召开的大会的各項决定的。一直到7月3日的灾祸以后，他們自己的队伍內部的分歧才开始严重化而且明显表現出来。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美国問題”

1954年5月10日

我作为美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會議和正待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在1922年6月1日到达了莫斯科。我在那里一直呆到次年一月間。除了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和代表大会以尽到我的責任之外，我还有机会到各处观光，对这个已进入革命后的第五年的国家获得一些印象。

在我回到美国以后，我在全国作了为期五个月的旅行，发表了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五年”的演講。这篇演講当时曾經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过，后来并由前鋒出版社以《俄国革命》为题，加上另一篇演講重印出版。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我是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出席的，并且还当选为主席团委員。主席团是一个較小的工作机构，就像一个全国性組織的全国委员会的較小的政治局一样，它經常开会并且处理共产国际的一切日常政治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共产国际怎样进行工作，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伟大的政治領袖們怎样在工作中对世界运动的問題进行討論和作出决定。安安靜靜地坐在那里，傾听別人的发言和試圖学习一些东西，我感到相当滿意。我确实認為，我从这寶貴的經驗中学习了许多东西。

各个国家党的問題在主席团的會議上都要逐一进行检查。我記得，当时的大問題是法国党内連續不断的危机和統一战綫策略的一般应用問題。所有重要的党在莫斯科都派有常駐代

表。他們就本国的新发展定期提出报告并且参加討論。

指派到共产国际从事常务工作的俄国代表团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其中有季諾維也夫,拉迪克和布哈林,季諾維也夫是主席。作为主席团的一个成員,当我呆在莫斯科的整个期間,我看到过这些領袖們如何进行工作,平均每周要听他們作一次报告。俄国代表們所起的领导作用是一点也沒有怀疑的余地的。这被視為理所当然而且从来沒有人提出过异議。但是,其所以如此,是完全公正和自然的。

他們都是有理論修养的久經鍛炼的老战士,他們通过自己在流放年代里的研究和亲身的經驗了解世界运动,特别是这个运动的欧洲部分。而且,他們享有一个胜利的革命的领导人理应享有的高度道义上的权威。其他党的代表們,像我自己,主要不过是年輕一代的学徒而已。我想,我們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感到能到这种举世无双的学校里来学习是很荣幸的,同时,我們都設法利用这个机会来得到一些益处。

* * *

我也在赤色职工国际的执行机构中工作。在这里,我結識了許多国家工会工作中的领导人,并且和他們相当熟悉。我特別記得洛索夫斯基,宁恩和布兰德勒。赤色职工国际的委员会当时在国际工会运动的一切实际事务中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可是,涉及到政治方針的問題却要与共产国际主席团取得一致,并且最后要由主席团决定。

* * *

为了达到我自己特有的目的——爭取共产国际支持我們在美国的政策——我同季諾維也夫,拉迪克,布哈林和庫西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書記)进行了个别交談。毕特尔曼 1922 年

夏天負着特別使命到达了莫斯科——我想是来汇报美国犹太运动的情况的。毕特曼和我在莫斯科一道密切地进行工作。我們合作准备有关美国情况的書面报告，一起和不同的领导人談話。

66 我注意到，所有的领导人，就像他們預先作了决定一般，在一切有关美国政策的討論中一直都不表示明确的意見和态度。他們极为友好和耐心。他們把自己的時間毫不吝惜地給予我們，而他們的時間在当时應該是十分有限的。他們提出了許多尖銳的問題，并且表現出对這個問題有浓厚的兴趣。可是，他們却沒有一个人发表过任何意見。第一輪的會談花了相当长的時間，其实际結果只不过是一項非正式的决定，就是要等待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其他派别的代表到来，任何決議都要推延到那个时候再說。

他們沒有說过一句話来直接表示一种确定的立場，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得到的印象是，俄国领导人倾向于把我当作他們在1905年革命失敗后的反动时期中在俄国党内所遇到的那种“取消派”。这些俄国的“取消派”曾經企图放弃非法的党組織并使社会民主党的活动适应沙皇的法律。布尔什維克一向都反对这种投降派的取消主义；我感到，俄国领导人在1922年所持的保留态度至少部分地受到了他們記憶犹新的原来那一場斗争的影响。

我也注意到，共产国际机构的一位技术工作人員，一位說英語的女同志告訴我，她是被派来帮助我研究过去布尔什維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經驗的。她把我帶到一个圖書館里去，替我翻譯了列宁在那个时期的一些論战的文章。我是贊同这些文章的，但是我却想，在沙皇的俄国和哈定的美国之間是有区别的。

在 1922 年的整个夏天，我都有着不安的感觉，因为我努力争取共产国际支持我们的政策，但是却一点进展也没有。

俄国领导人的保留态度可能是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早就派了一个代表——瓦列茨基，一个波兰人——到美国去，而他们在等待他的报告。

* * *

这是共产国际的全盛时期，当时它的道义权威是再高没有的，它对各国年轻的党提出的忠告的英明，得到大家的公認和重视。对于俄国领袖们中间的冲突和敌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把俄国领导看作是一个整体，列宁和托洛茨基站在最上面，与其他人多少有些不同。

托洛茨基在那年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六月全会上和几个月以后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领导了关于法国问题的辩论。托洛茨基在主席团的会议上也出现过几次，但是每次都是为了某个特殊的目的。我只有一次见过列宁并且听到他讲话，他那次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小时的演讲。当然，我知道他正病着；但各方面对他的康复都抱着自信的乐观。正如我所说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有的日常工作都是由派到那个机构工作的俄国代表团——季诺维也夫，拉迪克和布哈林——来领导的。我记不清当时我是否见到过或听说过斯大林。

* * *

同时，在国内，取消派和过左派之间的派别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更多的代表开始陆续从美国到达。这是一个大代表团，全算上大约有二十来个人，代表了所有各种倾向。马克斯·贝达特和阿纳·斯沃贝克代表了取消派，勒·伊·卡特菲尔德、罗斯·柏斯特·斯托克斯和其他的人代表了地下派。

还有一个以馬丁·阿勃恩为首的青年代表团。有一些人是工会的代表；我記得的有杰克·約翰斯頓、罗斯·沃尔蒂斯和其他的人。青年和工会的代表都支持取消派。还有一个黑人代表，姓名一点也記不起来了，他似乎是支持过左派的。特拉騰堡代表工人理事会派，这个派別还没有参加共产党。过左派分子（統一劳苦大众党）的分裂派也派来了两个代表，他們是被邀請来提出他們的申訴的。

此外，有些人以个人的身份来到莫斯科，他們各有自己的打算。在这些人当中有馬克斯·伊斯特曼、黑人詩人克劳德·麦克凱和艾伯特·里斯·威廉斯。在克劳德·麦克凱的一本自传《远离祖国》中，有一部分就是写他在俄国的旅行和代表大会的情况的。季諾維也夫和其他的俄国領袖們对他大捧特捧。他們要他同他們和代表大会的其他领导人照了一些团体相，为的是在殖民地世界中进行宣传。麦克凱在那本書的第十六章中談到了代表大会和他参加的美洲局。这是一个艺术家独立的印象，你会发现它写得很有意思。

在代表团全体团员都已经来到以后，第四次代表大会就开始把会期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拖延下去，美国問題上的初步斗争就真正开始了。最初的小冲突发生在共产国际主管英語国家事务的特別部門中。最近被黜免的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头目拉科西，当时是这个部門的負責人。他的英語說的很流利，我同他也很熟悉。他是在匈牙利革命失敗以后到莫斯科去的匈牙利青年領導人員之一。

当时拉科西給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僵硬的形式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他并不隱諱他怀疑我們是“取消派”。因为我們沒有把他看得太認真，所以我們并不十分在意。但是，他可能反映了

官方領袖們的观点，这却使我們感到十分不舒服。我不能不說，当时一般人都認為是这样，而且这也反映在共产国际机构中的其他技术工作人員的态度上。

他們开始不讓我过好日子了。在代表大会前夕，他們把我从勒克斯飯店的受优待的房間里移到一个設備簡陋和塞滿了代表的集体宿舍里。我是流浪工人出身，的确并不十分在乎，但是人們認為这是带有政治意义的，朋友們嘲笑我从勒克斯飯店被放逐出来。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把我当时的身份称为一种“賤民”，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些“阿帕拉其克”(apparachiks)* 是真正的晴雨表，我从来不欢喜这种人，不論是过去和現在都始終如此。

* * *

在代表大会将結束的时候，我終於有机会会見了托洛茨基。这在一夜之間就改变了一切。这次决定性会見一点也不能归功于我們，因为，就我記憶所及，当时我們甚至从来沒有想到要求作这次会見。这次会見是由馬克斯·伊斯特曼亲自主动安排的。

托洛茨基是一个办事最認真的人，他給会見規定了時間。他有严格要求人們遵守時間的令人生畏的习惯，同俄国人在時間問題上那种典型的漫不經心作风形成鮮明的对比。这已成了传奇，沒有人敢叫他等。伊斯特曼只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布置这次会見，只差一点就无法把我們找齐。當我們洗过俄国蒸气浴愉快地回来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到这种惊人的浴室中去洗澡——他在最后一分鐘找到了我們，用汽車慌慌张张把我們按照約定時間一分不差地送到了托洛茨基的

* 这是一个俄語詞，意思是机关人員，引伸为官僚。——譯者

办公室。

我記得，參加這次會見的有馬克斯·貝達特、馬克斯·伊斯特曼和我自己。如果還有任何其他的美國代表參加的話，我現在已經記不起了。托洛茨基辦事極其認真精確，沒有在禮節客套上浪費一點時間。他要求我們馬上就談自己的情況，並且提醒我們只有一個小時。

他的態度和方法同季諾維也夫的大不相同，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後者給我的印象是不拘禮節，隨隨便便，甚至還有些懶洋洋的。他總好像有充分的時間，要舉行一個會議總是推遲兩三小時才開始。儘管如此，他仍然做了很多的工作。這只是他的工作方法不同而已。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偉大是在於他們的天才的偉大。季諾維也夫在他們面前就顯得渺小多了，但是如果要求低一些，他仍然不失為一個偉大的人物。我對季諾維也夫總有一種溫情，我對他的深情關切從來沒有改變。我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夠寫一點東西，好對得起他的在天之靈。

同托洛茨基會談的時候，作主要發言的是我，貝達特作了一些補充。我還記得，我的論點有四點：（1）美國工人缺乏階級覺悟，結果，共產黨就有進行基本宣傳的任務。（2）這個國家里的實際政治氣候使我們有可能也有必要建立一個合法的黨。（3）我們建議支持成立一個以工會為基礎的勞工黨。（4）有必要使黨美國化，有必要擺脫外國語言分部的控制，並且保證由在美國出生的人擔任全國性的領導職務。

托洛茨基對美國的实际政治形勢只提了很少幾個問題，如有關法律等等的問題。他對所謂地下組織是一個原則性問題一說表示愕然，甚至覺得好笑。他說，外國語言分部派“控制”美國

党的企图既不现实，也是站不住脚的。他诙谐地表示，他们如果坚持这样做，俄国党会把他们请回俄国去。

（可以在这里附带说一句，奥尔维奇、斯托克里茨基、阿什克努则以及俄罗斯分部的其他强有力和狂热的领导人后来都回俄国去了。可以说，这件事确实帮助了党的“控制”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 70

对劳工党问题，如果托洛茨基说过什么的话，那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在讨论结束的时候（讨论时间大概没有超过托洛茨基规定的一个钟头），他毫不含糊地说他会支持我们，他并且还相信列宁和其他俄国领导人也会这样做。他说，如果列宁不同意，他将设法让我们直接同他会见。他还说，他要把这次会谈的情况向俄国中央委员会报告，这样美洲局很快就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讨论结束时，他要求我们把我们的立场简单扼要地写下来，写在“一页纸上，——不能再长了”，然后交给他以便转给俄国领导机构。

在经过整整一年无休止的争辩之后，要求我们把要说的一切话只写在一页纸上，这确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当时不免使我吓了一跳。可是，由于有了伊斯特曼的帮助，我们当天就写出来并且交了上去。今天，如果能够得到这份写“在一页纸上”的文件的原稿，我愿意出很大一笔钱。

* * *

同托洛茨基的会见在争取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合法化的长期斗争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个运动在一开头本来就决不应该接受一个非法的地位。不久以后，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美洲局的正式会议开始了。俄国人给美洲局派来一个人马齐全的代表

团——季諾維也夫、拉迪克和布哈林——表現出他們對這個問題有明白無疑的興趣。

事情不慌不忙地進行着。在安靜而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了充分的公正的辯論。除了美國人之外，沒有一個人感到過激動。卡特菲爾德和我每人都得到了一小時左右的時間來闡明對立的各派別間互相衝突的立場。羅斯·柏斯特·斯托克斯、貝達特和其他的人都被請出來對双方的主要報告人的發言作補充。一個地下過左派分子分裂集團的代表也發了言。

然後，重要人物開始發言。首先是季諾維也夫，接着是拉迪克，然後是布哈林。在以前的個別談話中使我們感到不安的那
71 種曖昧態度完全改變了。他們對問題是熟悉的，說明他們曾經徹底地在他們中間加以討論。他們每個人的發言都有力地和無條件地支持取消派的立場。他們的發言對合法與非法組織的整個問題作了真正光輝的闡釋，並且還從俄國運動的經驗中引用了很多例證。他們尤其說明了地下過左派分子的中心論點，即黨作為原則問題必須保持它的地下組織的論點，是錯誤的。他們解釋說，這純粹是一個實際問題——一定的政治條件下的實際情況和可能性的問題。

他們特別指責了把沙皇統治下的俄國經驗機械地硬搬到美國去的傾向，因為在俄國，法律上禁止一切形式的政治反對派，而在美國，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却仍然完好無損，而且工人黨已經在不受法律干涉的情況下令人滿意地進行着共產主義宣傳。季諾維也夫說，非法的地下工作是在某些條件下迫不得已的事情，人們不應該還對它盲目崇拜，並且當合法活動的可能性存在的時候，人們不應該只依靠代價大而又麻煩的地下活動。他講了一個可笑的故事說，一個老布爾什維克地下工作人員甚至在

布尔什维克已经接管政权之后还坚持随身带着她过去的假身份证。

美洲局讨论的结果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1)使党合法化；(2)建议党倡导建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党，并且为此而进行工作；(3)呼吁退党的过左派分子重新回到党里来，保证他们在党的队伍里受到欢迎和取得应有的地位。

* * *

只有在这一次，共产国际决定性地、明确地解决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所不能解决的一个巨大问题而使运动深受其惠。

后来的一切经验都证明了这个决定的绝对正确性。如果在这个关头得不到共产国际的帮助，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会怎样，想起来，不觉令人毛骨悚然。两种派别在力量上是势均力敌的，过左派分子是如此狂热地相信，他们正保卫着一个神圣的原则，以致很难设想取消派能取得明确的胜利而又不破坏运动的团结。⁷²

在那种情况下，美国共产党人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消耗在内部斗争中，以致放弃了公开宣传和吸收生力军的工作。前途则是，宗派斗争没完没了，运动分崩离析，最后精疲力竭，而这个伟大的国家却继续自顾自走下去，对它毫不理睬。托洛茨基、俄国党、共产国际先后的干预拯救了我们，使我们不致面临这种前途。

这一决定表明共产国际在它最好的和全盛的时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英明领导人和调解人。它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幼年时期的严酷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完全现实的，符合当时国家的政治条件和政治需要的。而且，为美国共产主义作出巨大贡献的俄国领导人表明他们本身对一切人都是客观、公平和

友好的，在重要的政治問題上非常果決和主動。

我常常帶着深厚的感激心情回憶起他們在這件事情上的友好的幫助。或許，正是為了這個原因，所以对反對他們的運動以及幾年以後把他們最後驅逐出黨的作法我怎么也不甘心。我絕不相信他們會變成“革命的敵人”，而在三十二年後的今天，我就更加不相信了。

* * *

1954年5月18日

1922年共產國際派駐美國黨的代表瓦列茨基是波蘭共產黨的領袖之一。當他參加布里奇曼代表大會後回到莫斯科的時候，我遇見了他，並且還聽了他在美洲局中所作的幾次報告。他并不完全支持取消派，我曾為此同他發生過幾次齟齬。他回到莫斯科以後的立場十分清楚地表明，在他去美國的時候，共產國際並沒有事先決定支持合法化。或者毋寧說，情況倒是恰恰相反。

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改變態度和最後作出那個決定是我們在那裡鬥爭的結果，而不是根據瓦列茨基的建議。在辯論過程中，他的態度才開始轉變，但是，他並沒有徹底做到這一點。他曾經嘗試要我們同意某種折衷辦法，以便使決定不起太大的作用，可是我們拒絕了。我記得，當我們對季諾維也夫抱怨瓦列茨基的立場的時候，他私下對我們說，“他正在改變，但是還沒有完全站到我們這邊來。”

顯然，瓦列茨基是一個有學識和十分能干的人。我想，他原來是一個教授，但是，他顯然在波蘭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工作了很長一個時期。波蘭黨內有過各種各樣的派別鬥爭。根據他的經驗，派他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到一個年輕的、經驗較少而又因為

派別斗争陷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党里去，他是够格的。

旁觀的批評家常常嘲笑派別活动和派別斗争是这种或那种反常現象，是激进运动的一种特有的病症。但是，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人沒有經過派系斗争的訓練而能变成一位重要的政治領袖。固然，我也知道有一些搞派別斗争的人——还不算少——只会搞派別斗争，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也还有一些人在派別活动中弄得心劳神疲，以致忘記了当初是为为什么事业而斗争的。但是，我猜想，这只是一小部分人。

在党取得合法地位以后领导的改組

74

1954年5月19日

問題 3 B——党取得合法地位以后领导的改組。

1922年8月間，警察袭击了在布里奇曼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这件事在当时似乎証明过左派集团（“笨伯會議”）所提出的論点是正确的，他們認為政治条件还不能使一个合法的共产党存在，必須保持地下共产党的一切职能。虽然我自己沒有亲耳听到，但是，后来有人告訴我，魯登堡对警察袭击會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宣布他已經改变了自己的立場并且要放弃在当时爭取党合法化的計劃。

然而，事实証明，布里奇曼代表大会所遭受的袭击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或許甚至只是一桩意外事件，或者也可以說是哈定的司法部长道尔提轉移人們視綫的一种手段。这和美国国内要求不要对激进分子进行猛烈迫害的普遍情緒是背道而馳的。这种迫害成了威尔逊第二次执政时期的特点，但是1922年秋天的大选就表明存在着一种走向开明的趋势。这种趋势进一步为形势

所証实。当时，工人党被允許扩大它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当局并不加任何干涉；而且，福斯特领导下的工会教育同盟也开展了規模广泛的公开活动。

这两个因素——工人党和工会教育同盟两者活动的扩大——更加促进了党走向美国化和它的一切活动合法化的趋势。共产党本身(地下的“非法”組織)除了“控制”由其它組織进行的合法工作之外并没有別的事可干。它并没有自己的真正职能。

同时，共产国际紧接着在布里奇曼代表大会之后所作出的
75 贊成党取得合法地位的決議拒絕了“原則上处于地下”的理論；并且击败了以这一錯誤理論为基础的过左派集团。这一失敗事业的领导人——卡特菲尔德、华根納赫特、米諾尔、阿姆特、吉特劳等人——从此威信扫地。由于事实証明他們对美国政治形势判断錯誤，由于共产国际拒絕他們的錯誤理論，他們作为政治領袖的权威从此一落千丈。

另一方面，由于“取消派”起着最突出的作用的工人党和工会教育同盟的合法工作不断发展和扩大，加上共产国际又决定支持他們，在党员眼中，取消派领导人的威信提高了。

我認为，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还没有一次像解决这场冲突时那样，一个派別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那样完全和彻底的胜利，而它的对手却遭受到那样屈辱的失敗。

在通常情况下，按照邏輯来說，这场长期斗争的結果应该导向一个扩大了而又权威的领导集团的巩固，这个领导集团包括在胜利的斗争中起过最突出的作用并且为促成胜利一起进行工作的那些人。这一新的联合领导集团的必要組成成分是：

(1) 洛夫斯东—坎农联盟(加上伟恩斯东和毕特尔曼)。在建立工人党并且把它发展成为过渡时期共产主义活动和宣传的

主要媒介的内部斗争中，这个集团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过渡时期中，整个的责任实际上都落到他们身上。

(2) 魯登堡。他在 1922 年春天才从监狱中出来，并且担任了工人党的全国书记。由于受监禁的结果，由于他大力展开共产党的合法活动，他的重要性和威信都大大提高了。

(3) 福斯特。他在 1921 年参加了党，并且开始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党的工会活动。

大体上来说，从长远来说，形势是这样发展的。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在真正的自然淘汰过程中取得全国领导的决定性职位的，但是，他们命定不能作为统一的整体而长期合作。一种“人为”的因素破坏了均势，在新的联合领导集团还没有得到良好的机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一因素就起了使它土崩瓦解的决定性作用。

76

这种人为的因素来自约翰·佩帕尔。他在 1922 年秋天才头一次来到这个国家，不久就像法院派去接管一个破产的公司的委托人那样专横独断地管理起党的事务来。他碰到的唯一麻烦就是这个公司一点也没有破产，委托人行使职权时遭到了反对和反抗，使他作威作福的任期大大缩短。可是，在他当权的时候，他的确像旋转木马一般使每个人都感到天旋地转。

在其他一些作品中，我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说佩帕尔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情况真是这样吗？佩帕尔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真正身份是什么？如果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话，他又有什么样的权威呢？

说起来也许令人感到奇怪，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完全弄清楚。至少，我个人就从来都没有确实了解清楚；直到如今，没有一个人对我解释过。我想，在美国党内，任何人都没有真正明白这件

事。共产国际在1922年夏天和秋天正式派駐美国党的代表是波兰人瓦列茨基。佩帕尔大約是在同一个時間来到这里的。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人告訴我們說，当时匈牙利共产党失敗了。在流亡到美国的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有着猖狂的派系斗争。为击破这种派系斗争曾采取了若干措施。派佩帕尔到美国就是这种措施之一。他的任务是在美国党的匈牙利分部的执行局中工作。

据我所知，他所有的正式任命就是如此。可是，佩帕尔，一个耍阴谋权术的高级专家，从来就不受束縛凡人的形式規章的限制。他工作效能高。他是一个地道的欧洲人，渾身浸透了欧洲大陆政治新聞記者的世故和技能。但是，一旦需要迅速处理工作并且設法避开自然障碍的时候，他比任何一个我所認識和听說过的手腕高妙和善于抄近路的人都更具有美国人的特色，而且在很多领域中都是如此。

在佩帕尔在美国党内活动的头六七个月中，我担任派駐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在国内。他開始的时候是在共产党匈牙利分部的执行局和編輯委员会工作，不久就接管了那里的全盘工作。有人告訴我，他和博里斯·萊恩斯坦一道，給瓦列茨基做助手一类的工作，并没有要求別人承認他自己的任何权威。在这两个职位上，他很快就熟悉了派系斗争和从事这一斗争的领导人物。就从这样一个小小的立足点开始，他迅速地打进了漩渦的中心；使自己被选或补选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面去；当我大約在1923年2月1日回国的時候，他似乎已經什么事都在管，一切事都得由他决定，包括那些討他喜欢和不要他喜欢的人的地位和命运在内。

他办事像閃电一样地快。他第一手惊人的奇技是抓住共产

国际的决定，成为这一决定的最活跃和叫得最凶的解释人——而当时，那些在共产国际中为这个决定斗争的代表还没有来得及回到国内作报告呢。他接着领导了取消地下党的斗争，并且马上就把一切都办完了。他成了中央委员会派去向无数党员大会和地下党代表团体作报告的人，听说，他先讲德语，由鲁登堡当翻译。（不久以后他就学会用英语演讲，可是在讲这种新学会的语言的时候，他讲得比那些除了英语就不会讲其他语言的人还要快，还要吵嚷得厉害。）

据我所知，在那些手足无措而情绪低落的过左派分子得到坏消息的会议上，他从来没有自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但是，我毫不怀疑，他总是设法让人们得到这种印象。他毫不隐讳他是“从莫斯科来的”，这就足以给他披上一件伪造权威的外衣。

他是一个能够说得天花乱坠的演说家，他把他在这方面的出众的天才发挥到了最大限度。他的方法和计划是把过左派领导人中比较顽强和比较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挑选出来，毁掉他们的政治生命，而对那些软弱的投降分子则予以恢复名誉和给予恩宠。比如，卡特菲尔德，虽然有宗派主义思想，然而，他却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性格和无法腐蚀的正直感，⁷⁸对运动有过不少贡献，可是事实上却被佩帕尔毁掉了。在他的突袭中还有其他的受害者。以前的派系斗争虽然已经够凶了，可是，“杀害”反对者，“杀害”似乎碍手碍脚的人的勾当却是到佩帕尔手上才真正开始的。

大多数取消派的领袖都参与了佩帕尔的这场野蛮把戏，好像是要消灭异己，为他们的垄断领导扫清道路似的。而佩帕尔在战略上却另有打算。最出名的取消派分子都被安置到了徒有

虛名的領導職位上，不過要捆上一根綫，牽綫的就是具有独立的个人影响和一群狂热的党羽的佩帕尔。这根綫說得更恰当些，應該叫做絞索。

佩帕尔給所有投降的失敗了的地下派分子以及回到党内来的分裂派过左派分子恢复了名誉，并且把他們糾合成为一个唯命是从的集团，因为这班人的政治生存全要靠他維持。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佩帕尔曾經拥有一个未經公开宣布的他自己的派別。这个派別使他拥有了一切人都必須承認的力量。

他就利用这个由个人追随者和依附者組成的派別，作为一种独立力量来同魯登堡、福斯特和洛夫斯东等比較强的独立领导人周旋。

佩帕尔的領導

1954年5月27日

問題 3B (續)——在党取得合法地位以后領導的改組。

借用經濟周期的術語來說，如果1920-1921年是美国共产主义的萧条时期，而1922年是上升的开始的話，那么，1923年就是繁荣的年份。这次繁荣部分是真实的，但是大部分是投机的、短命的，而且注定要走向破产。这就是佩帕尔时代。

79 党在那个时期的倒霉的冒险都有公开发表的史料为証，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很容易找到这些史料。同样，这些冒险行为所依据的政策也是如此。对于美国现实的异想天开的看法，和针对这种现实如何去做的异想天开的理論，都永久地記載在佩帕尔当时发表的大量著作里。而且，我們决不能弄錯了，以为佩帕尔当时的著作只不过是一些个人的古怪玩意，对于党并没

有約束力。

在那些发高烧的日子里，佩帕尔用鉄腕操縱着党；他写的东西就是党的政策；他說什么算什么。他把党弄得“政治化”到比地獄还糟的地步，他能够左右反对者差不多像左右拥护者一样。佩帕尔是政策的主要制訂人。这一政策导致了“联合农工党”名聞遐邇的大失敗——但是別的人也都跟着走。

这位初来的人，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当他还在学习这个国家的語言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位沙皇兼政委，控制了多少有些惶惑的党。他并没有局限于做新聞工作和制定党的对外政策的工作。他在两条战綫上作战。他对党内事务的控制也是绝对的，他在这方面的政策的疯狂程度也不比在对外政策方面稍差。

可是，无论如何，佩帕尔的内部“政权”，像他的对外政治活动一样，在现实形势中缺乏巩固的基础，同样注定要遭遇爆炸性的灾难。他的个人独裁——那确实是一种独裁，而且还不是仁慈的独裁——是注定长不了的。但是，1923年这个恶梦般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从佩帕尔掌握大权，“統一調度”他的古怪政权下的一切事情和(差不多)一切人物的时候起，到福斯特一坎农反对派出現时为止——的确是一个有声有色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党发展中的另外一个真正的轉折点。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把这个时期的真相揭露出来，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把佩帕尔扮演的角色加以掩盖。这不是真实的历史。佩帕尔是1923年的中心的和有决定性的人物。

这件事的真相比虚构的小說还要奇特得多。他是一个刚刚⁸⁰来的外国人，带着一张伪造的护照，不得不在伪装下工作并且不得不学习那里的語言。只要考虑到这些困难，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出佩帕尔的表现的确非常惊人。在容許我追述往事的有限篇

幅中，至少，我覺得對於惡魔也應當公平地指出他的才幹。我用這個譬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我認為，他的工作總的說來是禍害。他是一個騙子，但是卻不失為我所認識的一個最為才氣橫溢的騙子。他像一粒阿堪薩斯的鑽石一樣閃閃發光。

從1923年起，黨的历史就開始具有另一種不同的形式，光是研究記錄和文件是無法完全明白的。這是“領導危機”的真正開始，這個危機從來沒有得到解決，而且注定要在經過一場拖得很久的鬥爭之後，歸結為三方面的分裂。如果說，在左翼運動開始到1921年底成立工人黨和一年以後黨取得合法地位為止這段時期中，論點的衝突壓倒了個人之間的衝突，並且使個人衝突服從論點衝突的需要的话，那麼在1923到1929年的時期中，就很難說情況也是一樣，至少不能說在程度上是一樣的。

到了1923年，曇花一現的領導人物，經過了早些年翻來滾去的搏鬥都倒了運，有的被甩到了一邊，有的下降為次要角色。只有少數幾個人嶄露頭角而被公認為當時運動的真正領袖。但是，在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得到其他領袖的承認，也沒有一個人能夠憑他個人的權威充當最高折衷人。後來官方的說法把“奠基人”和“出眾的領袖”的角色攤派給魯登堡，但是這種說法只不過是官方的詭計而已。魯登堡只是幾個人中的一個。

他們全都是一個原始的運動的某一個方面的產物，他們彼此互相需要，並且以不同的方式互相補充；可是不幸的是，他們在一起進行工作就搞不好。他們相處時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出麻煩。而佩帕爾插進來，就使問題更加惡化和複雜了。

下面就是1923年的陣容：

81 魯登堡，從監獄里回來後被廣泛地公認為黨的出色的人物，擔任了全國書記，地位很穩固。

福斯特，作为一次伟大的钢铁业罢工的领袖，具有辉煌的威信，双脚一齐跃进党内，以工会工作的当然领导人的身份开始他的事业。

两个人都有四十多岁了，他们已经完全定型，并且已经处于权势最盛的高峰。

佩帕尔也是一个时势造就的英雄；事实上，他还左右着时势。他也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了。完全成熟了，有丰富的欧洲经验和政治世故，加上欧洲教养——这就使他在美国制靴工人当中显得出类拔萃。

洛夫斯东，从市立学校一毕业没有走什么弯路就直接进入党的领导机关，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正发展着他的恶毒才能，早熟得惊人。

我自己刚过三十岁，正咀嚼和消化着群众运动和党的丰富经验。我懂的并不多，但是别人可一点儿也吓唬不住我。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后来六年中党内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关系——互相依赖而又互相敌对，互相合作而又互相冲突的关系——把党向前推进而又拉回，把党团结起来而又把它拆散，像一部凑合着工作的不协调的机器一样。

也有许多别的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年轻的党在那些日子里拥有许多热心的天才和人物——但是，我认为我提到的中心人物在整个这段历史中是最最重要和最最具有决定性的人物。他们当中有三个人——福斯特、洛夫斯东和佩帕尔——每人都值得我们给他写一本书。他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本行中都是异常出众的，并且在任何环境里都肯定能够制造巨大的骚乱而轰动一时。我，过去和他们打过很多交道，他们并无恩于我，可是我却最不愿意贬低他们的优异才能。

尽管他們給我找过很多麻煩，我总是願意客觀地看待他們。由于这个緣故，我对他們的印象和評價，我对他們的优点和弱点的估計，我对他們的基本动机的看法，都和別人有所不同。等我处理完了几个別的問題以后，我願意把我对这些人的印象用素描的方式写下来。

在1923年中期开始并且前后持續了整整六年的新的派別营垒和派別斗争中，领导机关中个人的冲突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必須承認。可是問題还不仅止于此，因为领导人的爭吵是在并非由他們所創造，也非他們所能控制的情况下发生的。有人別有用心地把那个时期的党的历史說成是一場持續之久史无前例的匪帮斗争，所有人都怀着爭夺个人权力和名位的动机，派別、詭計成了公認的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說法也許包含了些許的真理。但是也仅仅包含了些許的真理而已。

参加派系斗争的人并不是离开国内的外在条件独立活动的。他們是客觀局势的俘虏，这一局势决定和限制了他們所做的和想要做的一切事情。个人，一点不假，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也仅仅只是在这个框框以內起作用而已。

在經過1921年經濟危机之后，到1923年美国資本主义已經完全恢复元气，正大踏步地进入二十年代长期繁荣的第一阶段。那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驅领导人——一个例外也沒有——都是革命者。他們想要迅速地建立一个革命政党——这是他們所有的人的目标。但是这种努力碰上了这些不利的客觀情况。上升中的繁荣对工会运动和对美国一般工人群众所产生的保守影响在任何情况下都命定要使党陷于实际上的孤立状态。

共产国际的基本論点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資本主

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而瓦解和崩溃的开始。这个论点是一个为一切党的领袖所共同承认的论点。当时，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靠牺牲旧世界而在新世界获利，并且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当旧世界衰落的时候疯狂地进行扩张。

后来，当美国资本主义在危机时期的这种有利因素得到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又错误地把它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这就促使领导机构走向保守主义和默默地放弃了在这个国家里闹革命的打算。接着，这又为斯大林主义征服美国党准备了条件。斯大林主义征服美国党是靠了它那套“云中天堂”的理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国是俄国，也就是说不是美国。⁸³

但是，在1923年，谁也无法预见，甚至做梦也想不到这一类的事情。

* * *

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而且想要彻底而又客观地加以研究的史学家无疑是给自己定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除开你显然已经从事的巨大的研究工作之外，你还有一项更困难的任务，那就是选择史料，把重要的和次要的分开；把公开宣告的争论和背后的个人冲突区别开来，并且同时又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不用说，还要断定这个小小的、但是却充满活力的政治组织在二十年代欣欣向荣、满怀自信的资本主义美国究竟占什么地位，并且估计这个党以及它的内部发展对于我国的未来的历史究竟有什么意义。

但是，这是你的问题了。我对你是真正同情的，即使并没有任何人强迫你而是你自愿干的也罢。你的任务虽然艰巨得可怕，我却认为是重要的。我毫不怀疑，将来会有许多史学家来深入研究我国共产主义先驱运动的记录，并且从这些想要建立一

个未来的革命党的最初的彷徨不定的尝试中去探索许多伟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论述这个问题的现有著作大部分都是虚假的和别有用心心的。你自己的研究会使你相信这一点。你作为第一个严肃从事这项工作的史学家，不管你的观点如何，有机会也有责任树立一个客观和忠实的榜样。你正在探索其早期历史的这个年轻的党配得上你这样去研究它，也不怕你这样去研究它。

不管怎样，这个年轻的党对工人，对这个国家和对世界都抱着满腔热情。即使事实真相能伤害它，它也不怕你去报道事实真相。它配得上，也不怕一位忠实的史学家对它作忠实的叙述。忠实的史学家所遵从的是奥赛罗的命令：“事实真相掩饰不了，也恶意歪曲不了。”

从你提出的许多关于福斯特的問題中，我注意到，就他而言，你快要弄清事情的底蘊了。我認識福斯特——当面認
84 識——正是在他决定从工会領袖轉变为党内政治家，并且为了正式屈从莫斯科而願意付出任何代价的那个时期。

三十年以前，我認為我連福斯特的骨头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現在也仍然这样想。他后来的演变——这种演变叫那些过去把他当作叛逆者看待并且尊敬的人作呕——在任何阶段上都从来没有使我感到意外。他当时所作出的基本决定使他不能不一步步退化。但是，如果他的性格不具有这种倾向，他也就不可能作出那样的决定来。

佩帕尔领导的倾复

1954年5月28日

問題 3B (結束語)——佩帕尔领导的倾复。

由于1923年正式取消地下共产党并且把一切职能和权力轉交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旧的派别营垒是垮了。表面看来党是統一的。从前的取消派占绝对优势的全国委员会作为一个統一体领导着党。过去組成整个取消派的各种分子的合作沒有正式瓦解和垮台。然而，十分明显，领导机构的中心核心正在进行着改組，既沒有人公开談到过这个情况，也沒有人說明过它的原因。

在这种全面团结的外表下边，一个新的领导正在形成中，出头露面担任运动的公开代表的是魯登堡和福斯特，担任党的真正幕后首領的是佩帕尔，担任他的第一助手的是洛夫斯东。我贊成这个新安排的头一部分，但是对第二部分也沒有在意，我也不知道我在这个新班子中能干些什么。不过，最初，我并不感到忧虑，因为我的計劃暂时并不要求在中心里进行活动。我想先到全党和全国各地去看看，然后再在一个地方呆下来。

85

* * *

我是1923年2月1日前后才回美国的，先后离开美国八个月。回来以后几个星期，我就离开紐約到全国各地去作演說旅行，这使我在路上就花去几近五个月的时间。我作公开演說的題目是“俄国革命的第五年”。我也在党员集会上作了有关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工会問題的报告。

我完全被旅行吸引住了，沉迷在我一直最热爱的并且永远

都能給我最大的個人滿足的工作——宣傳工作中。當我在這個偉大的國家里旅行，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講出來，並且從新的群眾和新的朋友處得到熱情的鼓舞的時候，紐約從我的心上消失了。我在那次旅行中所認識的某些朋友後來成了我終身的朋友。

1923年前半年制訂和執行的有關黨的政策的許多關係重大的決議和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今天與其說我是以參加者的身份，倒不如說是以觀察者的身份來追述這些事情的。這並非說我反對這些決定的總路線。我肯定不移地贊成勞工黨政策，並且還認為，同勞工界進步人士建立實際聯盟來促進運動是正確的，也是對我們有利的。我沒有參加花費一星期又一星期的時間在紐約所作出的這些決定，但我並不反對這些決定，我甚至並沒有想到它們會無情地導致七月間在聯合農工黨芝加哥代表大會上的災難性爆炸。

86 我沒有參加這次代表大會。當時我正在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一帶地方作巡迴演講；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當我讀到同費茲帕特里克發生分裂和倒臺的聯合農工黨正式成立的新聞報道的時候，我正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我對這些事最初的反應就是斷然不贊成，而且我的意見也從來沒有改變過。我不能同意我們的報刊上發表的一些樂觀的論調，說什麼在芝加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我看來，這種巨大的“勝利”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我花了幾個月時間跑遍了全國，我十分清楚，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少數派，在勞動運動中只有一個小小的立足點。我也明白，沒有實力雄厚的勞工官僚一翼的合作，由我們自己來領導一個群眾性的勞工政黨，那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我不能代表

別人講話，但是我自己在黨內採取的棄權和伺機等待的態度很快就開始變為積極反對佩帕爾領導的態度。至於具體和明確地反對它，是在芝加哥代表大會剛剛結束之後，並且就在那個問題上。

* * *

然而，使我迷惑不解的是福斯特為什麼要支持這次冒險。別的人同勞工運動從來沒有任何聯繫而且對勞工運動的趨向毫無真正了解，他們沉迷在這種奇想中，我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一向敬重福斯特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是一個徹底了解勞工運動的人。我無法理解，他怎麼能夠自欺欺人，他怎麼能夠一點也不明白同費茲帕特里克集團分裂一定會造成的後果呢，一點也不明白工人黨決定以少數無關重要的非黨人士作為裝飾品全靠自己的力量創立一個勞工黨會造成什麼後果呢。

後來不久，我在旅行的最後一段路程上在德蘆斯停下來，準備作一次演講，就在這個時候，我遇見了福斯特，他正在那裡參加一個工會的會議，同時也在作一次野餐旅行。我們在野餐場地一角的樹蔭下消磨了一個下午來討論黨的事務。這次談話成了福斯特一坎農反對派的由來。沒有許下什麼正式的諾言，但是，這個派別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福斯特作了開場白，他首先把黨的官方路線告訴我，並且預言代表數十萬會員參加芝加哥代表大會的工會代表們會把他們的基層工會組織併入這個新黨。一開始我就相當率直地告訴他，我知道的更清楚；而他，對勞工運動的實際情況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是不可能自欺欺人地相信這種荒唐的念頭的。不久，⁸⁷他就承認他對前途重新考慮和反復思考以後，感到很苦惱。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很高興能找到一個人向他說出自己的真心話

并且得到他的一些鼓励来抵抗官方政策的有害方针。他同意，如果没有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支持，芝加哥代表大会的工会代表就无法使他们的地方和中央组织加入新的“农工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连试一试都不会。我逼着他向我解释，别的人且不管，为什么他同意在这样一个不利的问题上同费兹帕特里克过早地分裂，我还要他解释，如果分裂无法避免，为什么他同意不顾一切地建立一个新的所谓劳工党。

我一向把他的回答当作一段值得一再重复的格言铭记在心中，我也常常需要重复这些话。他大体上是说：

“你知道，这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心愿相同的人们聚集到一间密室里，往往就以为事情真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谈着谈着就得意忘形起来。在代表大会的党内会议中，我们许多人被一时的热情冲昏了头脑，一再强调我们在这里也有力量，在那里也有力量，在各地都有力量，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里也有力量，以致我自己也不禁飘飘然起来，明知不对，不肯相信，竟也相信起来了。”

接着他还说：“麻烦的是，我们自己是大醉初醒，而在纽约，其他人仍然生活在空想的天堂里。必须设法改变这种方针，不然，我们工会工作到现在为止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很快就会付诸东流。”

* * *

不久以后，我回到了纽约，一点也没有隐讳我的不满。那时（1923年夏天）我给《工人》周报写了几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想要在美国劳工运动的实际情况，我们力量的孱弱以及同“进步分子”肯定决裂的失策这些问题上给人一个不同的印象。我在一篇文章的末尾说道，我们应该朝着“重新接近进步分子”的

方向进行工作。任何人都了解，这些文章是对党的現行政策的間接批評，文章鼓励了許多別的人表达同样的意見。在党的队伍里，我听到許多人表示同意和支持我的立場。

接着不久，在政治委员会的一次會議上——福斯特也参加了这次會議——佩帕尔把我挑出来給了一頓申斥。他企图用恐吓加嘲笑来使我立刻停止批評和反对。我对他給我的待遇毫不买帐，并且还这样說了出来（我們土生土长的美国革命者一直都有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并且习惯于言論自由）。在这场冲突中，魯登堡、洛夫斯东和其他的人都保持沉默。但是，福斯特却溫和地表示，他正在对芝加哥的經驗和由此产生的整个政策方針进行重新估計。

* * *

会后，福斯特告訴我，他对整个形势十分担心，佩帕尔显然打算虛张声势到底，并且使恶劣局面更为恶化，这使他尤其担心。他認為我們在工会中的一切障地都有崩潰的危險。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把事态的新轉折和他在党内的地位联系起来。我記不清他是否这样明白說过，但是，我想，福斯特是到这个时候才从根本上决定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党内并且在爭夺領導权的斗争中同佩帕尔决一雌雄的。

在这个时候以前，他的工作只局限于工会教育同盟，并且还没有公开承認自己是党员；虽然他曾經清楚地表示了他同情哪一方面，但是，他并没有参加爭取党的合法化的內部斗争，可是，在工会教育同盟的工作中和他最接近的一些人，首先是白劳德，都已經积极地参加了党内斗争。

我想，福斯特原来的計劃并不打算公开与党站在一起，而只是想做一个突出的群众領袖，在广泛的范围内独立进行活动，并

且在他提出的条件下取得党的全面支持。有一次，他曾經对我說：“德布斯从来不肯把時間花在内部會議上。他把自己的威信建立在群众当中。而党内政治家們在内部會議上作出决定之后，却必須首先探詢德布斯对这些决定的意見，然后才能把决定付诸实施。”⁸⁹

在 1923 年，我們党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福斯特已經明白，在临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党已經控制了一切，然而，如果他真的想要控制工会工作，并且使这一工作不超出现实主义的界限的話，他就必須大大插一手来控制党本身。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已經下定了决心，要把他的工作重心从工会教育同盟轉向党，但是，不久以后，他正是这样做的。

* * *

不久，新的派別营垒开始形成，于是爭夺“党内控制权”的斗争开始了。这场斗争持續了六年之久，有許多后果是原来策动这场斗争的人所沒有預見到和連做梦也沒有想到的。至于談到我，我肯定地認為一場真正的派別斗争已經临近。我毫不迟疑地着手在党内寻求支持。当时，我認為，并且現在还認為，我的方針同我在 1919 年全国左翼會議上采取的、后来始終坚持不变的方針，是完全一致的。

我認為，光是把党合法化，并且使它摆脱自我的地下孤立状态是不够的。如果要使党成为劳工运动中和美国总的生活中的一个因素的話，还必須同时使党“美国化”，和“工会化”；党必須承認现实，并且使自己适应现实的需要。党必須不仅在一般党员中，而且也在领导机关中实行无产阶级化。一个党的领导机构如果被一些对劳工运动一无所知，并且在美国现实中毫无根基的“知識分子”操縱，那就只能把党，用美国激进运动的一句老

实話來說，从一次冒险引导到另一次冒险，直到运动淪为一无所
有时为止。尤其是，党需要一批在自然淘汰的严酷过程中經過
考驗的土生土长的本国領袖人物。

簡而言之，这一切只不过是說：佩帕尔的独裁統治必須推
翻。

* * *

我們开始遵循这些路綫进行斗争，并没有在提綱和決議中
把我們的綱領写成成文的形式。提綱和決議都是后来才出現
的——很多，甚至是太多了，但是它們合在一起，也抵不上我們
开头的非正式綱領的一半。这个綱領就是我們长期斗争所真正
爭取的东西。

90

我們首先要求把党的总部从本身就是一个孤島的紐約迁移
到美国无产阶级中心芝加哥。这一要求并不只是住所爱好方面
的一种怪癖。它象征着美国无产阶级工会的方向，在党内也是
这样理解这个問題的。

佩帕尔的多数派不久就对我們的要求讓步，同意把党的总
部迁到芝加哥去——可是他們究竟为什么这样同意，我却始終
不知道——在1923年初秋，我們就开始动身了。党的全国中心
設在芝加哥前后有四年之久。在离开紐約之前，我曾尽自己的
一切可能在那里筑起了一些政治障地。

* * *

联合农工党七月代表大会上的得不偿失的胜利所引起的失
望情緒，以及在各方面进行独裁活动的佩帕尔领导所引起的不
滿情緒，比党内多数派所知道的要广泛得多。他們不但对劳动
运动的现实判断錯誤，而且还錯誤地自鳴得意地以为他們在党
内已經穩如泰山了。

从一开始，在同党内各个不同方面的许多著名人物的广泛交谈中，我就已经明白，如果斗争公开了，我们就会得到有力可靠的支持。我必须承认，我帮助了事物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我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宣传家，始终反对党的政策的自流倾向，特别是反对党内的独裁统治。

* * *

那时，在这条战线上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我首先希望获致的成就，就是和犹太分部的领导人结成同盟。党内这一部门的领导本身就分裂成两个派别。一派以毕特尔曼为首，他代表了创始时期的共产党人；另一派以欧尔金为首，他代表了1921年12月工人党建立时由于和工人理事会一派合并而吸收进党的一股相当大的力量。这两派人为了控制一家犹太日报《自由报》，几乎天天斗争不已，打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

为了形成党内的新营垒，我曾经争取这两派人的支持，并且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获得了成功。在我同毕特尔曼首次进行广泛的谈话时，他对我们的目的表示完全赞同；从此以后，在后来斗争的整个发展中，他一直是重要的参加者。

欧尔金和他的同伴们因为我在建立工人党时竭力主张吸收他们参加，后来又竭力主张取消地下党，因此对我特别感激。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地下党，对地下党的秘密“控制”深感愤慨。

* * *

我们同犹太领袖们的同盟有稳妥的基础。我们这场新的斗争要争取“美国化”，争取直言无讳的无产阶级的、工会的、中西部的方向，争取由在美国本国出生的人担任领导。而犹太领袖却全都是纽约人，而且还是知识分子。这样一场新斗争却要从同犹太领袖的同盟来开始，似乎是不协调的。但是，这在生活中

却不像在鉛印文章中看来那样矛盾。

犹太共产党人受美国生活同化的程度，比起其他任何外国語言分部派的人要深得多；他們对于由真正的美国人担任领导的决定性意义有着一种更为现实的認識。他們希望成为一个更为广泛的美国运动的一部分，而不希望仅仅做紐約人和外国出生的共产党人所組成的无价值的集团的領袖。我想，这是他們和我們結成同盟的主要动机，就他們而論，这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确的动机。

而且，他們之所以迅速同意結盟，主观上可能是由于他們自己对佩帕尔领导有一些强烈的不滿情緒。他們自己內部的猛烈的狗打架式的派別斗争曾經多次提到政治委员会去。希望征服更多新世界的佩帕尔給派別斗争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却只使双方都更加恼怒。佩帕尔企图“接管”犹太分部和《自由报》。他指派了一个政治委员会的“政委”去监督那家报纸。政委的任务是創建第三派——佩帕尔派，把另外两个互相厮杀的派別中的少数投降者收容进来，而把其余的人一脚踢开。

92

* * *

被派去从事这项艰巨任务的是吉特劳，而这项任务是任何一个有现实感的党内政治家即使手拿一根十呎长的竿子也不敢去碰一碰的。他的运气也不好，他过去进行过反对取消地下党的倒霉的斗争，因此，两边的主要領袖都对他采取敌視的态度。除此之外，吉特劳对意第緒語一窍不通，而且根本没有資格在这个領域內当一个作家。后一情况特別引起《自由报》工作人員的恼怒。他們都是第一流的作家，有理由为他們在这方面的特殊資格感到得意。

毕特尔曼和欧尔金两派繼續着他們自己爭夺控制权的斗

爭。但是，在和我們結盟之后，他們就使自己的斗爭服從于爭取改變黨內領導機構的更為廣泛的斗爭了。

在福斯特和我這方面，這個聯盟沒有什麼真正不合适的地方。我們並不需要在我們的基本目標方面作什麼讓步，因為這些目標都得到猶太領袖的全力支持。另外一方面，我們反對知識分子把持黨的領導的態度並沒有發展成為“反知識分子主義”，也沒有發展成為想要在領導成員中排斥知識分子的神經病。

當時，福斯特只認識一些工會方面的人物，很少認識黨內的其他許多重要人物。他在斗爭的最初階段，把同這些人打交道的東西都交給我。他對我的工作成績感到十分滿意；由於確信在黨的幹部中獲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他的勇氣也更大了，在總部遷到芝加哥以後，他就在政治委員會中採取了更為堅定的立場。

* * *

斗爭並沒有馬上公開。正像在派別斗爭的最初階段中所常見的情形一樣，政治委員會中的摩擦和衝突先是醞釀了幾個月，然後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爆發起來，接着又平息下去。也有人⁹³試圖把裂痕彌縫起來，也有過雙方互讓的妥協，可是，每一次，只要“聯合農工黨”的老問題提到會議上來，我們之間就會發生猛烈的衝突。而後，在下次會議上，又會以一種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和協議方式迅速處理另外一些事務。我記得，佩帕爾在一次會議上說過：“只要‘聯合’問題不出現在議程上，我們就可以和和乎平地開會，這難道不奇怪嗎？”

在預定的代表大會以前一個月左右舉行的全體會議上，政治委員會中的兩派分別提出了提案。但是，在全體會議上經過了有時極為熱烈的討論以後，大家商定了一個折衷方案，決定向

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共同提案。究竟两个提案有什么不同，我們最后商定的共同提案的内容又是怎样，現在我都記不清了。我也沒有兴趣查对旧的档案和証实它的細节。反正，这也沒有什么真正重要之处。

真正的冲突是两派在党的控制問題上的冲突，它們在对待党的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不仅仅在这个或那个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也不仅仅在这一时候或另一时候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在整个路綫，整个方向，以及在一个长时期內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这个問題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双方就当时的某些单独的政治問題分別提出的提案，不能充分說明这个基本冲突，双方一致通过的折衷性決議也消除不了这个基本冲突。

* * *

随着 1923 年的代表大会的逼近，在紐約和芝加哥的党员大会上爆发了一场无声的斗争，这个斗争甚至还蔓延到选举代表大会代表的区代表大会中去。在代表大会以前的时期里，我看見佩帕尔在最艰难的逆境里表现了他个人的魄力和胆量，这件事一直令我异常欽佩——虽然可以說，我們在党内是处在敌对的营垒中。

他在美国是非法的；对他來說，在任何公开場合出現，或者讓太多的人認識和認出，都是危险的。而且他的英語大約才学了一年。尽管这样，在芝加哥一次紧张的全体党员大会上——⁹⁴在这次大会上，斗争真正爆发了，我們集中猛烈火力攻击他的統治——他事前未經宣布就出現在会上，并且對我們进行了还击。在一群激动得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满怀敌意的群众面前，他起来发言，并且同我們进行辯論——用英語！——而他的发言还成为会上他的一方的主要发言。这真是一次精彩表演，不过还是失

敗了。

在查明福斯特一坎农反对派已經拥有超过二比一的多數以后，他又参加了代表大会的一次秘密會議。这次秘密會議是应他的請求而特地安排的。他参加这次會議是为了拚命扭轉局面。他的講話有力而又动听。我記得当时福斯特又欽佩又憤恨地——福斯特真的憎恨佩帕尔——对我說：“这个人講話的时候房子都在搖晃。”

但是，佩帕尔这次英雄般的努力絲毫也沒有起作用。在代表大会的斗争过程中，一个新的多數派队伍得到了巩固。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领导人員，讓福斯特一坎农联盟在中央委员会中取得了压倒的多數。

* * *

但是，斗争并没有結束，我們和佩帕尔的糾紛还没有了結。佩帕尔分子不甘心失敗。他們似乎覺得，別人靠了一时的侥幸，用欺騙的办法夺去了他們理应享有的党内控制權。另一方面，多數派則深信，公道实现了，并且决心把它保持到底。

领导机构中的两个派別，以前是靠了双方关键性人物的非正式諒解团结在一起的，現在巩固了起来，开始发展成为团结一致的，有明确的組織和紀律的小組織。这些小組織漸漸扩展到党的队伍中去，最后几乎包括了每个支部的每一个黨員，他們每个人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边。我們双方的营垒注定要展开为时六年的斗争——但是，当时我們并没有料想到斗争会拖这样长的時間。

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瑣記

95

1955年3月22日

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是在党的队伍中广泛形成各个派别小组的情况下举行的。大多数代表在前来参加大会的时候，大概都还不属于任何一派。随着代表们在大会前夕陆陆续续地跑进城来，两个派别都努力地展开工作，争取他们的拥护。我想，在这条战线上我是我们这一派方面最活跃和成绩最多的一个；佩帕尔一派方面则首推洛夫斯东。

大多数代表的一般意向是支持我们，对佩帕尔领导表示不满。这在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以前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在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以决定性的多数，击败了佩帕尔派的候选人而选举毕特曼为代表大会主席。这件事很可以说明代表大会上的阵势如何。这个阵势在后来的辩论中始终没有改变。

我们在争取洛尔和芬兰领袖们的支持方面并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努力，也没有向他们答应过什么特别的条件。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必要。在大会正式开始以前，在同他们最初几次讨论中，他们就已经表示了自己的选择。

我记得，他们对福斯特从工会活动专家转为党的领导人的前景感到高兴，他们强烈反对毕特曼在新的领导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他们对毕特曼不论干什么都反对。这是为了表示尊敬欧尔金和他在犹太分部中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同洛尔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同毕特曼闹过很多纠纷。

福斯特对毕特曼受到的反对感受很深，并且很为此担忧。福斯特总是动不动就把任何遭受攻击的人都抛弃掉。但是，我⁹⁶

只是到后来才了解他有这种令人讨厌的犯罪癖好。那时，我把他的忧虑归因于他不熟悉党内事务和党里的人，我极力主张支持毕特尔曼，他对此作了让步。洛尔分子最后也接受了毕特尔曼，作为他们方面的一个“让步”。

战前的社会党

1955年5月31日

我在这里附上给我们的杂志写的一篇论述“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文章。^{*}这篇东西后来辑印成册，但是整篇东西是计划给《第四国际》夏季号刊用的。文章相当长，可是，如果你有时间读的话，你也許可以找到一些有关早期共产党背景的有启发性的材料。

我不知道你计划怎样来逐步叙述共产党形成的过程，怎样来解释成为共产党前身的先前的各种运动。

艾拉·基普尼斯在1952年出版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1897-1912》一书对社会党1912年以前的历史方面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材料。我想你对这本书是熟悉的。不知道为什么基普尼斯这本书在刚出版的时候，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最近才弄到一本，并且还没有机会把它好好看一遍。

根据我初步浏览所得的印象，我倒有点怀疑基普尼斯的客观性。书中有些斯大林体的搬弄是非的语句值得警惕。书中的引证也太多了。这些东西可能全部都是准确的，不过，你知道，用公然伪造的办法固然可以歪曲历史，用选择史料的办法也未

^{*}本书已加以转载。

尝不可以歪曲历史。

在第一次浏览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我 97 毫不隐讳我是袒护左翼的，另一方面，我也很关心在历史著述中尊重事实真相。我总在想，从革命的观点来看，希尔魁特和柏格的一翼是不好的，基普尼斯引证的文献资料似乎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他这样彻底而又无可置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以致使我反而有点担心他做得太过分了。我认为，就全体而论，社会党比他所说的要好得多。否则，怎样来解释它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和大多数党员在 1917-1919 年的危机和分裂过程中支持左翼的事实呢？

*

1956 年 1 月 8 日

你 1 月 2 日、3 日和 4 日的来信都收到了。我将尽可能快而又尽我所能来答复。目下，我正集中精力写一篇有关德布斯诞生一百周年的大文章。*我得先完成它。我的日程上也还有一些别的事情需要处理，等我处理完这些事，我才能回答你关于共产党早期时代的问题。

我现在一会去回想美国共产主义的头十年，一会又去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美国运动，还得注意时事，的确搞得头昏脑胀。这是三个互不相关的世界。我有些觉得我好像是在一个密封舱里作宇宙航行一般。我在运动中确实有过三种不同的生活，现在要在回忆中把这三种生活重新经历一番，确是一桩极其吃力的事情。

*

* 本书已加以转载。

1956年1月27日

我終於写完了关于德布斯誕生一百周年的論文了，它将在
98 我們的杂志的下一期上刊出。我給你随信寄上用复写紙打的一份副本；在你研究美国左翼的起源的时候，你将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很有意思的背景材料。

我的論文不能不大加压缩。論文特別側重于战前旧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我們特別有关的一些方面。

在第四章里，我贊揚了在这方面从事工作的学者，并且向那些想要进一步探索这个問題、获得更全面的了解的研究者推荐了他們的著作。

战前的无政府主义者

1959年2月6日

你在談到1923年农工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提到了安东·約翰森。这使我清清楚楚地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的美国激进运动来。在那些日子里，无政府主义者是激进运动中一个公認的而且受尊敬的部分。約翰森就是他們当中的一个。他是一个“講求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行动看得比理論更重要。他从龔柏斯到海伍德每个人都認識。各个圈子的人都友好地接待他。我想起了赫琴斯·哈普古德給約翰森写的传记《劳工的精神》。这本书有趣地再現了新旧世紀交替之际芝加哥运动的情景。

約翰森在旧时代的激进派圈子里是一个有名和得人心的人物。作为一个实际的組織者，他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圈子里是有地位的，他也是国际木工联合会的一个領薪金的代表，但

是他还是同各式各样的激进分子保持了友好的甚至是亲密的接触。1915年前后，他在堪萨斯城呆了几个月，在那里争取人们声援施密特和卡普兰，并且募集保卫基金。施密特和卡普兰是两个无政府主义者，并且都是約翰森个人的朋友，他們受麥克納馬拉案件的牽連而被告发和被捕（他們被判了罪并在圣昆丁監獄中长期服刑）。

由于他有美国劳工联合会授予的正式證明書和一副动人的仪表，他可以自由进出堪萨斯城中央工会及其屬下的所有工会，他从这些工会募集了不少的保卫基金。另外，他的一切空閑和社交時間都是和我們各种色彩、各种派别的激进分子在一起消磨的。白劳德和我同他有很好的交情，并且为了施密特和卡普兰的案件在許多活动中同他合作。

約翰森也参加了1925年芝加哥国际劳工保卫組織的成立大会。他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說，要求把吉姆·麥克納馬拉和馬特·施密特（卡普兰已被释放）也包括到值得这个新組織支援的階級战争俘虏名单里去，他的建議为全体所一致接受。他為我們写了一篇关于馬特·施密特的文章，刊載在1926年7月的《劳工保卫者》上边。这是国际劳工保卫組織的月刊。

有人可以写一本关于这些人的极其有趣的書。我到圣昆丁監獄去看过馬特·施密特好几次，他是一个秉性高洁，勇敢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吉姆·麥克納馬拉也是一位男子汉，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一个沒有理論的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

（注：下面这封写給密拉·坦納·魏斯的信，似乎可以放在这里，作为关于战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补充材料。）

1955年7月29日

亲爱的密拉：

你6月9日的来信收到了。我把我那本关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小册子的手稿寄给你，在我来说，的确是有点故弄狡狴。我知道，我那本小册子会使你想起这个组织的往事来。

100 莫莱认为我寄这本小册子给你是承认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如果他反对这样一个字眼的话，他就大错特错了。无政府主义在组织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名辞矛盾，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个人中间的无政府状态的话，我们就不会需要组织的纪律了。革命政党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就一种意义而言，它实际上是各个个人的叛逆本能和一种理智上的认识的融合。这种认识就是：他们的反叛只有在他们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打击力量时才会是有效的，而只有一个有纪律的组织才能够提供这种力量。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对无政府主义者非常友好，并且我自己天性上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非常珍爱“自由”这个字眼，它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词汇中是最重要的一个字眼。但是，我并没有服从我的冲动，跟他们一路跑，因为我认识到，只有改造了社会，才可以使自由成为可能，但是，离开了组织也就无法改造社会。而且组织就意味着纪律和个人服从多数。当时，我很希望能够二者兼得——事实上，我现在都还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到现在还想不出到底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一步。

在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人不知道，也不能真正体会在那个时期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什么样子。

当时，它在理論上的假定还没有受到决定性的考驗。当时，无政府主义被認為是最极端的一种激进主义。在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有一些极其优秀的人物；他們具有秣市烈士的傳統，他們在所有的激进分子圈中都非常受敬重。当恩瑪·戈尔德曼和亚历山大·白克曼在演說旅行途中来到堪薩斯城的时候，我們这些“国际产业工人联盟”的盟員总是精神抖擞，把帮助他們的集会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来做。

恩瑪·戈尔德曼是一个伟大的演說家，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演說家之一，白克曼却是一个有着高洁气質的英雄人物。在湯姆·蒙尼被判罪以后就要送上絞刑台的时候，別的人都变得胆小怕事，一声也不敢吭，正是他，組織了保卫湯姆·蒙尼的第一个保卫委员会和运动，我还記得他到堪薩斯城来的情景。当时他还在作全国旅行，安排建立第一批蒙尼保卫委员会的組織网。我高兴而又自豪地想起了我当时已是白克曼組織起来的这第一个委员会的积极成員。（我和白劳德！）

初期无政府主义者的冲动是美好的，但是他們的理論是有缺点的，它沒有能通过战争和革命的考驗。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革命时期竟然变成资产阶级的內閣部长，这是可耻的；而紐約旧日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說他們的残余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竟然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也同样是可耻的。錯誤理論为害是再大不过了。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兴致，我将要写一点东西，談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运动。

战前的左翼

1954年7月22日

参看：毕特尔曼的《美国共产党史》（重印于《参议院 1930 年共产党活动特别委员会〔费希委员会〕会前作证》一书中）。

我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里研究了提醒你注意的这份文件，我发现它确实很有意思。这显然是毕特尔曼替纽约或芝加哥学校的一些训练班准备的一系列讲稿的提要。根据书中的证据判断，我想它的写作年代是 1923 年下半年和 1924 年上半年。

这部“历史”显示了毕特尔曼作为一个学者和批评家的全部才华，它也说明了当时我们当中那些从工团主义来到党内的人为什么很重视他。作为一个学者，毕特尔曼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党内政治方面，以及它的传统和内部的理论分歧比我们所得到的要多得多。

* * *

战前左翼运动分裂为狭隘的“政治的”党派和“反政治的”工团主义派，始终是一桩很坏的事情。我还从来没有看到有谁对
102 左翼历史的这个方面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毕特尔曼的阐述，尽管非常简略，大概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阐述。

我想，在俄国革命以前的时期中，美国运动中工团主义的一派无疑是更革命一些，他们有最优秀和最肯自我牺牲的战士，最关心阶级斗争中的群众工作和实际行动。但是工团主义认为议会社会主义毫无用处，却未免矫枉过正，也产生了流弊。由于完全拒绝“政治”和由此产生的政党观念，工团主义者就为他们自己的运动的毁灭准备了条件。工团主义者迷信行动，很少或甚

至根本沒有理論的訓練或傳統，並且一般來說十分藐視“理論”。

我記得，從那時起，這兩大派之間的分歧常常被粗略地說成是“行動和理論之爭”。當時我還年輕，而且非常喜好行動，我是文森特·聖約翰的“直接行動”學派的一個狂熱信徒——“哲學家們”和“理論家們”都一齊給我滾開。我現在仍然相信行動，可是“世界產業工人聯盟”在後來幾年的悲慘命運應該能夠使得人人都相信，行動沒有必要的理論指導是不足以建立一個持久的革命運動的。

* * *

畢特爾曼著的《歷史》是對社會黨戰前左翼運動的缺點的一個有教益的、簡要的解釋，是這個運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影響下進步演變的翔實的報告書。他指出，社會黨左翼認為黨是“革命工會的附屬品和社會主義的宣傳工具”（Ⅳ節C小節），他對左翼這種概念所作的敘述和批評是十分貼切的。他本來還可以指出，右翼社會黨人也有同樣的基本理論，只不過歪曲得不同罷了。他們索性認為社會黨的有限的作用在實踐中就意味著不干預工會內部勞工騙子們的事務，只批評他們在選舉期間的政治活動。

* * *

特別有趣的是，畢特爾曼談到托洛茨基——在他1917年旅居紐約期間——曾經幫助社會黨人的俄文日報《新世界》，成為“左翼的一個新的思想中心”，並且曾經倡導出版《階級鬥爭》作為左翼“說英語的分子”的首要喉舌。這就証實了托洛茨基在他的自傳《我的一生》中所寫的他自己在美國的工作經歷。托洛茨基和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整個發展有很大關係——從1917年美國共產主義運動在社會黨左翼中誕生起，中間經過1922年的

103

合法化大危机，直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它的最高潮就是我們在 1928 年被开除出党和我們后来的活动），始終是如此。毕特尔曼信实地提到，在 1917 年，甚至就在布尔什維克革命以前，托洛茨基就帮助左翼重新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在我看来，这就确凿地証明，他的文件的写作年代不晚于 1924 年初。毕特尔曼能閱讀俄文报纸，并且总是机械地跟着他們跑。在托洛茨基在俄国党内斗争的最初阶段变为少数派之后，毕特尔曼就决不会再替托洛茨基說好話了。

* * *

毕特尔曼关于“密执安集团”（后来的无产者党）的一段叙述是正确的，中肯而又全面（第Ⅷ节）。在美国共产主义历史上，这些妄自尊大和自作聰明的人差不多也只配占这样一小节篇幅。正如毕特尔曼所說，这些人“全然看不見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日常的战斗性質”。

* * *

毕特尔曼关于 1919 年 6 月左翼全国代表會議的报告（第Ⅷ节），是一个严格的紐約“政治的”党派分子的报告，完全值得和我 1954 年 4 月 21 日的信件放在一起加以研究，因为我在那封信里談到我自己作为一个初次到紐約来的外省人所获得的印象。特別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一段話：“在會議中有一个第三集团存在，他們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西部各州的說英語的代表，这个集团贊成参加社会党的代表大会，因为他們对于和社会改良派决裂完全沒有准备。”

以前我写信时曾經告訴过你，我們非紐約人都知道社会党对于 1919 年的分裂是沒有准备的。但是在毕特尔曼的書中我才第一次看到，有人清清楚楚地写着，紐約人真正了解“来自西

部各州說英語的代表們”的態度——西部各州指的是曼哈頓島 104
以西的整個地區。就 1919 年 6 月以後發生的一切事情而論，也
許我有些離開了中心，但是，每當我想到那些把左翼拖進了那次
為時過早而代價高昂的分裂的紐約人是多么無知而傲慢的時
候，我就忍不住還要冒火。

* * *

畢特爾曼關於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俄羅斯分部的小組
組織和小組織怎樣操縱大會(第Ⅷ節 B 小節)的報告，是我所看見
的關於這次可怕勾當的唯一的內幕報告。儘管很簡短，但是我
完全相信它的準確性。畢特爾曼自己就是一個俄羅斯人，他顯
然是奧爾威奇(也是俄羅斯人)小組織的一個成員，他對會議進
行情況的敘述是可靠的。

畢特爾曼的揭露真正是一份無價的歷史文件。只要看一看
下面一段報道就知道了。在這段報道里，他說明了俄羅斯領導
人怎樣玩弄“說英語的集團”的領袖們，又怎樣在他們之間進行
選擇的，而這些領袖們則甘心破壞美國本國運動的團結，來為俄
羅斯人服務。

“分部小組織的領導上明白，為了組成和領導這個黨，必須
努力設法取得一個英語集團的服務和支持。有兩個英語集團可
供選擇：密執安集團或‘革命時代’集團。這兩個集團都向分部
小組織提出了自己的綱領”。

接着，“在一場長期鬥爭以後，分部小組織採納了‘革命時
代’集團的綱領。”

最後，畢特爾曼這段文字的結語是：“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
一次會議上，就可以看出外國語分部派和英語集團之間的裂
縫。”

毕特尔曼的文件說明了这伙破坏者在美国本土左翼运动发展的严重轉折关头怎样把这个运动当作儿戏，而他們疯狂的冒险又带来怎样巨大的損失，直到今天，每当我一看到这个文件，就无法抑制心头的怒火，簡直就想回过头去，把这场斗争重头再来过一遍。

* * *

毕特尔曼的著作中关于“福斯特集团在美国劳工运动中的作用”的一段(第Ⅴ节 B 小节)，是大大地夸张和夸大了。这里表现了毕特尔曼作为宗派活动家的面目。这是他更为习惯的角色。他要为他自己的派别——新的福斯特—坎农—毕特尔曼联盟——“辯护”，并且利用歪曲和捏造证据的办法来使他們显得滿有道理。

事实是：福斯特集团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根本說不上是什么革命因素。实际上，他們遵循的是討好和迎合龔柏斯官僚集团，而不是同它作原則性斗争的政策。一点不假，福斯特自己和他的少数助手先在屠宰业中后来又在 1919 年的鋼鉄大罢工中做了真正伟大的組織工作。可是，这都是經過龔柏斯集团的同意以后才做的，代价則是放弃一切原則性的批評，包括原則中的原則，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

[參看龔柏斯、費茲帕特里克和福斯特自己的証詞，原載美国参議院委员会的报告。題目是《鋼鉄工业罢工(1919年)調查。第六十六屆国会第一次會議美国参議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調查会》录自 1929 年 8 月 15 日《战斗者》。]*

我認为，把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福斯特集团說成是后来演

* 这一証詞里的部分摘录刊在本章后面。

变为共产党的革命左翼中的重要流派在历史上是不正确的。最严格地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进步的工会集团。我从来就不知道他们当中有过半打人变成了共产党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福斯特

(印在下边的材料说明了威廉·福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材料包括参议院关于1919年钢铁大罢工的调查会议的公开油印纪录的部分摘引。已发表的一卷题为：《钢铁工业罢工调查。第六十六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美国参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调查会。依照关于参议院调查钢铁工业罢工决议案的参字第202号决议。》)

福斯特和龔柏斯

106

費茲帕特里克：他(福斯特)并没有宣传，而只是把自己绝对地局限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活动和范围之内。从我认识他这些年以来，他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这对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我认识福斯特大概有六、七年了。(75页)

主席：你同他讨论过这本书(《工团主义》)吗？

費茲帕特里克：噢，他是拿他少年时代的一些想法开玩笑哩，那时候，他同一些思想激进的人交往，并且受了这种思想的熏染。但是，当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就知道怎样更加审慎地和更加明辨是非地去衡量事物了。他已经忘掉了少年时期学到的一切。现在对这个问题是照成人那样来思考的。(76页)

龔柏斯：大约在苏黎世的那次会议后一年——不，在苏黎世会议后约两年，(福斯特是作为“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国际代表

到那里去的——著者)也是在那本小册子(《工团主义》)出版以后一年左右,我出席了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会议,会议由约翰·费兹帕特里克担任主席。人们要求我讲话,我也就讲了话。我结束讲话之后,一位代表站起来发表意见说,如果芝加哥和全国劳工运动的人都能遵循龔柏斯主席在讲话中所陈述的思想、哲学等等,那才是一种聪明的作法。我不认识这位代表是谁。对我来说,他是一位新人。当时,不但我的发言本身得到普遍赞许,连在我之后第一个讲话的代表的发言也得到普遍赞许,我不妨说,我当时的确十分得意,十分高兴。

使我更为愕然的是:会议结束之后,人们告诉我这位代表就是威廉·福斯特,也就是出现在苏黎世和写那本小册子的那个人。我认为,我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表示我赞赏他改变态度和改变心意,并且还向他指出,只要遵循建设性的政策,他可能对劳工的事业作出真正的贡献。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仪表堂堂,举止温文,英语知识丰富,我鼓励了他。我愿意帮忙架起一道金
107 桥,让我的敌人走过来。我愿意欢迎一个有过失的弟兄回到建设性的劳工队伍里来。(第 111-112 页)

福斯特:我是一个不时改变想法的人。我可以说,别的人也是这样。我在拉桑特监狱中和古斯塔夫·赫夫握过手。当时他因为反对军国主义和鼓吹怠工而被监禁在那里。可是今天,我仍然认为古斯塔夫·赫夫(他已经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著者)是法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第 396 页)。

主席(对福斯特):但是,在当时,当你在国内外鼓吹“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学说时,你的所作所为恰恰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背道而驰,难道不是这样吗?

福斯特:是的,先生。

主席：不論怎樣，龔柏斯先生并未改变他对“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观点，可是你的看法改变了，是吗？

福斯特：我并不认为龔柏斯先生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可能只是变得更加坚决了。

主席：可是你现在却对委员会说，你的看法已经变得和龔柏斯先生的看法一致了，是这样吗？

福斯特：是的，先生。我不知道是否百分之百地一致，但大体上来说，是一致的（第 423 页）。

福斯特和战争

参议员瓦尔希：他在战争中对这个国家的态度如何，你知道吗？

费兹帕特里克：绝对忠诚，他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从各方面为国家效劳。我和他在一起工作。我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和他在一起工作，我了解他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我认为，他不仅为美国政府，而且也为盟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贡献之大不下于任何一个人（第 75-76 页）。

参议员瓦尔希（对福斯特）：你在战争中对这个国家的态度怎样？

福斯特：我对战争的态度是：必须付出一切代价，争取胜利。

参议员瓦尔希：费兹帕特里克先生提到你购买公债或者说 108 你给某些募捐基金者捐款，你愿不愿告诉委员会，你个人在那方面做了些什么？

福斯特：我想，我购买了我能力所及的份额。在我们的工会中，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帮助公债的推销获得成功。

瓦尔希：你发表过演说吗？

福斯特：发表过，先生。

瓦尔希：多少次？

福斯特：噢，许许多多多次了。

瓦尔希：为了便于记录，我愿意请你告诉我们，你发表过多少次演说？花了多少时间？你为买公债给红十字会捐款、或者为了其他目的，共花了多少钱？

福斯特：嗯，我想，在战争中，我不是买了四百五十元，就是买了五百元的公债。我不能说出确数来。

瓦尔希：你曾为推销公债而演说吗？

福斯特：在我们屠宰业的组织中，我们进行过一次正规的运动。

瓦尔希：那么你的态度是不是同你的组织中其他所有成员的态度一样呢？

福斯特：确是那样的。（第 398-399 页）

福斯特和白劳德

1954 年 8 月 4 日

我在 7 月 23 日信中说过，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的劳联中的福斯特派，人数有限。这番话，是符合事实的，也许还把他們的人数估计得过高了一点。除了福斯特以外，其中只有两个人——约·曼莱和杰克·约翰斯顿——在党内起过显著的作用。我所以知道杰·福克斯，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一个有名的无政府主义派主编，但是我在共产党内从来没有碰见过他。这意思差不多也就是肯定说，他没有在党内呆过，因为在全国任何一个角落，每一个稍稍活跃或者突出的人，我没有不知道的。福

斯特(在《美国共产党史》中)提到戴維·考茨,他的情形也是这样。 109

十分可能,这些人以及劳联福斯特派中另外一些数目不“多”的人形式上参加过党,后来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退出去了。1923-1927年我在芝加哥地方組織的时候,塞姆·汉穆斯·馬克在那里起过一点小小的作用。但是,像絕大部分在工会运动的窄小学校里形成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人一样,他在党的錯綜复杂的政治活动中茫然不知所措。

福斯特本人以及約翰斯頓和曼萊对共产党都作出了个人的貢獻,福斯特的貢獻大些,后两人的貢獻要小得多。但是,如果把劳联中的福斯特派說成是对新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貢獻的一个支流,那在历史上就是不真实的。就連战前曾經是福斯特派工团主义者的白劳德,也并不是通过福斯特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他越过福斯特派——如果我們可以說这样一个支派是一个明确的政治流派的話——以个人身分先于福斯特三年加入了党。然后,白劳德才奉党的委托邀請福斯特出席1921年的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从而促使他走上了参加党的道路。

白劳德所以能够首先在1918年加入社会党左翼,他所以能在1921年进入共产党的全国领导机构并且来到紐約,他所以能在同一年率領一个代表团前去参加职工国际代表大会——这一切都是由于我直接从中出力的緣故。这是一件历史的巧合,我既不应为此受称贊,也不应为此受責备。正是在莫斯科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上,白劳德再一次和福斯特搞到一起,然后成为他在工会教育同盟总部的第一个助手,而且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助手。

白劳德的出身和我的出身几几乎是一样的,我們在政治发展上的各阶段也几乎是一样的。我們年龄差不多相同,原籍都

在堪薩斯，少年的時候都是社會主義者，兩人差不多都在同一個時候從社會黨轉入工團主義活動。後來，有幾年我們的道路稍微分開了一些。白勞德接受了福特斯式的工團主義，我仍然在
110 世界產業工人聯盟。然而，組織上的分手卻從來沒有像戰後和俄國革命以後那些年份那樣，在我們的合作和個人關係上造成尖銳破裂。

在那個時候，屬於不同組織和傾向的人們總是在相互有關的事業中，特別是在保衛勞工的問題上，彼此保持個人聯繫和合作。在各地保衛湯姆·蒙尼的委員會里，在麥克納馬拉事件引起的施密特—卡普蘭案件里，在類似的“統一戰綫”（我們當時還沒有聽見過這個名詞）性質的活動中，白勞德和我搞得非常熟。同我們一道工作的還有堪薩斯市其他色彩的激進分子。

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我們共同反對參戰的立場使我們更為接近了。白勞德和他的兄弟們在白克曼和戈爾德曼的無政府主義宣傳的影響下，曾經嘗試組織人們公開反對征兵，根本拒絕進行征兵登記。我採取了一種稍有不同的策略，就是作為一個“良心上的反對者”去登記，世界產業工人聯盟和左翼社會黨絕大多數人贊成我這個辦法。

在1917年因為拒絕征兵登記而第一次入獄受一年監禁之前不久，白勞德曾經前往紐約。他在紐約和美國合作社同盟的有關人物有了接觸，並且開始非常熱烈地傾向於合作社運動的工作，一方面把它作為一種職業，同時也把它作為表達政治見解的途徑。當他在獄中的時候，俄國革命和《解放者》報、《革命時代》報關於俄國革命的主要思想的宣傳影響了我，我完全修改了我的工團主義觀點。

為了把我新得到的政治觀念付諸實踐，我決定重新參加社

会党，并且同当时《革命时代》报所推动的全国左翼发生了联系。我和（“矮子”）波赫勒以及堪萨斯市其他一些工作者共事。这些人都赞成成立新的政治党派的主张。我们决定在堪萨斯市办一张新的周报来表达我们的政治见解。在筹办这张报纸的初期，白劳德和他的兄弟们出了狱，我立即就去找他们讨论这个新计划。

我十分肯定，在这次见面以前，白劳德还没有这样急剧地改变他的方向。但是他和我自己一样，在开始时都是一个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者，我发现他愿意接受这种新的主张，对它表同情。我们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热心地为创办我们的《工人世界》报而工作起来了。我们一道参加了社会党地方组织，同时参加的还有堪萨斯市另外一些精力充沛的战士——前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盟员、劳联工团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很多无党派激进分子。他们先前因为觉得社会党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激进观点，曾经退出社会党。

白劳德担任了这家报纸的第一任主编，但是不久之后，他因为策划阻挠征兵而不得不去利汶沃斯服第二次的两年徒刑，我接替了他的主编工作。我们主持这家报纸大约有六个月，直到我在1919年12月被捕并且根据战时的李维尔法被起诉为止。我被控告的原因是我在堪萨斯煤矿区鼓动人们反对联邦政府的反罢工禁令。

白劳德第二次坐牢期满的时候，约在1921年1月。当时，我已经在纽约，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忙于党的政治活动。党的其他负责人不认识白劳德，但是在我的推荐下，我们请他来到纽约，负责组织出席职工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他因为担任这个工作而同福斯特恢复了接触，并且设法使福斯特也去参加大

会。

以上所說的相当迂迴曲折的經過，說明了我們开头指出的一个問題：劳联中的福斯特派并不是白劳德参加共产党的媒介，虽然他在先前就和福斯特有联系。

* * *

福斯特在他的《美国共产党史》一書中費尽心机設法替劳联里面一小批講实际的工会工作者所組成的福斯特派吹嘘，企图顛倒历史，把这一派說成确是一种政治流派，是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的一个支流。在这里，福斯特的确聪明得过头了。他实际上是对自己做了件不公平的事情，虽然我并不說他有意如此。如果問題仅仅是福斯特不公平的話，我們本来很可以讓它那样下去。但是历史这个东西如果不真實的話，就沒有益处，甚至比沒有益处还要坏，因此，为了把既往的事情还它个本来面目，我感到需要替他辯护，指出他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要在劳联之中創立屠宰业工人工会而取得惊人的成功几乎
112 注定要失敗，而且保險不可能做到，但是福斯特却取得了这样的成功(1917-1918年)。他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在鋼鉄罢工(1919年)中再次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的这些成功是出乎寻常的个人成就。

在三十年代后期，在鋼鉄工业中組織工会是极其簡單的事情；官方領袖們只要利用长时期的萧条所造成的劳工运动普遍高涨的浪潮就行了，刘易斯沒有发动罢工就使美国鋼鉄公司在合同上签了字。但是在萧条以前和产联兴起以前的1919年，只有福斯特一个人以他的办事和組織能力，他的机智，他的耐心和他的旺盛精力，才能够在龔柏斯的官办劳联的框框里繞过行业工会所造成的路障和暗礁，在这样大的規模上組織鋼鉄工人，領

导他們举行大罢工。

福斯特組織鋼鐵工人的活动是无以伦比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他自己不顧官方的一切暗中破坏而进行的，只有极少几个在私人关系上忠于他的第二流人才在他指导下进行工作，但是正因为如此，福斯特的活动就更加显得出色了。他在事后把有这种出色表現的他本身說成是构成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政治流派的工具，这就不仅虛构了历史事实，而且間接地減損了他个人成就的光輝。

福斯特在1913年根据法国工团主义的理論写了一本小册子，提出了一个革命綱領。劳联中的福斯特派就是以这个革命綱領开始行动的。但是这第一个綱領性的宣言不久就撤銷、改写和冲淡了，結果只是含含糊糊地確認单单工会組織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工人解放的一切問題。从此以后，福斯特主义就只不过是迎合官方领导而在劳联中活动的一种方法罢了。

迎合官方领导，个人就能够得到一个工作的机会。福斯特在实际行动中完全証明了这一点。但是迎合并不是一个运动，也不能够創造运动，因为誰为誰效劳的問題总是要跑出来。龔柏斯知道福斯特的过去，他并不是个傻瓜，他認為福斯特的工
113
作和迎合可以为他自己的意图服务。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允許福斯特在劳联的框框里活动的，他在参議院委员会就鋼鐵托辣斯罢工証时就用下流的露骨态度說明了这一点。費茲帕特里克的看法显然也是这样。事实証明他和龔柏斯看得很对。福斯特后来也是这样来迎合共产党的。

在共产党领导下，福斯特在工会教育同盟草創时期的工作和成就，同样十分出色，并不亚于他在屠宰工人和鋼鐵工人中的活动。他在十来个不同的工会中迅速組織起一个有力的左翼进

步小組网,这个事实最令人信服地証明了他以前在劳联的成功并非侥幸。在不同的框框里,这又一次証明了只要有他可以依靠的力量和机构,福斯特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工会組織者。但是,在劳联里和工会教育同盟里,福斯特的的工作都要經過他所效劳的其他力量准許和控制。因此就决沒有,也决不可能有什么福斯特“运动”,或者严格地說,即使是福斯特派这样的东西也是沒有的。福斯特企图用迎合的办法来战胜別人,但是自从福斯特离开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之时起,在他毕生的經歷中,他总是注定了要为这些人的目的效劳。

只有在这个范围内,福斯特才是共产党内他自己一派的領袖。在1925年福斯特派内部的第一次摊牌中,当有关党的利益的政治問題劈面摆在眼前的时候,他看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并且发现福斯特派的政策并不是他自己可以随意决定的。

福斯特派内部的第二次摊牌发生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間。当时反对派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内部會議。那时这一派已經縮小到只剩下外表上純粹的福斯特分子了。在这次摊牌中,这位領袖发现自己陷于完全孤立。这一次,毕特曼在白劳德和約翰斯頓的支持下对他进行了最无情最輕蔑的攻击,完全掌握了“福斯特派”。他在内部會議上弄得沒有一个朋友,一个支持者。(我們其余的人,反对派联盟中不是福斯特分子的人們,只是站在旁边听任福斯特分子去拚个你死我活。)

在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福斯特已經一无所有了,他只能依靠他的名字,只能依靠斯大林利用他的名字达到自己目的明显意图了。他的名字并不代表一种必須加以承認的政治流派,不論这个流派是多么小。毋宁說,这个名字是他作为一个工会組織者的个人成就的象征,是他的社会声誉的象征,这

种社会声誉还没有因为他在党内遭到的失败而严重损坏。

他的名声是靠实际表现赢得的，这种名声使他能党内得到一席特殊地位。但是，说来具有讽刺意味，就连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声也成了一种障碍，使他不能实现他的野心，成为党的正式领袖，虽然这完全是出于斯大林的恩典。斯大林为了他自己的目的，需要美国的领袖（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没有独立力量的领袖，这些领袖要由他来指定，完全依靠他的恩宠。白劳德满足了这个需要。他的例子最生动地说明这样一个候选人的突出特点，不在于他的才能上的缺陷，而在于这种缺陷的性质。

* * *

白劳德天生是一个聪明、孜孜不倦和可靠的主要办事员，但是决不是一个有独立能力和才干的领袖人物。他在斯大林的准许下担任党的形式上的领袖达十五年之久，可是他事前做梦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野心，而且对于他为什么能够上台，他的领导为什么又突然那么轻易就结束，他居然始终糊里糊涂。我不怀疑，在他踩着高跷耸立在党员群众之上的很长时期中，白劳德确曾渐渐觉得自己是一个身高丈二的巨人。但是我非常怀疑，他是不是能够向自己或者别人说清楚，他从开头为什么变得那样高大，为什么他脚下的高跷又那样突然地倒了下来。

* * *

福斯特和白劳德之间当初的关系，按两个人的个人特点来说，是合适的。这种关系就是一个领袖和第一助手之间的关系。任命白劳德在党内坐第一把交椅，而让福斯特屈就一个名誉头面人物的职务，这确是使福斯特含垢忍辱。看到他怎样接受了这个大屈辱，怎样装出一副心甘情愿的样子，真是叫人难受。

在十五年之后白劳德终于被免职的时候，福斯特得到批准

去主持这个仪式。他那种发泄自己长期的怨恨、幸灾乐祸地看
115 着他的牺牲品、庆祝自己空洞的胜利的样子，看了又叫人感到可
怜。实际上，这个伟大的組織者庆祝的是他自己作为一个独立
政治人物的彻底失败，因为他接受的是一个沒有实权的形式上
的领导职务。

洛夫斯东和毕特尔曼

1954年8月

洛夫斯东毫无疑问是这场謎一般的戏剧中的中心人物。沃
尔夫和貝达特也是重要人物，但是重要性要次一等。尽管他們
很有才能，在洛夫斯东的圈子里，他們还是配角，而不是主角。

和洛夫斯东比起来，沃尔夫是个比較認真鑽研問題的人，受
过更好的教育，演說和写作才能都比他强，貝达特是战前老式的
德国学派教育出来的，他知道的正規的馬克思主义学說要多
得多，而且看待这种学說也更为認真。但是他們两个人都沒有
洛夫斯东那种意志力，那种残酷无情的野心，更不必提他那种对
阴谋手段的穷凶极恶的爱好了，也沒有他那种煽动人們互相爭
斗和把事情鬧得烏烟瘴气的不疲倦的精力。

* * *

毕特尔曼是一个学者和批評家；仅此而已。但是在当时的
运动中，这就很了不起了。他所作的貢獻的矛盾性質，原因也
在这里。毕特尔曼能掌握馬克思主义的正規理論。当他不怀派別
的私心写早期的历史，批評运动各部分的錯誤和缺点时，整个来
說是写得很好的，他的著作是很值得注意的。但是作为政治活
动家來說，他却沒有成就，沒有独創性。

他的政治活动就是迅速领会俄国最新的言論，并且把它譯成英語机械地加以运用。在根本不懂俄語、也沒有讀过多少不管哪一种文字的馬克思主义文献的人乍一看来，他在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令人欽佩的，但是毕特尔曼的工作从头到尾沒有任何創造性。甚至他早期写的历史著作也仅仅是一种批判工作，缺乏任何他自己的独特貢獻。 116

在我的报夹子里有两期 1921 年初出版的毕特尔曼的《共产主义团結》。那里面沾染的宗派主义痕迹要比他后来在 1923-1924 年写的著作多些。但是大体上，在他对別人的批判中，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自己的大錯誤是在左翼最初分裂时和奥尔威奇派（俄罗斯語言分部）共事，而更糟的是他甚至是在魯登堡同这一派决裂并在 1920 年加入共产主义劳工党之后还繼續留在奥尔威奇派里。但是，他这两个錯誤，他都略而不提。

到 1921 年，随着“統一委员会”的成立，毕特尔曼开始糾正他当初的錯誤，但是他轉湾抹角地来糾正錯誤，並沒有認識也沒有承認錯誤，反而用批判別人的錯誤来掩飾这一点，虽然这种批判絕大部分是准确和适当的。

* * *

我不得不暫時放下共产党的历史来完成我們即將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方面的其他一些任务，还要为这里的暑期党校准备一些报告。我这样深地牵扯进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中去是相当偶然的，我自己事前本来絲毫无此打算，而現在又要放下这个問題，我得承認我很感遺憾。我現在想写一篇推理性的文章，討論共产党如果在二十年代后半期沒有出偏差的話，在三十年代可能会怎样。我在 7 月 20 日給你的信中曾經概略地談到这个問題。但是这个工作必須暫時推迟了。

你对各种人进行的訪問和你的研究工作的其他一些方面証明了你是用严肃态度来对待你的任务的，并且确实打算干得很彻底。人們将会承認你这件工作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方面标准的参考著作。

你只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蓬蓬勃勃的青年运动，就可以确信你的著述今后是繼續不断会有讀者的。随着这个国家下一次社会危机的逼近，将会有成群的热心人士跑到圖書館去寻找关于美国共产主义起源和早期情况的真实可信的材料。一个有良心的117人必定感到自己對他們負有一种义务，应当在他們听到恶意的閑談私議、奇聞、神話和官方謊言的同时也向他們提供一些事实真象和合理的解释。从这方面着眼，我对你的工作感到非常关心和同情。

福斯特—坎农集团

1955年3月17日

福斯特—坎农集团是由于1923年7月3日在芝加哥举行劳工党代表大会的直接結果而成为党内一个确定派别的。这次大会的最高峰是同費茲帕特里克派分裂和在共产党领导和控制下成立联合农工党，这个党刚一成立就流产了。但是，如果把这一个“政治問題”与它的背景割裂开来，并且完全从劳工党問題分歧的角度来判断后来的斗争，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引起冲突的原因要深刻和复杂得多。命运不佳的联合农工党的成立只不过是党内整个局面所逐漸形成的一場爆炸的导火綫而已。

站在芝加哥这起不幸事件后面的是佩帕尔，“佩帕尔主义”才是这场长期斗争的初期阶段的真正爭执点。造成芝加哥这场

大失敗的政策的制訂人是佩帕爾，新反對派的火力最初就是針對他的冒險政策和他對黨的獨裁統治而發的。新的反對派只是在魯登堡肯定地和佩帕爾站在一邊以後，只是在福斯特一再設法和他取得協議都沒有成功以後，才和魯登堡發生衝突的。魯登堡和佩帕爾站在一邊以及我們所採取的立場都有深刻的理由，這些原因駕凌於當時的政治爭執之上。

勞工黨問題——更具體地說，聯合農工黨的問題——是在派系鬥爭最初階段引起爭執的最直接的中心政策問題。但是，118在爭執的深處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參加爭執的每一派在從前的不同經驗和傳統中都有很深的根子，在這場“權力鬥爭”中每一邊的队伍非常迅速地就形成了，而且由於形成得非常迅速反而顯得更加“自然”。

應當指出，在俄國革命以前，這個國家的革命運動，也像在其他某些國家，特別是法國那樣，是分裂成為兩翼的，一翼是政黨政治派，他們心目中的“政治行動”是狹義的政治行動即選舉和議會活動；另一翼是根本不問“政治”的工團主義派。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種傾向在組織上是互相分隔的。因此，它們的活動和它們的工作範圍也有明確的劃分。“政治派”主要從事於社會主義宣傳和競選活動，工團主義派集中力量從事經濟鬥爭方面的“直接行動”——組織工會和罷工。

* * *

共產國際把這兩種流派合併到一起組成新的共產主義政黨，這種努力在美國取得的成就比在其他地方為大。原來的運動中這兩方面的傑出活動分子都加入了共產黨，隨着也帶來了他們一部分舊行頭。“政治派”開始認識到工會工作的重要性，但是這在當時對他們還是一個陌生的天地；他們對這方面沒有

真正的了解，沒有“感覺”。前工团主义者和做实际工作的工会工作者也开始認識到成立政党的必要性和采取“政治行动”的重要性，但是在当时他們主要关心的是工会工作。

当然，也有例外，但是整个來說，旧的偏好决定了党内活动分子参加这一派还是参加那一派；他們要同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才习惯。这种出身和癖好上的不同——这也在不同的社交习惯和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的工作方式上得到反映——形成了領袖之間个人关系上的不融洽。即使在1923年7月的破裂以前的那个时期，这种情况就很明显了，虽然在那个时期，他們在当时的主要問題上——爭取党的合法化，扩大党的公开活动，要党来支持工会教育同盟——是合作得极有效的。

在馬克思主义理論和政治方面，我們全都是新学生；要把这两种流派合并到一起成为一个和諧的工作整体，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需要作进一步的学习，需要有更多的時間和共同工作的經驗。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融合的願望，只要事情正常地发展下去，本来融合是会實現的。但是，佩帕尔以他自己的政策、方法和意图进行了强制的干預，于是把这个进程打断了，破坏了彼此間的合作，加深了彼此間的距离。

* * *

我很明白佩帕尔在党内的一般做法和計謀——我敢說，比福斯特和另外一些芝加哥的人要知道得多得多，——我不喜欢那种办事的方式。我最初觉得我的反对意見只适用于党内的事情。經過7月3日大会的震动之后，我才确信佩帕尔的政策都是同样的一套；他的党内政策的惊人的不现实也表現在他对外的冒险主义上。

也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7月3日的代表大会在造成灾难

的政策上公开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并不满足于单单停留在那一个问题上。从这场斗争的一开头起，我就把它看作是推翻佩帕尔领导的全面斗争。福斯特很快也得出了和我相同的结论，问题就是这样提出的。在随后的斗争中，双方的营垒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佩帕尔的劳工党政策只不过是这个总目录中的一项。

* * *

从这个背景来说，如果说福斯特—坎农集团的形成是对7月3日芝加哥代表大会的一个反应，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没有公开承认的佩帕尔派却在这以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企图为联合农工党辩护的鲁登堡—佩帕尔“提纲”的提出，福斯特、毕 120
特曼和坎农在1923年8月24日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对这个提纲所投的反对票，也许可以看作是内部斗争的正式起点。

在这以前，导致这次合作的是我在1954年5月28日信中所谈到的我与福斯特在德卢斯的谈话和1923年夏季我在《工人》上发表的对党的官方政策提出了间接批评的几篇文章。其他的背景材料以及我对于1923年12月党代表大会以前的斗争和这次大会上的斗争的叙述都载在我1954年5月19日、27日和28日的信件中。我再一次审核过我这些信件，发现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事情就是那个样子，至少在我看来是那个样子。

* * *

你问到我，我对自己在福斯特—坎农集团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怎样看。我想，我在这些信件中的叙述就表现了我的看法。我对福斯特的能力，特别是对于他作为一个群众工作者的敏锐和熟练——这是另一派别的领袖们似乎欠缺的最不可缺少

的素質——有最大的尊敬，但是我从来不曾置身于福斯特个人助手的班底中，在任何意义上都从来不曾是他个人的追随者。我和福斯特之间的关系从头到尾一直是有同样的基础的。党内事务上的合作取决于事先就政策问题达成的协议。在1923年，这方面没有出什么困难；我们的想法是按着同样的路线发展的。

福斯特是党的杰出群众领袖，是最有威望的人物，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他并不像人家常常把他描写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婴儿；他知道他在追求什么。他象征着党所需要所希望的无产阶级——美国方向，我认为，作为党的领袖和公开的代言人，他坐第一把交椅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对于当时的党来说，他还是一个较新的人，他仍然在谨慎地探索着前进。作为开创时代的共产党员之一，我对党更熟悉一些。我和许多起决定作用的干部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且对其中的一些人有更大的影响。我们的结合——在这种结合没有终结以前——是一种有效的分工，并没有内部斗争，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我们每人都对这个结合作了独立的贡献，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分量。

121 白劳德在很晚的时候才说，主持与费兹帕特里克领导集团在芝加哥举行的劳工党问题谈判的是他，而不是福斯特，这种说法只有从形式上来说才是真实的。在白劳德的后面站着福斯特；白劳德是代理人，而且像往常一样是个聪明能干的代理人，但决不是“主角”。福斯特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中的影响，他依靠组织屠宰工人和钢铁工人的巨大工作所稳稳奠定的权威（在这个组织工作中，他得到了费兹帕特里克的有力合作，赢得了他的信任）决定和支配了费兹帕特里克与工人党力量的关系，从第一次接头到7月3日的代表大会破裂时为止，始终是如此。

此外，白劳德关于他在当时党内局面中的活动的报告在事实方面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活动并没有他所說的那种意义。他企图把自己說得好像在 1923-1924 年的党内斗争中起了独立的作用，这在我听来像是历史的“顛倒”——随意編排那个时期的事实，使之适应他后来在福斯特丧失了自己当初的影响和佩帕尔、魯登堡、洛夫斯东和坎农这些碍手碍脚的障碍都已扫除之后，由于斯大林的恩典才能够在党内起的那种作用。

如果說白劳德在 1923 年起过任何独立的作用的話，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肯定是应当会知道的，因为我当时生活在作出决定的漩涡中心，而且我的地位也使我能够知道这些决定是如何作出和由誰作出的。毫无疑问，他像别的許多人一样对佩帕尔的政策和这种政策的結果是极其不滿的。这样一种普遍的情緒很可以称之为不高兴，它为一个有力的并且終于取得了胜利的反对派提供了現成的材料。但是这样一个反对派首先必須由具有必要的影响和权威、能够领导党的人物来組織；而且他們必須懂得从什么地方着手，从誰着手。

我先前已經說过，1923 年的反对派作为一个以取得党的控制权为目的的明确的党内运动是从福斯特和我之間达成的協議开始的。这是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驟。下一步是与毕特尔曼达成的協議。芝加哥的首要人物——白劳德、約翰斯頓、斯沃貝克和克隆本——和青年組織领导机构的优秀人物——阿勃恩、沙赫特曼和威廉逊——以及威廉·邓恩等其他許許多多有影响的黨員都从开头起就是这个新反对派的重要支持者。但是开創者却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三个人，从开头到 1925 年这个派別破裂为止，在领导机构中起主要影响的都是他們三个人。这种情况是十分肯定的而且是普遍公認的，白劳德这个报告提出的新說法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 * *

我不知道白劳德当时脑子里是怎样想的，也不知道在他的想像中他是在做什么，但是我确实知道他近来在回忆录中说他作为一支独立力量，进行了猛烈活动，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是很少有什么关系的。我觉得，白劳德关于他在1923年与鲁登堡的谈话和协议的报道和解释，无意之中流露了他自己的天真。他同鲁登堡很可能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可是，他竟然得到一种印象，以为鲁登堡不问佩帕尔和福斯特如何——且不說洛夫斯东和坎农了——都同意和他联合，这种印象可以绝对肯定是白劳德的一种误解。

对于党内力量对比，鲁登堡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不会同意这样做。鲁登堡很狡猾，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他自视甚高，关注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他对白劳德作为一个党的领袖有很高的评价。而且，鲁登堡没有表现出有反对佩帕尔的政策的意思。情形正好相反——鲁登堡—佩帕尔提纲正好是在白劳德以为他使得鲁登堡同意和佩帕尔脱离关系的时候——在1923年8月24日提出的！

事情多半是这样：讲话的是白劳德，鲁登堡只是听着，白劳德在离开的时候却以为得到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谅解”。我记得，大约在那个时候，白劳德对我说，鲁登堡曾经表示了与洛夫斯东对立的情绪，原因是他加剧了宗派纷争，破坏了整个的气氛。洛夫斯东的情况的确确是如此，对他那种令人生厌的好与人吵架的态度有反感也是合乎鲁登堡的性格的，鲁登堡在与委员会的同事每次讨论问题和相处当中始终总是有礼貌、客客气气和“规规矩矩的”，我总觉得他是太“规矩”了。白劳德可能

把魯登堡对于洛夫斯东的評語看成是关于党内局面的“諒解”了。

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随着内部斗争的展开，深刻的政治分歧就压倒了并消除了双方阵营内部小小的不痛快。事情的发展已经表明而且后来还继续表明，魯登堡实质上是同意佩帕尔的政治路线的，如果以为他会受白劳德的影响而在次要的问题上决定他在党内的方针，那就是傻瓜。我不认为魯登堡对白劳德“食言背信”。更可能的情况是，白劳德同他的“諒解”是白劳德方面的误解。

魯登堡是个自负的人，有一股凛然的傲气，他和福斯特不同，看来他不屑于干公然说谎、耍两面派和不守信用这类下流的小手腕。要是他也想过这些话，他并不是认为这种手腕根本不对，而是有失他的尊严，这是更重要的。

* * *

在早期的时候，福斯特对工会运动的了解和敏锐感觉超过了党内所有其他领袖，但是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并不全都是好的东西。他在劳工骗子手的学校里学来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人不管一切指导理论和原则，不计手段来取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福斯特错误地以为这种手段在共产主义政治运动中也可以行之有效。浅薄的美国实用主义在简单的情况里“管用”，但是在复杂的革命政治活动中却是一种不中用的工具。

福斯特的思想多少有些机械和折衷主义色彩，这往往使他对一些需要作出有条件的答案的复杂问题作出仓促的判断。他片面地而且几乎是拜物教式地一心要在劳联中来一个“内部突破”，把这当作使劳工运动激进化和发展劳工运动的唯一办法——这种观念在1928年就不能不抛弃，而且已经由于产联的

124

兴起而为生活所无情地駁斥。这种拜物教就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局限性的突出例子。

但是，和美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物相比，福斯特在许多方面是个突出的人物，我认为，只有把他和其他人加以比较，才是从历史上评断他的适当方法。从福斯特和我联合在一起组成福斯特—坎农集团开始，在党的整个历史上一再有人企图把他說成是一个不懂事的丛林中的婴儿，被更狡猾的人引入了迷途，这种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福斯特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的一切行动都比表面上看来和他有意表现出来的要城府更深。福斯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从第一件到最后件，都是事前就心中有数。实际上，他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是太精明，太有城府了，而且太沒有顧忌了，反而给自己制造了失敗。在悲剧的进程中使他在个人名位上一再不体面地摔跟斗的行动，不是因为他的才智上有毛病或者意志力不足而产生的，而是因为他性格上的缺陷而产生的。

福斯特是他的野心和他的个人名位的奴隶。这是他的弱点所在。我在我的書里对他作出了这种肯定的判断，但是在这样判断的同时必須承認，他是尽力在劳工运动而不是在其他的領域里来实现他的野心和追求个人名位的。在这个領域里，他崇拜“成功”的婊子女神不下于任何企业家、野心勃勃的投机家和资产阶级政客。

福斯特是一个有杰出的才能、精力和旺盛的意志力的人，在他那时候的美国的条件下，他可以在任何其他一行职业中闖出天下来。但是他是在劳工运动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在青年时代就有意識地选定了这一行，而且頑强地坚持这一行，以致对任何其他事物都沒有兴趣。在这个范围之内——他除了劳工

运动就没有生活——福斯特使一切东西都服从于他的疯狂的野心和对于名誉和地位的近乎病态的热爱。为了这些，他以一种确是駭人的坚毅牺牲了他的自負和自尊，牺牲了一切忠于个人和忠于原則的考虑，最后，也牺牲了忠于他当初决定献身的运动的利益的一切考虑。

莎士比亚的葛莱西安諾*說过，他們失去了“費了許多心血换来的”天地。福斯特一心一意不惜任何代价过分坚持追求名誉和地位的结果，不能不自招失敗。他为了取得斯大林主义“力量”的欢心而心甘情愿地屈身事人和放弃自己的意見，这只是使自己在一再的勒索面前解除武装，一直到最后連一点独立性也都丧失淨尽。他对別人的不忠实使得他自己丧失了一切要求別人对他忠实的权利，使自己在最紧要的轉折关头得不到支持。他随时可以为了一时的方便表白一些他自己并不相信的看法，为了得到一点好处而撒謊和欺騙，这些行为使他丧失了同事們的尊敬，最后并且毀掉了他在党的干部中的道义上的威信。他早在1928年就已举目无亲的孤家寡人。他再也不能用自己的名字来爭取领导地位，而只能担任傀儡領袖的角色了。

但是，即使为了保持这点可怜的名誉和地位，福斯特也始終得搖尾乞怜，年复一年地在二十五年以上的時間內有系統地貢獻自己一份力量，帮助大大地出卖他曾經宣称是他自己的事业的工人事业。他在斯大林主义世界中取得的“成功”，代价的确是太大了——如果人們由于可惊的誤解把福斯特对名誉地位的追求叫做成功的话！

* 見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譯者

白劳德的作用

1955年3月22日

126 白劳德。我在3月17日的信中，在比这更早的一封信中（1954年8月4日）都相当详细地谈到了白劳德。这里要谈的是一些比较小的问题。我从来不曾听说过，也一点都记不起白劳德和其他的芝加哥领袖们曾经明白要求在1923年的党代表大会以后重新选举鲁登堡担任书记。就福斯特和我，大概还有毕特尔曼来说，我们丝毫不曾有过换掉鲁登堡的意思。事实上，我们当时的最高纲领只不过是结束佩帕尔的控制，改变委员会中的多数，使得力量对比和政策的控制权能够改变。我们当时仍然希望在最后能和鲁登堡互谅互让，并且在这种基础上与其他人分担党的责任。按照这个方针，我们并没有换掉先前被任命为新创办的《工人日报》主编的英格达尔，而只是添了一个邓恩作副主编。我们对区一级的组织人作了一些更动，但更动得不多。

白劳德透露他和约翰斯顿曾经“劝说福斯特代替坎农担任主席”，这对我也同样是个新闻。福斯特一点也不曾对我说过这件事。建议作这个更动的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在工人党成立的时候当选为主席，当时合适的候选人的名单比较有限。鲁登堡在监狱里；福斯特刚在这以前不几个月才加入党，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

鲁登堡1923年春天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提出由他接任执行书记的建议。我在这以前和他谈过这件事，他说，他个人愿意在执行书记和报纸主编这两个职务中担任一个。鲁登堡

威望很高，办事能力特别强，担任执行书记是个众望所归的人选。没有疑问，这是党内普遍的意见。

一旦福斯特的党员身份完全公开，我十分清楚，以他更大的名声和威望，他应当能担任主席。唯一的问题是福斯特是不是愿意公开他的党员身份。我相信这个更动是普遍赞同的，但是我同样也十分清楚，如果不由我自己来提出这个建议，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在当时是办不到的。白劳德和这个决定毫不相干，他只是在福斯特和我事前就这一人事更动达成协议、把这件事提到党的会议上正式批准的时候投了一张赞成票。

白劳德和约翰斯顿也许以为他们“自己构成了一个小支派”¹²⁷。但是我确信党内极少有人知道有这回事。我就不知道。在党的工作中，他们是福斯特的直接助手——白劳德是《劳工先驱》的常务主编，约翰斯顿是工会教育同盟的组织人。说他们两个人是不安心和有些牢骚的下级大概更正确一些，因为福斯特是个苛刻的工头，对他们的念头和意见是不太注意的。根据党所知道和我所知道的情况来说，白劳德是福斯特一坎农派里的一个百分之百的成员，他在这一派里的地位与芝加哥的党组织人斯沃贝克、克隆本、阿勃恩以及其他一些人大致差不多，比威廉·邓恩要低一些，比毕特曼要低得多。约翰斯顿在这一派里的地位甚至比白劳德还要低。

白劳德说他和我当时也有些对立，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新鲜的事。从1918年他和我最初在堪萨斯市在俄国革命纲领、重新加入社会党的决定以及与左翼结成联盟的问题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始，一直到1925年福斯特一坎农派分裂为止，白劳德和我一直携手共事。他同我的关系大概比同其他任何人都亲密一些。一直到这一派在1925年代表大会上因为共产国际

来的电报問題而分裂的时候为止，我記不起我們之間有过絲毫冲突。我們个人的友誼和我們政治上的合作到那时才突然結束，以后也一直沒有恢复。

共产国际的五届四中全会——1924年

1955年3月31日

我沒有出席1924年春天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全会。关于这次會議，除了福斯特的报告以外，我們沒有得到其他的报告。这与其說是一个关于全会的报告，不如說是一个关于“美国問題”上的决定的报告。至少，这是我們关心的主要方面，我所能記得的也就是这些。由于先前接到了福斯特的几封信，还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拍来的一封电报，我們对于不同意“第三党联盟”的决定已經有了精神准备。

在两派人中間，我記不得有任何人对这个决定有过任何不同意見。当时我們是坚决的“共产国际派”，共产国际的决定，特别是关于政治問題的决定，我們都看作是來自最高权威当局的决定，对所有人都有約束力。双方对于党的控制問題，对于莫斯科的决定在这方面可能有什么影响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拉弗勒特問題的关注。

* * *

我認為，如果断然肯定，在美国党里——或者因此也是在俄国党和在共产国际里——“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开端同时也是亲斯大林主义的开端”，那就說得太冒失了。事情是这样演变的，但是斯大林取得完全的控制的过程是逐步的，不知不觉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控制就更加有力。

根据我的记忆，我们在1924年的时候并没有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等量齐观地看作是俄国多数派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主席，我们党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同他直接打交道的。

人们对我们说，托洛茨基反对派是单独一个人对列宁的“老卫士”的反叛。而俄国党中央委员会这个正式领导机构就是由老卫士构成的。我们对当时的当权派内部的任何分歧一无所知。在我们看来，直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决裂以后，斯大林才显赫起来的，而且就是在那个时候，斯大林看来也是和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结成联盟的。

129

也许，在俄国多数派阵营内部，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倾轧在1924年就已经在酝酿了，有佩帕尔在莫斯科担任代表和通消息的鲁登堡派比我们更了解要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也更有准备在新班子还没有上台以前就搭上关系。但是，即令如此，他们也看得不够准，没有及时和布哈林决裂，这一下犹豫使洛夫斯东在1929年丢掉了脑袋。

1924年的选举以后

1955年3月22日

这封信要对你12月21日和2月28日来信中的一些事实问题谈一些简短的看法，我在3月17日的长信中并没有专门谈到这些问题。就我记忆所及，在1924年总统选举以后，鲁登堡派（这一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听从佩帕尔从莫斯科提出的主意）还想继续执行过去的劳工党政策，就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一样。我们认为劳工党暂时已经不中用了，任何政策，只要会导致建立

一个由共产党控制而在工会中沒有任何群众基础的不像样子的劳工党，我們都是反对的。

在1924年11月选举后党展开公开討論。当时我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曾經說：我們原則上并不反对劳工党，但是我們支持劳工党口号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工会群众中要有拥护劳工党的情緒。但是，毫無疑問，在冲突的过程当中，我們确是沒有手下留情，我們开始表現了一种肯定的宗派主义傾向。我認為可以說，在这种局面中，毕特尔曼所起的作用比他在其他任何时候起的作用都大些。

130 福斯特自己首先提出了一个建議，主张放弃劳工党口号，理由是这种运动沒有生命力，企图建立一个實質上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再版的影子的劳工党是浪費時間和力气。我再說一遍，首先主张这样改变政策的是福斯特；但是我們大家都馬上同意了他的主张。在我們这一派的全部主要人物中間，这个改变沒有什么困难就完成了。就我記憶所及，齐美尔曼（現任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副主席）等洛尔分子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見。

同样也是福斯特首先建議撤銷1924年6月圣保罗代表大会提出的农工党候选人，而用我們自己党的候选人来代替，对于这个问题，我們也遵从了福斯特的意見，魯登堡派也依从了这个意見而沒有表示反对。

总的來說，从福斯特参加共产国际1924年4月至5月全会回来的时候起到这一派內部在1925年代表大会上因共产国际的电报而发生冲突的时候止，在决定我們这一派的政策方面，主要都是由福斯特首先提出的。我一般都是同意他的。但是，当时，毕特尔曼和白劳德想要賦予这一政策以宗派主义的色彩，那却沒有我的份，我在进行討論期間写的文章中有意強調指出：我們

在那个时候反对劳工党是由于群众中没有拥护劳工党的情绪，而不是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加以反对。

我相信福斯特曾经稍稍倾向于毕特曼的那种偏向，但是这大概更多地是由于对派系斗争过于热心，而不是由于实际信念。福斯特并不是一个宗派主义者。1925年初期福斯特和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主持党的事务的是毕特曼和白劳德，我记得我们两人对于他们当时所表现的宗派主义倾向都十分不满意。

共产国际的决定赞成继续执行劳工党政策，这个决定我接受起来大概要比福斯特容易一些。现在回想起来，共产国际的这项决定是肯定错误的，就像它后来关于美国问题的几乎所有决定都是错误的一样。在俄国党的内部斗争爆发之后，美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其他一切支部一样，变成了莫斯科赌博的工具，共产国际对于各国问题的决定不再是客观的了。不过这是事后聪明。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国际派”，我后来费了三年功夫才把事情看清。 131

我不知道在共产国际中，事情实际是怎样进行的，在我的记忆中，我甚至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美国问题上有任何分歧。也许佩帕尔实际上真是季诺维也夫的代理人，也许季诺维也夫是为了避免在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上摊牌才在拉弗勒特问题上对托洛茨基让步的。托洛茨基后来展开论战，反对季诺维也夫派在所谓“农民国际”问题上的政策，反对通过与农民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周旋来建立共产党的全盘做法，这才暴露出在这一点上有过一场大争论。

一直到我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看到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批判》（在美国出版时，书名为《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为止，我都没有真正懂得这场争执。我在《美

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說过，我当时一心全放在“我們自己的”美国問題上了，我不會知道，甚至不會怀疑过，我們党的命运同俄国党內的斗争有着这样直接的关系。

1925年：“平衡委员会”和“莫斯科来的电报”

1955年3月31日

共产国际第五次全会

132 我和福斯特一同参加了1925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全会。在全会开会以前几个星期，两派人都有代表在莫斯科。在全会开会前，我們的工作主要是沒完沒了地拜訪共产国际的各位领导人，特别是俄国领导人，設法取得他們的支持。

最后的决定事前就有非常清楚的蛛絲馬迹可寻。我不久就得到一个令人寒心的印象，我想福斯特也是一样，原来我們这一派的地位在莫斯科要比在国内弱得多，而且我們对这种情况毫无办法可想。另一派在莫斯科有便利条件。由于有佩帕尔作活跃的代表，积极在共产国际的机构中活动，魯登堡派似乎在内部有門路。

布哈林特別直言不諱地袒护魯登堡派，他的举止就好像他是这一派的一个积极成員似的。当时代表德国党的过左派人士，特别是海因茲·紐曼，也是这样。季諾維也夫看来要比較友好和公平一些。

我有一个肯定的印象，他希望糾正我們在劳工党問題上的立場而不推翻我們的多數地位，使多數派决不要压制少数派，并且緩和派系斗争。我記得，有一次在我們談話結束的时候，他用友好說服的口吻对福斯特說：“和为貴”。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

話，我們沒有見過斯大林，并不知道他正在变成幕后的真正权威。

* * *

季諾維也夫最初曾經提出建議，要求“在党的代表會議上选出的(美国党的)新中央委員會中福斯特集团应占多数，魯登堡集团按比例至少应有三分之一的代表，”在季諾維也夫提出这个建議以前，我們的談判和討論的詳情如何，我已經記不很清楚了。

福斯特对这个建議非常开心，但是我并不开心。美国党的领导机构的組成要在莫斯科作武断規定，这种作法我就覺得不很合适，哪怕这个决定当时是对我們有利的也罷。福斯特在和我爭辯的时候強調指出这个决定可以保證我們多数派在党内的控制权。当时他对党内控制权这个煞风景的問題的关心比我要大，我們之間的这个分歧——最初看来是小事——后来越变越大了。

我之所以不安是因为我在我們和俄国人的商討中确信，在对劳工党在美国的前景的估計上，我們犯了一个政治錯誤，我所最关心的是我們要真正糾正这个錯誤。我的理論修养虽然不133够，但是我已經摸索出一个后来成了指导原則的概念；正确的政治路綫比任何組織問題，包括党内控制权問題在內，都更为重要。

按照后来美国形势的发展，今天回头来看，我認為我們对劳工党在美国的前途的估計和我們关于党在这个問題上的政策的建議要比魯登堡派正确得多，更接近美国实际得多。1925年共产国际关于这个問題的決定是比較謹慎和比較有保留的，但是就連这个决定也不得要領。不过在当时，我被俄国人的論据說

服了，也許也是被他們的權威性說服了。

在随后几年中，美国几乎看不到有一点真正的劳工党运动的踪影，党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的紧张鼓动工作沒有获得任何結果。到1928年就已默認了这个情况。当时，党再一次提出了自己的独立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而把劳工党贬低到光是一个宣传口号。

1925年的“平衡委员会”

共产国际1925年决定成立一个由俄国人古塞夫任主席的平衡委员会来安排我們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显然是一个和我們作对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我們作为选举产生的多数派的权利。我不認為这个决定是季諾維也夫作出的；这个决定和他当初的建議大不相同。他接受平衡委员会方案显然是他态度上的一个改变，多半是他和其他想要公开支持魯登堡派的人們妥协的結果。

134 在古塞夫到达芝加哥和平衡委员会（福斯特、毕特尔曼和坎农代表我們这一派，魯登堡、洛夫斯东和貝达特代表另一派）成立之后，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政治委员会的作用实际上等于是沒有了。党的政策、組織問題、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一切問題和其他各种事情都由平衡委员会来决定，在发生分歧时，古塞夫就投他那决定性的一票。

爭取选派代表大会代表的斗争就在这样一个严格的框框里猛烈地进行。古塞夫宣布严守中立，但是只要他能够做得干净又像有理，他就給我們最不客气的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四十对二十一的多數，我想，这就最有說服力地証明了黨員們支持我們而不要魯登堡派的真正意向。說得更

恰当些，魯登堡派应当叫作魯登堡—洛夫斯东派，因为洛夫斯东在这场斗争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党内生活的退化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925年。从1918年开始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以前历次派系斗争的特点是界限明确的政治倾向之间的冲突，到后来才退化为结党营私的越来越无原则的倾轧。

在政治问题方面，党内情况在筹备第四次全国大会时期可以大致描述如下：双方都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劳工党的决定，这个决定赞成魯登堡的主张，但是附有若干重要的修正。福斯特的工会政策为魯登堡派所接受。从政治上来看，确是没有什么理由展开斗争。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就是，平衡委员会在政治和工会决议上都是一致通过的。政治决议，大部分是毕特尔曼起草的，工会决议大部分是福斯特起草的。

在党员面前只有一套决议，他们在党的各层机构中都是一致地接受这些决议的。照正常的情况来说，这种一致本来应该会使派系的气氛缓和，使领导机构中互相斗争的派别趋向统一，使派系归于消失。但是事情的演变并不是这样。在党的控制问题上，派系斗争的激烈比我们党的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厉害。

关于政治问题的辩论，要是有的话，也只能谈一些鸡毛蒜皮的分歧，而且是以宗派情绪的夸大词句来谈的。党员从这样一种斗争中是学不到多少东西的，对于没有忘记当初的伟大理想的有良心的共产党员来说，这种斗争也不能给他们多大的满足。我相信我在当时已经开始感到我们大家都掉到了一种陷阱里；唯一合理的出路是设法消除派别组织，在领导人员之间达成一项在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合作共事的协议。

但是当时马上要做的事情是在代表大会上为我们这一派取

得多数，我自己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热心地为做到这一点而努力。我們在严格的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在爭取选派代表的斗争中赢得了二对一的多数。但是这并没有給我們带来任何好处。

“莫斯科来的电报”

1925年夏季拖拖沓沓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行将結束的时候，古塞夫召集我們举行平衡委员会會議，把有名的“莫斯科来的电报”交給我們。这份电报說：“魯登堡派比較更忠于共产国际，更接近于共产国际的观点”，电报还規定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魯登堡派代表所占的比例应当不少于百分之四十。这是一个突然的打击，我們对它毫无精神准备，这是有意要使我們对共产国际的信任經受一次很严重的考驗的打击。

我立即的反应是等待，在平衡委员会的會議上什么話也不說。我記得，毕特尔曼也保持着沉默。但是福斯特按捺不住講了話，他說他不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多数，叫魯登堡派接替新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好了，他个人不能担任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員。我当即决定反对他这种态度，但是在那个場合下沒有說出来。我想当时會議大概根据我的建議宣布休会，以便向聚集在一起等我們的代表大会多数派內部會議来报告这份电报的内容。

福斯特、毕特尔曼和我三个人事先沒有經過磋商并且沒有在我們之間就我們要提出的建議取得一致意見就徑自去举行內部會議，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們为什么跳过了这个习惯的程序，但是事情当时就是这样。福斯特似乎决意直接把他反抗这个电报的态度带到內部會議上去，我反对这种态度的决心也不在他之下。

他在内部会议上报告了这份电报，并且宣布他决定讓魯登堡派在他将不担任委員的中央委员会里握有多数，我馬上就发言提出一个反建議，主张我們把新中央委员会固定在一半对一半的基础上，两派在领导工作中分担同等的責任。

邓恩和斯沃貝克支持我的态度。毕特尔曼和白劳德支持福斯特。阿勃恩和沙赫特曼发言贊成我的建議。約翰斯頓和克隆本发言贊成福斯特。发言一个接一个地进行下去，随着这场不祥的辯論展开，全国各地来的負責人都表示了他們的態度，我們这一派就这样开始分裂为两半了。

* * *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要平靜地叙述这场暴风雨般的冲突而不加事后聪明的粉飾，如实地报导这件事，如实地报导我們依据我們当时知道和不知道的事情并且本着当时驅使着我們的那种情緒做了些什么，这仍然是一件煞費力气的事。

我前面說过，我当时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国际派”。我对俄国領袖們的智慧和公正是有信心的。我認为他們是因为了解情况不确而犯了一个錯誤，这个錯誤以后是可以糾正的。我甚至沒有想过，这样一件破坏我們党的民主权利的怕人的事情竟然是莫斯科棋局中的一着，在这盘棋局中，我們党和共产国际其他各党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供人驅使的工具。

我認为福斯特的态度是不忠誠的；他外表上情願把多数交給魯登堡派，自己退出中央委员会，实际上的意图是想挑起我們这一派反抗共产国际。福斯特把我們之間的爭执变成了一个对他个人作为这一派的領袖的信任問題。这对他是害多利少，因为那时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不是后来那种久經管訓的奴才。福斯特企图乞灵于“跟着領袖走”的原則，这种做法只能使大家对他

公开表示不滿。

我覺得我是為爭取黨忠於共產國際而努力的，我認為支持我的動議的大多數代表也是從這種感情出發的。在經過了整整一宵和一天的辯論之後，最後的表決贊成了我的動議，這不僅僅結束了福斯特對共產國際的反抗——我再說一遍，我確信這就是他的“站到旁邊去”的建議的真實用意。這也結束了他想有朝一日實現他的野心的全部希望。這個野心就是依靠一批忠於他個人、支持他個人的部屬來統治美國黨。這批人充當他的顧問，差不多像總統制的“內閣”那樣，但是最後決定權操在他手裡。

* * *

我本來以為，在通過了我提出的中央委員會名額對半平分的動議之後，派系鬥爭可以停頓下來，使兩派負同等的領導責任，並且迫使他們一同工作，一直等到以後同共產國際找到解決這種局面的辦法為止。我這個天真的幻想沒有能維持很久。

我們去出席一半對一半的新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時候，權術家古塞夫可以說是對“年輕人必修課”作出了又一貢獻。（年輕人從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的那一套作風裡是可以學到許多東西的。）古塞夫溫和地宣布，雖然雙方的協議是成立一個平衡的中央委員會，但是他作為主席卻感到有義務按照共產國際的決定的精神辦事，支持魯登堡派。

他說：這也就是說，魯登堡派應該在政治委員會和黨的其他機關裡占有多數。因此，事情的結果是福斯特在內部會議上提出的把多數交給魯登堡派的建議實際上是實現了，而我提出的在對等基礎上凍結委員會的建議卻被古塞夫圓滑地破壞了。

如果說，我承認我隨和了這種不講信義的兩面做法而依然
138 拒絕參與任何反抗共產國際的行動，我也並不是想為自己取得

什么好名声。我今天把这段不愉快的回忆写下来只是为了说明，对于共产国际的忠心本来是早期的共产党人最好的品德之一，但这时却被弄成一种需要根治的疾病。

这种疾病在我身上继续又缠了三年，影响了我在党内做的每一件事情。一直到1928年，我才得到医治。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我总算是永远地完全地医好了。

* * *

1955年4月1日

要写1925年以后的黑暗时期的事情是困难的，但是要在这个时期生活过来而又不像其他许许多多在先前的工作中本来是很好的伙伴的人那样渐渐变成犬儒主义者，那就更加困难了。尽管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无可挽回地把我们分开了，最后还在我们之间画上了一道血淋淋的界线，我还是不能不带着某些同情的感情来照着当时的真实情况来写这些事情。我想这大概是一种爱尔兰式的伤感。但是良心也在驱使着我，我要对得起后来的青年反叛者，他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和迫切不会下于当年的我们。

二十年代的“党的生活”

1959年2月4日

你找出了许许多多有关二十年代中期“党内生活”的材料，从这里面你可以很容易地勾划出一幅非常详尽的图景，看出在徒劳无益地企图把组织结构“布尔什维克化”——实际上是俄国化——期间，在组织方面是如何混乱，又如何无效。但是也不应

当把这种情况看得太了不起了。尽管有那一切，党还是在照样工作，在一切方面都要比那个时期的其他激进組織活跃十倍以至百倍。

139 同样，也不应当把內部文件中所暴露的支部會議死气沉沉、出席的黨員很少等等情况看得太了不起了。应当知道，这些都是些“自我批評”的典型材料，是故意挑出来的一些极端的例子，用以教育人們懂得支部會議要开得更活泼些，应当踊跃出席等等。

在通常时期中，材料中所举出的各种缺点是一切自願組織中都有的現象。二十年代中的共产党和其他組織在这方面的真正的区别(如果这个问题还值得稍稍多注意一下的话)在于：共产党支部會議毫无例外地总是出席人数比其他的組織多，議程項目也比其他組織多，因为共产党員比其他組織的成員更認真，交給支部完成的任务也更多。

誰都知道，今天一个基层工会举行一次通常的會議，出席人数常常不到會員人数的千分之一。但是这并不等于这种工会就完了，或者快要完蛋了。到了把新的合同拿出来討論或者眼看要举行罢工的时候，會員就来了。我听说，洛杉磯的零售店員工会會員一年只开四次会。但是在元旦的时候和資方发生了冲突，他們男男女女团結得像一个人一样坚持了将近一个月，一直到他們得到了滿意的解决才罢休。

如果我不就此收住的话，我很可以根据自己的长期体验和观察来就下面这个題目写一篇学术論文：“如何使平时的支部例行會議具有吸引力和出席的人数多——办不到的原因何在”。我年輕的时候曾經因为好玩而参加了鷹隼兄弟会，这是一个联誼会性質的組織，罗斯达尔地方凡是不属于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方面的青年，凡是从沙龙和弹子房出来的“体面的小伙子”都

参加这个組織。鷹隼兄弟会像当时其他一切联誼会一样，也有保险一类玩意，但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會員能够在俱乐部里喝杯啤酒，在禁賭的地区打一局紙牌而用不着担心巡警的干涉，因为巡警也要尊重我們这个上流社团的政治势力。

即使这样，这个联誼会地方組織每半个月一次的例会也是死气沉沉的，通常只有很少一些人参加。这个“如何使例行會議具有吸引力和使群众来参加”的問題——順便說一句，洛杉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地方支部目前正在討論這個問題，其他每一个党的每一个支部大概也在討論——用一个简单的法子解决了。大約每隔三个月，我們可敬的負責人就算好财务收支情况可以付得起一次啤酒会餐的开支。每当这种时候，那些对联誼会不太在意的兄弟們就大批来参加这种活跃的聚会来了，每个人都可以喝啤酒，吃夹肉面包，交朋友。但是到下次开例会的时候，就又是那种死气沉沉的老样子了。

在政治組織中，我們只能做一些吸引力較小的事情，像举行“教育講座”，作关于某个問題的“专题报告”等等，这些东西也有一些吸引力，但是总比不上鷹隼兄弟会在罗斯达尔的“巢穴”里吃喝的免費啤酒和夹肉面包。

巴塞克罢工

， 1955年6月9日

我还記得1925年12月的美共中央全会。我在这次全会上和魯登堡派站在一边，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工会問題的辯論。虽然在这次全会的爭执中，一些具体問題的細节我已經記不得了，但是这次全会大概成了反对迷信劳联的一个初步开端的标志。

根据我的记忆，在全会上提出了巴塞克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起源并不在全会。问题是韦斯波德以风暴般的活动硬加到党的头上来的，他自己到工人群众当中，实际开始了把没有组织的纺织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作。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应当受责备的地方，倒不是我们对韦斯波德的组织工作给了有条件的支持，而是我们在支持的时候没有全力以赴，没有明确地把迷信劳联问题提出来。

在巴塞克组织工人的工作是由“统一战线委员会”主持的，而不是由当时的情况确实需要成立的一个新工会来主持，这是对党内当时一切以劳联为中心的政策的一种让步。不成问题，征集个人成员参加“统一战线委员会”歪曲了统一战线作为各种组织的联盟的概念，使统一战线走了样。但是在巴塞克的实际问题是把劳联所不理睬的无组织、不熟练和工资低的工人组织起来。

福斯特派反对征集个人成员参加“统一战线委员会”的后果，第一次清清楚楚地暴露了他的极端劳联政策的破产。这只能使巴塞克纺织工人的组织工作因为害怕犯了“双重工会”罪——福斯特派对这一点确是有恐惧病的——而陷于瘫痪。

巴塞克罢工是1926年春天我们还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六中全会的时候发动的。与这次罢工最直接有关的情况，我一点不知道，不然就是记不起了。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罢工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可以说，这次罢工是由于韦斯波德在当地组织纺织工人获得成功而摔到党身上来的。

吉特劳在《我坦白》这本歪曲和捏造的小册子里谈到他怎样为巴塞克的局面出主意定计划，那些话都是完全不能相信的。他所说的种种，就是在不是公然捏造的地方，也都故意夸大了他

在党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而縮小了別人——在这件事情上是韦斯波德——的作用。

在巴塞克組織工人和給予罢工本身以强有力的领导，都是韦斯波德的突出劳績。在我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我曾經有机会在当地看到这一点。我自己和巴塞克罢工毫无关系，但是我在那里呆了一个短时期，我得到很好的机会看到韦斯波德是怎样活动的。作为罢工领导人，他是第一流的，这一点决錯不了。

的确，他是在芝加哥党的全国领导机构所指定的設在紐約的一个党委员会的密切监督和指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委员会在远离現場的屋子里开会和在現場实际领导罢工，这两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这件事情的全部功劳都属于韦斯波德。

共产党六中全会的决定批准福斯特派——連同它的亲劳联政策——掌握党的工会工作领导权，但是它同时又在劳联以外在“統一战綫委员会”的主持下领导巴塞克罢工，这两件事是有明显的矛盾的。这并不是由于派系的操縱。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生活闖进了党的內部事务。¹⁴²

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韦斯波德——一个冒失、年輕、自我中心的刚从大学出来的小伙子，一般來說在近处看来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演說家，是一个絕无仅有的精力充沛的人——把許多工人煽动起来了，把他們組織在“統一战綫委员会”中了。他們在組織起来之后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所以敢于不等劳联工会的批准就举行罢工。这次罢工不久就和警方爆发了暴力冲突，成了各大城市报上的头条大新聞。在很长一段时間里，巴塞克罢工成了头条劳工新聞。

巴塞克的这个行动确实是违反了党实行了好几年并且在莫斯科再一次得到默認的福斯特派工会政策的文字和精神。但是

这并没有改变党掌握着一次大罢工这个事实。党也的确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次罢工所提供的机会。

巴塞克罢工确实使党登上了劳工舞台。我认为,仅仅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在党史上专辟一章来谈。这次罢工说明了共产党是激进劳工运动中的推动力,是劳联工会所不理睬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组织中心——在这个领域里共产党代替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巴塞克罢工组织得很好,领导得很巧妙,在一切通常的情况下本来应当得到辉煌的胜利。唯一的问题是纺织业老板太强大,财力太雄厚,决心太大,决不让一个激进的工会组织得到巩固。孤立在一个地方的罢工工人就那样耗尽了精力,饿得不成,还是一筹莫展。

在这种困境下能够争得的最好的出路是一个可怜的解决方案。这种经验后来继续重演了许多次,后来到三十年代,组织工会的活动才得到足够的声势和力量来打破资方的抗拒。

* * *

巴塞克罢工不可避免地要对党的工会政策发生影响,从长期来看,这比罢工本身要重要得多。不几年之后工会政策所作的急剧改变,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这次罢工。党企图向纺织业老板和劳联的骗子们的主要要求——撵走罢工领袖韦斯波德——让步,以便哄住他们,使他们上当。这一努力虽然得到了反应,但是为时已经很晚了。

当事情已很明显,罢工在垮下去,而资方又不肯和“统一战线委员会”谈判的时候,就同劳联纺织工会进行了谈判,请劳联接管这个组织,设法谈判出一个解决方案。这些圆滑的骗子手同意了——附有一个小条件,事实证明这个条件和资方的条件

是一样的，那就是讓共产党的罢工领导人自行滾蛋。

我不知道是誰第一个主张接受这个可恶的条件的。但是我脑子里还記得最清楚的是党领导机构中的两派都同意了这个条件，在这个問題上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牺牲罢工领导人这个有害的决定是党的领导机构一致作出而最后由罢工委员会执行的。

对这种問題不能抽象地看。也許，只有亲身遇到过怎样使一次失败的罢工不致一敗涂地毫无收获这种痛心的問題的人才有权对这一决定作出判断。別人是很难有資格判断的。在巴塞克的局面中主要的考虑是罢工已經越过了它的高潮。要取得真正的胜利已經根本談不上了，一般的感覺是一个不好的解决方案总比沒有好。过去也有过一些罢工甚至是以更加屈辱的条件解决的。工人們曾經一再地被迫“同意”牺牲他們队伍中最好的战士，把他們列入黑名单，作为在取得一点点協議的情况下复工的条件。

但是在巴塞克罢工的結局中，今天回顧起来突出的一点——即使在今天回想起来也还令人痛心的一点——是，党的领导机构竟然那样快地同意了那个解决方案，一般人竟然还認為这是一着聰明的“策略”，实际上这样設想却是毫无根据的。 144

牺牲罢工領袖和解散“統一战綫委员会”的决定，意味着承認当时劳联在紡織业中烂透了的、反动的而不中用的組織是这个行业中的“合法”工会；而“統一战綫委员会”却只不过是劳联工会的一个支援和招募的机关。

所有这一切是彻头彻尾的錯誤。“統一战綫委员会”本应当看作是成立一个独立的紡織工人工会的起点。为了这个目的，讓这次罢工“失敗”要比以屈辱的条件結束它好得多。展开独立

的工会运动是在紡織业中进行工作的唯一办法,而且自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全盛时期以来一直是唯一的良方。在紡織业中,排除其他一切办法而单纯从劳联工会“内部突破”的政策,从来不曾有过现实的根据。

巴塞克罢工的解决方案和促成这个解决的动机使得福斯特的劳联迷信达到了荒谬的地步,党领导机构中所有其他人虽然一直同意这个方针,但是也多少感到不安。这就引起了一种反作用,使得党在工会问题上的政策两三年后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在共产国际 1928 年准备好来一次疯狂的“向左转”而采取“红色工会”方针的时候,洛索夫斯基特别举出巴塞克的投降作为美国党“围着劳联跳四对舞”的政策的一个怕人的例子。于是党又走上了一条冒险的道路,跑到全面建立独立的共产党工会的另一个极端。

这个以工会统一同盟为组织中心来建立单独的共产党劳工运动的试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对巴塞克事件上的罪过的惩罚。

1925-1928 年派系斗争中的占压倒地位的问题

145

1955 年 6 月 27 日

吉特劳的书(《我坦白》)是非常不可信的,如果不和其他的来源核对就轻信他所说的任何一件事,都会是有危险的。他显然是写了一些赫斯特愿意收买的材料——我记得这本书没有出版以前就在赫斯特系的出版物上连载过——他显然觉得需要在

書里添油加醬，把他根本不知道的東西也寫進去。他在把他個人知道的某些事情別有用心地寫出來的時候，把許許多多風聞傳說、臆測捏造，都冒充事實塞在裡面。

一般來說，吉特勞對於黨內真正發生的事情知道得並不像他自己以為或者裝做知道的那樣多。決定黨內鬥爭的事態發展的是別的人，而不是他。吉特勞作為一個獨立的人物的作用到1923年“笨伯會議”的慘敗就完了。後來他先是充當佩帕爾的工具，然後是充當洛夫斯東的工具。他確是當局者，但是他對自己所看到的事情也沒有看得很清楚，他甚至對自己看到的事情也沒有如實地加以敘述。

我在1954年秋季號《第四國際》上發表的《共產黨的退化和新的開端》*這篇文章以及我在《美國托洛茨基主義史》一書中的所寫的材料，已經闡明，在我看來，黨在1925-1928年這段時期中的事態發展，其實質意義何在。我本來想，我對這一時期情況的敘述就以此為限，不再講其他更多的話了。但是你的幾次來信推動了我，使我想更詳細地來陳述那時確實發生過的事情，我現在就來做這件事。

我要談的第二點是你所提到的1927年8月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你對於表明洛夫斯東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露出¹⁴⁶“美國例外”論的少數材料表示很感興趣。很湊巧，我們現在還有材料可以把洛夫斯東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的思想的起源追溯到更遠以前。

洛夫斯東在他寫的《黨史片斷》一書第十九頁上引用反對派同志的話說：“魯登堡是左派。但是現在魯登堡不在了，黨走到

* 這篇文章已作為這本冊子的緒言加以轉載。

右边去了。”碰巧，洛夫斯东在这里講得很正确，他不但把“反对派同志”所說的話轉述得很正确，而且就实际情况而言，也講得很正确。

1927年3月魯登堡去世后，洛夫斯东和沃尔夫很快就开始越来越随便地發揮他們自己的那种理論，这种理論肯定地比魯登堡的理論要右。这方面的証据俯拾即是。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福斯特一坎农联盟的代表提出了一份长篇控訴書，譴責洛夫斯东当权时期的所作所为，这份文件的标题是：“美国党內的右傾危險”。我認为即使今天也很值得一讀。

反对派的这项声明一开头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論点：“目前的經濟萧条不可避免地必然会成为深刻危机的先声，即使美国的資本主义可能依靠它仍然具有的后备力量推迟它的到来。这次萧条不能看作仅仅是‘正常的’周期性萧条，只有輕微的很短暫的影响。相反地……每一次这样的周期性萧条都要在最大的程度上强化資本主义的矛盾，更深地破坏着整个結構，最后导向深刻的危机。”（这段話是加了着重点的。）

这个預測是在1928年7月作出的，离1929年的股票市場暴跌只有十五个月，由此可見它說得差不多正中要害。

147 福斯特一坎农联盟关于“右傾危險”的文件接着控訴洛夫斯东派在十一个問題上对美国資本主义的前景有着不同的看法。文件指責他們“跟在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后头把目前的萧条估計为只是‘衰退’”以及其他等等。文件接着指出这一論断是根据什么文件得出的：“洛夫斯东派的这种傾向在（1928年）2月提綱的草案原稿、在1927年5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會議決議以及在洛夫斯东、佩帕尔、沃尔夫、尼尔林等等同志的文章和演說中都有其表現。”（这段話是用着重体写的。）

《美国党内的右倾危险》发表在《战斗者》1928年11月15日第一卷第一期以及后来的几期中。

* * *

洛夫斯东—沃尔夫的保守观点——这和1928年以前布哈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向右转是合拍的——使我们反对派在1928年的斗争更形尖锐。上面所引的文件就表明了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要把当时党的历史的真相说出来的话，我就必须说，洛夫斯东派的右倾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如果共产国际路线的改变要求他们这样做的话，洛夫斯东派是完全愿意成为左派的。说明他们这种意愿的证据可以在洛夫斯东的《党史片断》和他们在1929年代表大会上的决议中找到。这项决议谴责了布哈林，要求撤销他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

1925-1928年派系斗争中占压倒地位的一个大问题是党的控制权问题，以及在促成派系产生的争执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仍然在党内保持壁垒森严的派系问题。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采纳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六个月以后，洛夫斯东分子被开除出党，因而也可以自由行动了。到那时，各派系所固有的倾向才有了明确清晰的政治形式。在这以前的三年期间，盲目派系斗争只不过是后来有原则的斗争的前奏而已。

1925年以后：永久性的派系斗争

148

1955年7月14日

共产党1925年代表大会以后的三年给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带来的困难一定要比过去历年加在一起所带来的困难还要

多。党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局面，这种局面在美国激进运动先前的全部历史中是没有先例的，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糾紛的种子都是在这个时期播下的。在这个时期中，党内冲突中无原則的宗派斗争使许多人养成了一种癖性，以致到后来竟然在更广泛的工人阶级斗争中放弃和出卖了党本来应该坚持的一切原則。

如果只看印刷出来的正式文件，那末与其說它能說明党在这些凄凉年份中的糾紛的真实原因，还不如說它反而模糊了这种真实原因。在我看来，重要的不在于正式文件所記載的关于党的政策的具体爭执和吵鬧，而在于各个派系都陷在里面的那种总的局面——它們对这种局面誰也沒有充分的了解——和他們那种想要摆脱这种局面的盲目的或者說半盲目的尝试。

在这个时期以前，派系斗争尽管做得过分，有时甚至达到荒謬的程度，但是还是圍繞着完全可以理解的根本問題进行的；在爭执解决之后，派系也就解散了。从1925年的代表大会起，党内生活就起了根本不同的变化。旧的分歧大部分过时了，或者縮小成为不值得計較的細微分歧了，但是派別仍然保持着，固定成为永久性的营垒。

1925年以后，派系爭权的斗争变成为斗争而斗争了，不再是达到各个对立的派別所想要达到的——或者自以为他們想要达到的——目的的手段了。这就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在党的政策問題上的分歧并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不管这种分歧是真实的还是表面上的。各次小冲突的細节主要是在和这一点有关系的时候，才是重要的。

149 派系斗争由于派系的存在在政治上沒有真正的理由而破产了。因此，一个派系的胜利使它有机会来执行自己的政策，但是却什么問題也不能解决，因为其他派系的政策基本上和它是一

样的。当然，潜在的倾向上的分歧是有的，但是这些倾向究竟会造成什么结果要等有了更多的经验以后才能看得清楚。各个派系就是靠了彼此夸大和歪曲对方的立场和期待将来产生分歧来维持的。

无论如何，全国性政策问题上的实际分歧，他们内部和属于他们自己的分歧，从当时明确地表现出来的程度来看，并没有严重到有理由保持壁垒分明的界限。当时的各派只是互相斗争着，保持一种战斗状态，相持不下，等待他们这种毫无意义的斗争得到严肃的政治内容来充实，至于到底在等什么，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各个派别就是这样盲目地奔向1928-1929年的两次大爆发，到那个时候，每一派潜伏着的倾向才在国际范围的真实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来并且具体化了，这些问题注定要造成三种不同方向的分裂，使以后的和解再也没有可能。但是当时在从事这种毫无意义的斗争的人谁也没有预见到会有这种结局。这种斗争尽管十分紧张激烈，却仅仅是后来在更为严肃得多的问题上发生的冲突的前奏。

* * *

早在1925年初期，我就开始认识到没有明确的原则基础的派系斗争的破产，并且开始寻求一条出路来摆脱它。这仍然没有抓到问题的根子——没有找到无原则的派系斗争大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这是向前走了一步。这种认识使我多少离开了两派的中心领导人，并且成了眼前的冲突的障碍。盲目的宗派分子总是比那些对问题思考得过多的人更热烈一些。但是1925年的反复思考终于帮助了我，使我能够找到一条提高一步的道路。

1925年的代表大会期間福斯特一坎农派內部會議上的冲突的經驗暴露了福斯特派对派別的基本看法，那就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永久性的集团，他們要求自己一派的成員在爭夺領導权和消灭对立派別的斗争中事先就表示忠心不二。我不能这样同
150 流合污，这种分歧使我們分道揚鑣了。

福斯特一坎农派的明确分裂不是发生在“共产国际来的电报”引起第一次大冲突的1925年的代表大会上，而是发生在几星期以后，发生在多次嘗試弥合这个裂痕以后。在福斯特和毕特尔曼坚持他們的派別观念并且为了派系的忠誠企图迫使我就范的时候，我和另外一些見解相同的人除了同他們破裂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选择了。

这是深刻的分裂；这一派系的干部也分裂成为两部分，就像在代表大会期間这一派在內部會議上发生分裂的情形一样。支持我的立場的著名人物如下：威廉·邓恩和明尼苏达州党的整个基层领导机构；芝加哥的阿納·斯沃貝克和馬丁·阿勃恩；青年組織的主要领导人——沙赫特曼，威廉逊，施奈德曼和其他一些后来在党内成为显要人物的人：哈沙威，托姆·奥弗拉赫蒂，戈麦斯；費希尔和南部斯拉夫分部中的費希尔派；底特律的巴德·雷諾；后来在回波兰以前成为底特律区組織者的波兰人格伯特；以及党的若干区組織者。

我和魯登堡—洛夫斯东派的中心领导人試行合作过一个很短的时期，但是这个嘗試也毫无結果，这段經歷很快就証明了他們的观念基本上是和福斯特一样的。我認为两派中任何一派都沒有統治党的权利，我認为这样下去党內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这就使我无法全心全意参加任何一派，而如果我要想参加其中任何一派的話，我就非得全心全意参加才行。

我在 1925 年开始認識到，問題很簡單，党的危机是不能以这一派对那一派的胜利来解决的。这一派的短处正是那一派的长处。两派必須彼此取长补短，彼此都是对方缺少不得的，也是党所缺少不得的。

我認為福斯特派整个來說比較无产階級化，比較接近工人，因此也是“較好的”一派，但是我也开始再清楚不过地認識到它过分着重工会的片面性。在这方面，我比較接近于魯登堡—洛夫斯东派。但是后面这一派虽然比福斯特派工会工作者更有“政治性”一些，却又太知識分子气，和我合不来。我觉得，魯登堡—洛夫斯东派凭它本身是不能够領導党，并把党建設成一个真正的工人組織的，以后几年的事态演变，并没有改变我这个看法。 151

两派的干部人数都非常多，有才干的人也太多，以致于不可能把他們都赶出党的領導机构去。两派如果能团結共事，結果会比任何一派单干强許多倍，办事也会更有效。我們認為是應該消除宗派把党統一在一个集体領導之下的时候了。

我这样說并不是要表示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党内事务上的和平主义者。在派系斗争成为当时要务的时候，我和別人一样也是个派別分子，我从来不曾認為有任何理由否認这一点或者因为自己这样做而感到内心有愧。在党内生活充滿着内部斗争的时候，那些不属于任何派別的好心人是算不了数的，他們没有什么功績可以講。的确，宗派斗争可以发展到极端而成为一种病害——就像 1925 年以后的共产党那样。但是，完全不过問派系斗争的人总是只能使并不感到良心責备因而也毫无忌憚的別的人干起他們的勾当来更容易一些。

在需要为某种严肃的事情而斗争的时候，我并不反对派別。

但是，当时我已经坚决反对在促使派系产生的争端已经得到解决或者已经过时以后，还要搞永久性的派别。我从来没有过深地卷入派别斗争，以致把派别斗争本身当作一个目的。在这一点上，我也许和其他绝大部分派别领袖不同，这一点最后把我引上了一条大不相同的道路。

这是我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这是我对整个党和革命的问题经过许多反复思考的结果。我下定决心首先决不能忘记我当初为之奋斗的理想，这一条基本考虑在那些阴暗不愉快的日子里支持了我。我觉得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献身于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并不是为了要栖身于一个永久性的派别里，更不要说是一个结党营私的派别了。我一向总是力求把党看得高于一切，永远把党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152 一般来说，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虽然在当时的气氛下这并不容易。许多好党员被派别斗争所迷，完全失去了他们的方向。从犬儒主义到变节，中间只差小小的一步。在小事情上出卖原则很容易发展到在大事情上出卖原则。我生平看到过许多人当初本来是头等的革命者，后来变成了工人阶级的叛徒。有些人甚至变成了职业的告密者来害自己过去的同志。不问是非的派别观念就是这种道德和政治退化的起点。

我们看得出派系的斗争在退化成为结党营私的争斗，我们决定反对这种做法。我们是郑重其事的，所以没有分散自己的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相反，我们迅速成立了一个“第三派”为统一党和解散一切派别而斗争。这看来也许像是堂吉诃德式的举动——后来结果确是如此——但是我们自己经过了长时间的奋斗才看清了这点。

* * *

使我們的全部努力遭到挫折的是国际因素，但是国际因素最后也帮了我們的忙，給我們指出了一条新道路。在1928年看到发人深思的托洛茨基的文件以后，我开始从国际的角度来看美国党內的問題。但是这已經是在純粹一国的范围內在黑暗中斗争了三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黑暗中混战总免不了时而絆倒几交。我們也是这样，我决不爭辯說我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基本前提錯了，政治方針就不可能正确。我們当时的前提是：我們党內的問題純粹是美国的事情，但是在共产国际，特别是在俄国领导人的帮助下，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像解决早先发生的那些麻煩一样。

这种想法从两方面來說都是錯誤的。国内的客观形势是对我們不利的，我們都无知，才干不足，因此对党內局面的混乱也負有一部分責任。但是这一次造成我們的困难的主要根源是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退化；在我們党內挑拨离間的人，也像在共产国际其他各个党內一样，主要也就是这班我們信賴地期望他們給予帮助和指导的人。

我費了很长的時間才在脑子里弄清这个問題，同时我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黑暗中瞎摸过和絆过交。但是我对这个問題的基本态度和別人不一样，这最后使我解开了这个难题，走上了一个大不相同的新方向。

153

* * *

当时的客观情况是：二十年代后期欣欣向上的繁荣削弱了激进主义运动的基础，工会运动停滯不前而且在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党內派別斗争的狂热活动对于許多人來說代替了工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病症在那些日常生活与工人最隔绝的人身上特別厉害。他們沒有好好地看待我們提出的通过取

消派別求得党内和平和统一的方案。他们不理解这种方案，而首先是他们不相信这个方案。

在目前世界上的黑社会里——我在监狱里几度和这个社会有过接触——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既聪明又诚实的人世界上是没有的。人类是由诚实的笨蛋和机伶的恶棍组成的，世界上全都是这两类人；最机伶的恶棍是假装老实的人，是骗子手。同工人阶级斗争的现实问题毫不相干的职业派系活动也是一种黑社会，宗派活动老手的心理状态是和那种黑社会的心理状态一脉相通的。

这种人已经把共产党的内部斗争看得像空气一样片刻也离不得，把内部斗争本身看成就是目的，在这种人看来，任何人如果主张党内和平和统一，他不是一个好心的傻瓜，就是一个别有用心心的伪君子。在那些同我们在多次斗争中周旋的可敬的同事们看来，我们不可能是好心的傻瓜，因此只可能是别有用心心的伪君子。我们所采取的立场被认为根本不可能有第三种原因或动机。

福斯特—毕特尔曼派和鲁登堡—洛夫斯东派的领袖们没有从票面价值来看待我们提出的实现党内统一和党内和平的方案。我们被看成是制造麻烦的无政府主义者，赌博的规矩要求分成两个派，只许有两个派，而我们成立了“第三派”，这就破坏了规矩。

154 福斯特派的人对我进行了特别恶毒的攻击，把我当作一个“叛徒”，好像我一生下地就是某一家一族的一员，我的血缘关系就不许我同山那边的斗争对方来往似的。这是他们那些人的一个彻头彻尾的误解；他们把我的出生证给搞混了。

至于洛夫斯东派，他们甚至在党的支部里提出动议，专门谴

責“第三派”的成立。在他們看来，兩派是理所公認的；第三个派別就反常了。但是这个格律對我們並沒有約束力，理由很簡單，我們不接受。

从最开初的时候就很清楚，我們的方案是不能通过說服来做到的，需要有某种强制和压力，而只有成立一个有組織的独立的派別才能使这种强制和压力产生效果。我們決定着手建立这样一个派別作为一种平衡力量，好讓两个主要派別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独攬党的控制权。

尽管最上层和次一层的領導人員把一切精力都投到派別斗争里去，我們要求全党統一的主张毫无疑问地反映了两派群众中的普遍情緒。許多基层群众厌倦了毫无意义的內部斗争，渴望党能統一起来，实行全面的合作来从事建設性的工作。紐約区的書記伟恩斯东和团结在他周围的一批同志在1926年采取了和我們一样的立場，这件事情突出地表现了群众中的这种情緒。

这个事件打破了魯登堡的“多数”，就像我們在这以前的反叛打破了福斯特的“多数”一样。伟恩斯东不久就和我們取得了一致，这个新的联盟成了党的領導机构中一个举足輕重的力量。派系斗争並沒有因此而停止——情形远非如此——但是这种形势防止了一个派別独攬党的控制权而把其他派排斥于外，而且在党内創造了条件，使各派的主要活动分子都可以无拘束地做党的工作。

* * *

我在当初爭取党的合法化的斗争——1921-1923年——中和伟恩斯东有过密切的联系，对他非常了解。虽然在从1923年

155

佩帕尔—洛夫斯东派在一起，当全国中心設在芝加哥的时候，他是这派在紐約的杰出代表。

在新的发展的过程中，我对伟恩斯东更了解了，对他也形成了更明确的看法。他是三君子——洛夫斯东、伟恩斯东和沃尔夫——之一，我們管他們叫“市立学院的小伙子”。当他們在俄国革命后的高潮中被吸引到左翼运动中的时候，他們还在学校上学，但是他們已經因为具备別人所沒有的特点和受过較多的教育而在运动中涌現在前列。

他們先前并沒有任何同工人在一起进行日常的阶级斗争的經驗，可是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就已經居于显要的地位了。他們三个人在所受的教育方面都有这种缺陷，洛夫斯东和沃尔夫从来不曾表現过想要弥补这个缺陷。他們总是以一种純粹知識分子对工人运动的兴趣而給我一种外人的印象。伟恩斯东至少有一种倾向于工人的感情，虽然在我認識他的那个时期中，他似乎从来不曾真正和工人打成一片。

这三个人全都能說会写，沃尔夫是最有能力最多产的作家，伟恩斯东是三个人里头最有才能的演說家。洛夫斯东写文章和演說的才能不怎样特出，但是他是三个人里个性最强的人，他在任何时候給运动带来的影响都要比其他两人深刻得多，而且絕大部分都是坏影响。

每一个人都認為洛夫斯东在无休止地玩阴謀耍手段方面是肆无忌惮的；在这一点上，我認為大家都看得对，虽然“肆无忌惮”这个字眼用来形容他的活动似乎多少有点过于溫和了一点。洛夫斯东是一个十足的权术家，和福斯特一样——但是方式各有不同。福斯特是工人运动中的人，是属于工人运动的，他对工人运动有一种責任感；他在沒有必要欺騙和撒謊的时候能够做

到相当誠实。福斯特的欺詐是有目的的，功利主义的，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不經心地玩弄的。洛夫斯东却是我們其中的一个恶劣的异己分子，他似乎是恶毒地为耍手腕而耍手腕。

在致力于人与人間关系的最崇高理想的运动中竟会有这样¹⁵⁶一个性情乖张的人物跑进来，真是命运的奇妙播弄。在他鑽进来謀求个人发迹的这一运动中，还从来不曾有过像他那样做了那样多坏事的异己分子；他就像是一个到处乱鑽的癌症細胞一样在党的肌体里作怪。党只有成为工人阶级謀求自身解放的严肃历史过程的自觉表现，才有意义，才有理由存在，党的这种历史使命使它的成員負有各种严格的道义責任。但是洛夫斯东似乎把党看成他进行个人冒险事业的手段，而且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种违反人之常情把事情搞得烏烟瘴气的本能。

他用几乎是病态的疯狂在从事这种个人冒险事业，他不顧忌任何人与人間关系的公認行为准则，至于他这种手段会給工人运动的士气和团结精神造成什么影响，那就更不在話下了。对于他來說，工人的阶级斗争以及这个斗争对人类前途的严肃意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理智概念；争夺党的“控制权”的派系斗争才是实在的东西，是生活里实在的东西。他的主要敌人从来就是党内的派系对手，而不是资产阶级和这个阶级所代表的剥削制度。

洛夫斯东的派系手段和做法有系統地給党以錯誤的教育；散布流言蜚語唆使这些同志反对那些同志；歪曲对方的立場；放肆地蠱惑和煽动派系支持者，一直到使得这些人晕头轉向。他还有其他的手法，但是全都是这一路的貨色。

在那个时候，党的領袖們对彼此的看法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当然并不都是些恭維話；不过在内心深处，尽管斗争时对立情緒很深，我認为他們总还是彼此看作共同事业中的同志而互相尊重的。可是洛夫斯东却沒有人信任，他对事业的忠誠受到普遍的怀疑。福斯特不止一次地在比較亲密的人中間說过，洛夫斯东要是不是个犹太人的話，他百分之八九十可能成为法西斯运动领导机构的候选人。这也是大家很普遍的看法。

157 沃尔夫受的教育比洛夫斯东好，大概也比他聰明些，但是性格比洛夫斯东弱，他在洛夫斯东的一切不正派的鬼花头中充当他的第一助手和支持者。他和洛夫斯东的区别主要是他对眼前的各种阴谋不那么专心致志，不那么不顧一切地关心那些阴谋的結果。

洛夫斯东的派系手法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在1929年写的小册子《党史片断》。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对他的派系对手提出了一个洋洋大观的“控訴”，办法是随意把虚构的事情凑在一起，只引用能够敗坏对手名誉的材料，而把他可以引用来敗坏自己的名誉的更为洋洋大观的材料完全丢开不用。沃尔夫写的宗派文章也是这样，从头到尾全是歪曲。他在1929年写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小册子說明了他到底值几文錢。这两个人差不多根本无需向斯大林学习。按他們在派系斗争中的伎俩來說，他們就是斯大林主义者，虽然那时候斯大林本人的手段还没有充分向美国人暴露出来。

* * *

伟恩斯东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他没有那样机伶狡猾，他没有洛夫斯东那种意志力。但是他比洛夫斯东和沃尔夫誠实，更关心党，那时候他没有疑問是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我認为，伟恩斯东也比魯登堡—洛夫斯东派任何其他領袖更明事理，

比較不固執己見，比較客觀。

偉恩斯東從來沒有完全沉迷在派系鬥爭里。他所以能在1926-1927年採取獨立的方針，根由就在這裡。他承認別一派的同志的功績。他比他那派里別的人更清楚地看到派系鬥爭當時已走進死胡同，並且是真誠地在為黨的更高的利益尋求一條出路。

偉恩斯東曾經一度被佩帕爾的假名聲所迷惑，但是他從來不是魯登堡或洛夫斯東的個人追隨者。在和我的許多次談話中，他對這兩個人的批判是中肯而客觀的；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他對魯登堡派要取得黨的“領導權”的野心是反感的——他們實際上是提出過“在魯登堡派的領導下實現黨的統一”的方案！這聽來很像是要各個殖民地在一个帝國主義帝國里統一起來，它的意思也確是如此。偉恩斯東擔心鼓勵這樣一種不現實的無理的野心會使黨陷於絕路，最後只能分裂，他擔心得很對。 158

早在1926年，在魯登堡還沒有死以前，偉恩斯東就已經開始在那个派系里採取了主張統一的立場，他主張解散派系，由最有能力和影響的人組成“集體領導”，不要有派系的壁壘來妨礙他們的自由合作。這種立場當然促使他和我們磋商並且最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因為我們在福斯特派里面也通過自己的經驗採取了同樣的立場。

洛夫斯東分子看事情，事先就斷定一切都是勾結共謀的結果，沒有什麼事情是出於好心和不受別人影響地考慮問題的結果。他們完全肯定是我策動偉恩斯東脫離他的派別，是我說動他採取反對本派別的異端的。這就是吉特勞在他那懺悔性的回憶錄中對這件事的說法；但是在我的記憶中事情不是這樣。

由於共產國際1925年一手包辦的顛倒乾坤的人事變動，偉

恩斯东担任了紐約区的書記。在那个时候，那些昨天还居于合法当选的多数地位的紐約区起作用的大多数黨員們就变成了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少数。伟恩斯东認識到他們作为党的工作者的价值，有意識地自行在紐約区实行了和解和合作的政策。

紐約的絕大部分福斯特分子在經過一个时期有怀疑地持保留态度之后，响应了伟恩斯东的和解政策，于是在党的工作上实现了相当大程度上的合作。这种局部的良好結果使得伟恩斯东頗想把自己的想法应用到全国党的問題上去。因此不久他就采取了和我們在芝加哥采取的几乎一样的态度。

我不認為我个人对他形成这种想法起过多大影响——至少在初期如此。他得出了和我們所已經得出的看法實質上相同的看法，这个事实使我們得到了某种安慰，相信自己对問題的看法是正确的；接着我們和伟恩斯东的关系当然就越来越密切了。

159 在一九二七年三月魯登堡突然意外逝世以前，我們就达成了共同合作的明确協議。我們常常推想，如果魯登堡活着的話，局面会怎样。魯登堡也像其余的人一样是一个宗派分子，但是他不像洛夫斯东那样疯狂。他远比洛夫斯东更富于建設精神，更負責，也更关心党的总的利益和他自己作为一个党（而不是一个派系集合体）的領袖的地位。而且，他在党内也更有威望，更有影响，更受尊敬。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否决洛夫斯东的过火的宗派活动，只要他願意。

如果他活着的話，很有可能实现不稳固的和平，逐渐解散派系。他的突然逝世排除了这一切可能。魯登堡派这时变成了洛夫斯东派，党内局面因而也恶化了。

国际劳工保卫組織

1958年4月17日

你提到有关国际劳工保卫組織問題的信已經收到了。

我对这个問題的确感到亲切。这是我在二十年代参加共产党的时期里記得最清楚和最鮮明的往事之一，这是我們本着世界产盟的原有精神，为了互相支援而誠实工作，并且取得踏实成績的一段往事。

这的确是一段有趣的历史，我想也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因为，在这段时期里，毕尔·海伍德的影响——通过我和我的战友罗斯·卡尔斯納、托姆·奥弗拉赫蒂、馬克斯·沙赫特曼、馬丁·阿勃恩——投入到他被迫离开的运动中来。这种影响就是叫我們用一片赤誠和善意对待美国監獄中一切階級战争的战俘，并且給他們以真正的不分党派界限的支援。你注意到，毕尔在《劳工保卫者》1926年6月号上提到，1925年他在莫斯科同我有过一次談話。这就是国际劳工保卫組織的发端。我将在另一封信里同你談談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大部分問題都提到国际劳工保卫組織的成立和活动是 160
否可能牵涉到宗派斗争的問題。这使我有些不解。这一切都是次要的。国际劳工保卫組織的真实历史就是，它开展了自己的工作，組織了募捐，認真处理自己的基金，公开公布基金用項，并且本着落落大方的、不分党派界限的精神，来进行它的一切活动。說起来也許很奇怪，这一切所以可能，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我属于党内一个派別！我們那一派是国际劳工保卫組織的边境哨，它竭力防止国际劳工保卫組織受到宗派斗争的

破坏，或者尽量要把这种破坏减少到最小限度。在那些年月里戕害党的宗派活动对国际劳工保卫組織的影响，要比在任何其他领域中都要小些。

*

1959年2月6日

聖經里有个人不相信拿撒勒^①能给人带来任何好处，职业反共分子也总是从这个聖經人物的前提出发。用騙子們的現代行話來說，他們不給一个共产党人以均等的机会。例如，他們当中有一个人曾說，我通过国际劳工保卫組織帮助世界产盟被捕工人的动机“不完全是出于博爱之心”，因为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是在为党的利益服务。

这种說法是不准确的。我的动机根本不是“出于博爱之心”。我真正地相信支援一切階級战争的战俘的原則——我在早期的激进运动中就是在这个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当然，我当时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人；我認为而且說过，国际劳工保卫組織所进行的正直的救援工作至少会間接地給共产党增光。但是，代表各种各样事业和組織的人們在做他們心目中的好事情的时候，又有誰不是抱着这种双重动机呢？

世界产盟当年支持过敌对的劳联的罢工，并且支持过其他劳工保卫案件。他們这样做是完全誠心誠意的，但是，他們同时也希望这一貫的相互支援政策会在激进工人当中給世界产盟增光。实际結果也是这样。天主教的修女們毕生在医院里为病人服务，她們无疑地覺得她們在替天主工作。但是，她們也希望她們所献身的工作能够給天主教增光。实际結果也是这样。当一

^① 拿撒勒是耶穌的故乡。——譯者

位洛克菲勒这样的人或者一位杜宾斯基这样的人捐款给某一个社会公益事业的时候，他们难道不是同时也想到——只是一点点——这有助于改善美孚油公司或杜宾斯基工会同“公众的关系”吗？

我不想暗示共产党人和其他人有双重道德。但是，这种虚伪的道德说教却像一条黑线一样贯穿在一切反共作品中。

* * *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在我的管理下，把自己的支出严格限于劳工保卫工作。我从来都不允许任何人侵犯这项原则。我十分自觉地严格执行这一政策。我所以要这样做，有两重理由。首先，我主张在处理劳工保卫基金时要认真廉洁。其次，我有意识地关心我在一般激进人士中的声誉。因此，在我管理期间，国际劳工保卫组织每月都在《劳工保卫者》刊物上公布按收据编号编制的捐款清单，以便接受公众的监督。此外，《劳工保卫者》还发表了一位合格的公共会计师的年度收支报告表。

当波士顿的萨柯—范齐蒂委员会就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募集的萨柯—范齐蒂案件基金问题提出质询时，我马上就在1927年1月号的《劳工保卫者》上发表了为此目的拨出的款项及其来源的一览表，并附上支票的影印照片，说明这笔款项已全数移交萨柯—范齐蒂保卫委员会。同时，我还邀请萨柯—范齐蒂保卫委员会指定一位代表和会计师来审核我们的帐目，核对我的报告。

我不但真正相信劳工应该相互支援，相信在劳工保卫案件的财政问题上应该认真负责，而且也擅长于政治活动和宗派斗争，能够在这些方面保卫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自主，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工作和声誉因此而获益匪浅。

*

1959年2月10日

我以前对你说过，我很久以来，就想谈谈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起源以及它早期的支援工作的一般情况，以便对得起毕尔·海伍德的英灵。但在为了要出版我的演讲集而搜集材料的时候，我发现，十年前我就发表过一篇演讲，谈过这个问题，后来又把这回事忘了。我在那篇演讲中主张声援共产党领导人，不管和他们的政治分歧如何，而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提到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在这方面的传统，以及毕尔·海伍德在倡导建立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篇演讲是1949年2月6日在纽约发表的，题目叫做《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审讯》，后来刊登在1949年2月14日的《战斗者》上，现在仍可查对。我在追述了莫耶—海伍德案件以后的历次保卫案件中劳工相互支援的传统之后接着说：

“共产党自己就一度鼓吹过这个值得骄傲的相互支援的传统。1925年在共产党直接主持下成立的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就专门致力于实现不分党派的劳工保卫原则，致力于保卫一切由于自己的活动或意见而遭到资产阶级法庭迫害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成员，而不管他的观点如何。

“我这段话是确凿可信的，因为我参加过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筹划工作，而且，从它成立之日起到1928年我们被赶出共产党为止，我一直担任这个组织的全国书记。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确实‘是在莫斯科诞生的’；我必须承认这一点，但它在工作方法和实践方面却完全是一个美国组织。国际劳工保卫组织是在同毕尔·海伍德讨论的过程中诞生于莫斯科的。这位老战士在要处他二十年徒刑的威胁下，被迫离开美国，他对美国工人遭受的迫害，深表关切。他希望给那些关在我国各处监狱里的几乎被

遺忘的人們，做點事情。

“當時，在美國有一百多個勞工領袖、罷工領導人和激進分子被關在獄中，其中有世界產盟的盟員，無政府主義者，蒙尼和比林斯，薩柯和范齊蒂，麥克納馬拉和施密特，森特拉利亞被捕者等等。我們1925年在莫斯科討論的時候，制訂了國際勞工保衛組織的計劃，並且確定它是一個非黨派的機構，致力於保衛一切在資產階級法律下遭受迫害的工人階級運動的成員，而不管他所持的觀點和所屬的黨派如何。

163

“我永遠也不能忘記我和畢爾·海伍德談話的情景。當我們完成了後來成為現實的國際勞工保衛組織計劃的時候，當我向他保證我回到美國以後一定要把這個計劃付諸實施的時候，當我向他保證我們真的要着手工作來援助那些在獄中被遺忘的人們的時候，他那雙像雄獅般的眼睛——或者不如說是那一只眼睛——射出了光芒。他說：‘我要是能回去參加這個工作，那該多好’。他是回不來了，因為他在美國是一個不受法律保護的人。這並不是因為他犯了什麼罪，而是因為他給美國工人階級做了很多好事。他一直通過通信積極參加國際勞工保衛組織的工作，一直到死為止。

“在莫斯科，我們在海伍德的房間里制訂了把國際勞工保衛組織當做一個非黨派保衛組織來經營的計劃。這個計劃在頭幾年中付諸實施。當時在美國有一百零六名階級戰爭的戰俘——在加利福尼亞州、堪薩斯州、猶他州和其他州里，有幾十名世界產盟盟員根據懲治工團主義刑事法被投入監獄。我們還查出，在羅得島州的監獄中有兩名不出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在西弗吉尼亞州有一群勞聯礦工；在緬因州的托馬斯頓有兩名勞工組織者，此外還有上面提及的比較突出、比較著名的被捕者。當時，

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总共有一百零六个人因为在劳工运动中从事活动而被关在牢里。他们根本不是罪犯，而是罢工的领导人、组织者、鼓动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人。在这一百零六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但是，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却无例外地保卫他们，帮助他们。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采取的政策是宣传他们的案情，为他们募捐。我们募集到相当数量的基金，每个月可以给一百零六名阶级俘虏每人寄五元钱。每逢圣诞节，我们还为他们的家属筹集一笔款项。在森特拉利亚事件中被捕的世界产盟盟员多年来差不多已经没有人记得了，我们又叫人们想起他们，宣传他们的案情，努力帮助他们。我们对于那些已一半被人遗忘的老的案件，也是这样。国际劳工保卫组织是声援萨柯和范齐蒂的世界范围的巨大抗议运动的组织中心。这一切支援工作都得到了共产党的全力支持，不过这都是在共产党完全斯大林主义化和开除诚实的革命者以前的事。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由于执行了不分党派界限保卫劳工，不因政治观点而实行歧视的原则，所以才取得这样高的声望，才为战士们所如此热爱。这个原则也就是相互支援的原则。当你把这一切同斯大林主义者后来的行径比较一下的时候；当你想一想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的时候，你就必须说，斯大林主义者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玷污了这一相互支援的传统。他们也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破坏了保卫劳工不受阶级敌人损害的团结事业。”

“在阶级敌人面前不团结的可怕腐败现象也渗入到劳工运动的其他组成部分中。社会民主党人在谈到斯大林主义者的时候，发表了很多假惺惺的道德说教，但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好不了

多少。他們大多數人都沒有對迫害斯大林主義者的事件表示抗議。產盟和勞聯的勞工領袖也都袖手旁觀，許多人甚至支持起訴。

“他們認為，不必為史密斯法擔心；它是用來對付斯大林主義者的。在七年前我們受審的時候，斯大林主義者也是這樣想——這一邪惡的、違憲的法律是專門用來對付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我在舊金山就聽說，一位斯大林主義黨的演說者在別人追問到對他們的審訊和對我們的審訊的關係時說：‘整個這場審訊是一場誤會和誤解。史密斯法是用來對付托派分子的’。但是，斯大林主義者終於也受到了史密斯法之害。別的人也是可以遇到同樣遭遇的。

“如果這一次給斯大林主義者定了罪，確立了又一先例，從而加強了我們的案件所確立的先例的話，那麼，也就可以援用這同一個法律來迫害其他政治組織，迫害大學教授，甚至迫害和統治階級意見相左而又敢於表示自己意見的傳道師了。忽視這場審訊，拒絕表示抗議，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一個可怕的錯誤；我們大家都要為這個錯誤付出代價——他們和我們，還有我們所 165 有的人，所有希望通過工人們的團結和相互支援來建立一個更美好更自由的世界的人，不管我們要想通過什麼樣的手段，或者通過什麼樣的綱領和學說來達到這一目標。如果聯邦檢察官在這個案件中勝訴，在輿論支持下貫徹下去，我們大家就都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因此，我們希望大家在審訊還在進行的時候，就盡一切力量扭轉目前的趨勢，克服消極和漠不關心的態度。

“如果有人希望或者以為我們能夠同斯大林主義者一道組成一個統一的運動，像過去那樣忠实地合作，那當然是空想。斯大林主義者不會同任何人忠实地合作。我們過去向他們提出過

統一戰綫的建議。他們拒絕了。甚至就在政治迫害、忠誠調查和清洗的矛頭指向他們的時候，他們都不肯為詹姆斯·庫特契爾說一句話。庫特契爾是一個沒有腿的退伍軍人，也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新澤西州的退伍軍人管理局因為他具有不同的政治觀點而解除了他的職務。

“由於斯大林主義者的態度，也由於其他考慮，希望建立一個大門敞開的統一戰綫，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工會和反斯大林主義的政治組織應該為了他們自己的緣故，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團結起來，對這一起訴提出抗議。我們願意參加和支持這樣的努力。但是無論如何，不管是合作也好，還是分別工作也好，我們大家都應當對正在福萊廣場^①進行的政治審訊，表示抗議。不是為了斯大林主義者，而是為了言論自由，為了勞工運動化了很大代價才贏得的民主權利。這種民主權利是勞工運動在增進工人的見聞，提高工人的覺悟，以達到更高水平的鬥爭中所迫切需要的”。

1927年：從魯登堡到洛夫斯東

166

1955年7月22日

1927年3月魯登堡的突然逝世打亂了黨內不穩定的平衡，使得共產國際不得不第二次直接進行干涉，以挫敗黨內多數派的意志，越過多數派來決定黨內領導機構的組成成分。

魯登堡在黨內一向起着巨大作用，他似乎長期固定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他在盛年逝世，的確使局面陷於混亂狀態。

^① 福萊廣場是美國聯邦法院的所在地。——譯者

当时，党内的两个“大人物”就是福斯特和鲁登堡。他们俩人都有很多成绩和建树，完全配得上享有这样的威信。

福斯特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是1919年钢铁大罢工的组织和领导人，成绩卓著，后来又是工会教育同盟的组织和领导人，也有很多成就；鲁登堡所以出名，是因为他英勇地反对战争，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先驱者进行过卓越的活动，也是因为他毅然入狱，英勇不屈。党员们都知道他们的社会声望的价值，因此一致同意他们在党内占据最高的地位，担任党的领袖和发言人。派别活动并没有给这两位声望最高的领袖的威信增添什么东西，如果说起了什么作用的话，倒是有些玷污了他们的威信。

在鲁登堡派的所有领导人中，鲁登堡在党内最受尊敬，个人影响也最大。这一派就以“鲁登堡集团”相标榜，想要利用他的威信。但是，有鲁登堡的鲁登堡集团在党内却是少数，1925年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次选举，斗争十分激烈。

在举行1925年的代表大会的时候，“莫斯科来的电报”，经过在场的共产国际代表解释，突然把这个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结果，天真地投票选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党员们就变成了一群竟然以为他们在选择党的领导人员方面还有一些权利的大傻瓜。 167

另一封“莫斯科来的电报”，在1927年完成了同样的奇迹，也把一个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按照这封电报作出的许多补充决议逐渐像大棒一样把党员打得伏伏贴贴，并且把他们的民主权力化为乌有。从此，共产国际在美国共产党事务中的作用，就从在政策问题上施加友好的影响，变为在组织问题上，包括在最重要的问题即领导人员的选择问题上，直接进行粗暴的裁决了。

从此以后，决定就是在莫斯科作出了，美国共产党就只保留着可疑的表演权利。把共产党从一个自治的民主組織变成克里姆林宫的傀儡的过程是在 1925 年开始的，到 1927 年，又进了一大步，更加接近完成。这一年在党的历史上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此。别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和附带的。

* * *

魯登堡集团的不稳定的形式上的“多数”，甚至在魯登堡逝世以前，就因为执行委員伟恩斯东和巴兰叛变而瓦解。后来，魯登堡突然逝世了，这就使魯登堡派失去了它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和取得黨員信任的最大号召力。这样一个薄弱的少数派没有了魯登堡，难道还能够“控制”党并且避免同中央执行委員會中构成多数的其他派別达成合作協議嗎？

当时，我們認為这是它办不到的，并且認為以后当然必須要調整領導人員。但是，結果并不是这样。有人玩弄花招造成不同的結局，我們还没有动手就失敗了。在我們方面，我們有算术規則，党章上規定的中央执行委員會多数的权利，形势的邏輯和当时大多数黨員沒有疑問的支持。但是，这一切并不够。

168 洛夫斯东方面有不顧多数意志夺取党内控制权的疯狂劲头——还有莫斯科的支持。这些东西証明是这一局牌中的王牌。这一局牌拖了六个月才达到它的預定結局。1927年的斗争結束后，洛夫斯东拥有了“多数”——共产国际給他的——并一直保持着这个多数，直到两年后，同一个最高权力机关才决定从他手中夺去这个多数。

* * *

洛夫斯东玩弄的第一条詭計是叫政治委員會任命他担任由于魯登堡逝世而出缺的总書記。按照党章，这是不合規定的。

任命黨的負責人員的權利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政治委員會只是這個機構的一個下級委員會。

我們要求立即召開正式的全会，來處理由於魯登堡逝世而產生的一切問題，包括任命一個繼任者擔任書記的問題。偉恩斯東和我同福斯特達成了一項協議，決意要讓偉恩斯東擔任黨書記；既然我們在全會中占有多數，我們就認為這個決定可以付諸執行。

接着，洛夫斯東又玩弄了第二個詭計。共產國際用電報拍來了它的決定：全会可以開會，但是，在莫斯科討論全部問題以前，不能對組織問題作出任何具有約束力的決定。各派的所有主要代表都要為此目的到莫斯科去。由於主要“組織問題”是按照全会多數派的方針改組政治委員會和任命新的黨書記，共產國際的這封電報雖然在表面上未作判決，實際上卻使洛夫斯東在這兩個地方都掌握了大權——即使不是在法律上，也是在實事上掌握了大權。

美國共產黨的最高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事先已經被禁止作出任何具有約束力的決定，在洛夫斯東未能出席第二次會議以後，就顯得更加可笑了。決定是要在莫斯科作出的。他和吉特勞突然間就動身到那里去了，對於經過選舉產生的黨的領導機關連招呼一聲也沒有。可是，按道理來說，他們像一切別的黨員一樣，要受這個機構領導，黨章上也是這麼說的。 169

在一個參加本國階級鬥爭、根據自己的權力進行工作的、比較健康的、自治的黨里，這種蔑視領導機關的胡鬧行為無疑會使當事人威信掃地，立即引起黨員的非難。但是，洛夫斯東的無賴行為這一次卻沒有引起這樣的反應。出席全会的多數人怒不可遏。福斯特暴跳如雷，用激烈的語言發泄了自己的憤慨。但是，

对于这件事本身，我們这些依法选出的多数派，却毫无办法；我們不能在任何問題上作出任何“具有約束力的决定”——共产国际的电报禁止这样做。

自从1925年以来，党已經逐漸同意取消它作为一个自治組織的正常权利，到后来連这些权利的影子也不見了。洛夫斯东这一回的可耻行动只不过有力地說明了党在莫斯科太上皇面前的真正地位罢了。

* * *

沒有別的办法，只好再一次到莫斯科去，設法解决另一个所謂“誤解”。事后来看，我們那时候真是天真得无以复加了。現在回想起来我还感到痛心。經過了这么多年，又发生过这么多更重要的事情，我現在还有点不想承認，不过，事实仍然是：伟恩斯东和我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满怀信心，真以为我們所提出的在集体基础上調整領導人員并取消原有派别的計劃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要求在領導机关中取得控制权和“領導权”的其他派別沒一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取得多数，而我們則肯定地能够起举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我們認為其他派別将不得不接受我們的計劃，至少在今后一个时期是如此。

我們并不想以一个单独派別的身份，或者同另外一个派別联合，来从組織上控制党。我們的目的是要使宗派壁垒森严的現象緩和下来，在領導委员会中創造条件，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对所討論的任何政治問題实事求是地客觀地表示态度，而不必顧到以前属于什么派別。

在我們自己內部的討論中，在我們在党内的一般宣传中，我們已开始強調，政治問題應該优先于組織考虑，甚至包括党的

“控制权”在內。在当时，各派之間並沒有不可調和的政治分歧。这种情况对我们提出的吸收各派领导人組成集体领导机关的計劃，似乎也是有利的。我們認為，政治問題服从派別組織考虑的現象——这种現象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只能使全体黨員和领导人員受到不正确的教育，并且使他們腐化。

至于我，我当时正在开始充分領会并且認真接受應該永远以重要的政治問題为重的列宁主义原則。我不能明白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支持我們的态度，因为我当时还認為共产国际是列宁原則的具体代表呢。

* * *

人們在許多派別斗争中領教过各种狡猾手腕之后，已經有了一句怀疑主义的口头語：“当一个人在原則上接受一种主张的时候，那就是說他在实际上拒絕它”。事情并不总是这样，但是1927年我們在莫斯科遇到的局面却正是这样。我們的計劃在原則上被接受了，但是又发表了一些补充声明来使它归于无效。我們发现，各方面都同意派別應該取消，领导應該統一。但是，在这以后，書面決議却暗示洛夫斯东分子在这种統一中应握有“領導权”——这稳稳当当地要使“統一”成为宗派統治的可笑烟幕。

官方的決議譴責“宗派斗争的剧烈化”——这是洛夫斯东分子在党的全会上的行为所造成的——但是又把这种“剧烈化”的責任轉嫁到“反对派联盟全国委员会”身上。決議吸收了我們所提出的“过去的政治和工会分歧差不多已經消失”的公式。接着，它譴責“沒有政治分歧的宗派斗争是最严重的反党罪行”——洛夫斯东分子夺取党内控制权的企图正是这样一种罪行——但是又把这种“罪行”轉嫁給“反对派联盟”。共产国际1927

年关于“美国問題”的決議——对于那些欢喜研究阴险艺术的人來說——是一份真正的学习詭辯术的材料。

* * *

过去，共产国际在有爭执的政治問題上都是明确的和直截了当的。这一次，共产国际的決議中却沒有任何明确和直截了当的东西。他們強調要緩和宗派斗争，实现党內的和平、团结和合作。但是，正式的決議却倾向于暗示——沒有在任何地方明白地說——在未来的党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被看中的是洛夫斯东派。这就使党內肯定不会有团结和合作，只会有爭夺代表大会控制权的宗派斗争，如果洛夫斯东分子赢得多数的話，党內以后还会有宗派統治。

* * *

我們知道我們1927年在莫斯科沒有取得任何胜利，但是，我們的“一般原則”既被接受，也就鼓励了我們繼續进行斗争；我們知道，如果洛夫斯东在代表大会上依靠形式上的多数掌握大权的話，这些一般原則在党內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只是到那时，只是在莫斯科的討論中和在正式決議以后，伟恩斯东—坎农和福斯特才正式成立联盟，以便在代表大会以前的斗争中提出联合候选名单，爭取选派代表出席未来的代表大会。以前，我們只是在全会上达成一項推选伟恩斯东为党書記的協議。現在，我們一致同意在代表大会以前的斗争中联合我們的力量，以阻止洛夫斯东分子实现宗派統治。

从魯登堡逝世到8月底的代表大会，中間有六个月時間。
172 这六个月在两个方面打开了我的眼睛。第一，党內发生了清晰可見的变化，在当时就已經使我对前途产生最严重的疑惧。党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叛逆分子們所組成的团

体，它以誠实的、不拘形式的民主方式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员。这是它最大的吸引力之一。

但是，到1927年，共产党已经不复是原来的样子了。它的党员已在灼然可见地逐渐变成一批消极的群众，听命于权威，被人用最露骨的煽惑手段加以操纵。这个时期的情况比我以前所认识到的更清楚地说明了，本国党领导人本身的独立影响已经遭到多大的削减，又在多大程度上要服从莫斯科的支配一切的权威。许多党员都开始把眼光转向莫斯科，不仅希望莫斯科给他们作出政策决定，而且希望莫斯科向他们暗示，他们应该投票推选哪一个全国领袖或者哪一批领袖。

* * *

第二，在1927年，洛夫斯东原形毕露了。这件事本身对于党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在过去，洛夫斯东是在鲁登堡的掩护下进行工作的，他使自己适应这种情况，并且依靠鲁登堡的信誉取得党的好感，或者至少是党的容忍。在那时候，就是那些同洛夫斯东面对面斗争、对他的恶毒才能有正确认识的各派中心领袖，也从来没有完全看穿这个人的全貌。

我们现在第一次看见不受鲁登堡约束的洛夫斯东的真面目了。他运用了他的全部的神通和精力，来进行肆无忌惮的煽惑宣传。这种奇观使得旁人真不知道他自己究竟是在一个以合理改造社会为目标的工人组织中呢，还是糊里糊涂走进了一所疯人院。

一切旁的人都认为，鲁登堡的逝世是对他在形式上领导的那个派别的一个严重打击。但是，洛夫斯东却从这个事件中脱颖而出，就像是从一件疯人衣中脱身而出一样。鲁登堡的尸体还没有冷，他就宣布鲁登堡弥留之际表示希望洛夫斯东为他的

繼任者，同时呼吁莫斯科阻止召开全会处理这个问题。这样，他在争夺党内控制权的斗争中就着了先鞭，并且给党内宗派活动立下了一个新格局。这样的宗派活动就是在深受宗派之害的共产党的历史上也还从来没有看见过。

* * *

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中，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被无耻而有效地包装起来，兜售给一群糊里糊涂的选民，使许多善于批评的观察家都感到惊讶和难受。但是，我对这种十分有效的巧妙操纵或许并不那么惊奇，因为我以前见过这种事情——在美国共产党内。两者在规模上和所投入的力量上当然有所不同，但是，即使全考虑到这一点，洛夫斯东在1927年的党内选举中把自己当作鲁登堡的选定继承人和莫斯科的宠儿兜售给党员的工作，其令人怵目惊心的程度也不亚于1952年麦迪逊大街的政治贩子的职业活动。

这一下真是海阔天空，一切限制都没有了。1927年的党内竞选是无耻的煽惑宣传的杰作。煽惑宣传的目的是要从情绪上打动党员。宣传的最高潮是兜售其中藏着洛夫斯东的鲁登堡的尸体和共产国际的决议。连鲁登堡的葬礼和后来的追悼会也被人卑鄙的操纵，并乘机进行宗派宣传。

洛夫斯东在沃尔夫的支持下进行了“拥护共产国际”的竞选，制造了在这个问题上要么投赞成票要么投反对票的气氛，仿佛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仅仅提出了是否忠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最高原则这一问题。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拿来当做大棒挥舞，借以吓唬党员群众，并且无耻地利用了党员们害怕由于犹豫或怀疑而受到报复的心理。

这些鼓动伎俩按说是法西斯主义的武器中才有的，但是

1927年却在美国共产党内产生了效果。久經鍛煉的反对派干部沒有一个人受到这种肆无忌惮的鼓动的明显影响，但是，在外国，反对派联盟的力量却敌不过这种大規模的宣传。新党员和怯弱分子認為还是投票“拥护共产国际”保险；鬼鬼祟祟的野心家都趁机从暗处跑出来，一齐起哄。

洛夫斯东大概是党的领导人員中最不得人望的一个，无疑地也是最不受信任的一个。但是，現在由洛夫斯东领导的洛夫斯东派这一次却完成了它以前在得人望的有影响的魯登堡领导下所从来沒有能够办到的事情。洛夫斯东在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并且使这一派第一次不仅在形式上，而且也在实际上控制了党的机构。

* * *

洛夫斯东是把自己当作莫斯科的宠儿而兜售給全党的。当时，他不可能知道，我們也不可能知道，他实在做得太过火了。在党内选举中援用莫斯科的权威并且訓練党员习惯于“投票拥护共产国际”的办法，两年以后反而使洛夫斯东自己受了害。那时，同一个最高权力机关又决定讓他下台。当时已經可以很容易地看得出来，我主所賜予的，我主也可以收回。

他在党内赢得的“多数”并不是他自己的。当共产国际命令党员們投票反对他的时候，那些以前在洛夫斯东的鼓动和訓練下“投票拥护共产国际”的党员們，現在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响应。洛夫斯东通过1927年过分成功的“拥护共产国际”的竞选活动，只不过在党内給自己的灭亡創造了条件而已。

1927 年的若干遺聞軼事

1955 年 7 月 26 日

吉特劳在他的忏悔录《我坦白》一書中說，在 1926 年-1927 年我最初和伟恩斯东討論的时候，我們曾經談到瓜分党内职位問題——由我任主席，伟恩斯东任总書記，福斯特任工会部长（見原書第 405 頁）。这只是吉特劳一貫把他自己的猜疑当做事实来报道的一个例子。在魯登堡逝世以前，我們根本沒有討論过党内的职位問題，在魯登堡逝世以后，我們只討論过突然空缺的总書記职位問題。在我們同福斯特打交道的時候，也只討論到書記职位問題。当时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必須馬上解决。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在 1925 年代表大会以后，在共产国际的电报和共产国际代表格林（古塞夫）的决定把魯登堡派变成多数派的时候，主席职位已經取消。

吉特劳由于同洛夫斯东經常在一起，总是习惯成自然地認為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碰头，就是在搞对他們个人有利的事情。在他的書中，充滿了把他的猜想当做事实的材料。

* * *

吉特劳說，在魯登堡逝世以后，伟恩斯东因为洛夫斯东答应給他当書記而搖摆到洛夫斯东那边去。这一說法同我的記憶不合。在整个那段时期，我都同伟恩斯东保持密切联系。他把同洛夫斯东分子每一次討論的情况都告訴了我。据我所知，在 1927 年代表大会以前，在我們所商定的根本立場——反对任何其他派別控制党——上，他决沒有动摇过。我不相信他当时关心的主要是职位；我也不相信窃取职位在任何时候曾經成为他

的主要动机，像吉特劳所猜想的那样。

伟恩斯东在当时的局面中所以很重要，是因为他个人在紐約很有威信，是因为他担任了举足輕重的紐約区的書記的职务，¹⁷⁶也是因为他无可怀疑地真誠恪守非宗派立場。斯塔彻最初也跟着伟恩斯东走，这使洛夫斯东分子特別感到苦恼。伟恩斯东还得到一些青年的拥护；后来担任《工人日报》編輯的薩姆·唐在那个时期也始終跟着他走。伟恩斯东还得到南部斯拉夫分部的一个集团的支持。

我想，在你研究的全部档案材料中，大概只有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有人給斯塔彻講过一句好話，不管是多么有限的好話。事实上，在1926-1927年，斯塔彻是伟恩斯东领导下的紐約区組織書記，他确是被爭取过来，同意了伟恩斯东的非宗派政策，并且执行这个政策一直到魯登堡逝世以后的某一个时候。我記得紐約福斯特派的領袖克隆本对我說过，他“从来沒有看見过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轉变”。而且他的态度的轉变还大大地緩和了紐約区的宗派斗争局面。

斯塔彻参加过我同伟恩斯东举行的許多早期的討論，并且表示完全同意我們的計劃。有一回，他还建議我到紐約去担任党書記，在紐約貫徹这个計劃，如果伟恩斯东去担任全国書記的話。經過好几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洛夫斯东才最后使斯塔彻就范。但是，这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的确有短短一个时期把党的利益的更高尚的考虑放在第一位。他的一生的其余部分似乎都是致力于恶性的宗派活动。

至于沃尔夫，伟恩斯东和我都不相信他这个人，也不相信他同情伟恩斯东的計劃的各种表示。我記得伟恩斯东告訴过我，說沃尔夫始終是洛夫斯东的密探；說他只是在短时期內假装同

情，目的是要控制斯塔彻，把他拉回去，并且利用斯塔彻牵制伟恩斯东。这样一种复杂的馬基雅弗里式的計謀是符合洛夫斯东的性格的。但是我至今仍然不相信斯塔彻自觉地参加了这个阴謀，虽然沃尔夫差不多可以肯定与这个阴謀有关系。

177 巴兰当时也跟着伟恩斯东走了过来，在1927年代表大会期間一直和我們一起留在反对派联盟中。我承認，当时形势中的这种变局，我始終不能理解。巴兰是当时党内缺乏领导才干、可以說是靠宗派斗争維持其政治生活的少数人之一。他們不是領袖，而是某一个派別的仆从。从很久以来，我就認為他是一个无耻之徒，我想別的人也都是这样看。

在1920年俄罗斯分部派和魯登堡决裂，并且丧失了他們的所有比較能干而又有影响的“英語发言人”以后，巴兰就是他們的“英語”喉舌。在党内就合法化問題展开斗争期間，他一直在俄罗斯分部那批极端过左派当中保持着这样的地位，直到1922年-1923年他們遭到惨敗时为止。后来，佩帕尔替他恢复了名誉，把他收容进来。从此，他就成为佩帕尔的宗派嘍囉，在佩帕尔—魯登堡—洛夫斯东联盟中混了四年，1927年才跑过来，站到伟恩斯东方面。

巴兰在党内名声很坏，几乎没有什么个人影响。当我们听說他将和伟恩斯东一起到这个新集团中来的时候，我們都有些不安。但是，他似乎接受了我們的全部計划，我們沒有理由排斥他。我当时坦率地表示我不能理解巴兰的态度。我認為，他在任何一个派別中出現都是可以想像的，不过要在这个以結束宗派斗争为宗旨的派別中出現却是不可想像的。可是，他在当时的秘密討論中都和我們表示了一样的看法，認為宗派斗争已經把我們大家引到死胡同里，我們目前必須要找一条新的出路。

我記得我有一次問到他对結局的看法，他說：“我絕對相信共产国际”。但是，在共产国际的決議之后，他还是跟着我們走——一直到代表大会的时候。在代表大会之后，他有一机会就溜到洛夫斯东的集团中去了。

* * *

伟恩斯东也在代表大会以后跑到洛夫斯东那边去了，但是决不应把两个人的动机等同起来。我想，伟恩斯东当时断定，共产国际的決議和洛夫斯东在这个基础上取得的胜利已經破坏了按照我們提出的方針統一全党的可能性，因此必須接受洛夫斯东集团的“領導权”。不过，他从来沒有变成像那个派別中大多数人那样的“洛夫斯东分子”。1929年，洛夫斯东一同共产国际鬧翻，他就馬上离开洛夫斯东，成为最先支持共产国际新方針的人士之一。

* * *

統一反对派联盟 根据我的記憶，这个联盟是1927年我們在莫斯科的时候成立的，而不是在这以前成立的。在以前，我們只达成一个支持伟恩斯东担任总書記的“別碰我”協議。新联盟明白地称为“联盟”，目的是要表明各派并沒有像福斯特所希望的那样融合成为一个派別。伟恩斯东和我对于由福斯特控制全党的办法都不表同情，也不同意和他一起成立单一派別的办法，因为在那样一个派別中，我們可能要受到多数票的控制。在我們那个时期的相互关系中，一切問題每一次都必須通过協議来决定，而不是通过多数票来决定。

照我們看来，当时的情况實質上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派別在当时的头等重要的問題上都沒有政治观点上的明显分歧。这就是我們主张取消老的派別的“政治基础”。当时，其他派別要求

我們拿出他們并不向自己要求的東西來。由於我們沒有提出一個新的政治綱領，他們就指責我們“沒有政治綱領”。在我們和福斯特成立了這個聯盟之後，洛夫斯東也發出同樣的叫囂來反對它。這從側面有趣地說明了那些日子裡老派別的流行心理。兩個老派別，福斯特派和洛夫斯東派被視為理所當然，有權利作為既成事實而獨立存在。第三個集團，或者一個新的“聯盟”，就需要有“政治基礎”。在原有的“政治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以後很久，還要搞宗派鬥爭，的確可以使人產生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成立這個聯盟的目的是要設法阻止洛夫斯東分子以明確的多數控制全黨。我們不懷疑，福斯特想要自己來控制全黨，但是
179 我們也知道，沒有我們的支持，他是辦不到的。而我們是從來不打算讓他控制全黨的。在基層黨員中間，支持他的人要比支持我們的人多。但是，比較能干的幹部大多數都是我們的。因此，在一切有關代表權的協議中，福斯特都不能不同意對半平分的原則。1927年代表大會選出一個新中央執行委員會。聯盟以少數派身份推選代表時，也是按對半平分原則辦事。在新委員會的十三名少數派代表中，我們得了六名，福斯特集團得了七名，多給了他們一名。

反對派聯盟似乎是1927年在莫斯科發生的情勢的邏輯產物。但是，我認為可以說，福斯特在這方面要求最迫切，所作的讓步也最多。這並不意味着偉恩斯東變成了任何意義上的福斯特分子，也不意味着我們在1925年同福斯特之間發生的裂痕已經得到彌補。倒不如說這是一種政治上的便利的結合。

1927年夏天的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會議 偉恩斯東和我一塊到莫斯科去，並且在全會的最後一天到達。我們沒有參加它的任何會議，根據我的記憶，也沒有參加投票，因為投票是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才有的权利。我们并不是作为全会代表到莫斯科去的，而只是为了美国问题去的。

德国的伊瓦特(布朗)当时负责美洲局。伊瓦特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正直而直率的共产主义者，工人出身，以前只是第二、三流人物，在共产国际先后摧毁布兰德勒—塔耳黑默以及过左派费希尔—马斯洛夫的传统领导之后，才参加到德国党的领导机关中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恰好选他来领导美洲局。我想，他是接近布哈林的，并且在这方面执行了布哈林的愿望。

我不记得伟恩斯东和我这一次见到过俄国党的任何高级领袖。一般来说，在那个时期，洛夫斯东在莫斯科的把戏中都远远走在我们前头。首先，他得到了佩帕尔的帮助。佩帕尔钻到共产国际的机构中去，了解一切内情和风向，知道该见谁，该避开谁。

在这里，我倒不如坦率承认，在1922年我第一次去过莫斯科以后，后来再去莫斯科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在1922年的时候，一切都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双方在公开辩论中提出明确的政治问题，然后在政治的基础上直截了当地加以解决，对于有关各派既没有歧视，也没有偏袒，也没有任何由于俄国内部问题而产生的未经宣布的原因来作为决议的动机，来决定对于各派领导人的态度。这是列宁—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我前去参加是做得很对的。在1924年以后，在共产国际中，一切都不同了，我似乎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讨厌像请愿者一样到处去见人，见了一个又一个，我也讨厌像在黑暗中摸索一样，不知道旁人在没有我们参加的情况下要决定些什么事。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只有在美洲局的会议上才感到自在。在那种会议上，各派代表可以面对面地进行公开辩论。但是，到美洲局的会议开始时，会议也不过是手续罢了。

一切問題都在幕后決定好了。命令已經下達，共產國際中所有第二流的領導人員和負責人員都只是一體遵行而已。

我不無理由地覺得，我在整個事情中一點忙也幫不上。我每一次離開莫斯科的時候都有無用之感。所以，我愈來愈不願意再去莫斯科了，到1928年，我就第一次斷然拒絕前去。只是由於本派朋友一再督促並且施以壓力，我才最後同意在1928年再去試一下。當時，我對俄國黨內的情況已經深深感到不安，但是，我當時又認為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問題還是絲毫也解決不了。我絲毫也沒有想到，我會被卷入這場鬥爭，而且在那以後會成為一個堅定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同過去的一切關係一刀兩斷。

* * *

我想，魯登堡—洛夫斯東集團，由於早在1924年就比較早和比較熱情地投入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所以在開頭的時候，在莫斯科占了一些便宜；因此，在後來的幾年中，俄國的領導人始終記得這件事。福斯特和畢特爾曼也千方百計地來彌補福斯特一坎農派早先在托洛茨基問題上的懈怠，但是我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只是默默地跟着。這種情況在莫斯科可能也被人注意到了，而且可能就是我在那裏失寵的部分原因。關於這一點，我不能肯定。

來信說，你的“印象是，在1927年，美國黨內確確實實還沒有一個人可以稱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哪怕只是托洛茨基立場的同情者。”你說得不錯。據我所知，在1928年我參加六大歸來以前，黨內沒有一個人公開採取這種立場。我個人對開除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措施深深感到不安和不滿，但是，當時我也不能說是一個“托洛茨基分子”或哪怕是同情者。而且，就當時

党内气氛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表示这样的意见和不满是不明智的。到那个时候，在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国党内，谁要是沾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边，谁就有马上被开除的危险。

在我们被开除以后，我们发现有一小批匈牙利共产主义者，以路易斯·巴斯基为首，在我们被开除以前接受了俄国反动派的纲领。不过，他们是在根据其他的理由被开除出党以后，才采取这一立场的。开除他们的理由则是洛夫斯东分子为了加强他们在匈牙利分部中的宗派控制而捏造出来的。在我们的运动高举托洛茨基的旗帜向前开拓道路的那些风狂雨暴的艰难日子里，匈牙利的同志们大大增长了我们的志气。

洛尔从来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且在我们被开除以后，他也从来没有同我们这一集团合作过。马克思·伊斯特曼无疑是美国的第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正式成为党员。在1928年，他自己负责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著作《俄国实况》。但是，当时，我们正在莫斯科出席六大，我回来以后才看到这本书。这本书中收罗有俄国党左派反对派的纲领和左派反对派的一切其他文件。在我们作为一个被开除的集团出版《战斗者》的最初日子里，伊斯特曼曾跟我们合作，并且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 * *

1927年的共产国际决议并没有明文规定洛夫斯东分子应在下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取得多数。后来连续发表的所有决议和电报都有帮助这一结果实现的倾向，但是也没有作明文规定。洛夫斯东这一次从共产国际取得的帮助足以使他取得多数，但是不足以使他消灭或排斥少数派。而且，他所得到的有倾向性

的支持还附有一项规定：必须统一全党，实现和平。

这就是共产国际代表伊瓦特在逗留我国期间进行活动的意义。在党代表大会以后——而且自然是在它的决议范围以内——他似乎始终是为和平与和解而努力。我们从来也没有理由抱怨他不公平。可以认为，他是根据指示工作的，但是这种指示对他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他无疑地是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在我的记忆中，他不是不可亲近的人。

我认为，这样说是不错的：莫斯科在1927年给予洛夫斯东有条件的支持；可以说，是对他加以考验；同时还作出规定，保全少数派，以防万一这个试验不能令莫斯科满意。我们以前说过，美国问题根本不是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全会上决定的。一切都是在后来解决的——形式上是通过美洲局来解决，实际上是在俄国领导人之间的幕后安排中来解决。

洛夫斯东的领导

1956年2月3日

1928年的2月全会所以有名，与其说是由于全会的形式上的决定，不如说是由于它在党的领导的发展中是一个新的转折点。鲁登堡逝世的全部影响在这次全会上第一次表现出来。

183 在1927年8月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洛夫斯东和沃尔夫根据他们继承鲁登堡的权利，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获得了多数。他们由于保证要统一全党和解散各派，也博得一些选票。在中間的六个月中，洛夫斯东分子完全控制着党，二月全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对成绩加以检查。

当时已经十分明显，党内这个领导是一个新东西，同过去有

所不同。魯登堡从来也不是党的“唯一領袖”，甚至也不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是那一派的“唯一”領袖；他只是所謂魯登堡集團的一部分。尽管这样，魯登堡集團仍然帶有他的個人品質的標記。他是一個忠心的共產主義者，完全獻身於事業——我認為，任何人都沒有懷疑過這一點。而且，他是很負責的人，關心各部門黨的工作的進展。他的政治傾向有些過左的色彩。

* * *

新領導是洛夫斯東領導——那就同過去不一樣了。政治和組織政策方面的改變逐漸明顯了。在過去，洛夫斯東和沃爾夫處處適應魯登堡，為的是在他的個人影響和權威的盾牌後面前進。現在，原來的限制解除了，他們開始實行他們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組織方法。他們的政治主張顯然比魯登堡要保守，而他們的組織方法則遠遠沒有魯登堡那樣負責。

美國資本主義的不斷擴展的力量把他們迷住了。他們說美國資本主義進入了它的“維多利亞時代”，並且從這個觀點得出“美國例外論”的理論。他們認為在美國地平線上不會有經濟危機，因此美國工人階級也沒有激進化的希望。

在黨的組織方面，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洛夫斯東分子繼續高唱團結。但是，在這種論調的掩護下，他們又在組織上到處鑽空子，加強他們對黨的機構的宗派控制，比在魯登堡時代還要積極得多。

“魯登堡領導”（黨內的）在實際上是各派的聯合領導。魯登堡集團佔據了支配地位，但是其他派別對於黨的重要決議總是能夠施加強大影響的，而且在他們各自的工作部門也有充分行動自由。福斯特分子在工會實際事務中就有充分自由，坎農派在國際勞工保衛組織中也有充分自由——這是黨的群眾工作的

两个主要领域。现在，鲁登堡不在了，洛夫斯东分子就开始在党的各个部门和角落来圆滑地但无情地打破这种联合领导的方式，而代之以清一色的洛夫斯东派统治。

* * *

两个反对派集团经过几个月密切注意，开始注意到洛夫斯东分子的新的政治倾向，并且对它进行斗争。在2月全会上，反对派就开始对“美国例外论”和洛夫斯东分子一般的右倾进行批评。

到2月全会的时候，我们也开始看出，洛夫斯东关于和平和团结问题的叫嚷只是把反对派集团中的怯弱分子拉到洛夫斯东派中去，以便孤立并且最后消灭其他派别的一个公式。除了起而应战外，别无他法。与2月会议上从政治上开始反对洛夫斯东政策同时，反对派各集团在组织上也开始重新统一起来。

一切以为有可能在统一的领导下取消各派的幻想都在2月全会上化为泡影。伟恩斯东和巴兰在全会上回到洛夫斯东集团中去，但是，这并没有能大大改变力量对比。在1927年8月代表大会上站在反对派阵营中的所有其他领导人，都开始在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不调和地反对洛夫斯东领导。

我们不能相信洛夫斯东。在这次全会上，并没有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求得任何肯定的解决；它仅仅是新的宗派战争中的头几次小接触。

* * *

185 在2月全会的议程上，有一个项目是沃尔夫关于俄国党开除左派反对派的报告。沃尔夫是这个问题的“专家”。这个问题处理得相当马虎，因为这些问题好像是已经解决了和死亡了的

問題。沒有一個人為這件事激動，很快就通過決議，列入記錄。

我在《美國托洛茨基主義史》中說過，我在2月全會上沒有就這個問題發言。這使畢爾·鄧恩和我們這一派的其他一些成員感到不安。他們擔心人家可能注意到我的沉默，並且利用這一點來反對我們。洛夫斯東分子如果猜到我沉默的原因，幾乎一定會利用這一點來反對我。但是，我的沉默在全會的混亂局面中似乎並沒有引起注意，我沒有聽到我們自己一派以外的人提到這件事。

莫里斯·斯佩克特作為加拿大黨的代表參加了這次全會。他和我一樣對俄國黨開除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措施，感到不滿。我們在一塊化了整整一個晚上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向他吐露了我自己的感覺。我們誰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也沒有制訂任何行動計劃。

後來，我們又在共產國際六大期間互相接近並且最後約定在回國以後出來維護托洛茨基的事業，而為這一切鋪平道路的則是那次秘密談話。在六大以前，我只向斯佩克特一個人坦率表達過我對俄國問題的觀感。

據我記憶所及，1928年的5月全會沒有討論俄國問題。在中央委員會中也沒有人反對遴選我為出席六大的代表。如果他們猜到我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話，他們無疑會提出反對。

關於季諾維也夫的一點想法

186

1955年7月26日

我很久以來就想过並且表示過要寫一本簡要的政治傳記，來對季諾維也夫加以評價。有一位精通俄語、熟悉俄國運動歷

史的同志也答应同我合作，来准备这份材料^①。但是，我真不知道我們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这项工作太大了，也太严肃了，夹在其他任务中間是不行的。

像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我在共产国际的早期受到季諾維也夫的很大影响。我从来也沒有忘記，在反动的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他是列宁的最亲密的合作者；根据托洛茨基的作証，他又是革命的第一流的演說家；而且，他还是列宁—托洛茨基时代的共产国际的主席。

首先使我真正受到震动、开始怀疑和不满、最后走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就是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联盟以及他和托洛茨基一齐被开除的事件。听到許多渺小人物誹謗季諾維也夫的无耻胡說，我总是感到很憤慨，我覺得，應該有人在历史面前替他辯护。

我毫不怀疑，他的一切重大行动，包括他的最可怕的錯誤的根本动机，都是出于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更高利益的忠誠——对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忠誠。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最大錯誤就是，在决不能使用策略的原則問題的爭执中，他依靠了策略手段。

187 我認为，季諾維也夫向斯大林投降，既不是出于信念，也不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主要是因为他認为他用这种策略可以为事业服务。他希望他自己和反对派的其他領袖能够活下去，等情况发生变化，創造了新机会的时候，能够出来领导斗争，来推翻斯大林和恢复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革命领导。

在政治斗争的多事之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还不便于对这

^① 这是指約翰·賴特。他已經开始这一工作，但是不久以前不幸故世。

个人的一生作全面的和客观的估价；而别的人又没有兴趣。但是，历史的公道要求这样做，总有一天会有什么人来做这件事。不管怎样，应该恢复季诺维也夫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英雄烈士的面目。

就我所知，美国党内没有人特别喜欢季诺维也夫。关于他，我个人永远记得的一件事就是，他在1925年作了耐心而友好的努力，竭力要使两派相信，必须实现党内和平和合作。这表现在我前面已经提到的他对福斯特所说的一句话中：“Freiden ist besser”（和为贵）。

党内六七人

（一）毕尔·邓恩

1955年7月19日

的确，像你所猜想的那样，在那些日子里，不论在私人关系上还是在政治上，邓恩同我都非常接近。我至今还是非常激动，难以下笔对这个悲剧性的人物的个性和生涯作充分的客观叙述。他和我还没有见面的时候，就在“一起”了；我们两人都来自运动的“产业”一翼，互相早就知道了。在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在战后煤矿罢工和暴徒逞凶的困难岁月里，他是《巴特每日通报》的编辑，而我是堪萨斯城左翼报纸《工人世界》报的编辑。

毕尔在西北部有当之无愧的很高的威信，在明尼阿波利斯特别受人欢迎。他的兄弟们就居住在那里，每逢劳动节或类似的机会，他总是在那里代表中央劳工联盟发表出色的演说。根据我的提议，他才在1921年被调到纽约来，担任那年出席职工国际的代表团的团员。

他和我从相識之日起就是亲密的朋友和政治战友，直到1928年我們在莫斯科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托洛茨基問題分手时为止。在1923年，他从一开始就支持我反对佩帕尔主义，后来又在同福斯特的冲突中支持我。在1927年全国办事处迁到紐約以后，我們两对夫妇——毕尔和瑪加丽特以及罗斯和我——住在一块，同在一个公寓里。我們始終是好朋友和好同伴，1928年分手以后，感情上的創伤始終沒有痊愈。

在1928年使这个悲剧更加可悲的是，毕尔由于同我决裂，也同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他自己的兄弟們决裂了。他們三个人——文森特，米尔斯和格兰特——在这次分裂中，都拥护托洛茨基主义，并且在后来的历次斗争中，不論成败利鈍，一直是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毕尔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受害者。在1928年以后，他就不再是原来的他了。我們非常替他惋惜，胜于对任何其他人的惋惜。革命政治总是要求認真对待它的人付出很大牺牲。

(二) 卢德維希·洛尔

1955年3月22日

我同洛尔并不很熟，从来沒有同他有过密切关系，但是，我始終認為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保持着战前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的傳統。我認為，他在共产国际中是感到不自在的，他从来沒有像我們別的人那样变成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据我記憶所及，他贊同共产国际的統一战綫政策，但是却把它解释为同第二国际和好并且重新統一的一个步驟，而不把它看成是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工具等等。

我認為，他所以反对“第三党联盟”，是他在农民問題上的左

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正統思想决定的。我不知道他的立場是否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晓得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对这个問題采取的态度。我觉得他不晓得。

洛尔一般的政治傾向是右的。在俄国党内斗争的头几个阶段，洛尔像欧洲的有些人一样，在一个錯誤的印象下支持托洛茨基，他竟以为托洛茨基的反抗是对季諾維也夫的“过左思想”的反抗。洛尔后来的演变十分清楚地說明，他不是在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現在回头來看，毫無疑問，共产国际所以大罵洛尔，是因为他原来宣布支持托洛茨基，而不是像它所說的那樣，是因为他在美国事务上的政策。

我認为拉弗勒特政策并不是洛尔反对魯登堡—佩帕尔集团和他支持福斯特—坎农集团的唯一原因，或者不是主要原因。他断然地反对佩帕尔，反对一般的“阴谋手段”。他也反对季諾維也夫，但是，他是否認为佩帕尔是季諾維也夫的代理人，那就知道了。

洛尔在紐約的党员中間很有威信，但是，要是在一場派別斗争中摊牌的話，他并没有决定性力量。他支持福斯特—坎农集团，但是从来也不是它的核心集团內决定性的成員。两大派瓜分了党内的控制权。这种情况使得洛尔和他的小支派不能不作出抉择；他的支派同别的派別爭夺党内大权是毫無希望的。

我認为，他所以支持我們，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他認为我們更有美国特色，更有无产階級工会工作者的特色，因此，更能够使党成为我国实际生活中的一个因素。

* * *

1955年3月31日

我不記得，在我們这一派的高級核心會議中，有任何人对共

产国际批評洛尔感到激动。可以說，他一直和我們在一起，但是，他并不是我們当中的人。的确，他在1923年的代表大会上支持我們，但是，他在日常实践中很像一个自由騎士。他在《人民新聞》有他自己的小王国，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天天都自由地闡释自己的思想，而不跟我們商量。

我們当时还以为，共产国际对他的政治性批評，像它的一切其他政治宣言一样，是貨真价实的；我們当时还以为，洛尔应当主动地調整他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同时，还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不是因为莫斯科連忙抓住洛尔的“偏向”的話，我們本来是不会注意，大概也觉察不到这种“偏向”的。我相信，我們当时誰也沒有想到，攻击洛尔的动机实际上是俄国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的宗派考虑。

(三) 安托尼特·科尼可夫

1956年10月16日

馬克斯·伊斯特曼記得，1928年冬天在洛尔的寓所同桑泽夫会晤时，在场的有一位“波斯頓来”的“紅色”妇女社会主义者。她无疑就是安托尼特·科尼可夫医生。她同洛尔一向是友善的。

这位杰出的妇女从1888年以后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她是共产党的先驅党员之一，也是1928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先驅者之一。事实上，她还稍微走在我們前面，因为在她因别的理由被开除出党以后，她就在波斯頓成立了一个小組。这事发生在1928年10月我們被开除之前。这个小組大約就在《战斗者》第一期創刊的时候，出版了一期小报，叫做《第一号通报》，日期是在1928年12月。波斯頓小組后来变成我們的新組織的一部分，安托尼特也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直到1946年7月她在七十

七岁上死去为止。她是我們的全国委员会的一位名誉委员。

1946年7月13日的《战斗者》載有她的詳細传记材料，以及她的《第一号通报》第一版的影印照片。1946年7月27日的《战斗者》刊載了她的女儿伊迪斯·科尼可夫的頗有文采的追悼¹⁹¹詞。她的女儿也是我們組織的一个成员，在1954年去世。

《战斗者》上的传记材料說，安托尼特于1869年出生于俄国，1888年在瑞士参加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成为普列哈諾夫所創立的“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她在1893年移居美国。虽然她本人并不是犹太人，她却学会了講意第緒語，以便在波士頓的犹太工人中間进行工作。她是帮助建立“工人小组”的人士之一。她还参加过社会劳工党，到处发表演說，担任过馬薩諸塞州州委员会委员和其他领导职务。1897年，她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德布斯派。这一派当时和其他集团合并，成立了社会党。

安托尼特毕业于特弗兹学院。作为一个医生，她以計划生育运动創立人之一而聞名。她始終行医为业，但是，她的主要兴趣和活动是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

(四)以色列·阿姆特

1956年12月18日

11月21日的来信收到了，稽迟裁复，深以为歉。我发出上一封信以后，就不再思索遙远的过去了，現在要把思路扭轉回来，的确要花一番力气。在我所特有的思想方法上，也像在一切別的事情上一样，我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一旦我“集中精力”思考某一問題，我就暂时把一切別的事情都从脑海里抹去。当我最后在你的不断督促下轉到回忆的軌道上来的时候，我就把时事从脑海里排除掉，真正开始重新体味过去的日子，一定要做到自

信是在用很高的准确性来叙述往事。

192 美国激进运动正好处于不活跃的状态，因此我能够长期心安理得地回忆过去。我必须感谢你使我转到这个回忆的轨道上来，而且一直留连到最后把我的回忆写在纸上为止。我的两本小册子——关于世界产盟的和关于德布斯的小册子——都是这样集中精力思索遥远的过去的副产物。我相信，这两本小册子对于运动有一定价值，至少它们给了我个人很大的快慰。我必须为此感谢你。

现在，我又到了另一极端。过去几个月波兰和匈牙利的风暴事件已经把旧的记忆重新抹去，我得费很大力气才能重新回到你在 11 月 21 日来信中提出的事实上来。

下面就是我能想起的事情：

阿姆特的角色 我没有出席 1924 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阿姆特不仅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且在这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一直是美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的常驻代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当时的地位要比以前或以后重要。

阿姆特派赴莫斯科是佩帕尔的党内政治手腕的一个典型例证。阿姆特在党内扮演的最大角色是 1921-1922 年担任过左的“笨伯会议”的主要领袖之一。阿姆特(福特)是“福特—杜卜纳提纲”的共同起草人，杜卜纳就是贾基拉。1922 年底共产国际关于党的合法化的决议使这个集团遭到悲惨的打击，以致它所有的领袖的威信也都因此一蹶不振。这时，佩帕尔开始着手来瓦解“笨伯会议”，他一方面诽谤和孤立骨头比较硬的领袖，一方面给另外一些领袖恢复名誉，吸收他们参加他自己的新的私人派别。

佩帕尔所毁掉的最杰出的“笨伯会议”领袖中，有卡特菲尔德和林德格伦。阿姆特和吉特劳被恢复名誉，成为“佩帕尔分子”。华根纳赫特和其他人受到新成立的福斯特—坎农集团的庇护，未被佩帕尔排挤掉。阿姆特出任美国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是他变成佩帕尔的一名助手以后所得到的报酬。

193

在正式的档案中，他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的时期，好像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在那个时期中，他在1922年作为党内一个独立领导人所具有的强大个人影响，已经化为乌有了，他已经成为，而且从此一直不过是别人的一名助手，起先是佩帕尔的助手，后来又是洛夫斯东的助手。

从佩帕尔开始，美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就成了一种脱离正道的丑恶活动。

(五) 庫契尔

1956年12月18日

你在11月21日的来信中还问到“庫契尔”其人。你在研究中发现，他是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位持有不同意见的代表，他还出席过第四次代表大会。庫契尔是他的真名字。我很清楚地记得他。

他是一个很活跃的工会工作者，是独立工会制度和独立工会联合会的有原则的、甚至是狂热的鼓吹者。在福斯特1921年参加党和党在同时转向亲劳联的政策以前，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有一些小的地方工会从劳联中分裂出来，或者被开除出来，或者独立建立起来，它们在庫契尔的领导下集合在一个独立的工会理事会中。他反对党所采取的新的福斯特路线，竭力为他自己的政策斗争，后来还两次到莫斯科去，在共产国际面前为他的立

場辯護。在那里，他失敗了，他的運動最後也瓦解了。從那以後，我就再不知道他的下落。

回想起來，這個插曲最有意義的是，它說明在當時運動中是公平而民主的，承認一個小集團有權保持不同的觀點，不僅在美國黨內如此，而且還可以派代表參加共產國際就有爭執的問題舉行的討論會。

194

(六) 列寧主義的列特人

1959年3月20日

你在談到多曾堡事件時提到羅伯特·澤爾姆斯。這喚起了我對往日的一段愉快的回憶。我同他很熟。他是整個薩柯—范齊蒂案件運動期間國際勞工保衛組織在新英格蘭的專職組織工作者，我同他打過很多交道。他像查爾萊·斯科特和多曾堡一樣，也是一位列特族的全心全意的布爾什維克。當時，我還是一個未經改造的世界產盟活動家，我很喜歡這些人，覺得同他們意氣相投。我想，未來的美國工人運動一定能培養出一種像列寧主義的列特人那樣的人。他們什麼時候都是忠實可靠、說干就干的。美國革命將需要他們，就像俄國革命需要他們一樣。

(七) 梅吉爾筆下的魯登堡

1959年2月6日

我偶然記起曾讀過梅吉爾悼念魯登堡之死的一首詩《查利，安眠吧》。當時，這首詩登在《工人日報》上。我所以還記得這件事，也許是因為這首詩有一種諷刺的成分，在各次追悼儀式中給了我很深印象的緣故。梅吉爾當年還只是《工人》報的一個青年撰稿員，不可能見過魯登堡，除非遠遠地看見過他。然而，梅吉

尔却愉快地称他为“查利”^①，仿佛魯登堡和他是老朋友似的，或者至少魯登堡是一位見面熟，同各色各样的人都混得很亲热。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和魯登堡見面，从来沒有听见任何人，哪怕是他最亲密的战友，叫他查利，或者哪怕叫他查尔斯。在这个严肃的凛然不可侵犯的魯登堡面前，这种过分亲昵的态度是不可想像的。总得严格地叫他“魯登堡同志”，等到你和他相識几年之后，你可以叫他“C.E.”，再不能过份了。他也从来不把我們叫做毕尔，或杰姆，虽然人人人都知道，我們生下来就有这样的名子。梅吉尔的“查利”肯定不是那种大众朋友式的人。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

195

1956年1月27日

在我的头脑里，我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的新斗争，掩盖了从1927年洛夫斯东派的胜利到1928年那次代表大会为止的一段时期。1928年前期的许多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在党的二月全会和五月全会之间，我几乎一直不在党的总部。为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公务，我在1928年二月全会之后，马上就动身到全国各地去绕了一个大圈子，在五月全会前不久才回到纽约。在这次旅行中，我竭力把派别斗争从脑海里排除出去，并没有十分密切地注意党内事态的发展。你提出的问题说明你对当时的事件比我熟悉得多。

* * *

我們在1928年已經知道，共产国际在向左轉，这就在美国

① 查利是查尔斯的昵称。——譯者

党内給反对派創造了更有利的条件。究竟这在当时給了我多大影响,現在回想起来是很难說的。当时,我們大家关心的主要是美国的斗争。直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我才开始真正有了一个国际方向。

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斯大林的一切行动都受到托洛茨基的有力影响。斯大林的做法是在組織上摧毁反对派,然后把它的思想拿过来,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加以实施。是托洛茨基首先看到,在战后的巨大革命高潮减退之后,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正在到来。他在1921年同过左分子的論战中已經表明了这一点。此后不久,共产国际的官方政策看到了新的现实,又过分強調起新的资本主义“稳定”来。这是共产国际向右轉的时期(1924-1928年)。这个时期在美国党内大大帮助了洛夫斯东分子。

196 大約就在共产国际在这一論調上走过头的时候,托洛茨基看到了新稳定中的矛盾和新的革命前景的展开。他反对官方关于英俄委员会和英国总罢工的政策斗争,就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他的《英国向何处去》一書以及他在1926年2月15日发表的关于《欧洲和美洲》的演說(《第四国际》1943年4月号和5月号曾加以轉載),也反映了这一思想。

在1927年12月开除左派反对派的同时,斯大林在俄国和国际范围内开始采用了托洛茨基綱領的很大一部分內容。这就是他和布哈林发生冲突的原因。

* * *

我以前說过,当时我对这一切完全不能理解。当时,我們只是看到了向左轉的迹象。在这个轉变开始的时候,洛夫斯东和沃尔夫正在抛弃他們从魯登堡那里繼承过来的过左行头,而凭

他們自己的政治本能辦事，而他們的政治本能一向明明白白是保守的。共产国际“向左轉”的时候，他們絲毫也沒有防备。

正式的記錄可能給人这样的印象：1928年美国党內的派別冲突主要圍繞着工会問題，福斯特和洛夫斯东站在一边，毕特尔曼一坎农站在一边。文献材料可能証实这种看法，但是，这一看法并不真正正确。当时，福斯特一坎农一毕特尔曼的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他們一致協議对党內的洛夫斯东领导及其一般的保守观点，进行不調和的反抗。工会問題只是斗争的項目之一。

而且，虽然在1928年5月全会上福斯特在这个問題上同洛夫斯东分子比較接近，但是，他却在全面的派別基础上，肯定地和我們站在一起，来反对洛夫斯东的领导。在5月全会前不久，当我回到紐約来的时候，福斯特先来找我，建議我們一起对洛夫斯东分子展开更加积极的斗争。佩帕尔似乎已經在1928年春天奉着特別使命回到国内，要促进洛夫斯东集团和福斯特集团的“团结”。洛夫斯东分子在佩帕尔的鼓动下，力图把福斯特爭取过去，或使他守中立，但是，他却不答应。

在五月全会上，洛夫斯东分子集中攻击我和毕特尔曼，并且竭力表現得同福斯特“团结一致”。我記得我曾經嘲笑他們突然发现了福斯特的优点。我質問道，他們是不是想用亲善来杀死福斯特。我还引用了一句拉丁格言：“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对死者揚善隱恶）。全場都听懂了这句机智的話，福斯特也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洛夫斯东分子想要把福斯特俘虏过去，但是他們的阴谋並沒有得逞。福斯特坚决反对他們控制党，并且拒絕了他們的一切拉攏行为。

* * *

福斯特对待工会問題的方針同洛夫斯东和沃尔夫的方針并

不一样。洛夫斯东和沃尔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像在其他国内问题上一样，是由他们对美国前景的根本保守的看法决定的。他们相信，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它的“维多利亚”时代。他们似乎对此非常高兴。这些人根本不再相信在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里还有革命的可能。

福斯特对工会问题的态度则出于不同的动机。他主张在劳联中“从内部突破”，他是他自己的这种迷信的俘虏。自从1911年他和世界产盟决裂以来，这种迷信就支配着他的思想。他的整个名位似乎都同这种具体策略联系在一起。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自我辩护的需要迫使他抱住这个迷信不放。

在工会问题上，我从来也没有完全同意福斯特的意见。我也是从世界产盟出身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我在那个领域中的工作。我已经开始认识到，世界产盟企图在双重工会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的革命工会是错误的。但是，在我自己的思想中，从来也没有像福斯特那样走到劳联主义的极端。

统一共产党在1920年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反劳联的立场，就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我曾经发言，主张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政策，即一方面在现有的劳联各工会中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劳联所忽视的领域中支持独立的工会。那次代表大会关于“陶逊”发言的报告中所说的“陶逊”，就是指的我。（统一共产党正式机关刊物《共产党人》1920年6月12日第1卷，第1期，第4页）¹⁹⁸

在1923年开始的派别斗争的多事之秋，没有特别理由，也不适于让这种侧重点的不同在党内公开表现出来。但是，早在1925年12月全会上，邓恩和我就在巴塞克罢工运动问题上，同福斯特分子发生分歧。邓恩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支持洛索夫斯基，就是我们的真实思想的自然表现。我们认为

必須在勞聯所忽視或不肯去建立工會的地方建立獨立的工會。這可以看做是我們和福斯特之間的真正分歧；但是，當時我們認為這是側重點的不同，而且，我們在反對洛夫斯東領導及其一般保守觀點上的總的一致，始終掩蓋了我們之間的分歧，甚至在1928年5月全會上也是如此。

* * *

畢特爾曼在這些新事態中扮演的角色是很特殊的。畢特爾曼和我一樣，從來也不是一個“福斯特分子”。他自始至終是莫斯科的人，莫斯科來的路線在他就是法律。他有一個有利條件，就是能讀俄文書報，因此每當莫斯科有新的動向的時候，他總是比別人先了解一步。此外，在黨內，畢特爾曼在猶太分部內一直有他自己的個人的支派。因此，同他打交道的時候，總得把他看做是一個派別的代表，而不能僅僅把他看做是一個人。

在1928年10月我們被開除以後，共產黨最後決定全力執行獨立工會主義政策，並且把工會教育同盟變成一個新的工會中心，改名工會統一同盟。福斯特不得已接受了這一決定，但是，這在他一定是一丸苦藥。事實上，這是拋棄了自從他和世界產盟決裂以來他一直主張的整個方針。

1934年秋天，札克被開除出黨，有一段時期到了我們這一邊。他對我說，前不久他去看過福斯特。他覺得福斯特很不高興，無依無靠，意氣沮喪。札克說，福斯特勸他不要給白勞德任何借口來把他開除出黨。談到這一點時，他告訴札克，他從來也 199不相信工會統一同盟計劃，但是，他覺得他不能不同意，為的是避免被開除出黨。

* * *

我相信，福斯特未能出席1928年冬天的職工國際第四次代

表大会沒有任何特別意义。他当时正为矿工运动忙得不可开交，經常在現場。我不記得在邓恩动身前去参加职工国际这次代表大会之前，我和邓恩有过任何特別討論。关于整个这件事，我的記憶是相当模糊的——或許是因为我当时一直在旅行的緣故。但是，我認為，毫無疑問，主动急剧轉变的是洛索夫斯基，而不是我們。不过，叫我們同意这个轉变是十分容易的。因为在我們看来，事情愈来愈明显，要把沒有組織的工人組織起来，需要更加側重在某些領域中建立独立的工会。

《共产党人》1928年7月号上刊載的我那篇关于工会問題的文章，是在我自己坚持下刊出的。我对这个問題相当激动，急于要闡明我的立場。当时，人們已經認為，在报刊上出現互相冲突的观点有些“不正常”。洛夫斯东分子是反对的，但是，他們大概認為，在那样一个时候，刊出这篇文章比在那样一个問題上同我鬧糾紛要好一些。我不記得我同福斯特討論过这件事。当然，洛夫斯东分子認為，他們叫福斯特出来为官方政策辯护，是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但是，福斯特也在耍他自己的把戏，来为自己的迷信辯护。

* * *

在5月全会上我和福斯特在工会問題上的分歧，並沒有严重妨碍两个派别的联盟关系。和以前一样，它仍然是一种“別碰我”的权宜联盟。我記得，在我們动身到莫斯科去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前，我們两派举行了一次联欢会。总的諒解是，我們在那里要一道干。

根据我的記憶，福斯特分子內部的分歧在5月全会上並沒有表現出来。他們把这种分歧掩盖了一个时期。直到两个反对派集团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联席會議上，斗争才第一

开化,那时候,我們才知道福斯特分子內部有激烈的斗争。在那 200
次內部斗争中,福斯特陷于孤立。

我們那一派有好几个代表出席代表大会——邓恩、坎农、哈沙威、戈麦斯,还有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的一些人。但是,我們并没有站在毕特尔曼—白劳德—約翰斯顿方面进行干預。我們没有插手,而讓福斯特分子自己去拚个你死我活。

* * *

洛夫斯东在 1928 年对洛索夫斯基路綫的反应,主要并不是他对工会政策的任何狂热信念决定的。工会問題不是他的主要兴趣——远远不是这样。他关心的是替党内多数派过去的政策辯护,从而保护它的威信。他关心这一点远远胜于关心他将来必須采取的任何路綫。关心的主要問題是怎样保持党内控制权。

为此,他差不多願意接受莫斯科的任何新指示。我深信,他当时有一种錯覺,以为洛索夫斯基騎虎难下,在布哈林的支持下,他可以在莫斯科斗倒他。挑起这场斗争而且逼得洛夫斯东除了起而应战外別无出路的,是洛索夫斯基。

* * *

在描述我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的感觉和希望时,我的回忆很难不受后来的事件的影响——当我在会议期間讀过托洛茨基的《綱領草案批判》之后,我知道了很多事情,也做了很多事情。

在 1928 年头几个月中,来自莫斯科的新迹象无疑地对反对派^①有利一些了,但是我認為,这种情况給予福斯特分子的鼓舞

^① 文中所說的“反对派”有时是指当时美共党内的反对派,有时是指当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請讀者注意。——譯者

比給予我的鼓舞要大。我們過去已經在莫斯科遇到過很多挫折，因此，我再也沒有那股熱勁，希望下次運氣好一些了。

201 而且，我在《美國托洛茨基主義史》中已經說明過，當時，俄國黨內的事態和反對派被開除的事件把我壓得喘不過氣來。但是，我當時對爭執的問題，了解有限，不知道可以想什麼法子，也沒有要想一些辦法的明確打算。在那種心情下，我根本不想去參加代表大會，要不是因為我那一派朋友堅持，我本來也不會去的。

當時，我並沒有把我內心的想法和懷疑告訴他們，因為我提不出明確的建議。他們的心情和我恰恰相反，對於我們一派的鬥爭在莫斯科得到支持的前景，相當樂觀。我想，這就是他們不叫我退出代表團的原因。

洛夫斯東在莫斯科碰到的麻煩

1955年5月31日

我還記得你提到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美洲局的那次會議。在我的記憶中，這次會議的精彩節目就是，洛夫斯東和其他人特別冒失地攻擊洛索夫斯基。洛夫斯東提到洛索夫斯基曾在1917年反對列寧的政策，並且說：“在我們黨內還沒有人反對過列寧”等等。據我所知，一位美國代表竟敢攻擊任何俄國領袖，這還是第一次。

洛夫斯東領導集團由於它的工會政策而受到猛烈批評。洛夫斯東和其他人對洛索夫斯基的凶惡攻擊毋寧說是絕望的防守戰。

在六大以後，共產黨在工會問題上急劇轉變，直接採取了建

立同劳联相抗衡的工会的政策，这就进一步证明洛索夫斯基的观点胜利了。这事发生在我們被开除以后不久，而我們是反对独立工会原則的。

的确，洛夫斯东 1928 年在莫斯科也占到一点点上风，但它决不是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洛索夫斯基的攻击是毫无顧忌的，不得到斯大林的許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現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这样推测：斯大林故意“放出”洛索夫斯基痛斥洛夫斯东集团，²⁰² 以此鼓励福斯特集团，然后又在个别的談話中把打击緩和下来，以便推迟和洛夫斯东的摊牌。当时，他正准备同布哈林决裂，但还没有准备好，不能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使这一决裂公开化。

不久以后，福斯特就被召去秘密会見斯大林。他把会見情况告訴了我，后来又向反对派各集团的联席會議作了报告。福斯特的这份报告后来印成一个派別文件，在党内传閱，迫使斯大林不得不笨拙地加以否認。我清楚地記得福斯特报告的要点：斯大林告訴福斯特，他不相信洛夫斯东集团；他講得很明白，“洛夫斯东集团干不出好事来”。

这无疑地鼓励了福斯特分子在六大以后重新展开派別斗争。几个月以后，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团就出来公开地反对洛夫斯东多数派。福斯特分子当然就更加相信他們会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了。以后，洛夫斯东就被調到莫斯科去，在那里担負工作。他的灾难是布哈林倒台的喜剧性副产物之一。

斯大林的迂迴的阴謀

1955 年 7 月 6 日

这封信是回答你 6 月 29 日的来信的……

魯登堡逝世以后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連串的決議中，先是禁止 1927 年 5 月全会上的多数派——福斯特—伟恩斯东—坎农——运用自己的权利选举一个人繼魯登堡之后担任总書記；后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以后，它又把洛夫斯东派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宠爱的一个派別，摆在全体黨員面前，并用自己的決議帮助洛夫斯东派在党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洛夫斯东使大多数黨員相信，他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的。这就是他所以能在代表大会以前的竞爭中爭取到大多数代表的主要原因。

203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共产国际 1927 年的決議中以三十五票对十七票通过的明文規定（关于新中央委员会組成成分的規定），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专门用来对付福斯特—伟恩斯东—坎农少数派的，甚至不能說主要是用来对付他們的。这一点对于解释这一規定，十分重要。这一規定的意图当然是要保証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他們假定这一派就是洛夫斯东派，但是沒有明白說出来——能够在新的执行委员会中成为一个安全的可以进行工作的多数派。但是，他們的主要目的却是要保証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拥有足够的代表权，使这一少数派的领导人可以自由地进行活动，并且保护这一少数派，使他們不致为多数派消灭。你所引証的所謂禁止“对反对派采取任何紀律措施”等字眼，也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

要理解 1925-1928 年間莫斯科对美国問題的政策，这一点极为重要。我在当时还不能看透共产国际这种迂迴的阴謀。現在回想起来，我看得更清楚了。当时，俄国人的政策并不是专门依靠一个派別，消灭其他派別，而是对一个派別加以垂青，把其他派別留作后备，以防万一。

毫無疑問，當時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是偏愛洛夫斯東集團的，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來幫助他們。那個時代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聯盟的時代，布哈林大概還能夠對共產國際的事務有一定程度的獨立影響。洛夫斯東從這個過渡局面中占了便宜。

到 1929 年，斯大林才完全控制了共產國際，像以前消滅季諾維也夫一樣消滅了布哈林。到那時，他才採取了保證一個派別壟斷黨的領導並消滅其他派別的政策。但是，到這時候，這個派別已經不是原來擁有或多或少獨立的領袖的那些本國集團中的任何一個集團了，而是由各集團的部分人員拼湊起來的綜合的新集團，這個集團只效忠於斯大林，而不效忠於任何一個美國領袖。

在 1927 年，莫斯科還沒有準備好這樣大刀闊斧地解決美國問題。我想，從這個觀點來解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1927 年的決議，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幫助洛夫斯東取得多數，但並不許他消滅反對派。他們給他加上一個強有力的少數派的負擔。這個少數派在中央委員會中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權，在黨的工作中可以自由活動。我相信，如果我們只看到 1927 年的決議支持洛夫斯東多數派，而看不到保護少數派的規定，那我們就誤解了這個決議。

我們可以看見，1928 年的決議也是屬於同一種格式的。洛夫斯東多數派在官方的決議中仍然備受偏愛，但是，另一方面，斯大林卻把福斯特召去密談，並告訴他說，他不相信洛夫斯東集團。“洛夫斯東集團干不出好事來”——這就是福斯特在莫斯科六大時轉告我的一字不差的原話。我絕對相信，這一次，福斯特沒有說謊。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1956年1月1日

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1928年），除了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写的材料外，我再也没有多少可以补充的了。那本书中关于整个代表大会的材料是太少了，原因我已经在那里解释过。实际情况很简单，在我们到达莫斯科以后的头一个时期中，我像所有其他美国代表一样，关心美国问题上的斗争远远胜于关心大会的一般工作。后来，在我搞到一本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批判》以后，我的兴趣和注意力就集中到了那上面，集中到了我回国以后怎样办的问题上。

205 加拿大党的一位高级领袖莫里斯·斯佩克特也同时看到那本书，他的反应也和我一样。从此以后，我们就对正式的会议失去兴趣。我们约定要为托洛茨基的事业奋斗，但是，我们知道，在莫斯科开始我们的斗争是无益的，从策略上来说也是不智的。我们连续不断地举行了我们自己的“代表大会”，讨论托洛茨基的伟大文件及其意义。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说过：“让干部内议和大会会议去见鬼吧，我们要研究这个文件。”

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成了一个蹩脚的报告者，担上了片面性的罪名。但是，片面性有时对一个政治工作者也是有用的。这一次无疑就是如此；托洛茨基对纲领草案的批判所代表的“一面”，比代表大会所有其他内容的总和还要重要得多。

* * *

我对那个时期的回忆只得由我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一书来保存下来。十四年前我写那本书的时候，一切事情在我脑

海里还比較新鮮。現在我再也想不出有什么重要事情可以作为补充了。這本書有一个奇特的历史。像我差不多所有的作品一样，它多少是偶然产生的，是在运动的其他工作中附带产生的，事先根本没有计划写它。1942年冬天，負責紐約党校的同志們要我作几次关于党史的講演，以填充他們講座時間表上的几个空白日期。我想这好办，就輕率地答应下来，心里本来只是想就主要的問題講几件往事。

后来，当我坐下来写第一篇演講提綱时，我忽然想到，我應該說明一下我們的运动是怎样从共产党內产生出来的。但是，要講在共产党內的这段历史，就需要提供一些說明性的背景。我还没有充分認識到自己在干一件什么样的工作，就重新开始写了一些关于早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提綱。我在有关这段时期的提綱中愈陷愈深，以致作了三次演講，才講完共产党內的这段历史，然后才有可能开始講我們被开除以后的独立活动。

听众的兴趣鼓舞我繼續講下去，一共作了十二次演講。演講时，并没有預先写好講稿，而是按照提綱随口講的，提綱通常也是在当天写成的。我只参考了《战斗者》合訂本，为的是把各个事件按适当次序排好。其余的都是凭記憶即席講出。

206

講演稿最后的发表，也不是我事先計劃好的。我当时的秘書西尔維雅·卡德威尔，自己主动地把講演速記下来，然后誊在她的筆記本上。我們偶尔也談到了什么时候发表这些講演稿，但是我一点也不在意，讓打字稿在箱子里又躺了一年半。要不是又发生一件我无法控制的事件，这堆原稿大概还躺在那里呢。

1941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审讯中，我們被定了罪。后来我們提出了上訴。1943年11月，我們得到通知：我們的上訴已被最高法院駁回，我們得准备在一个月左右以后进沙石監獄去。

由于時間緊迫，我就倉促地改正了打字稿上的幾處文法錯誤，在時限快到的時候，交給了前鋒出版公司。這部偶然的書終於在第二年春天出版了。它有沒有價值要由別人來評判。我只確確實實知道它是完全真實的。

* * *

關於我對斯大林在六大時期的政策的評論，我必須附帶聲明一下：當時俄國黨和共產國際內部的情況，我現在知道的要比當時多一些。因此，我必須提防不要讓我後來找到的解釋影響我對各種事件的回憶。

可以肯定地說，當時，我們美國反對派的人都知道俄國黨內正在進行着秘而不宣的反右翼的鬥爭；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這對我們會有某種好處。我想，我們當時並沒認識到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間的裂痕有多麼深。因為當時布哈林還被推舉為大會的領袖，負責作主要政治報告，這些都使我們看不清裂痕的深度。

207 關於俄國黨內實際發生了什麼情況，有很多猜測，但是究竟怎樣，似乎誰也不知道。我個人從哈沙威口中得到不少消息。哈沙威是我們一派的一個成員，在莫斯科的列寧學校剛剛完成了三年的學習。像這個命名錯誤的學校里的一切其他學生一樣，哈沙威受過訓練，能夠嗅出俄國黨內的動向。他是一個受到充分思想灌輸的斯大林主義者。他像鸚鵡學舌似地重復了官方的論調，攻擊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他認為是俄國黨內的右翼分子的一些其他人，但是我記不清他是不是肯定地講過布哈林也是右翼分子。

斯大林顯然想利用這個代表大會，來最後掃蕩左派反對派，然後再對布哈林展開公開的鬥爭。美國反對派干得很狡猾，他們避免在俄國黨的內部事務上陷入騎虎難下的境地。他們譴責

洛夫斯东分子是共产国际内部右翼倾向的代表，但是又没有明白指出誰是这个右翼的俄国領袖。我不記得毕特尔曼或美国反对派的任何其他成員公开攻击过布哈林，我相当有把握記得这种事情沒有发生过。

* * *

我們听說有人在元老會議中提出了关于俄国党内部斗争的謠传問題，但是，据我記憶所及，並沒有任何消息說洛夫斯东当时提出过这个問題。（元老會議是一个顧問机构，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組成。我想，其中也包括一些别的特別著名的代表。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福斯特也是元老會議的一員。）

我到現在还記得的一件事情是，据說，斯大林在元老會議的一次特別會議上否認俄国领导机关中有任何冲突，这就使想要提出这个問題的大会代表有所顧忌。

代表大会上时时刻刻都流传着关于俄国党内分歧的各种各样謠言；但是，我沒有听說有任何可以看做是“走廊大会”的有組織的或者半有組織的运动。我倒認為，这个說法是洛夫斯东分子被开除以后捏造出来的。当时，他們已經什么也不怕了。当然，我个人的証詞并不一定准确无誤。按照我当时在莫斯科的

208

地位，如果有这种秘密团体的話，也不会請我参加。但是，福斯特倒是够資格的；我从来沒有听福斯特說过他和任何“走廊大会”有关系。如果他有这种联系的話，看来差不多可以肯定，他会講出来的。他講过比这更机密的消息，那就是他应斯大林的邀請同他亲自会面。在見面的时候，正如我在另一封信里所說的那樣，斯大林告訴他，他不相信洛夫斯东。

* * *

据我所知，斯大林的迂迴曲折的政治操縱手法絕對是举世

无双的。沒有任何判断标准可以用来估計他在某个时候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托洛茨基有一次在談到俄国党内左派反对派早期的斗争时(或許是在他的自传里)說过,党的干部对多数派这一或那一行动的意思,总是莫名其妙。他們得“猜測”这一行动是什么意思,然后来适应。干部的选拔和提升就是以他們在派別斗争的每一发展阶段上猜測的准确程度为根据的。那些猜錯了或者根本不去猜的人都被抛弃了。这种猜謎的把戏在斯大林准备抛弃布哈林的时期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認为,在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真实情况怎样,或者已經有了什么計劃。人人都在猜。十分显然,洛夫斯东分子猜錯了。

这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推論,如果洛夫斯东和沃尔夫事先已經知道所謂“走廊大会”,并且已知道斯大林站在它背后,那末,布哈林就已經是一个显然要失败的派別的代表了,他們还会抱住他不放嗎?我怀疑他們会这样做,或者不如說,我肯定地說他們不会这样做。

洛夫斯东和沃尔夫关心的主要問題不是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政策的方向,而是他們自己在美国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利益。第二年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摊牌的时候,他們就建議开除布哈林,企图向斯大林討好,这是一个很能說明問題的姿态。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他們未能同布哈林断絕关系,的确不应看做是他們对布哈林的事业抱有堂吉訶德式忠誠的一个标志。这只是猜得不准而已。

* * *

吉特劳在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次調查会中提出了洛夫斯东拍給他在美国的宗派支持者的一封信,电报上提到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間的一次會議。我在以前(1955年5月31日的信中)

已經說過，我記得有这么一次會議。我記得，它是美洲局的一次會議，而不是美國代表團和俄國代表團的聯席會議。不管是什麼會議也好，我確實不記得斯大林曾出席講過話。我把這件事忘掉是不大可能的，因為斯大林親自出席這樣的集會是希罕的事，很容易記住。我所以還記得這次會議，是因為洛夫斯東採取空前未有的行動，對洛索夫斯基進行粗暴的憤怒的攻擊，並且說：“在我們黨內還從來沒有人反對過列寧”——，這顯然是指洛索夫斯基在(1917年)10月同列寧的分歧。

也有可能，洛夫斯東派同斯大林和布哈林舉行了秘密會議，而斯大林在這樣一個會議上給了他們若干印象，使他們認為他們可以指望他的支持。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是斯大林想要叫布哈林放鬆警惕以便將來切斷他的喉嚨的迂迴行動的一部分。但是，這當然只是猜測。當時，人人都鬧不清是怎么回事。現在可以清楚知道的是，在第六次代表大會時，斯大林正準備向布哈林開火，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把他在共產國際中的支持者搞掉，但是，當時他還沒有準備好宣布他的整個計劃。

* * *

反對派的綱領《美國黨內的右傾危險》是反對派聯盟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向美洲局提出的。簽名的人有約翰斯頓、戈麥斯、鄧恩、坎農、福斯特、畢特爾曼和西斯金德。這些人顯然都是正式任命的代表。(還有一些別的反對派分子，如白勞德、哈沙威等也出席了代表大會，但他們顯然不是正式代表)。文件是用整個反對派代表團的名義提出的。據我所知，沒有持不同意見的 210 人。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是畢特爾曼。簽名的次序沒有什麼意義。

我不記得美國反對派分子曾經以大會提綱第49節沒有充

分強調“美帝国主义面临的日益增长的矛盾等等”为理由，对这一节提出抗議。无论如何，这不能認為是一次严重冲突，而只能認為是企图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为的是把美国革命納入更加明确地符合共产国际新方向的軌道，并帮助反对派在美国党内进行斗争。在共产国际内部的这些派别斗争中，每一派别在提出要求时，通常都是比它預計可以得到的东西要多一些，希望經過折衷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 * *

在我們提出反对派关于“右傾危險”的綱領的时候，在反对派联盟里的一切情况仍然多多少少是正常的。絲毫沒有迹象說明福斯特分子反对我参加，因为这个联盟若不团結起来，便沒有希望在党内爭得多数。他們反对我的地方倒是，在美洲局面前，我在斗争中不够活跃，不够积极。在我讀了托洛茨基的《綱領草案批判》以后，他們对我的实际表現就更加不滿了。这时，我已經开始对派别斗争慢慢不感兴趣了，到后来就完全不感兴趣了。別的人也可能知道或者猜到了其中的原因，但是，我可以有把握地說，他們認為我决不会做任何愚蠢的不切实际的事情。只要他們还没有受到某种公开的行动的損害，他們是不关心任何人的秘密的内心活动的。

我对莫斯科的派别斗争以及它可能造成的結果，愈来愈漠不关心，“坎农集团”的代表們对此特別不滿；他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肯定要因为我不参加斗争而受到不利的影響。他們开始施加压力，劝誘我改变这种态度，認真参加斗争。由于福斯特已被他自己以前的支持者抛弃，反对派联盟的领导机构中出現了某种真空，他們覺得我远远比福斯特集团的任何其他成員更有資格来填充这个真空。这种看法，照当时的情况來說，也不是沒有

211

某种道理的。这一切就引起了一桩或许值得一谈的事件，因为正是这一事件迫使我作出了后来产生了深远后果的决定。

在莫斯科召开了我們一派的所有成员和同情者的会议。参加的总共有十二人，包括我們出席大会的代表，列宁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别的人。斯佩克特也出席了。在这次会议上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我不再犹犹豫豫而全力投入派别斗争的话，他们愿意在洛夫斯东领导被推翻的时候，支持我作党内中心领导职务的当然候选人，一直支持到底。

我在会议上没有作明确的答复。斯佩克特和我举行了我們自己的秘密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有两三天之久。我們完全从怎样才能最好地为托洛茨基的事业服务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时，我們已完全献身于这个事业。这个建议有它吸引人的地方。首先，虽然我們没有别人那么乐观，我們也认识到，这次会议中所说的目标并不是不现实的。如果说共产国际向左转的迹象已经充分展露出来，那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反对派在党内争得多数的可能会不断增加。

第二，在福斯特已经被他自己先前的支持者所不信任和抛弃的情况下，我远远比毕特尔曼或福斯特派的任何其他人更有权利要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担任反对派的中心领袖，最后担任全党的中心领袖。毕特尔曼有很多不利条件，他自己也很清楚。他显然是一个党务工作者，不是一个群众领袖和演说家，不适于做公众的领袖。白劳德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是没有地位的，当时对他连考虑也没有考虑。福斯特集团的其他人，资格就更差了。

我們这样推理：如果我能在党的正式机构中取得中心职务，在决定性的公开决裂的时机到来时，我将能够促使更多的人支

212 持国际左派反对派。但是有一种可能足以破坏全盘计划，那就是，为了执行这个策略，我就必须适应共产国际官方的路线，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甚至得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热心，以弥补以前的不足。事实上，我就得使全党支持斯大林主义的纲领。

要是那样的话，我能在将来某一个不能确定的时候，宣布我自己的秘密纲领，克服我帮助散播的错误教育的后果吗？难道不是连我自己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退化变质，以致不能在将来某一个时候脱身吗？

我必须坦白地说，斯佩克特和我在决定拒绝这个建议以前，非常严肃地秘密讨论了这个建议。只是在从各方面透彻地考虑了这个策略以后，我们才最后决定拒绝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坦率地宣布托洛茨基的纲领，并且在那个基础上开始教育新的干部，从长远来说，那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事业更好，即使这肯定意味着我们自己在新的斗争的一开始就被开除，从而陷于实质上的孤立状态也罢。

我们的运动自1928年以来，就一贯是学习托洛茨基主义的有原则的政治的学校。对于在这个学校中成长和受教育的人来说，选择何去何从，是毫无困难的。我们当时所作的决定，似乎是一个可以很容易作出的决定，可以马上作出的决定。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却不容易。自从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的政治已经成为一个阴谋诡计的学校。我们自己也受到它的影响。托洛茨基关于纲领草案的文件是一项伟大的启示，它告诉了我们原则的政治的意义，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新的启示。我们深深受到它的影响，然而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理解它的全部意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迟疑不定，花了一两天时间来反

复考虑这样的可能性：是不是要采取一个自己騙自己的策略。这个策略很可能会严重損害我国真正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还不只我国的真正共产主义事业而已，因为各处被开除和被誹謗的共产主义旗帜的保卫者們当时都处在他們最黑暗的时刻。他們希望听见一个美国的声音出来支持他們。我們在1928年—— 213
当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处于与世隔絕状态的时候——公开打起托洛茨基的旗帜的示威性行动，大大鼓舞了全世界国际左派反对派的被粉碎的力量。

* * *

福斯特分子从来沒有向我們談过他們自己的家务事。因此，两个集团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联席會議上发生这场大爆炸，我們都感到有些意外。从他們的激动情緒来看，这场反对福斯特的叛变一定已經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它不可能是仅仅由工会策略上的分歧引起的；情况更可能是这样：爆炸是由許多日积月累的不滿造成的，工会爭端只是爆炸的导火綫，因为在工会爭端上，毕特爾曼和白劳德可能觉得自己站在洛索夫斯基一边，因而有了勇气。

在我同福斯特搞熟以后，我特別注意到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和态度。他对待他所需要的人，如毕特爾曼和我，总是非常小心，有时甚至有点尊敬。他对待需要他的人，如白劳德和約翰斯頓，就很粗暴和专制。他們一定对他有了很多不滿。

我記得，在討論期間发生过一次相当有声有色的事件。福斯特声势汹汹地站在約翰斯頓旁边，握紧拳头，用他那老一套的恫吓办法，咆哮地說：“你真是太胆大了。”約翰斯頓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回答說：“你作践了我好多年，我再不讓你作践我了。”約

翰斯頓和白勞德在这次會議上使人覺得就好像是冲出長期監禁的牢獄拚命向外跑的人。

畢特爾曼的行為是我比較難以理解的。當我們在一個集團裏的時候，私人關係方面的一切情況我都是了解的，福斯特就從來沒有敢恫吓過畢特爾曼。然而，在这次會議上，畢特爾曼那種語調和措詞就好像他同福斯特有什麼深仇大恨要在這一次報仇雪耻似的。他對福斯特的攻擊是絕對無情的，甚至對他提出的辯白表示輕蔑。

* * *

214 值得注意的是，在會上沒有人給福斯特辯護。整個這一派都起來反抗他，畢特爾曼帶頭，白勞德和約翰斯頓緊跟在後面。在整個事情中好笑的地方是，這場鬥爭差不多達到通常會使當事人的私人關係和政治關係完全破裂的那種空前激烈的程度，但是居然誰都不考慮這種後果。

起來反抗的福斯特分子仍然要依靠福斯特的名聲和威望，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當時，沒有他，他們就沒有希望在黨內扮演重要角色。福斯特呢，他也沒有別的出路，只能成為洛夫斯東分子的俘虜，而這是他所絕對不干的。因此，一場風波驀然而起，倏然而去，不過還是在同一個茶杯中翻騰了好一陣子。我們“坎農分子”站在一邊，讓福斯特分子自己去拚個你死我活。從私人觀點來說，我對歇斯底里地起來反抗的奴隸們，有一點同情。但是，從政治觀點來說，我覺得，鼓動一次分裂，把陣容調整一下，撇開福斯特而在我們這一派和福斯特分子之間建立聯盟，這是非常愚蠢的。

福斯特的名聲和威望，他作為一個群眾工作者的頑強的毅力和卓越的能力，始終是福斯特集團的主要本錢，就是當他在这

个集团内部遭到失败和陷于孤立的时候，情况也还是这样。不久以后，事实就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斯大林想要向美国反对派传达一个指示——不只是暗示将来给予支持——的时候，他就派人把福斯特找去，亲自向他传达。

很可能，白劳德和約翰斯頓有一种錯覺，以为他們离开了福斯特也能过下去，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沒有发生似的。他們俩人都以在政治上不现实和不懂事聞名，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不能够想像毕特尔曼也有这种錯覺。他对于党内的各种力量和他自己的缺陷，一向有十分现实的估計。他知道，他必須和那些具有他所缺乏的才能的人联合起来，他总是依靠他可以在其中折冲的各种联盟。原来的福斯特—毕特尔曼—坎农集团就使得他在党内扮演了一个他自己一个人决計扮演不了的角色。在这个联盟有三分之一分裂出去的时候，他的地位已經有所下降。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他和福斯特公开决裂，他的地位还会下降。 215

根据我的了解，毕特尔曼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比大多数人都善于控制自己的个人感情——这种品質，我是很欽佩的；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那样猛烈地攻击福斯特，以致有引起不可弥补的分裂的危險。至于他是不是想爭夺党内的領袖职务，照我看来，这种假設必須排除在外。

* * *

在我的回忆中，福斯特分子这场家庭爭吵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声。但是，我很快就把它忘記了，因为我正忙于研究一个大得多的問題：托洛茨基的《綱領草案批判》以及它对我自己今后的道路的意义。

在那次會議以后，福斯特在私人談話中曾經向毕尔·邓恩和

关于批評者和批評

1959年4月6日

你3月31日的来信和本期《政治月刊》已經收到了。到現在为止,我只是把奥克利·約翰遜的文章翻了一下,注意到它对你第一本書的十分恶毒而虛伪的——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的——批評。我还没有时间和兴趣加以詳細研究。我已經养成一种机械性的习惯:把所有这类材料另外捆成一束,放在一边,等到我有了时间和心情来干这种艰苦的讨厌的零活的时候,再把这些材料拿来一次看完。密切注意斯大林主义的出版物,在我为什么成了这样苛重的任务呢?是因为偏見嗎?还是仅仅因为我过于苛求地喜欢风格相当清晰的誠实写作呢?

我的經驗和我在逐渐变成一个坚强的政治家的过程中所养成的一种习惯,可能也值得你,一个作家,来考虑。我最后已經学会即使不是高高兴兴地,也是全神貫注地听取一切批評,并且仔細地研究它——看看我是不是留下任何暴露的目标,可以在下一次加以掩蔽。

批評我的人,包括愚蠢地搞錯了的人和蓄意歪曲我的人,从来也不知道我是多么全神貫注地听取他們的批評,又从中得到多少好处——我的柔嫩的敏感的皮肤終于磨出了老茧,厚实到足以抵抗一切攻击,从針刺直到匕首的投刺。

你也不妨抱着这种哲学来研究約翰遜的文章。

“第三时期”

1959年3月20日

“第三时期”是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的，这是給一个完整的时代取的总名称。在这个时代，他們在俄国和国际范围内展开了疯狂的极端激进的活动，历时五年之久。一切工作都是在“第三时期”的标志下进行的。这几个字变成了解释一切和說明它所做的一切的口号。他們甚至还宣传一种“第三时期舞蹈”。（我没有夸大其詞，确是实情。）²¹⁷

* * *

斯大林的向左轉(1928-1933年)不单单是他对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进行派別斗争的手段。他还穷凶极恶地利用它来战胜左派反对派。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加迫不得已的动机：这个轉变决不仅仅是斯大林在派別斗争中任意作出的一个决定。

像他后来的許多轉变一样，这是他所遭遇的、他以前的政策所促成的环境逼迫他作出的决定。在对左派反对派作斗争期間，富农在以前的右翼政策下发了財，到1928年，已經变得十分大胆，竟然抗售粮食，威胁到城市面包供应，如果不加遏制的話，就会使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执行成为不可能。

这时，发起反攻，击破富农力量，已經成为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存亡問題了。左派反对派以前所主张的比較稳健的政策——对富农征收重稅，以便取得資金，促进工业化計劃——这时被斯大林主义者拿过来，以不顧一切的狂热，雷厉风行地予以执行。

在这个混乱局面中，不能不击破想要抵抗这次转变或至少想使之缓和的布哈林等人。托洛茨基对于这个时期逼得斯大林向左转的这些基本原因，作过详细的说明。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托洛茨基把引起这次转变的情况叫做“沒有武装的富农叛乱”，这种叛乱使得斯大林主义政权一时猝不及防，因而惊慌失措。

我記得，在三十年代初期，托洛茨基就写过一篇文章，对这种不顧各国条件到处一律实施的极端激进的政策，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托洛茨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的錯誤》。你已經指出，“第三时期”的最高潮是1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的惨祸。以后不久，就开始向右转，轉向人民陣綫政策了。

福斯特的最后掙扎

1958年1月22日

福斯特在晚年的发展完全符合于我在前几封信中对他的估計。福斯特正在为維護自己的名誉，保全自己的威信、自己的历史地位，而进行最后掙扎。他也明白，很久以来，这完全要决定于历史对斯大林主义的判断。

但是，就斯大林主义这个詞的真正意义來說，福斯特并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莫希干人”，更不是一个“波旁分子”^①。福斯特是一个福斯特分子——名誉的崇拜者。他在迎合斯大林主义力量时，也还像他以前迎合費茲帕特里克，甚至迎合龔柏斯时一样，以为这样做对他自己的目的和他自己的发迹有利。

^① “斯大林主义的莫希干人”犹言对斯大林主义忠实到底的人，“波旁分子”犹言保皇党。——譯者

重大的不同是，在他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迎合龔柏斯时，他遇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要发生的困难——龔柏斯坚持要利用他的迎合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福斯特可以通过迎合莫斯科——最后就是迎合斯大林主义——在劳工运动里找到另外一个活动场所。但是，在这以后，他就再沒有第三条路可走了。

福斯特和斯大林主义結了不解之緣。他如果回到龔柏斯和費茲帕特里克那里，他就再沒有提高自己的名声和威望的必要余地了。他也不能走到美国資本主义那边去；他的形象，他的名声，甚至他整个生命都已經同工人阶级运动不能改变地联系在一起了。

当然，他本来还可以考虑另外一条道路：同斯大林主义决裂，着手从头建立一个新的革命运动。但是，要这样做，他就必須牺牲他的声望，他的威信，他的地位和某种权威——或者说权威的影子。这样做是不符合福斯特的本性的。因此，在他脚下的最后几块沙地陷落下去的时候，他仍然死抱住一种幻想，竟以为在他妄图和历史斗智的时候，他是在以某种方式創造历史。

福斯特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

219

1958年1月31日

我認为，如果我們想要彻底探究美国斯大林主义的現象，一件頗为重要的事，就是要認識到福斯特和那些在共产党已經完全斯大林主义化以后才参加共产党、从来沒有进过任何别的学校的青年一代理想主义者之間的差別。福斯特在1921年参加共产党时，已經四十多岁了。他的性格，他的一般观念和他的野心都是在以前的运动中形成的。毫無疑問，他向俄国人学习了

一点东西,改变了一点。他的主要战略是投靠这支新的力量,以便实现他原来的野心,那就是改变美国工会运动的局面,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成名发迹。然而,历史无情,造化弄人,他本来想要利用斯大林主义力量,结果却是斯大林主义力量利用了他,把他利用得无所不至,直至临终之际还在利用他。骗人者反被人骗,有谁替他惋惜呢?我是不替他惋惜的。

* * *

你说:“说他是一个假斯大林主义者,比说他是一个真斯大林主义者,要好些。”你这番话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设法对那些在三十年代初期参加共产党、真心以为他们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青年人,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至少是比较容易了。我刚刚读了盖茨在《纽约邮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不自觉地深刻地描绘出这一代被欺骗、被出卖的青年理想主义者的面貌。他们的故事还没有人写,但是,我想,一个观察深刻的艺术家才能把这个题目做好。在他们的希望和失败中,比在别有用心地接受斯大林主义的福斯特的生涯中,有更深刻的悲剧。

斯佩克特的作用

1958年1月22日

在你和斯佩克特会面以后,你就能把我以前向你提供的材料的漏洞弥补起来。根据我的回忆,斯佩克特关于他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发展中的作用的叙述,在每一点上都是符合事实的。

关于你12月25日的来信,谨就下面标号的各节,简述如

下：

(一)我的确听说过，早在1925年，斯佩克特就不愿意谴责托洛茨基。因此，他同情托洛茨基，或者至少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示怀疑的公开表现，要比我早三年。但是，在1928年初我在纽约同他谈话以前，我和他没有联系，也不知道他的思想发展情况如何。

(二)我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前，于1928年在纽约同斯佩克特会面，会面情况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确信，那是在2月间，在他以加拿大党兄弟代表身份来参加当时的美国党全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度过整整一个晚上，坦率地讨论了我们对俄国事态的怀疑和不满。但是我们当时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也没有制订做任何事情的计划或决定。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在1928年2月的这次会面中所互相倾吐的思想，为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莫斯科的接近，铺平了道路。

事实上，早先在纽约同斯佩克特的会面，在我的脑海中，始终记忆犹新，我也曾多次提到它，所以，在我接到你的来信时，我竟以为我在先前给你的某一封信里已经作了充分报道。但是，我把从乡下回来以后所写的信件检查了一下，发现我仅仅简短地提到这件事（在1956年2月3日）。我认为，你同斯佩克特会面，查明了有关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起源的这一重要细节，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也有助于历史的准确性。我很高兴你给我一个机会来弥补我的疏忽，证实斯佩克特的报告。看来，他的回忆和我的回忆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在纽约会面的时间，但是，会面本身则是没有疑问的。

(三)斯佩克特关于我们在莫斯科合作的报告，同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和写给你的那一封信或几封信中所报告的

情况，是一致的。我不記得斯佩克特也从俄国带出一份托洛茨基的綱領批判，但是，我願意相信他自己的說法，而不加怀疑。

(四)在我参加了六大回到国内以后，我把托洛茨基的綱領批判拿給沙赫特曼和阿勃恩看，并且把我的态度告訴他們。我不記得他們曾經“深为震惊”。托洛茨基的文件本身似乎就足以使他們相信这个文件是正确的。我告訴他們，我要在一切情況下維護托洛茨基，这大概也有助于他們下定决心，馬上跟我一起干起来。据我記憶所及，經過很短一个时候，不到两三天，我們就达成了一项实心实意的協議，一道开始斗争。

* * *

我可以想像，你要把1922-1945年的整个历史压缩到一卷書中，是有困难的。在我看来，这里至少有三大段历史：二十年代的派別斗争，这一时期到洛夫斯东分子在1929年被开除时結束；其次是极端过左的“第三时期”，到1933年底結束；再其次是向“人民陣綫”的大转变。当时，白劳德駕上像蘑菇一样的云朵，真以为他快要控制外层空間了。人們几乎可以說，三个不同的党代表了这三个发展阶段。好啦，这是你的事儿了，除了同情以外，我沒法帮忙了。

我們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罪而受审

1956年2月3日

1928年10月，我們在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會議上，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罪而受审。在某种意义上說来，这是我們十三年后在明尼阿波利斯根据“史密斯法”受审的一次預演。在两次审讯中，所謂的罪行和起訴方法都是一模

一样的。在两次审讯中，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都不是说我们有公开的行为，而是说我们“阴谋鼓吹”某些犯禁的思想。

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一书（第 240 页）中叙述过我们在 1928 年受审的情况：

“直到长期的审讯结束时，我们才宣读了我们的宣言，结束了一切暧昧不明的局面。在这以前，他们一直企图用他们所能得到的各种‘旁证’来证明我们犯有‘托洛茨基主义’罪。（我已经解释过，为了策略原因，我们一直没有承认我们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派别）。他们找来了很多证人，就像我们不久以前在明尼阿波利斯受审时的检察官一样，提出确证和旁证，来证明我们的罪名。不时会有一个坐探跑进来，他听见了这个，另一个密探又跑进来，他听见了那个。主要的证人则是共产党书店的经理。他说，他可以发誓，沙赫特曼是一个托派。为什么呢？他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总是到书店里来找中国问题的书籍，我知道中国问题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这个卑鄙的告密者还没有什么大错。中国问题像一切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一样，的确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

我们一直拖延着时间，我们用了很多时间盘问这个证人和别的证人。洛夫斯东分子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似乎也愿意让这场审讯没完没了地拖下去。他们想害福斯特分子，把他们说成是我们的同谋犯。福斯特分子对这一点特别不安，急于要结束审讯。

我记得在最后一天发生了两个小事件：福斯特理直气壮地、223
愤怒地说：“事情已经万分清楚了，党内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派，它的三个领袖就坐在这里。”这时候，怙恶不悛的最无耻的宗派活动家斯塔彻突然良心发现——也许他早已把良心吞掉了，也

說不定——十分庄严地說：“这些同志参加运动已經很久了，我們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須十分慎重。”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們决定摊牌。我站起来宣讀了我們效忠于俄国反对派的声明。这个声明就登在《战斗者》第1卷第1期第1頁上。几分鐘以后，我們就被开除而离开了那里。“陪审員”在陪审席上动也沒有动。

* * *

回答你的問題：

我对福斯特、毕特尔曼和其他福斯特分子在这个时期的行为，并不感到惊异或失望。到那个时候，像共产国际所属各党的一切其他干部一样，他們已經在斯大林的手心里生活。事情关系到他們自己的脑袋。

我和福斯特只有一次短时间的談話——在审讯开始的那天早上。在前去开会的路上，我們在一家咖啡店一道喝咖啡。我們是偶然碰了头，还有一些別的人在場。福斯特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对着面。他告訴我，检举我們的就是他。我沒有告訴他我要怎么来回答他。

当时，他心里想的事一定是摆在面前的局面和我的反叛对他的希望和梦想——在党内取得多数——的新打击。这一打击是加在一切其他打击之上的又一打击。我在1925年和他决裂，是粉碎了他的野心的唯一重大打击。在遭受那次打击之后，他从来没有能恢复元气。当时，我几乎要問他：“你觉得你今天报了仇嗎？”但是，我沒有說。我在瞻望着我們所开始了的新的伟大斗争，我沒有那种閑心去跟他算这种宗派斗争的老帳。

1959年5月27日

我觉得，关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诞生”——我所以在它的诞生中扮演了中心角色，是因为我当时恰巧在场，而当时又没有任何别的人来做这件事——，我已经把我要写的东西写完了。除了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在给你的信中，在《第四国际》1954年秋季号刊载的长文《美国共产党的退化和新的开端》^①中所写的材料以外，我再不能补充什么了。我的理由就是这样。如果要我再写一遍，我也只能把我已经说过的话重复一遍。

你可以在那些材料中找到很好的和很充分的阐释，我就是今天再写一遍也不能写得更好了。我有一种能力，对我倒是一种挺有好处的能力，那就是，一旦我把我要写的事情写了出来，我就把这些事情搁在脑后。为了写一篇关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起源的新报告，我就得迫使自己重新回到半昏迷的状态，回忆和重新经历三十一年前的斗争。再去干一遍这种事情，我实在受不了。

* * *

我在关于那个时期的详细材料中唯一没有谈到的问题，我有意愿在一切著作中都不谈的问题，就是我的行动的个人动机这一特殊因素——犬儒主义者永远也不会相信这种动机，研究工作者也永远不会在档案和索引中找到它。这就是良心的逼迫

^① 本书转载了这篇文章，作为绪言。

問題。这时候，一个人面临一种义务，这种义务在一定条件下只有他自己才能决定究竟是毅然承担还是規避。

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我讀到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綱領草案批判》，得到了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启发，但是，除此以外，还有
225 另外一个考虑使我一辈子都要感到激动。那就是，托洛茨基已經被开除并且流放到遙远的阿拉木图去，他的朋友和支持者遭到誹謗、开除和监禁，而这整个可恶的事情却是一场誣害！

我在少年时代就为了替莫耶和海伍德主持正义而参加斗争，現在，当一个关系整个人类前途的最最重要的案件直接摆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能够背叛正义的事业嗎？一个腐儒可以很容易地回答这个問題說：“当然不能。規則是很明显的。你該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令你要以你的头顱作代价。”但是，在1928年夏天，我的問題却不那么簡單。我不是一个腐儒。我是一个搞党内政治和派別斗争的人。我知道做人要磨光棱角。当时，我懂得这一点，因此，我的自知之明使我心神不安。

我已經逐漸混到一个穩当的职务，成了党的一个負責人員，有一个办公室，有一批工作人員。我可以很容易地保住这个位置——只要我不越出一定的界限，不违反一定的規則，这些界限和規則我都很清楚，而且只要我干得机敏熟巧，这些机敏和熟巧在长期的派別斗争中差不多已經成为我的第二天性。

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也知道另一点，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告訴过別人，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我却不能不第一次認真地加以考虑。我一向是世界产盟的一个不安分的叛逆分子，但是，不知不觉地我已經开始舒舒服服坐在一个安乐椅中，用各种卑鄙的阴谋手段和規避手法保証自己坐在这座位上，甚至竟然因为自己能够巧妙地适应这一套不体面的把戏，而有点自負起来。

当时，我第一次把我当做另外一个人来看，当做一个快要变成官僚的革命者来看。这幅图画是可怕的，我厌恶地躲开了它。

我对于自己在1928年夏天决定支持托洛茨基大概要造成什么后果，看得很清楚。我时刻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欺骗自己。我知道，我要付出的代价是我的头颅，还有我的安乐椅；但是，我又想，这又算得什么——还有比我更优秀的人为了真理和正义，拿他们的头颅和安乐椅来冒险。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当时在苏联的流放营和监狱里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他的资材是多么有限，都应该记住他在青年时代一开始是为了什么而战斗的，并且应该把他们的主张讲出来，让全世界都听见，或者至少让被流放、被监禁的俄国反对派知道，他们已经找到一个新的朋友和支持者。这样做是非常对的。

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第61页上写道：

“那时在美国开始的运动在全世界产生了影响；一夜之间，斗争的整个画面、整个前景就改变了。官方宣布死亡的托洛茨基主义在国际舞台上复活了，具有了新的希望、新的热情、新的精力。美国的党报对我们进行谴责，全世界都加以转载，包括莫斯科的《真理报》。监狱里和流放所的俄国反对派知道了我们的行动，知道了我们在美国的反叛。因为《真理报》或迟或早地到了他们手中。在反对派斗争的最黑暗的时刻，他们知道了，新的援军已经在大洋对面的美国走上战场。这个国家本身的力量和分量使得美国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事情也变得重要起来。

“我说过，当时，列夫·托洛茨基生活在亚洲的小村落阿拉木图，与世隔绝。当时，（俄国以外的）世界运动日益衰退，它没有了领袖，遭到了镇压，陷于孤立，几乎不存在了。一支新部队在遥远的美国出现，确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这个消息传出后，

黑人問題

1959年4月6日

寄上論述美国共产党早期在黑人問題上的政策的演变和結果的文章一篇^①。你可以对照你的見解和結論来研究一下我的見解和結論，看看在你叙述这一史实的时候，这里面是不是有任何东西可供参考。

我处理这个問題的时候遇到很大困难。我最初本来打算避免討論共产党历史的这一章。我当时担心，如果我答应回答你的問題的話，我就要深深陷入这整个問題中，以致要花很多時間，打乱我的其他工作的日程表。后来，我又情不自禁地摆脱开其他任务，来研究你的来信，最后我就做了我在开头担心的事情。

这篇文章里包含一些有关美国共产党在早期插手黑人运动

^① 《俄国革命和美国黑人运动》，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評論》1959年夏季号上，收入本書作为第二編。

的結果的見解和印象，這些見解和印象在我脑海里醞釀了很長時間。據我所知，以前還沒有人提出過這些見解，但是，我自己本來也沒有論述這個問題的計劃。可以有把握地說，如果不是因為你提出問題來逼我，我永遠也不會就這個問題寫什麼材料。

在我寫作美國共產主義頭十年的材料的整個過程中，情況也都是這樣。為了出版這個文集，我又把那份材料看了一遍，覺得沒有什麼要修改的。我很高興我能把它寫出來，我想，它會有很大用處。在這方面，我得大大感謝你。

* * *

的確，在頭十年中，儘管共產黨制定了政策，它在黑人當中的影響仍然是微不足道的。這個事實本身也許可以作為你在第二本書中對整個經驗給予否定評價的理由。但是，你的研究還證明了另一個重要事實：共產黨在後來的十年中吸收了大批黑人黨員。假如這樣的政策不正確的話，這種情況為什麼發生呢？怎麼能夠發生呢？我認為，你應該說明這一點，以便有一個跳板，便於在第三本中作更充分的敘述，因為那時候，美國共產黨在黑人中間的活動的豐碩結果已經表現出來了。²²⁸

尤其是，我認為你必須更清楚地說明並強調指出，俄國人在二十年代對美共政策的影響，同社會主義運動傳統的立場的影響比較，給局面帶來了多麼深刻的變化。

* * *

我想，你既然已經投入很多精神和精力，也一定會寫論述三十年代的下一本書——如果你的壽命能通過這個考驗，體力支撐得住的話。我認為，斯大林主義真的成為斯大林主義的那個悲劇性的和可怕的时代的历史，不大可能由一批沒有親身經歷其事的教授們寫出來。三十年代共產黨的时代也是你自己的时

代，大概只有你能以目击者身份写这段历史。托洛茨基在最近才出版的《日記》中，講过一些非常聰明的話。在談到一般写作时，他說：“只有参加者才是深刻的观察者”，或者大意如此的話。

当然，像写小說的情况一样，一个人可以写出具有参加者的洞察力和深度的历史，而不必先要亲身經歷他所描述的事件。但是，如果他要报道得真實的話，他無論如何必須把自己的精神投入，看見它，感覺到它。这就不单是研究所能奏功的了；因此，这也不是一个可以派給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任务。

請原諒我的說教。这已成了我的习惯。我把我的書叫做《一位鼓动員的筆記》，的确不是开玩笑。

第二編 俄国革命和美国 黑人运动

229

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头十年中，党就一直很关心黑人問題，并且逐渐找到一个政策，这个政策有别于并且优于美国激进运动的传统政策。但是，在我所发表的关于这个时期的回忆录里，黑人問題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作为各大派系内部爭执的問題出現。原因是，任何美国領袖也没有在这个爆炸性的問題上主动提出过任何新思想；党到头十年末尾已逐渐实现的方針上、态度上和政策上的轉变，沒有一項是各派自己倡导的。

黑人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在莫斯科进行的，处理這個問題的新方針也是在莫斯科制訂的。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美国黑人”問題就列在議程上，并且对這個問題进行了初步討論。研究历史就将确凿地証明，共产党在黑人問題上的政策是从莫斯科得到最初的推动力的，而且这个政策的一切进一步的具体規定，包括1928年采納的“自决”口号，也都是来自莫斯科的。

在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的不断督促和施加压力之下，党在头十年就开始在黑人中間进行工作；但是，它只吸收到很少一些黑人党员，它在黑人中間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从这一情况很容易得出一个实用主义的結論：在头十年中，从紐約到莫斯科的一切关于黑人政策的談論和爭吵，都是白費心血，俄国的干涉根本沒有結果。

这或許就是目前冷战时代里通常的估計。在冷战时代里，230

厌恶一切俄国东西的情绪往往代替审慎的意见。但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远远不是这样。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是一个太短的时期，我们不能单单根据这一时期的情况，就对共产国际强加给美国党的黑人问题新方针的结果，作出肯定判断。

在从历史角度叙述共产党头十年在黑人问题上的政策和行动，以及俄国人在这方面的影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考察后来十年的情况，那么，这种叙述不管多么彻底详细，都是不够的。在这个以前没有勘探过的领域中，年青的党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取得很大进展。不参照头十年的转变和新方针来看，就不可能理解三十年代的惊人成就。后来的行动和结果就是从那里来的。

* * *

要认真地分析整个复杂的过程，首先必须认识到，二十年代初期的美国共产党人，像那时和以前的一切其他激进组织一样，在黑人问题上没有什么遗产，只有一个很不够的学说，一种错误的，或者说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和少数具有激进或革命倾向的黑人追随者。

共产党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来没有认识到在黑人问题上需要有一个特殊的纲领。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而纯粹的经济学问题，是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运动对于特殊的歧视问题和不平等问题，是无能为力的。

早期最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可以以德布斯为代表。他对于一切种族都是友好的，没有任何偏见。但是，这位伟大的鼓动家在这个很不简单的问题上的眼光，也是有局限性的。这表现在他这样一段话上：“我们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贡献给黑人，我们不能对各种族提出不同的口号。社会党是不分肤色的全体工人阶

級——全世界的全体工人階級——的党。”(雷·金格尔:《弯曲的十字架》)这在当时被認為是一种非常进步的立場,但是,它并没有規定要在此时此地,或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可以預見的将来,要积极支持黑人希望得到一点平等的特殊要求。

德布斯的总公式忽略了主要的問題——黑人随时随地受到歧視的迫切問題。但是,德布斯在这一方面,就像在一切其他方面一样,也远远高出于維克托·柏格之上。柏格是一个直言不諱的白种优越論者。他在他的密尔窝基报纸——《社会民主先驅报》上写过一篇社論,里面有一段簡要的話:“毫無疑問,黑人和黑白混血儿是下等种族。”这就是“密尔窝基社会主义”的无知而冒失的劳工头子所闡明的密尔窝基社会主义在黑人問題上的主张。一个受折磨受迫害的黑人在喝密尔窝基啤酒时听到这样的話,不可能感到很好受,即使他手边还有几文錢,能够找到一家白人酒店,在角落里喝一杯啤酒的話。^①

柏格的露骨的沙文主义从来也不是社会党的正式立場。还有一些像威廉·华林那样的別的社会主义者。华林主张給黑人以平等权利,他是1909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創立人之一。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前,这样的人在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中間,实在是凤毛麟角。

社会主义运动在黑人問題上的传统政策是不够的,这已經由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家艾拉·基普尼斯和戴維·香农加以充分証明。香农把社会党对待黑人的一般的和流行的态度归納如下:

“他們在党内是不重要的,党沒有进行任何特別的努力来吸 232

^① 这里文意双关。密尔窝基以啤酒著名,也以那种牌子的社会主义著名。这里的密尔窝基啤酒暗指密尔窝基牌社会主义,白人酒店暗指社会党。——譯者

收黑人黨員，党对于黑人爭取改善他們在美国資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的努力，即令不是实际采取敌視态度，也是漠不关心的。”他又說：“党認為，黑人的唯一得救之道和白人的唯一得救之道一样：‘社会主义’。”

在这个期間，对黑人問題本身是无能为力的，愈是少談它愈好。还是把它扫到地毯下面去，眼不見为淨。

这就是早期的共产党从它的前身社会主义运动繼承的傳統立場。行业工会运动的政策和实践还要坏一些。世界产盟并没有“因为种族、肤色或信仰”而不讓任何人入会。但是，占优势的劳联各工会都是純白人垄断就业机会的托拉斯，只有少数例外。他們也提不出什么口号来吸引黑人；事实上，什么也沒有。

* * *

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同这一傳統的决裂，标志着它和它的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祖先的差別——而且是一个深刻的差別。早期的美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的影响和压力下，慢慢地而且痛苦地学会改变他們的态度，学会吸收新的黑人学說，那就是把黑人看做是一个受到双重剝削的二等公民的特殊問題，需要一个特殊綱領，作为全面綱領的一部分——并且开始做了一些工作。

只根据二十年代的成績来衡量这一深刻轉变在各方面的真正重要性，是不够的。头十年必須看做主要是一个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重新进行了考虑和討論，改变了在黑人問題上的态度和政策——为将来在这一領域中的活动作准备。

233 俄国干預在二十年代所造成的这种轉变和准备的結果，在后来十年中才爆炸式地表現出来。大萧条为在黑人中間展开激进的鼓动和組織工作創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而这时候，共产党

已經准备好在这个領域中采取行动。这是我国任何激进組織在以前都沒有做过的事情。

* * *

在黑人問題上一切新的进步的东西，都是在 1917 年的革命以后，作为这个革命的結果，从莫斯科送来的——不但送給了直接响应的美国共产党人，而且送給了一切关心这个問題的人士。

美国共产党人自己从来沒有想出任何和美国激进运动在黑人問題上的传统立場不同的新东西。我們在前面从基普尼斯和香农的历史著作中引来的材料說明，这个传统立場在理論上是相当弱的，在实践上更弱。他們的簡單化的公式——黑人問題只不过是一个經濟問題而已，只不过是劳資問題的一部分而已——从来都不能打动黑人的心弦。黑人即令沒有說出来，也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他們每时每刻都不得在残暴的歧視下生活。

这种歧視沒有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也沒有有什么隱秘的地方。人人都知道黑人处处受到最残忍的歧視，但是，几乎沒有一个人关心这件事，也沒有人想做一点工作，来把这种情况緩和一下，或改变一下。在美国社会和它的工人階級那一部分中，白人占百分之九十的多数，他們不管在南方或北方，都对黑人抱着极深的偏見；这种偏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不过，为了人类博爱的理想，社会主义运动不便把这一态度公开講出来，并且采取了規避的办法。美国激进运动的旧理論在实践中証明只是在黑人战綫上无所作为的理論——附带地說一下，也成了掩盖白人激进分子自己潜在的种族偏見的方便盾牌。

俄国人的干預改变了这一切，改变得很彻底，而且是向着好 234

的方面改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同国际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中的一切其他派别有所不同，他们很关心被压迫民族和少数民族的问题，坚决支持他们争取自由、独立和自决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真诚而热心地支持一切“没有平等权利的人民”，但是其中没有任何“博爱”的成分。他们还认识到，被压迫人民和民族身上有巨大的革命潜力，并且认为他们是国际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的同盟军。

1917年11月以后，以俄国革命的权威性为后盾，这个新学说——其中特别强调黑人问题——开始传到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开始向美国共产党人提出生硬的坚持不懈的要求，要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没有公开讲出的偏见，对美国黑人的特殊问题和疾苦给予注意，到他们中间去进行工作，在白人社会中保护他们。

受到不同的传统熏陶的美国人要经过一些时间，才能接受这一列宁主义的新学说。但是，俄国人年复一年地追逼，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对美国共产党人增加压力，直到他们最后懂得了，改变了，并且开始认真进行工作为止。二十年代逐渐实现的美国共产党人态度上的转变，在后来的年代中，对远远广泛得多的人士发生了深刻影响。

* * *

在共产党同美国激进运动在黑人问题上的传统立场决裂的
235 时候，恰好黑人本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南方农业地区到北方工业中心的大规模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大加速，并且在后来的几年中继续进行。这就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在南方各州有了一些改善，但改善的程度仍不足以补偿他们由

于被人赶入隔离区并且在各方面繼續受到歧視而产生的失望情緒。

当时的黑人运动抱着爱国的热情，支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的是讓世界成为民主政治的安全場所”；有四十万黑人到军队里服役。他們退伍归来，希望享受一点民主果实，但是却到处碰壁。回答他們新的自主精神的是全国各地不分南北层出不穷的私刑事件和一連串种族騷乱。

这一切合在一起——希望和失望，新的自主精神和野蛮的报复——就促成了正在形成中的新黑人运动的出現。新一代黑人坚决抛弃了布克·华盛顿树立的在白人世界中甘居下等地位的传统，加紧努力要求平等。

* * *

新兴的美国黑人运动——黑人在人口中只占百分之十的少数——最需要、然而又十分缺乏的东西，就是一般白人，特别是它的必然同盟軍劳工运动的有效支持。共产党积极维护黑人的事业，号召黑人和战斗的劳工运动結成联盟，恰当其时地在新局面中起了催化作用。

是共产党，而不是任何別的人，把赫恩頓案件和斯科茲保罗案件变成全国性和世界性的問題，逼得南方民主党的合法私刑暴徒处于守势——这是重建計劃垮台以来破天荒的事情。共产党的活动家领导了各种斗争和示威，使得失业的黑人得到救济机关的公平照顾，把被迫迁出的黑人的家具送回到他們的家中去。是共产党在1932年示威式地提名一个黑人担任副总统候选人——这是任何其他激进的或社会主义的政党从来没有想到要做的事情。

通过三十年代的上述或类似上述的行动和鼓动，共产党震

撼了白人多数当中一切或多或少具有自由主义和进步倾向的人士，并且使得人们在黑人问题上开始根本改变态度。同时，党成为黑人当中一支真正的力量，黑人自己的地位和信心也提高了——一部分是由于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积极鼓动的结果。

我们不能说一声共产党人别有用心，就把事实抹杀掉。一切维护黑人权利的鼓动都受到黑人运动的欢迎；而共产党人的鼓动在当时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远为有力，更远为有效。

在这些新发展中似乎包含着—个矛盾方面。据我所知，这个矛盾方面还没有人加以正视或解释。共产国际强加给共产党的口号之一——“自决”口号——似乎从来没有能适合实际情况，但是，三十年代共产党人在黑人运动中的势力扩展却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们在这个口号的问题上吵得最凶，所写的提纲和决议也最多，甚至把它作为主要口号来加以讨论。尽管如此，自决口号并没有在黑人当中引起多少响应；在加维领导的分裂主义运动垮台以后，他们的主要倾向是争取权利平等的一体化。

在实践中，共产党跳过了这一矛盾。共产党在采纳自决口号以后，并没有停止积极鼓动，来维护各方面的黑人平等和黑人权利。相反地，他们加强了和扩大了这种鼓动。黑人愿意听的是这些话，使得局面改观的也是这些话。带来成绩的也是共产党在后一口号下所进行的鼓动和行动，成绩的取得并没有得到不受欢迎的“自决口号”和一切为它辩护的提纲的帮助，实际情况大概是，尽管有这种口号和提纲，还是取得了成绩。

* * *

变成斯大林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在展开极端激进活动的“第三时期”，用他们所特有的、同他们分不开的、一切邪恶的煽惑、

夸张和歪曲的手段，在黑人当中进行活动。但是，尽管如此，权利平等的主要口号仍然发生了作用，在黑人当中引起响应。自从废奴主义者以来，黑人第一次看见有一个积极的、富于战斗性的、有力的白人集团在维护他们的事业。这一次，领导经济萧条所造成的强有力的声势浩大的激进运动的，不是少数博爱主义者和苍白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三十年代的奋勇前进的斯大林主义者。在那些日子里，他们的活动是有力量的，对美国生活的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

许多黑人最初的反应是良好的；共产党作为一个同苏联有联系的革命组织的声望，大概与其说起了阻碍作用，不如说起了帮助作用。追求体面的黑人上层分子往往躲避任何过激的东西，但是黑人下层群众却是穷苦大众当中最穷苦的，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他们什么也不怕。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吸收了成千名黑人党员，并且一度成为黑人当中的一支真正的力量。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平等权利问题上的政策，他们从俄国人学来的总态度和他们在新战线上的活动。

* * *

在三十年代里，共产党的影响和行动并不限于一般的“公民权利”问题。他们还大力展开活动，改造劳工运动，帮助黑人工人在过去排斥他们的劳工运动中找到一个地位。黑人工人过去就参加过建立新工会的大规模斗争，现在则比过去更加积极地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但是他们需要帮助，需要同盟军。 238

共产党的战士在新工会形成的日子里，在紧要关头担当了这个角色。三十年代里，在产联的旗帜下建立了新的劳工运动，黑人工人在这个新劳工运动中至少取得了半公民的地位。在帮助黑人工人取得这种新地位的斗争中，共产党的政策和鼓动所

起的作用十倍于任何其他人。

* * *

人們常常說黑人运动所以能取得进展，輿論所以轉而支持它的要求，應該归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变化。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最大事件，改变了一切（包括美国黑人的前途）的事件，却是俄国革命。人們現在已經認識到，并且大体上普遍同意，黑人問題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能像在共产主义以前的激进运动中那样，简单地归入劳資冲突的总题目下。但是，在促成这种認識方面，列宁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比任何来源的任何其他影响都要大，虽然列宁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后来被斯大林加以敗坏和歪曲，然后才通过美国共产党的活动传播过来。

說社会党、自由主义者和大体上进步的劳工領袖同意了这一新看法，对黑人的要求給予一些支持，这是講出了一些真情，但是并不多。他們所做的也仅此而已，他們同意了別人的看法。他們並沒有提出自己的独立的完整的理論和政策；这些东西从
239 哪里来的？从他們自己的头脑中想出来的嗎？很难是这样。在二十年代里，他們在这个問題上完全是跟着共产党走的。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持有不同意見的激进集团也向俄国人学习，也对維護黑人权利的斗争作出他們力所能及的貢獻；但是，支配了激进运动的斯大林主义者也支配了黑人領域中的新发展。

* * *

对于黑人問題的一切新东西，都是从莫斯科来的——在俄国革命开始像惊雷一样向全世界发出号召，要求給一切少数民族，一切附属国人民和一切种族，地球上一切被鄙視被遺弃的人

們，以自由和平等以后。雷声現在仍然轟隆不已，比以前更加响亮。报纸上每天的大字标题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共产党人首先而且最有力地响应了俄国的新学说。但是，黑人和美国白人社会的很多部分也間接响应了，而且仍在响应——不管他們願不願意承認。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目前的官方領袖，对于这个运动日益扩大的战斗精神和它在我国白人居民中得到的支持，极为惊奇。他們从爱国主义立場出发，一致宣布他們同俄国革命毫无关系，但是他們几乎沒有想到这个汹涌澎湃的运动得到俄国革命的多大好处。

馬丁·路德·金牧师在蒙哥馬利抵制斗争时期說，他們的斗争是全世界有色人种爭取独立和平等的斗争的一部分。殖民地的革命的确是美国黑人运动的一支有力同盟軍。但是，他还應該补充一句：殖民地的革命是从俄国革命得到他們的最初动力的，而且現在还天天得到这一革命的推动和加强，只不过这一革命現在体現在苏联和体現在白人帝国主义所突然“失掉”的新中国身上而已。

最狂暴的反苏分子，其中有自由主义的政客和官方劳工領袖²⁴⁰，也間接地、然而更加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們說：小石城丑聞和类似事件不應該发生，因为它帮助了共产党在深色皮肤殖民地人民中間的宣传。像某些其他的人由于害怕上帝才講美德一样，他們是由于害怕“共产党的宣传”才講美德的。

現在，北方的劳工領袖和自由主义者同情黑人爭取少数基本人权的斗争，已是很普通的事了。他們說，这是“天經地义的事情”，是文明的理智的标志。也有些人以前是激进分子，后来变成某种反共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是一种十分可怜的“自由主

义者”，他們甚至現在還以他們曾經“正確”支持“公民權利”，反對黑人隔離和其他歧視，而感到自豪。可是，這一切是怎樣來的呢？

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從來也不想一想，在列寧和俄國革命推翻了原來根深蒂固的、人們心安理得視為當然的“分離但不平等”學說以前，為什麼前一代的自由主義者——只有少數特別的例外——就從來沒有想到以這種更加開明的新態度對待黑人呢？美國反共的自由主義者和勞工領袖所恨之入骨、畏之若虎的俄國影響，有一部分甚至已經染到他們身上，可是，他們還不知道呢。

* * *

當然，人人都知道，美國的斯大林主義者最後把黑人問題搞糟了，正像他們把一切其他問題都搞糟了一樣。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替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服務，出賣了維護黑人權利的鬥爭——正像他們為了同一根本原因，出賣了罷工的美國工人並且在1941年托洛茨基主義者由於史密斯法在明尼阿波利斯第一次受審的時候，支持監察當局一樣。

現在，人人都知道了這一點。害人者終於害了自己。斯大林主義者自己也不能不公開承認他們的一部分叛賣和可恥行為。但是，不管是對無法隱藏的罪行表示懺悔也好，還是吹噓別人愛聽的當年的美德也好，都不能給他們任何幫助。共產黨，
241 或者不如說是共產黨的殘余部分，已經威信掃地，為人所不齒，以致它早先在黑人領域中所做的工作今天也不能給它帶來多少榮譽和光彩。在早先的日子里，他們的工作的確是起過廣泛的、主要是進步的影響的。

援救他們不是我的責任，也不是我的目的。這篇簡要的回

願的唯一目的是澄清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事实——供不論出自什么动机希望了解全部真相并且从中学习的、富于求知欲的新一代研究者参考。

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头十年中向俄国人学来的新的黑人政策，使得三十年代的共产党能够促进黑人的事业，并且在以往任何激进运动都没有达到的规模上扩大了它自己在黑人当中的影响。这些就是历史的事实，不仅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是黑人解放斗争的历史事实。

* * *

对于瞻望未来的人来说，这些事实是重要的；它们是未来事件的序幕。斯大林主义者由于他们先前的战斗活动，大大推动了新的黑人运动。后来，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卖了黑人的事业，为不慌不忙缓步前进的渐进主义者铺平了道路。这些渐进主义者自那时以来，一直在领导着黑人运动，还没有人同他们抗衡。

渐进主义的政策答应在一个黑人居于附属地位和下等地位的社会制度范围内给黑人以自由。这个政策是行不通的。它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黑人的希望是很高的，他们在斗争中也付出了很多精力和精神。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具体斗争果实却少得可怜。他们前进了几寸，但是，真正平等的目标还远得很。

在公共汽车上坐上一个空位置的权利；少数黑人子女可以到少数公立学校读书的象征性的一体化；对个别黑人开放的少数公职和某些职业的少数位置；书本上的而不是实践中的公平就业权利；在形式上和法律上予以承认但在实践中处处予以剥夺的平等权利——这就是解放宣言公布九十六年以后今天的情况。

自布克·华盛顿的时代以来，黑人运动的面貌和要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他们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这个矛盾正在一天天加强，还要再发生一次爆炸，再有一次政策和领导的改变。在下一发展阶段，美国黑人运动将不能不转向比渐进主义多一点战斗性的政策，将不得不寻找比北方的资产阶级政客可靠一点的同盟军，因为，这些北方的资产阶级政客自己就同南方民主党人结成了同盟。黑人比我国任何别的人更有理由、更有权利成为革命力量。

新一代的一个诚实的工人党将认识到黑人斗争的革命潜力，将号召黑人和劳工运动组成战斗联盟，共同对现社会制度展开革命斗争。

比迄今所获得的远远更为重要和更有意义的改革和让步将是这个革命联盟的副产物。在斗争的每一阶段，都将争取并获得这种改革和让步。但是，新的运动将不以改革为限，不以让步为满足。黑人运动和战斗性的劳工运动在一个革命党的统一领导下，将用解决黑人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法——社会革命——来解决黑人问题。

243 我们这一代以前的共产党在这一方面最初的努力将得到承认和利用，就连斯大林主义叛卖的經驗也不会白白浪费掉。人们对于这个叛卖，记忆犹新，这将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在下一次不会成为领导者的原因之一。

尤金·德布斯和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

一 今天的劳工和社会主义

德布斯誕生一百周年和劳联-产联的合并恰巧湊在一个停滯的年份內。这一年看起来呈現了一幅进步和反动交織的画面。

德布斯对于今天以产业工会制度为主的有組織的劳工运动，貢獻很多，但是，在合并大会上，却沒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德布斯是产业工会运动最伟大的披荆斬棘的先驅者——但这已經是昨天的事情了。主持合并大会的沾沾自喜的官僚們都是完全生活在今天的講求实际的人，他們深信，进步是此时此地可以看見，可以屈指細数的东西。

他們在所属的各組織中有将近一千五百万會員，在各地的財庫中有比这个数目还要多的美元，因此覺得情况比什么时候都好。官方的心情从来沒有像今天这样自滿保守。

另一方面，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各团体和組織却把今天的政治激进运动的人数当做自己的衡量标准，因此覺得在德布斯誕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沒有什么可高兴的。他們看一看各激进組織今天的成員和拥护者的人数，再看一看德布斯时代社会党的几万名黨員和几十万张选票，就断定，今天的情况是再糟糕也不过了。他們紀念德布斯誕生一百周年的主要办法是，怀着哀

愁的心緒回忆“美国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发出几声叹息和哀歌，希望回到“德布斯的道路”去。

照我看来，这两种估計都对劳工运动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前景发生了誤解。德布斯时代以来的改变，并不全是进步，像自滿的工会官僚們所設想的那樣，也不全是反动，像別的一些人所認定的那樣，而是兼而有之。

把一千五百万工人組織在劳联-产联中，把另外大約两百万人組織在独立工会中——加上随之而来的工会会員的觉悟——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意义的进步成就。这项成就包含的内容不单单是工会的扩大。

工人阶级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地位改变了，这里面就暗含有革命意义。工会方面的成就本来也就是美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进步；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是全面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并没有它自己的独立利益或意义。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今天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数量上縮小了，但是在思想方面却比前輩丰富了。由于他們吸收了我国和其他国家过去的經驗，并且把这些經驗和他們所得的教訓包括在自己的綱領中，他們也更能理解自己的任务了。这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进步，因为归根結底，綱領决定一切。

247 很明显，在产业劳工运动逐步增长的同时，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没有相应的发展。相反地，近几年来，在这一方面还有下降；社会主义政治組織在数量上的弱小就反映了这一点。

这当然是一个反动的表现，但是，形势中的其他因素足以抵銷它而綽綽有余。全盘的形势是，自从德布斯时代以来，美国工人阶级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目前的形势是再一次跃进的跳板。

在下次跃进中，有組織的工会会员将变得具有阶级觉悟，并进而参加阶级政治组织和采取阶级政治行动。这一变化将比最初把涣散的个体工人变成今天有組織的劳工运动，要容易一些。而且，很可能，也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从阶级社会的矛盾中产生的同一些情况和力量，既然引起了第一次变化，也必然要引起另一次变化。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今天美国资本主义的人为的繁荣将比德布斯时代——资本主义扩展期的比较稳固的繁荣，爆炸得更快、更厉害；而且，下一次爆炸将促使工人的觉悟发生更深刻的变化——比促成产联建立的三十年代的危机所引起的变化更为深刻。

从这个前景来看，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目前困难时期的工作就有了异乎寻常的历史意义。看到这一前景，就可以很好地利用目前阶级斗争暂时沉寂的时期，因为这个沉寂时期使我们有时间来思考和思索。它可以成为，而且大概也必将成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之一——迎接未来的伟大事件的准备时期。研究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可以是迎接未来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有用部分。

这是纪念德布斯诞生一百周年的唯一明智的办法。在这个节日，我们不应该怀着哀愁心绪回忆往事，不应该消沉叹息，希望回到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和局面，而应该彻底地研究和批判地估计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应该把它看做是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必须照抄的典范。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既研究它的胜利，也研究它的失败，以便从整个经验中学习一点东西。

这种研究的第一条规则应该是，发掘事实真相，加以报道；按照德布斯运动的真正面貌来加以说明。德布斯配得上我们这样来研究他，也不怕我们这样来研究他。就是他的错误也是一

个巨人和先驅者的錯誤。在客觀地加以考察的時候，這些錯誤只能使他的不朽的優點顯得更加突出。

二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成长

美国的真正历史就是一个导向社会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基本部分就是那些看到了目标并且向别人指出这个目标的人们的活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尤金·德布斯是一个值得我们怀念的人。他生在一百年以前——1855年11月5日。这是我国的一个喜庆日子。德布斯看到了前途，并且为它奋斗，这是任何人所不及的。在社会主义先驅者的光荣榜上，他名列第一。

德布斯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的一生；但是，像一切其他的美国东西一样，它也部分地带外国成分。他是一个真正土生土长的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在促使社会主义“美国化”方面，他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人们有时说，他是一种完全由他自己发明、没有吸收“外国”思想或影响的、特殊的国产社会主义的提倡者，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德布斯的例子最生动地说明了美国工人怎样在别人的思想，而且是从外国输入的思想的影响下，改变自己的生活。许多本国和国际的影响，他个人的经验以及国内外其他人的思想和行动，合在一起决定了他的生活，然后又在他将近中年的时候改变了他的生活。

249 雇主们和他们的政治工具也尽了最大的力量来帮助这件事的实现。当克利夫兰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去镇压1894年的美国铁路工会罢工，而一位法官以违反禁令的罪名把德布斯送入狱中的时候，他们就无意中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勃

然兴起，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位天才的鼓动家是在伍德斯托克监狱中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这是德布斯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发生重大变化的起点。不久以后，就在美国社会党的名称下组织了第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

德布斯从一个进步的工会工作者和人民党人转变成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像突然受到天启一样一下子发生的。在他离开伍德斯托克监狱以后，他又过了几年，印证了自己在阶级斗争中的亲身经验，仔细研究了新思想，试验了这方面的各种改良主义和乌托邦式观念，然后才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社会主义。

但是，当他最后抓住它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抓住它，从来没有改变。德布斯从考茨基那里学习了基本原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里，考茨基是在我国知名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就成为他的一切鼓动的主要论题。他轻蔑地谴责龚珀斯所谓劳资利益一致的理論，他对于所谓资本主义将通过一系列改革长入社会主义的騙人理論，也毫不调和。

德布斯竭力鼓吹通过工人的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不达到这一目的，决不甘休。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决心坚持主要問題，坚决走大路，不管某些小路看起来多么誘人”。

美国社会党所以能在1901年的“统一大会”上成立起来，德布斯起了主要作用。他是最得人望的吸引力量。社会党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也是因为他的緣故。 250

在这以前的五十年里，我国也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組織；但是，他們每一次都因为客观环境和誤解他們所拥护的

学說的緣故，而走入歧途。最初的社会主义者主要都是各种各样烏托邦主义者，或者德国侨民。这些德国侨民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来了，但却从来也沒有学会把这些思想和美国的情况联系起来。

恩格斯就認為，这种社会主义在美国是沒有任何前途的，他的話像馬克思的話一样，对任何国家都不能說是外来因素。直到 1895 年逝世时为止，他在写給住在美国的朋友的信中，不断地坚持指出，美国社会主义如果不学会“說英語”，并且通过本国的工人得到表現，就永远一錢不值。

在德布斯身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最后找到一个真正操我国語言的人，他知道怎样按照美国工人自己的經驗来向美国工人解释从外国輸入的社会主义思想。

三 鼓动家的角色

在德布斯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已經以劳工領袖的身份聞名全国了。他的声望和威信，他的出色的演說才能，他为事业工作的滿腔热情，給新的党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使得局面改观的就是德布斯，就是德布斯和使听众願意响应的当代条件：德布斯成为二十世紀初叶社会主义的杰出发言人。有了德布斯，社会主义在我国才第一次开始有了願意傾听的群众。

关于德布斯和他代表的运动，我要講的話有一部分是一个
251 当时在場的目击者的証詞。其余部分是事后的意見。我自己对德布斯的愛戴是我自覺地开始做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时候开始的。我同德布斯从来沒有过个人的結識，但是我听过他的几次演說。他是我所景仰的人物，正像他是我那一代所有激进分子

都景仰的人物一样。

在我的家庭里，德布斯时时刻刻都发生着影响。我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德布斯派——自始至终是如此。在当代所有社会名人当中，德布斯是他最爱戴的人。德布斯的性格和气质，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全部光辉的人格——都对我父亲有强烈的吸引力。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先驱者也都像我父亲一样。他们都是好人，对德布斯怀抱着热烈的感情，认为他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是他们那一类人，或者是他们理想的那一类人的最优秀的代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们把他当作一个人，当作一个同伴来敬爱，不亚于他们把他当作一个社会主义领袖和演说家来敬仰和信赖。

我父亲在政治上的发展大体上也和德布斯一样。他从劳工骑士团时代以来就是工会工作者，后来成为人民党人，在1896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又成为白里安派，最后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和德布斯一道终于信仰社会主义。

当时由德布斯担任首席社论作者的《向理性呼吁》报，每星期都寄到在堪萨斯州罗斯达尔小城的我们家里来。当西部矿工联合会领袖莫耶和海伍德在1906年以虚构的谋杀罪名被捕下狱的时候，《向理性呼吁》报在德布斯的带头下，展开了保卫他们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德布斯号召以革命行动阻止这种法律谋杀。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他们要吊死莫耶和海伍德，就叫他们把我也吊死！”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开始注意这家报纸和德布斯。一星期接着一星期，德布斯的响亮的呼吁和这家报纸在西部矿区的“战地记者”乔治·休夫的电讯深深地激动着我。我的父亲

252

和当地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凑了一些钱，增订了几捆报纸，用来免费散发。他们叫我帮助做这个工作。我为社会主义运动所做的第一件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感到自豪——就是在罗斯达尔挨家分送《向理性呼吁》报莫耶-海伍德事件专号。当时我才十六岁。

保卫莫耶和海伍德的运动是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行动。一切鼓动似乎都集中在那个迫切的问题上，而它也的确使人们激动起来。我相信，在开头，影响我最深的是行动本身，而不是政治论争。这是一件主持正义的行动，对青年人来说，这总是有着最强大的吸引力的。在我参加这一行动以后，我才去进一步研究这一事件牵涉的更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少年时代推动我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正是德布斯和《向理性呼吁》报保卫莫耶和海伍德的这一伟大运动。我回想起他们来，总是充满感激的心情。在后来的年代里，我在全国各地遇到很多人，他们启蒙的动力也和我一样。德布斯和《向理性呼吁》报是用社会主义的伟大希望鼓舞我同一代本国激进分子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

德布斯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而且，他作为一个激励人们、到处散播社会主义种子的鼓动家所起的作用最大。他天生适于干这种工作，也乐于干这种工作。德布斯以及和他有长期联系的《向理性呼吁》报的永垂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们唤醒了人们，把他们从随波逐流、听天由命的习惯中解脱出来，向他们指出一条新的道路。

德布斯用火一般的语言谴责资本主义，但是这只是他的鼓动的一个方面。他还带来了未来美好时代的希望信息。他详细说明了建立在合作和同志情谊基础上的新社会秩序的前景，并

且使人們看見它，相信它。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基本上就是由 253
那些从德布斯和《向理性呼吁》报那里第一次懂得社会主义基本
原理的人們所推动的。

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那以后，在我国和別的地方，历史都在加速前进。世界上已經发生了許多事情，美国是这个
世界的一部分——也只是它的一部分——因此，这些世界性
事件也对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影响。現代的革命运动从
德布斯时代以来，是从許多来源和許多經驗中吸取它的鼓舞力
量和思想的，这些后来取得的财产已經成为它的綱領的一个必
要部分。

但是，尽管如此，美国今天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是以
德布斯为其杰出代言人的早期运动的直系后裔，它所以能有今
天也应归功于先驅者的努力。德布斯誕生一百周年是一个更深
入地研究当代运动的好时刻。

四 双重的历史

希望研究前代社会主义运动起源的青年一代現在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現成的必要材料。有一批認眞的学者一直在努力恢复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并提供一切必要的文献資料予以証明。

他們已經发表的研究成果，在分量上已經很不少了。就仿佛
是迎接德布斯誕生一百周年似的，現在已經出版了許多研究
德布斯和过去十年中的美国社会主义問題的書籍。

霍华德·昆特的《美国社会主义的形成》叙述了十九世紀的
支流运动和組織，最后叙述了社会党在1901年統一大会上的成
立。

艾拉·基普尼斯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1897-1912年》叙述了1912年总统竞选运动以前的历史，并且详细地报告了那个时期社会党的内部冲突。社会党的改良主义领袖在这本书中遭到非难。他们和德布斯之间的明显对比在每一点上都有充分的文献资料加以证明。

在这以后，就在今年德布斯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出版了戴维·香农的一本颇为简明的历史著作《美国社会党》。香农教授的研究显然是很透彻的，他引证的文献资料也是宝贵的。但是，在他的解释中，他似乎对那些巧妙地利用德布斯的威望，同时反对他的革命政策的党内改良主义者，采取了容忍态度。

除了这些历史著作以外，还出版了《尤金·维克托·德布斯著作和讲演集》。这本极其宝贵的文集出版于1948年，其中有小阿瑟·施勒辛格所写的一篇解释性序言。仅仅为了礼貌的缘故，这篇序言本来也是不应该列入的。

施勒辛格是美帝国主义的老奸巨滑的“自由主义的”辩护人。他没有权利贡献了自己全部生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德布斯写序言。他更没有权利“解释”他，因为他自己根本无法理解他。施勒辛格的解释在德布斯讲演和著作集这个宝库中十分刺眼，像一个肮脏的拇指。但是，书中别的部分都是干净的。这是真正的德布斯用他自己的话在进行解释。

最后，还有雷·金格尔所写的一部真正值得钦佩的德布斯传记，书名叫做《弯曲的十字架》。继戴维·卡尔斯纳和麦卡利斯特·科尔曼先前所写的传记之后，金格尔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备和全面的报告。如果有什么可爱的书的话，这就是一本可爱的书；在这本书中，鞅群超伦的金尼^①真是栩栩如生。他的奇妙的一

^① 金尼是尤金·德布斯的昵称。——译者

生中的明亮部分和阴影部分真切生动地再现出来，阴影部分把明亮部分衬托得分外明亮。

255

从这一大堆洋洋大观的文献材料中——即令考虑到著书人添加的各种意见和解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的社会党和当年的德布斯的面貌。德布斯是社会党全盛时代最孚众望的社会主义者，在公众的心目中，他代表着党。但是，本世纪头二十年的美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个双重的历史。

它是党本身，它的官方政策和行动的历史，也是德布斯的非官方的和大体上独立的政策和行动的历史。这两部分是互相有联系并且同时进行的，但是又不是一回事。德布斯是在党内，是党的一分子，但同时又比党伟大——更高大，更好。

五 德布斯的传奇

德布斯的传记作者金格尔说，德布斯生前是一个传奇人物。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其中有些是否真实，尚属疑问。还有许多人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互相矛盾的理由而表示忠心于他。

德布斯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过和他相似的人。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曲解，因为有些人只能看到他的卓越个性的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些人虽然能够看到整个人，却只去渲染对他们有用的那一部分。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渲染德布斯的某些片断的方面。

毫无疑问，德布斯本着一个社会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待人是友好慷慨的；就是在阶级社会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中，他仍然按照

社会主义的理想来生活。在这一方面，贊揚他的人多，模仿他的人少，而且常常有人企图把他說成是一个与人无爭的圣徒。有一种流行的說法，說德布斯是一个好人，但是，当局并不是因为这个緣故才把他投入獄中的。他还譴責残害工人的剝削者以及那些宣揚劳动者和剝削者亲如兄弟的劳工騙子。这同圣徒毫无共同之处。

尽管他的个性极其复杂，在忠于唯一的理想，在言行一致方面，他却和他所敬爱的英雄約翰·布朗一样极其单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鼓动家，他的信仰和实践是互相关联的，他的一切言論和行动是异常一致的。客观事实可以証明这一点。

早在他接受社会主义以前，他就是一个著名的劳工組織者和罢工領袖，一个实践者。在他轉向講坛以后，他也从来没有失去他对阶级斗争火綫的热爱和感觉。罢工的工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可以得到金尼的帮助。工人们向他求援，他没有不帮助的。不管斗争在什么地方进行，他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出現。

他是一个朴实的人，只受过有限的正式教育，但却置身于一个充斥着油嘴滑舌的律师、职业作家和假愜愜的神学博士的党内。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这些人总是說，德布斯是一个好人，一个大演說家，然而却不是党的“智囊”；他干理論和政治是不行的。

文献材料清楚地說明，事实是，他在当时工人阶级政策的一般問題上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他比社会党内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理論家和政客全部加在一块，都要高明。差不多在一切这样的問題上，他的見識也都比当时任何左翼領袖高明。这些人大多数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轉向工团主义。

德布斯的演講和著作至今仍不失其价值。这些講演和著作使得他所代表的社会党看起来要比实际上好一些。德布斯的質朴、明确性和革命魄力是社会党的貨色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而已。社会党由于它的性質和成分,还有別的特点,而起决定作用的却正是这些別的特点。

六 大門敞开的党

257

每一个工人党都要通过内部的斗争、分裂和统一来发展,这一政治法则生动地表现在社会党从头到尾的暴风雨般的历史中。这一历史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它在上述历史著作中都得到十分充足的文献史料的证明。

社会党是在1901年的“统一大会”上成立起来的,但是,它也渊源于过去的各种运动。新的统一组织是在下列情况下产生的:原来的社会劳工党发生分裂,分裂后,社会劳工党被摔在后边,死守教条,陷于孤立;原来的短命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分裂后,德布斯和柏格同那个党的耽溺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移民分子分道扬镳;更早一些时候,成千名本国激进分子——包括德布斯和《向理性呼吁》报的著名发行人威兰德——从人民党运动中分裂出来;分裂后,人民党同民主党“统一”了,被后者吞并。

这些来源不同的流派,加上开始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许多其他地方性集团和个人,最后聚集到一个阵营——社会党内来。

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以后的代表大会,直到1919年明确分裂时为止。此外,新党还敞开大门,欢迎各种各样一般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参加。这些人对于社会主义究竟指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有着形形色色的看法。因此,

从一开始，党内就出现具有各种色彩的政治派别，从教条主义的极端激进主义一直到基督教社会主义。

258 这一批混杂的人群依靠一个松弛的组织结构来保持不稳固的统一。在这个松弛的组织结构内，人人都不受任何真正的中央机关的控制。党章中有所谓“州权”原则，规定各个单独的州组织实行自治；每一个州组织都保留主持自己的事务——意思也就是鼓吹自己的那种社会主义——的权利。大家都不肯批准成立正式的全国机关报，这就使地方分权现象更加严重。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要加强各自管辖范围内的地方和州的出版物——还附带地加强柏格一类的地方头子。

党的出版自由原则包括在出版界建立“自由企业”。销行很广的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出版物《向理性呼吁》报、《威尔雪尔杂志》、《粗齿锯》和《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都是由私人经营的。各个发行人随心所欲地解释社会主义，党员却没有发言权。而且，这还被视为理所当然。

最后，党的每一个发言人、作家、编辑和组织者，事实上是每一个党员，都用自己的方式鼓吹自己的那一种社会主义；全面统一的结果，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增强了，也就干得更加起劲了。这就使党更加像一个社会主义杂货铺。实际结果是，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一般观念，得到广泛传播，成千上万的人第一次听说社会主义，并且同意它是一个良好的目标。

这本身就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各派别的内部冲突也注定要在将来造成各种问题和困难。这样一个五花八门的党所以能够成立起来，是当时的条件决定的。或许，作为一个试验性的起点，它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在我国还是新的东西。在经验和思想

方面，它远远落后于欧洲的运动。拥护社会主义的各集团和派别还需要试试是否有可能在一个单一的組織内合作共事，制訂一个共同的綱領。新的社会党就为这种試驗提供了舞台。

当时，行业工会只吸收了一个狭窄的熟練工人和特权工人阶层；托拉斯化的工业中的基本无产阶级的組織問題——真正的階級运动发展的根本起点——还没有認真地去加以解决。組織一般的激进主义中心——社会党支部——要比組織产业工会容易一些，因为产业工会立即引起了基本工业中陣地巩固的雇主們的直接反抗。

在全国各地，人們对扩展期資本主义的残暴行为普遍不滿。这个資本主义刚刚进入它的第一个残暴的托拉斯化阶段，对妨碍它前进的东西无不加以摧残。工人遭受剝削，而没有工会組織来加以限制；佃农和靠抵押土地取得貸款的农民为了在土地上生存下去而掙扎在飢餓綫上；小企业主被垄断資本逼得走投无路——他們都感受到了“金錢力量”的压迫，希望找到某种防卫和抗議的途径。

組成統治階級的資本家們对于現狀却很滿意。他們認為一切都很好，不需要实行改革，不需要改善情况。資本主义的两大政党还没有像在后来几十年中那样具有用改良主义迷惑群众的灵活性和能力；他們坚持現狀，很少注意資本主义的受害者的怨言。而人民党的垮台則留下了一片政治真空。

七 壮大和扩展的年代

展开一次全面社会抗議运动的条件，在本世紀的头十年就已經具备了。新的社会党，由于它能吸引一切不滿的人，由于它

答应在新的社会秩序中給一切人以更公平的待遇，很快就成为这个运动的大旗。

新的党，以德布斯作为它的总统候选人和最受欢迎的鼓动家，并且得到了銷行很广的《向理性呼吁》报的有力支持，因此，²⁶⁰ 旗开得胜，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早在1900年，即社会党正式成立之前一年，德布斯作为各派新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就已经获得近十万张选票。这个数目大约三倍于以前任何社会主义派的总统候选人所得的选票。

1904年，德布斯所得的选票有了惊人的增加，一跃而为四十万二千二百八十三张，增加了三倍；许多人计算着增长的速度，开始预言在可以預見的将来，社会党将取得多数。1908年，总统选票保持不动，共計四十二万零七百十三张；但是，党在組織上的扩大足以抵銷这一选举挫折而有余。

在中間的四年中，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从1904年的二万零七百六十三人增加到1908年的四万一千七百五十一人（香农引証的官方数字）。党仍然是一帆风顺的。在后来的四年中，也有惊人的进展。

全国各地都选出了社会党市长，从紐約州的斯克內克塔迪一直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密尔窝基則是一座灿烂的明灯，輝耀于两地之間。密尔窝基成为庸俗的市政改革社会主义的故乡，这种社会主义几乎和当地的啤酒一样有名，但是比那种啤酒还要溫和。

1912-1913年，我在世界产盟东部机关报《团结》报工作，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紐卡斯尔。当时，那里就有一个社会党市长。“紅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俄亥俄州在較小的工业城市中，也有几位社会党市长。1913年，我出外采訪世界产盟领导的阿克伦橡

胶罢工，就在俄亥俄州圣马丽斯的市政厅发表过演说，由当地的社会党市长斯科特·威尔金斯担任会议主席。他是一个“红色社会主义者”，对世界产盟抱友好态度。

根据基普尼斯引证的官方材料，到1912年，社会党已经有“一千多名党员在三百三十七座大小城市中当选公职。其中包括市长五十六人，参议员和市议员三百零五人；警察局长二十二二人，教育局长一百五十五人，财政局长四人”。

如果像许多社会党领袖——尤其是它的公职候选人——热切相信的那样，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仅仅是一个选出足够的社会党市长和参议员的过程，那么，这个大转变到1912年就已经有了顺利的进展。 261

在1912年的竞选运动中，站在社会党方面的有三百二十三家报纸和期刊——五家日报，二百六十二家周刊和十家月刊，加上四十六家外语出版物，其中有八家日报。《向理性呼吁》一向是销路最广的社会党报纸，那一年，它的销行额达到六十万份以上。根据香农引证的官方材料，党员人数从十一年前成立时号称的一万人（大概是夸大了），增加到1912年的平均数十一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名正式党员。

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德布斯以社会党候选人的身份得票八十九万七千张。这还是在妇女获得选举权以前的事。这个数目约占那年选票总数的百分之六，按比例计算，相当于1960年选举中的四百多万张选票。

考虑到德布斯像往常一样是在纯粹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纲领下来进行竞选，1912年所得的选票确实是当时我国社会主义情绪的一次惊人表现。当然，这个数目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必须看做是在另一方向努力的改良社会主义者争取到的抗议选票。

而不是拥护社会主义的选票。

不过，局面并不像这种统计资料表面上所指示的那样美妙。不论从党员人数方面来说，还是从选票方面来说，1912年都是社会党的高峰年；在这以后，它就再也没有能够达到这个高峰。事实上，下降趋势在选票计算出以前就已经来临了。这并不是由于公众的嫌弃，而是由于内部的纷争。

在它的外部的成功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大门敞开”的党的内部矛盾也开始走向最高峰，并且使它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1912年以后，社会党就急转直下，走向灾难。

八 内部冲突和衰微

社会党在头几年要比在后来激进一些。左翼在成立大会上很强大，在1904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更加强大了。今天来看，初期的左翼在它的某些策略立场上是有缺点的；但是，它坚决维护产业工会制度，并且在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则上采取了明确的立场——这是任何真正社会主义政策的根本起点。阶级斗争是社会党第一个时期——也是最好的时期——党的言论中的主要内容。

当时，左翼和中間派的松弛的同盟构成了党的多数。主张慢慢地逐步实行市政改革的密尔窝基人柏格所领导的右翼，肯定是一个少数派。但是，机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力图夺取党内大权。作为斗争中的一个压力手段，柏格屡次地扬言要拉走他的威斯康辛派，每年至少要挟一回。

在1904年的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希尔魁特领导的中間派同密尔窝基改良派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左翼。从此以后，柏

格的政策——經過希尔魁特加以若干修正，使它比較容易为人接受——就成为党的現行政策。在这个右翼联盟当权的时候，“政治行动”被解释为純粹是这样一件簡單的事情：爭取社会党人当选和担任公职。党的組織变成主要是一架选举机器。

机会主义者放弃和出卖了爭取产业工会制度的斗争——德布斯和左翼所維護的劳工运动的迫切問題——希望向劳联官僚們討好，并且拉攏行业工会会員の选票。他們冲淡了社会主义²⁶³的学說，使它能为“体面的”中产階級选民接受。社会党当权派愈来愈离开階級斗争的綱領，力图通过一个改良的綱領爭夺选举胜利。

这个轉变并不是在沒有內部冲突的情况下，一下子实现的。左翼和右翼——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在党内各部分都沒有中断过。許多地方支部和州組織是左翼的堡垒，而且；毫無疑問，基层黨員多数的情緒是傾向于左翼的。

德布斯比任何別的人都更敏感和更准确地表达了基层黨員的情緒。他始終維護階級斗争的政策，始終都发表同类的演說，而不管党的官方綱領說些什么。但是，德布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对外鼓动上面，从沒有在內部斗争中使用他那有决定性影响的全部力量。

另一方面，职业的机会主义者却始終都在搞党内政治。他們夺得了党的全国机构的大权，并且无耻地利用它来不停地进行派別活动和阴谋。他們不仅力图把他們的政策强加在不情願接受的党的头上(大多数黨員从来都不相信他們)，而且力图把自覺地反对他們的革命工人赶出去。

1910年，鼓吹体面的改良主义牌社会主义的柏格当选为第一个社会党国会議員；同年，在密尔窝基也有一个社会党市政府

上台。这些选举胜利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加强了党内改良派势力，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国内其他地方希望通过密尔窝基的方法取得公职的飢渴感。党内机会主义者所擅长的市选，在庸俗的市政改革綱領下，給社会党内希望做官的人带来許多胜利，但是，并不是給社会主义运动带来胜利。

264

基普尼斯說：“这些地方性胜利很少是在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爭的問題上贏得的。事实上，这一問題通常都是居于很次要的地位。在1910年到1912年当选公职的社会党人，絕大多数都是牧师和自由职业者。他們的竞选所以成功都是靠了只具有地方意义的改革問題：地方选择权^①，禁酒，酒法实施；貪污，缺乏效率，管理不善，納賄营私和鋪张浪費；两党联盟，土豪流氓統治和市自治，公共設施的改善，学校津貼，运动場和公共卫生；市公产，选举权和公平賦稅；在少数地方的选举中，还有工业萧条和劳資糾紛問題。”

* * *

党的官方政策不断地从阶级斗争轉向漸进改良主义，同时，开始講究溫和和体面，这就对党的社会成分产生了影响。成批成群希望升官发财的野心家、牧师、商人、律师和其他自由职业者被吸引到这个組織中来，因为这个組織把自由而廉价的社会的进步的希望和野心家的个人利益融洽地結合起来了。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来做官，来出风头的，而不是来工作的。律师、职业作家和传道师变成党的最著名的发言人和公职候选人。

1908年的基督教社会党大会宣布，有三百多名传道师参加了社会党。传道师都占据重要职位，自然要削弱党的政策。基

^① 地方选择权是指听任一个地方自行投票决定酒类是否可以买卖。——譯者

普尼斯說得好：“由于基督教社会党人的分析的基础是人类的博爱，而不是阶级斗争，他们都同党内机会主义派站在一起，而不是同革命派站在一起。”

党内的革命工人对中产阶级的侵入和导致这一现象的政策，感到十分厌恶。好几千人离开了党。其中一部分人对迷恋议会的官方政策发生反感，完全抛弃“政治”，走到工团主义的邪路上去。还有一些人仅仅脱离了党。在这一时期中，有好几千名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走散了，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他们都是第一流的人材，本来可以用他们建立起一个很伟大的党。

265

留在党内的革命战士居于少数地位，节节败退，没有适当的人来领导他们。“大门敞开的”社会党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改良派占多数的组织，革命的工人再不受欢迎了。

在1912年的代表大会上，右翼多数动员起来，完成了这一转变。他们通过一项党章修正案，宣布党要维护资产阶级的法律和秩序，禁止鼓吹可能侵犯它的任何工人阶级的行动方法。这个修正案就是臭名远扬的“第十一条第六款”，后来差不多一字不易地载入各州为了宣布世界产盟非法而通过的“惩治工团主义刑事法”中。修正案如下：

“任何反对政治行动或鼓吹以犯罪、破坏或其他暴力方法作为工人阶级的武器以谋取解放的党员，都应当开除党籍。政治行动应当解释为意指按照社会党纲领参加公职选举及实际立法和行政工作。”

这个措词狡猾的修正案居心要把革命工人排挤出去，以达到分裂党的目的。这个目的是大体上实现了。在代表大会通过修正案以后，左翼的战斗领袖毕尔·海伍德就被解除了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接着就有大批革命工人脱党。

改良主义的头子还以为，他们这种给人以体面印象的表演
266 会給社会党——即令不是社会主义——带来更多新党员和更多
选票。但是，在这方面，他们的希望悲惨地落空了。党员人数从
此急剧下降。选票也是如此。到1916年，党员人数已降到平均
数八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比1912年的平均数下降将近三万五
千人。那年，社会党所得的选票——由改良派本逊代替德布斯
担任总统候选人——降到五十八万八千一百十三张，比德布斯
1912年所得的选票减少三分之一。

社会党在1912年的清洗之后，从没有恢复元气，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战争又使得党员大批脱党
——这一次主要是右翼分子脱党。他们本来以为，从渐进改良
主义的纲领来看，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似乎并不那么困难和危
险，现在，他们觉得这种斗争是太困难太危险了。同时，战争和
俄国革命把大批外国出生的新工人带到国内来。这就使外国语
言分部的党员人数大大增加，给恢复了活力的左翼提供了新的
群众基础。

这个新左翼用俄国革命的伟大思想武装起来，他们的斗争
比原来的左翼有效得多。这一次，并没有发生纷纷退党、流散四
方的现象。机会主义的领导发现他们处于少数地位，就采用大
批开除的办法，分裂已成定局。在内部斗争和分裂之后，新的左
翼成立了共产党。

新的共产党成为后来十年内吸引美国激进主义运动中一切
活跃分子的磁极。社会党被甩到后边去了；分裂之后，它一天天
衰微下去。党员人数在1922年降到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人，到
1928年降到七千七百九十三人，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外国语言分
部的成员。（所有数字都引自香农引用的官方资料）

德布斯仍然是这个破碎不堪的組織的成員，但是他也挽救不了它。社会党已經不能吸引叛逆的青年人了，就是德布斯的具有魔力的名字也不能給它增添任何光彩。这位伟大的鼓动家在1926年与世长辞。在他的晚年，社会党的黨員、影响，一切的一切，都比二十五年前創立时少得多了。

九 德布斯在內部冲突中的作用

社会党無論如何是一定要发生变化的。在刚开始的时候，它可以做一个大門敞开的党，友好地接待一切色彩和傾向的激进分子；但是，它无法永久地保持它在創立时代的面貌。由于它的性質，它的社会成分注定要更加純一，它的政策也注定要更加明确。不过，改变的方向和最后变成一个改良主义的选举机器，却不是必然的。在这里，个人由于他們的行动和疏忽，起了作用，而起了最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則是德布斯。

德布斯在社会党內部斗争中的作用是这个运动全部历史上最有趣和最有教育意义的方面之一。說起来，奇怪而反常，这位无可非难的革命家的行为竟然是改良主义右翼所以能控制全党并且把革命工人赶走的最重要的原因。

他并不希望事情这样，而且本来还可以加以阻止，但是他还是讓这种情况发生了。从史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如果忽視这一点，就只能歪曲历史真相，掩蔽整个經驗中最重要的教訓之一。

德布斯是最孚众望的和最有影响的黨員。如果他全力投身在內部冲突中，他无疑能使多数人跟着他走。但是，他从来也沒有这样做。在每一个重要轉折点上，他都退在一旁了。他不参

加斗争正是改良派求之不得的，只要他参加斗争，他们就不可能胜利。

德布斯在他的公开鼓动演说中，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阶级斗争的路线。他坚定地维护产业工会制度，他从来没有像党内当权派那样在这个问题上妥协或退缩。他不需要骗取选票。他反对在党内占据领导职务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传道师。他的反对战争的立场是光明磊落的。他支持俄国革命，并且宣布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在一切这些问题上，他的同情始终一贯地在左翼方面，他屡次利用机会在左翼机关报《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表明他自己的立场。但是，他只能到此为止。每一次，在表明他的立场之后，他就退出了冲突。

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德布斯无疑地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工人对资本家的直接阶级斗争中，德布斯是一个无可非难的战士。任何力量和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在那个领域中把态度放和缓一些，把愤怒抑制一下。他对于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劳工骗子，也是从不留情的。

德布斯的弱点是在一个比较狭小、但是同样重要的领域中——党内政治和组织领域中。在这个领域中，他规避斗争。这种规避不是出于和平主义，而是从他自己的党的学说中产生的。

据我所知，德布斯的党的学说从来没有正式讲出来过，但是，从他在党的一切内部冲突中自始至终一贯采取的方针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本人总是维护革命的纲领，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党应该给其他各类的社会主义者敞开大门；他赞成一个大门敞开的党，党的团结是他的第一考虑。

德布斯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开除和分裂手段。他反对 1919 269 年的分裂,并且对这次分裂感到痛心。就是在分裂已成定局,左翼和右翼已经永远分手以后,他还是呼吁团结。

德布斯认为,一切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应该在一个组织中和谐一致地合作共事。在他看来,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倾向如何,都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同志,他不能忍受同志间的争吵。

在纲领的基本原则上意见一致的同志们们的关系,的确应服从这一崇高的原则,但是,当各派提出表达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纲领并且为此展开斗争的时候,这种原则就谈不上。如果革命派不让事情到这种地步,改良派也要让事情到这种地步。这就是当时社会党党内情况。德布斯超然地高出于派别之上,但是,这并不能制止派别斗争。而且,各派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少同志情谊。

德布斯在社会党内部冲突中的方针也受他的领导学说的影响。他倾向于把领导和官僚主义等同起来。他有意地使自己的作用只限于做一个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其他的事情都交给基层党员去决定。

他一再说,他不是一位领袖,也不想做一个领袖。这些话像他发表的别的言论一样都是真诚的。许多不动脑筋的人常常引证这些话,加以赞许。但是,主观愿望并不能取消领导在一切组织和一切集体行动中的决定作用。德布斯放弃领导,造成了一个真空,别的远为不称的领导人就跑来填充这个真空。而他们所带来的纲领却不是德布斯的纲领。

德布斯对基层党员几乎具有神秘的信心。他一再地表示,他相信,只要各方面都有善意,具有健全革命本能的基层党员会

270 把一切都整頓好。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他們从来没有出来这样做。基层群众在党内冲突中，像在工会中和更广泛的阶级斗争中一样，只有当他們是有組織的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而組織从来也不是自动实现的。它需要有领导。

德布斯拒絕积极参加派別斗争，拒絕作为有組織的左翼的領袖发挥他应有的作用，这就大大帮助了改良主义的政客。就在这里，他的一团和气和寬宏大量害了他，因为党也是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个舞台。德布斯大談“同志之爱”，他是真心誠意的，但是，机会主义的騙子手却根本不相信。他們从来没有相信。他們始終对党内的革命工人进行着恶毒的有組織的进攻。德布斯不参加斗争，就叫他們占了便宜。

德布斯的錯誤的党的学說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全部历史上任何革命者所犯过的代价最昂貴的錯誤之一。

資本主义的力量不在于它自己和它自己的制度；它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它在工人組織中还有支柱。我們現在都知道，根据我們从俄国革命及其結果中得到的启发，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十分之九就是在工人組織内部，包括在党内，反对资产階級影响的斗争。

改良主义的領袖是社会党内部资产階級影响的传播者，而且归根結底，派別冲突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現。德布斯显然沒有能認識到这一点。由于他超然地站在冲突之外，就使得机会主义者控制了党的机器，把他作为社会主义鼓动家所做的伟大工作，大部分都加以破坏。

在建立社会党的时候，德布斯所出的力比誰都多，但是他的錯誤的党的学說却成为社会党可耻地結束，几乎蕩然无存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們从德布斯那里得益很多，从列宁那里得益更多。在这里把德布斯的方針和列宁的方針比較一下，可以得到很大教益。

当我们从他們的始終一致的言行方面来看他們时，就可以看出，他們两人在性格上是非常相像的——在一切情况下都是正直而忠誠；大公无私；具有伟大气魄，毫不庸俗。对于他們两人來說，人类总的利益超出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他們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給我們树立了以美丽的英雄的一生致力于一个思想——也是一个理想——的榜样。关于实现这个理想的方法，他們在一点上有不同的看法。

他們都从一个前提出发：改造社会需要通过工人的革命。但是，列宁走得更远一点。他看到工人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具体现实性；他特別致力于研究怎样准备和組織这个革命。

列宁相信，为了爭取胜利，工人們需要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党；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具有革命綱領和革命领导的党——一个由革命家組成的党。他集中毕生主要精力来建設这样一个党，并且不断展开斗争，使这个党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和影响的侵袭。

列宁認識到，这就要招致內部的討論和冲突，但是，他从来没有退縮。孟什維克市僧們——相当于美国的柏格和希尔魁特之流——所以仇視他就是因为这个緣故，特别是因为他专心致志地集中精力为一个革命的綱領而斗争，而且在这场斗争中干得很好。列宁并没有因为孟什維克的仇視而退縮。列宁从心底

相信，党的內部問題就是革命的問題，而且他总是战胜了這些問題。

272 在1904年以後，德布斯一貫地拒絕參加決定政策的党的代表大會，並且始終婉辭負責解釋和實施政策的全國委員會委員的提名。列寧的態度與此截然相反。他認為党的代表大會是党的生活的最高表現，他总是參加代表大會，隨時準備為他的綱領而鬥爭。他認為，中央委員會是運動的執行領導機構，並且親自擔任它的首腦。

列寧寫過整整一本書，來闡述在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衝突。在那裡，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第一次發生了根本分歧。列寧很在行地參加了那場鬥爭。那場鬥爭後來證明關係着俄國革命和全人類的前途。

列寧把他自己對這場鬥爭的感覺同另一個驚慌失措的代表的感覺比較了一下。列寧寫道：

“說到這裡，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會上同‘中派’某一個代表的談話。他向我訴苦說，‘我們的代表大會充滿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呵！這是多么殘酷的鬥爭，這是怎樣在鼓動互相反對，這是多么激烈的論戰，這是怎樣的非同志態度呵！……’我回答他說，‘我們的代表大會是多么好啊！公開地、自由地進行鬥爭。各種意見都發表出來。各種色彩都暴露出來。各種集團都顯現出來。手舉過了。決議通過了。階段渡過了。前進吧！——這是多么好啊。這才是生活呢。這才不是無休無止的討厭的知識分子的無謂口角，人們結束這種無謂口角並不是因為他們已經解決了問題，而只是因為他們說得疲倦了……’

“這個‘中派’同志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詭异地聳了聳肩。原來我們用不同的語言講話。”（《進一步，退兩步》，英文版第225

頁注釋)①

他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回憶錄》中引証了列寧的這几句话，並且說：“這段話把伊里奇的意見表達得恰到好处。” 273

列寧時代的講求實際的聰明人瞧不起俄國流亡者的理論原則上的衝突，認為列寧是一個宗派主義的狂熱分子，喜歡為了派別爭吵而進行派別爭吵。但是，實際上，列寧却並不是為了瑣事而進行鬥爭。他認為，反對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机会主義的鬥爭是革命鬥爭的一個必要部分。因此，他才毅然投身於這一鬥爭。

應該記得，在這一鬥爭過程中建設起來的布爾什維克黨後來成了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十一 最重要的教訓

德布斯和列寧在革命社會主義的一般綱領上意見一致，在比較具體的問題，即黨的性質和作用問題上，意見不同。對於我國社會主義者來說，也像對於一切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一樣，這後來證明是我們時代的最重要的問題。

1917年的俄國革命澄清了這個問題。列寧的革命家的黨站起來，證明了自己的歷史正確性，同時，德布斯的大門敞開的黨却證明了自己的不濟。

這就是應該從兩國經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訓。這兩個國家相隔這樣遠，然而在它們的最後命運上卻又如此相互依賴和相像。

有人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俄國先於美國出現革命形

① 見《列寧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8-339頁。——譯者

勢，美国尚未出現革命形势。尽管如此，我們的比較仍然不失为有效。列宁对于俄国革命成功的最大貢獻在于他为这个革命所作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是在革命到来之前以在反动时期建設一个革命党作为开始的；而布尔什維克党又是在列宁的党的学說指导下开始建立的。

274

我們給德布斯时代的社会党下評語时，不能說它未能领导一次革命，只能說它沒有能抱着这个目的来进行工作，并据此挑选自己的党员。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的革命改造，也必須有社会的革命改造；不彻底做到这一步就只不过是資产阶级的改良而已。只有当社会党作为有觉悟的工具引导工人准备迎接必然的社会革命的时候，它才配得上叫社会党。这只能是一个革命家的党；由具有互相冲突的綱領的各色分子組成的一個大門敞开的党，是完不成这一任务的。

我們决不能低估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在本世紀头几年的成就，但是最好應該弄清这些成就究竟是什么。以党为中心組織力量的社会主义运动使千千万万的人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的总的前景；它为未来的革命运动的主要干部提供了一个第一次聚集起来的場所。在一切其他事情都已經成为历史陈述的时候，这就是剩下来的实际結果。这是早期的社会党——尤其是德布斯——的历史功績。

但是，这些不可抹煞的成就毋宁說是一个試驗型的社会主义組織的副产品。这个組織，按其本性來說，只能是暫時性的。社会党本来想要充当工人反对資本家的阶级斗争工具。但是，它却把小資产阶级的改良派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包括到一个政治組織中来，这只能是把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引进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其結果是，从党成立的那天起，內部冲突就始終不断。

党终于瓦解，革命分子终于决定建立自己的党，这都是整个试验的必然结果。

在俄国的运动中，列宁预先看到这一切，革命因此而受益。在俄国革命之后，美国社会党的左翼，还有一部分工团主义者，也认识到列宁的方法的优越性。那些认真看待社会主义纲领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走列宁的道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理所当然地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切国家革命工人的榜样。 275

共产党在1919年的建立，不仅是同原有的社会党决裂，而且更重要的还是同革命派和改良派并存的党的整个观念决裂。这就意味着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开端，它的历史重要性远远超过以往发生的一切事件，包括社会党在1901年的建立。决不能再回到过去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威信扫地的运动去。

自从1919年的新开端以来，新的运动也碰到自己的困难，犯下自己的错误。但是，这些困难和错误同早先的困难和错误不属于一类，必须分开来考虑。旧的运动的可怜的思想武器是无论如何解决不了这些困难和错误的。

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和叛卖的斗争是建设一个诚实的革命党的先决条件。这场斗争需要从另外一个武库中去取得武器。在这方面，俄国人也是我们的老师。列宁的共同工作者和继承人托洛茨基给我们提供了反对斯大林的叛卖行为的纲领武器。

决不能再回到过去的美国运动去了。在德布斯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有些江湖骗子按照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的人数来衡量它的价值，他们在原来的社会党身上发现了新的优点，因为它在德布斯的时代曾经获得那么多选票，因此，他们就建议按照同样的方针进行一次新的试验。这个药方对社会主义先锋队来

說，是一個一錢不值的建議，此外，它還是對德布斯的英靈的侮辱。

276

德布斯所以值得我們紀念，是因為他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的積極貢獻，而不是因為他的錯誤。德布斯是我們最傑出的社會主義鼓動家，他是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在危險和困難的時候，他始終堅守在階級鬥爭的崗位上。作為這樣一個人，他畢生的工作將永遠是革命工人的寶貴遺產。

從這方面來紀念他是紀念他的最好辦法，同時，從這方面來紀念他也就夠了。他曾經十分出色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但是，這個事業的勝利需要一個同他當年支持的黨有所不同的政治工具——一個不同的黨。這個黨的榜樣就是列寧的黨。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偉大的序幕

277

一 大胆的规划

1905年6月，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成立大会在芝加哥开会，当时，促成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总罢工运动已经在进行中；它的回声已经响彻大会的大厅。这两个发生在同一时间的事件昭示了世界的未来。芝加哥的领袖们欢呼俄国的革命，把这个革命看做是自己的革命。这两个互不相关的事件，在相隔半个地球的地方同时发生，标志着一个革命世纪的开始。它们是未来局势的序幕。

遭到失败的俄国1905年的革命为1917年的胜利的革命铺平了道路。正如列宁所说，它是一场“预演”。这一估计现在已经得到举世的公认。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成立大会也是一次预演；它的重要性，最后分析起来，很可能毫不逊于和它同时的俄国行动。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创立人无疑是大工业中现代产业工会最初的鼓动者和首倡者。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过，即令承认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是今天的产联的前驱，那也远不是对它的历史意义有了充分估计。现阶段的产联同1905年创立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先驱者的理想比起来，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

世界产盟成立大会在一个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把我们前人

278 当中的三位巨人——德布斯、海伍德和德利昂——团结在一起。他们有不同的经历，来自不同的活动领域，他们也很快地分道扬镳了。但是，他们的言行，他们联合起来创立一个新运动的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为美国工人阶级起草了一份宪章。这份宪章已经鼓舞和影响了不止一代的劳工战士。而且，在它的主要点上，它还将影响未来的世代。

他们都是巨人，站在一起就显得更其高大了。他们不同于他们的同代人的地方，他们不同于今天的工会领袖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有不计个人名利的无限远大的雄心壮志，他们眼光远大，预见到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将要建立起来的世界，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这一事业。

响应号召参加世界产盟成立大会的其他代表，绝大多数也都是具有同样品质的人。他们都是向资本主义社会宣战的不随流俗的人，是不调和的硬骨头。世界产盟就是由这些激进分子、叛逆分子和革命者创立起来的，正像我们历史上一切其他进步运动都是由他们创立起来的一样。

今天的劳工领袖都拚命装作好像是青年商会的候补会员似的。在这样的日子里，回想一下说不同语言的人们的生平事业，的确可以令人心神一爽。德布斯、海伍德、德利昂和他们的同志们，不相信龔柏斯之流当时所鼓吹的劳资合作的论调。他们在世界产盟章程的著名“序言”中说，这种论调“会把工人引入歧途”。他们当年早已反对过今天的产联领袖所鼓吹的所谓工会和工业私有制可以永久“共处”的思想。

世界产盟的创立人是产业工会主义者的先驱，今天的各大产业工会都是从他们那里发源的。但是，他们的目标远远不只是产业工会制度。他们并不把产业工会看做是一种讨价还价的

279

机构，承認工业私有制是天經地义、万世不变的。他們認為，資本和劳动的关系是一种战争状态。

④ 布里森登在准确翔实的世界产盟史中扼要地說明了他們的主要思想：“階級冲突的思想的确是世界产盟的根本观念，或者說是‘第一款’。他們所以采取产业工会制度，是因为这一制度使他們有可能在比較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这场階級战争。”（保尔·腓德烈·布里森登：《世界产盟：美国工团主义研究》，第108頁）

世界产盟的創立人認為組織产业工会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他們所怀抱的目的就是，推翻資本主义，代之以新的社会秩序。他們的綱領的灵魂就在这里。这一目的現在还有待美国工人的革命加以实现。当那个革命到来时，它也决不会不承認它的序幕开始于世界产盟的成立大会。因为，那次大会在五十年前就公开宣布了工人斗争的不折不扣的革命目标。

* * *

起草这个大胆的計劃的是西部矿工联合会总書記毕尔·海伍德。世界产盟的成立大会就是由他主持的。他在开幕詞中宣布大会开始时說：

“这是全大陆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大会。我們到这里来是为了把我国工人組織在一个工人階級运动之中。这个运动的目的将是把工人階級从資本主义的奴役束縛下解放出来。”（《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記錄》，第1頁）

今天的行业工会已經逐漸同意黑人也是人，也有权利生存和参加工会。世界产盟在这个問題上，也和在许多其他問題上一样，比它們先进五十年。龔柏斯的許多原有的工会都是純白人垄断就业机会的托拉斯。它們不准黑人参加，不讓黑人在自 280

己的管轄範圍內受雇。海伍德在開幕詞中憤慨地譴責了“勞聯所屬的”各工會“在自己的章程和細則中禁止有色人種入會，或者對他們強加義務”。他後來又在批准這個章程的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這個新成立的組織“對於種族、信仰、膚色、性別或先前的工作條件的分別，一概不予承認”。（《會議記錄》，第575頁）

而且，他最後還預言式地建議美國工人走俄國人的道路。他說，他希望看見這個新的運動“在全國壯大起來，把絕大部分勞動者都吸引進來，這些勞動者將像俄國工人階級今天所做的那樣，起來反抗資本主義制度”。（《會議記錄》，第580頁）

德布斯說：“當前最高的需要是建立一個健全的革命的工人階級組織……它必須表現階級鬥爭。它必須承認階級界綫。當然，它還必須具有階級覺悟。它必須毫不調和。它必須是一個普通工人的組織。”（《會議記錄》，第144、146頁）

至於德利昂，他說：“我只有敵人——這個敵人就是資產階級……我的理想是推翻資產階級。”（《會議記錄》，第147、149頁）

當時，思想家德利昂已經不僅考慮到推翻資本主義問題，而且進而考慮到“勞工共和國的政府管理形式”問題。代表大會之後，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發表演說，闡述“世界產盟的章程序言”。他說，各種工業“不管以前的政治界限如何，都將成為新中央當局的選區。這個新的中央當局的腳手架上星期已經在芝加哥大體上搭好了。世界產業工人聯盟總執行委員會的所在地，也將成為全國的首都”。（德利昂：《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

281 其他人的演說和代表大會通過的正式宣言——章程序言——也採取了同樣的方針。章程序言一開頭就斬釘截鐵地肯

定階級斗争：“工人階級和雇主階級毫无共同之处。”接着，它又說：“在这两个階級之間，必然要展开斗争，直到全体工人在政治領域中，也像在工业領域中一样”，把我国各种工业“拿过来加以控制为止”。

这些言論是截至当时为止我国最不調和的和最明确的革命意图宣言。在这以前，也有別的人提出过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必須通过爭夺政权的斗争来实现这个目标和必須組織工人政权的思想，却是在世界产盟的成立大会上，才得到清楚的表述和明确的闡释的。

1905年的人物講出的真理比他們所知道的还要多，即令他們还只是一項有待他人完成的历史任务的預告者。世界产盟从成立之日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开始衰微时止，在行动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績。但是，它作为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进步因素的地位，却完全是由成立大会的勇敢而具有远見的宣传牢牢地确立起来的。思想是行动的种子。

世界产盟也有它自己的先行者，因为革命劳工运动是一条无法切断的水流。在五十年前的芝加哥大会以前，还有劳工騎士团；秣市烈士所领导的八小时运动；美国铁路工会的产业工会大罢工；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暴风雨般的斗争；以及两个社会主义的政治組織——老的社会劳工党和新成立的社会党。

这一切先前的运动都对世界产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所貢獻，并且都派了代表参加大会。高貴的烈士帕森斯的寡妻、战士露西·帕森斯就是一位代表。矿工們敬爱的領袖馬瑟·琼斯也是一位代表。他是矿工們在艰难困苦当中的希望和勇气的象征。 282

这些先前的运动和斗争，丰富的和悲剧性的經驗，为世界产

盟的成立大会鋪平了道路。但是，德布斯几个月以后在一篇演說中大致說得不錯：“工人階級的运动将从 1905 年算起，将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成立之日算起。”（《尤金·德布斯著作和講演集》，第 226 頁）

二 一个革命家的組織

一切工会的建立都是从一个簡單前提开始的，那就是要保卫工人的当前利益不受雇主的侵犯。世界产盟也从这个前提出发，决心要成为一个产业工会运动，把全体工人都团結起来，而不問他們的一切差別怎样。作为一个产业工会，世界产盟在它的全盛时期領導了經濟領域中的好些令人难忘的斗争，并且为后来建立产联的大規模斗争，确立了組織方式和战斗性的罢工战略。

只是在世界产盟在言論和行动上維護和宣传了产业工会主义的綱領以后，只是由于世界产盟做了这些工作，产联才得以建立起来。单单这一点——工会运动領域中的宣传和示范作用——就足以确立世界产盟作为創始者，作为現代产业工会的先行者的历史意义，因而也足以使許多人为它付出的全部精力和牺牲得到一千倍的补偿。

但是，世界产盟还不只是一个工会。同时，它还是一个革命組織。它的簡單而强有力的思想鼓舞和推动了当代最优秀的青年战士，鼓舞和推动了一代激进分子的精华。世界产盟的名字所以光輝四射，原因首先就在这里。

世界产盟作为一个革命組織的真正性質，在它成立的第一年中，就在內部冲突中得到确凿的証明。这种內部冲突在第二

次代表大会上造成了一次分裂。引起分裂的問題，在正常情况下，都是政党关心的問題，而不是工会关心的問題。世界产盟第一任总主席查尔斯·薛尔曼贊成产业工会这一組織形式。但是，他显然只願到此为止。对于那些認真看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革命宣言的人來說，这是远远不够的。他們不满足于仅仅在口头上贊揚大原則。

1906年9月，世界产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会，当时，海伍德正在爱达荷州的監獄中等候决定生死的审訊；德布斯站在一边，因为他从来也不贊成派別活动。文森特·圣約翰則挺身出来，与德利昂結成联盟，成为反薛尔曼派的領袖。他本人就是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一位杰出人物，而且也是西部矿工联合会派赴世界产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团员。

像通常在派別斗争中一样，人們提出了各种各样次要的指責。但是，圣約翰却按照他平素一貫的直爽作风，提出了促使他和他的支持者起来反抗的眞正爭执点。

这位坚毅的人物所以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展开斗争，据他自己說，是因为：

“控制世界产盟的人們不按照本組織的革命綱領办事……爭夺本組織控制权的斗争把第二次代表大会分成了两派。代表大会的多数票是在革命派方面的。反动派掌握了大会主席，使用了阻挠战术来控制大会……革命派用取消主席职位，从革命派当中推选一位大会主席的办法，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文森特·圣約翰，《世界产盟：历史、結構和方法》）

这一行动促成了分裂。薛尔曼从此就被打入历史冷宮，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因为不是革命派而被抛弃的工会主席，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位。将来还会有

別的人，但是薛尔曼的名字将作为典型而載入史册。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也促使西部矿工联合会脱离了世界产盟。西部矿工联合会是世界产盟在开始时唯一的有强大組織的工会。西部矿工联合会代表团的其他团员早已轉向保守方面，他們在爭执中支持薛尔曼。但是，圣約翰按照他的天性和他一貫所起的作用，坚持原則。

他不能不决定何去何从：究竟是留在名聞全国的、富有的西部矿工联合会中呢（他原是这个联合会的专职負責人員），还是坚持世界产盟的綱領和原則，留在这个貧穷的、还不大知名的世界产盟中呢？他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后者。对于他來說，也像对于世界产盟历史上其他重要人物來說一样，工人利益和工会飯碗問題是次要的問題，首先必須忠于革命原則。

薛尔曼和他的支持者們在警察的帮助下，强占了总部，劫持了这个組織的全部經費。圣約翰說，新当选的負責人員“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不得不在連一枚邮票也沒有的情况下开始工作”。（見前引布里森登書，第144頁）圣約翰从此就成为后来十年中世界产盟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在他領導下的新机构不得不重头做起，有形資產一无所有，只有綱領和理想。

綱領和理想，加上圣約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証明足以使这个破碎的組織不致解体。薛尔曼派，在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对抗組織，但是，並沒有能維持很久。圣約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証明自己是真正的世界产盟。不过，在后来的几年中，它主要是一个对資本主义制度宣布全面开战的革命組織，而不是一个为有限的經濟要求斗争的群众性产业工会。

作为这样一个革命組織，世界产盟把一大批优秀的青年革

命战士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作为一个工会，这个組織領導了許多罢工。在罢工期間，會員人数都暂时有所增加。但是，在罢工結束以后，不管是取得胜利，还是遭到失敗，都沒有能維持穩固的工会組織。每次罢工之后，會員就只剩下一小批在原則基础上團結起來的核心干部了。

三 世界产盟的双重性

世界产盟从馬克思主义学來了一些东西，事实上是学來了不少东西。它的两个主要武器——階級斗争的学說和工人們必須通过自己的有組織的力量自謀解放的思想——都是从这一庞大武庫中取來的。但是，尽管如此，世界产盟仍然是美国环境的真正土生土长的产物，它的理論和实践都必須按照当时在我国展开的階級斗争的背景来考察。

当时，美国工人階級还没有認識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階級，它的經驗是有限的，概括性的思想，就是对它的最优秀的代表而言，也是相当不完备的。階級斗争的确很活跃，但是还没有超出它的初期阶段。当时，冲突形式一般还是各自为政的工人群众和雇主之間的局部游击冲突，双方都很野蛮。雇主方面使用的政治力量还主要是地方当局的力量。

联邦当局的确曾經派遣軍隊去打破 1894 年美国鐵路工会的罢工(歇斯底里的报纸称之为“德布斯叛乱”)，而且还派遣軍隊去对付西部的金属矿工。但是，这些都是例外的情况。在現在，联邦政府以全体資本家的执行委员会身份进行干涉的現象，已經成为劳資关系中的經常性的突出的因素，但是，半个世紀以前，在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冲突中，这种現象还是很少見的。工人

286

們一般是把地方当局和联邦当局区别开来，拥护联邦当局——直到今天，大多数工人还是这样，这是过去的传统的残余。

在1905年世界产盟登上舞台的时候，许多人还看不出，全体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展开全面斗争，而以国家政权作为他们的必然斗争目标。世界产盟的创立人的宣言和后来由此产生的一切行动，都应该按照这个背景来考察。他们的纲领是从当时美国的阶级斗争中得出来的。由于这个斗争规模有限，他们五十年前的远见就更加显得惊人。

当时，工人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最初步的阶段，它的许多错综性和复杂性还没有在行动中揭露出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世界产盟的领袖们就预见到工人阶级的革命目标，并且致力于制订一个组织斗争的单一的、全面的公式。他们把一切都归入一个项目下，并且着手建立一个“足以完全满足工人需要的”组织——它的主要领袖和鼓舞者文森特·圣约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就是这样说的：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工会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简单的公式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但是也有一个弱点——一个矛盾。后来的经验揭示了这一点。

世界产盟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后来从未解决的最重要的矛盾之一，就是它给自己派定了一种双重角色。它企图既是一个全体工人的工会，又是一个经过挑选的革命家组成的宣传机构——实质上是一个党。这是它最后遭到失败——作为
287 一个组织来说——的相当重要的原因。两种不同的任务和机能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要求建立互相分开的组织，但是，这两种不同的任务和机能都由世界产盟独力承担起来；这种双重性就妨碍了它在两个领域中发挥有效作用。对于这一切和许多别的问题，当时，世界产盟的富于战斗精神的领导人，或国内任何其他

人，都还不能像我們現在看得这样清楚。

世界产盟宣布自己是一个大門敞开的工会；它欢迎一切願意在通常的工会基础上参加組織的工人加入，不管他在任何別的問題上的观点和意見如何。在許多場合，在各地开展吸收新會員运动和举行罢工的时候，也确实做到了这一步，当然为期是很短的。尽管这样，这并没有妨碍世界产盟的鼓动員在每一次罢工集会上鼓吹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

世界产盟的罢工集会事实上成为“社会主义的学校”。当前的有关罢工的問題成为闡明階級斗争的原理，全面反复痛斥资本主义制度和宣传自由平等的新社会秩序的起点。

世界产盟公开宣布的“非政治”政策同它在行动中的实际記錄，并不十分相符。它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反对現存社会秩序的鼓动和宣传——在街头演說，散发报纸、传单和歌本；展开保卫入獄工人的运动；在許多地方发动爭取言論自由的斗争。这一切活动基本上都是政治活动，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活动。

世界产盟自始至終，甚至在吸收信教的、通常很保守的工人群众参加罢工期間，也像一个革命家的組織一样活动。“真正的世界产盟盟員”、常年的活动家，博得 Wobbly 的綽号（究竟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取这样一个綽号，已无可查考）。Wobbly 的衡量标准就看他是不是坚持階級斗争的原則和它的革命目标；是不是願意毕生献身于这一事业。²⁸⁸

世界产盟在全盛时代，事实上既不完全是一个工会，也不完全是一个党，而是兼而有之，又有几分欠缺。它是一个布尔什維克党的不完全的先驅，但又缺乏布尔什維克党的完备理論，同时，它又是未来的革命产业工会的蓝图，但又缺乏必要的群众性的會員基础。总之，它是它自己。

四 文森特·圣約翰

世界产盟的第二次分裂也是因为一个理論問題而发生的。分裂的結果,德利昂和社会劳工党分子就在第四次代表大会(1908年)上脫离了世界产盟。这一次,爭执点是“政治行动”問題,更正确地說,是双方对于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行动的互相抵触的看法,因为阶级斗争从它本来的意义上來說,在本質上就是政治性的。

这一分裂的真正目的是要把世界产盟从社会劳工党对于“政治行动”的极端合法主义的、狹隘的和教条主义的看法——他們認為“政治行动”就是投票箱前的行动——下解放出来,并且为圣約翰关于通过有組織的工人的“直接行动”推翻資本主义的看法鋪平道路。根据一个肯定很武断和不确切的定义,代表大会宣布这种行动完全是“非政治性的”。

1908年的代表大会仅仅消极地从章程序言中删去了“政治条款”。后来,由于遭到失敗,世界产盟就明确地宣布和“政治”,連同“政党”,完全断絕关系。这一傾向的渊源通常都归之于法国工团主义的影响,这是錯誤的;当然,世界产盟后来也从欧洲輸入了某种玩弄詞句的排斥政治的激进主义,而使自身蒙受損害。但是,布里森登說得很对:

“世界产盟运动的主要思想——可以肯定1905年以后头几年世界产盟运动的主要思想是如此——是起源于美国的,而不像通常所設想的那样起源于法国。的确,在九十年代初,法国酝酿着这种情緒,但是,在美国也酝酿着这种情緒,而且美国的情緒同法国的情緒是根本不同的。只是到1908年以后,法国的革

命工团主义才对这里的革命产业工会运动产生了一些直接影响。”(見前引布里森登書,第 53 頁)

世界产盟式的工团主义(它的倡导人坚决要把它叫做“产业主义”)从来没有承認它起源于法国,也没有理由这样做。世界产盟的学說是 *Sui generis* (独具一格的),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它的主要制訂人文森特·圣約翰也是这样。一切老一輩的人都知道,在决定英雄时代的世界产盟的性質方面,圣約翰功劳最大。他在公众当中的威望同毕尔·海伍德的光輝名字比起来,略逊一筹,这就使沒有系統研究过世界产盟历史的人发生誤解。事实上,干部的組織者和領袖是文森特·圣約翰。

海伍德本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所得到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成立大会就是由他主持的。他在成立大会上的庄严发言,我們已經在本文的开头引証过。这位“大哥”在爱达荷州著名审讯中的表現不愧为一位劳工英雄,后来,在世界产盟领导的劳伦斯、帕特孙和阿克伦等地的大罢工中,他又轟动一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在 1914 年,他从圣約翰手中接过了世界产盟总書記的职务,此后在战争和迫害的暴风雨般的年代里,他一直担任它的首脑。公众把毕尔·海伍德的名字和世界产盟的名字視为一体,把他看做是它的化身,这是历史的公道之处。

但是,在 1906-1914 年,在确定世界产盟的性質和罗致它的基本干部的年代中,领导这个运动和指揮它的一切活动的,却是文森特·圣約翰。如果把这一章略去,世界产盟的历史就会不完全,不真实。

圣約翰像海伍德一样是一个矿工,是一个靠自学成功的人。他好不容易才在西部矿区的激烈阶级搏斗中升到全国聞名的地位。他的所有朋友都称他为“圣徒”。如果这位圣徒从別人,而

290

且是从外国人的著作中借用了什么东西,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他不是个知识分子,他的学校就是他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他的信条就是行动。他知道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主要是从生活和同别人交往中学来的。他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种经验主义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作为一位处理实际问题的领袖人物,他确是轶群绝伦。他善于出主意——足以“偷天换日”——而且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把这些主意付诸实施。在行动中,他主张迅速地大刀阔斧地采取决定,走捷径。这一脾气使他在担任西部矿工联合会执行领袖期间,取得卓著的成绩。他在西部矿区中享有盛誉,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承认他的力量。布里森登从一个矿主偵探机关 1906 年的一份典型的报告中引过一段话:

“圣约翰在过去一年给(科罗拉多)矿区的矿场主造成的麻烦比那里随便什么二十个人所造成的麻烦还要多。如果对他不加约束,再过一年他就要把整个矿区都组织起来。”

在和人交往——所谓“驾驭人”——方面,圣约翰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凭着敏锐的洞察力来“衡量”人,既朴实又狡猾,善于发现和淘汰骗子手和半瓶醋,——要圣徒合作得好,你就得认真地干——善于叫人在他那种通过实践学习的学校中工作,并且发挥自己的最大才能。

“经验”、“果断”和“行动”——这就是圣约翰衡量人的主要标准。他按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来衡量一个人。他常常用下面的话对人表示赞许:“他有丰富的经验”,“他再有一点经验就行啦”。有一次我听到他用一定的保留态度谈到另外一个人(这个在世界产盟中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他很会演说,不过我不知道他做事是不是果断。”在他的词汇中,“经验”是指战斗

的考驗。“果斷”是指一面思考一面行動的能力；是指當機立斷，不“空談理論”，不逡巡猶豫的能力。

聖約翰作為果斷的實行家的優良品質是有傳染性的；他吸引了志趣相投的人，他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一個組織。他不是個喜歡拍拍下級肩頭的上司，而是一位領袖，他有一位領袖應有的審慎態度，他並不單單用辯論來說服人，事實上，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他的主意和方法就在他的生活中。他誠懇、正直、大公無私、染不上任何污垢，也絕不會浮誇做作。在他的面前，空氣也是晶明的。

在他領導下工作的青年人——在當時這是一批傑出的幹部——都憑着聖徒的名義發誓。他們相信他。他們覺得，他是他們的朋友，他愛護他們，只要他們對組織忠誠老實，他總是會公平對待他們的。約翰·甘姆布斯在《世界產業工人聯盟的衰落》一書（布里森登的歷史著作的續編）中說：“我听人說，在傑出的領袖當中，聖約翰是世界產盟歷史上最受愛戴的一個，也是最受完全信賴的一個。”他聽到的話是不錯的。

在聖約翰影響下發展的世界產盟輕蔑地拒絕了把“政治行動”局限於議會程序的狹隘觀念。按照聖約翰的理解，階級鬥爭就是一場爭奪政權的無情鬥爭。不徹底做到這一步是不行的，採取其他辦法也是不行的。他像列寧一樣肯定地相信這一點。他按照他眼前的兩個例子來判斷社會主義者的“政治”和政黨——柏格和希爾魁特掌握的社会黨和德利昂的社会勞工黨。這兩個黨，他都不喜歡。

這種態度就實際情況而論，是肯定正確的。柏格是一個眼光短淺的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者；希爾魁特顯然比較圓滑老練，

292

赤裸裸的柏格主义不受左派的攻击。

德利昂当然要比这些自命不凡的侏儒好一万倍；他远远高出他们之上。德利昂有各种巨大的优点和能力；他公而忘私，他完全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的事业；他对敌人毫不妥协，值得我们爱戴和钦佩。但是，尽管这样，德利昂所采取的策略却是宗派主义的，他对政治行动的看法是拘泥于形式主义的，被合法主义的迷信弄得毫无生气。

照我看来，圣约翰对柏格和希尔魁特采取敌视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他同德利昂决裂，也有一半以上的地方是正确的。他反对柏格和希尔魁特的议会改良主义和社会劳工党的极端合法主义，这种态度有许多地方现在必须认为是健全的和正确的。他的错误在于，他只根据这些微不足道的有限的例子，就普遍地反对一切“政治”和一切政党。他的观念的缺陷就在于很不全面，因此，很容易被别人加以夸大，一直到加以曲解。

圣约翰习惯于从他自己生活中的有限的局部的经验和观察中学习，而不从书本上学习；他力求在直接的行动中求得简单的解决。这种长期养成的癖性，使他不能利用别人从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经验中概括出的更为全面的理论。世界产盟作为一个运动来说，大体上也是这样。由于过分简单化，它的一般观念就具有了某种极其有害的局限性，发展到最后，在远不简单的局势下，就给世界产盟带来了致命的后果。但是，这需要时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时候，世界产盟的指导思想的不完备性才充分暴露出来。

世界产盟对議會政治的蔑視开始被解释为反对一切“政治”和政治組織。但是,这种态度并不是强加在一群无主見的盟員身上的。世界产盟不能不在当时条件所决定的領域中开展自己的主要活动,因此,差不多自然而然地它就有了一批根据自身的經驗具有同样傾向和偏好的新盟員。

世界产盟的組織計劃是針對我国东半部現代大工业而制訂的。工人的主要力量就集中在那里。但是,剝削階級的力量也集中在那里,組織工人同陣地巩固的公司进行斗争,說起来要比做起来容易。

世界产盟制訂自己的革命綱領的目的,首先是要表达东部托拉斯化工业中的基本无产階級主要群众的潜在傾向。在那里,工資工人改变階級身份,成为独立的有产者或小农的可能性,要比在西部边疆小得多,因为在西部边疆,改变階級身份仍然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如果階級斗争的邏輯刻板地实现的話(在适当時間,总是会实现的),按說,密西西比河以东各工业中心的工人应该最具有階級覺悟,最乐意响应世界产盟的号召。

但是,当世界产盟作出最坚强的努力的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世界产盟从沒有能在工业发达的东部現代机器工业的工人中間建立起穩固的工会。相反地,它的主要活动却在我国西部边沿上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綫发展起来。当时,西部边疆还在建設中。那个地区的漂泊不定,只能勉强糊口的工人更愿意响应它的号召。它的主要干部也是从那些工人当中选拔出来的。

在国际經驗中，这种表面上反常的現象也是屡見不鮮的。其实，这不过是說明从现实到觉悟要經過一段時間而已。那些由于工业发展最有条件接受社会主义的工人，并不总是首先認識社会主义的人。

革命运动总是首先在它办得到的地方，而不是在它所选的地方吸收新成員，并且总是把第一批新成員当做組織的骨干和学說的宣传者。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是邏輯的和必然的答案，但是，它在英国开的头最不順利，拖延的时日也比較长些，而英国却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代世界资本主义突出的中心；另一方面，在大規模工业化以前的德国，它却得到蓬勃发展。在爭夺政权的实际斗争中經過列宁发展的同一馬克思主义——又称为布尔什維主义——，对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來說，是最好不过的綱領，但是，它却在工业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了胜利。

归根結底起决定作用的是經濟因素，在一切地方，階級斗争都要按照它的邏輯規律发展——但这只是从长远來說，并不是沿直綫进行的。工人的階級斗争，在其一切表現中，从一个工会組織最起碼的行动直到革命，都要在最薄弱的环节来打破資本家抵抗的鏈环。

世界产盟的情况也是这样。世界产盟单单有正确的組織形式，并不能說就找到在托拉斯化的工业中迅速取得胜利的鑰匙。它的創立人在1905年的代表大会上曾經指出并且強調說明，在这一領域中陈旧的行业工会制度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他們建議采取产业工会組織形式的公开动机。但是，在一个很长時間內，打破那种現代工业中旧有行业工会的集中的力量也还是相当强大的，足以阻止用新的产业工会来代替旧的行业工会。

世界产盟在产业工会的天然地盘建立革命产业工会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少成绩，这并不是因为不努力。世界产盟一再地企图攻入托拉斯化工业中，包括钢铁工业，但是，每一次都被击退了。世界产盟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组织工作的一切英勇努力都是孤立分散的活动，并且从一开始就被击破了。

雇主们极其认真地对新的工会运动进行斗争。为了对付世界产盟的纲领及其一小批鼓动家，他们动员了他们的金钱重炮；动员了报纸和牧师所制造的支持他们的舆论；动员了他们私人雇用的大批劳工密探和工贼；而且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要动员世界产盟所不愿承认的那个“政治国家”的警察力量。

在世界产盟展开最激烈的斗争的年代里，世界产盟在现代化的大工业中，也只是领导了几次局部性的罢工，而且这些罢工几乎全部失败了。1912年胜利的劳伦斯纺织工人罢工确立了世界产盟的全国声誉，但是这次罢工只是一个光荣的例外。在东部任何地方，他们一天也没有能建立起任何稳固的和永久性的工会组织，甚至在劳伦斯也是这样。

从世界产盟在1905年的代表大会上制订产业工会纲领到这个纲领最后在大工业中实际实现，中间有一条迂回曲折、漫长崎岖的道路。经过三十年的宣传和不断犯错误又不断试验的努力，经过一次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所促成的火山式的大规模爆发，产业工会主义才攻入和占领了大工业的各个堡垒。不过，在世界产盟第一次发出号召，开始自己的开拓活动的时候，这种不可战胜的大规模反抗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在这一段时期之中，世界产盟在工人还不愿意组织起来而公司又极力阻止工人组织起来的东部工业区，遭到了失败和挫折，但是，它却在西部得到最热心的响应，因此，它也就把主要活

动集中在西部。它在那里取得了一些成绩，建立了一个组织——主要是在季节性的和漂泊不定的工人中间。

六 世界产盟盟员剖视

在世界产盟的时代，还没有所谓“充分就业”。经济循环以十年为期正常地进行着，周期性地发生危机和萧条，在东部工业中出现了一支剩余劳动大军。失业现象随着经济循环各阶段的交替而起伏，但是，始终是当代的一个不变的特征。1907年的经济危机和1913-1914年的严重萧条使失业大军大大扩大起来。

许多失业工人，特别是年青人，都背乡离井，就像后来在三十年代另一代人那样，外出求职。正在发展的西部需要一支流动的劳动队伍，许多人都拥到那里去。当时，西部的机动的劳动队伍，有很大一部分，或许还占多数，都是从大陆东半部迁移过去的。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

他们不是工人阶级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因为这部分人当时和现在一样是住在大陆东半部各工业中心的。但是，这些漂泊者，不管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总是最积极地响应世界产盟关于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纲领。

世界产盟在下列各类工人当中受到欢迎：临时工，他们在收割谷物的田地上打短工，乘搭货车依次到谷物成熟的各地区，然后又搭货车回到运输中心，在那里随便找一些活来干；铁路建筑工人，他们出外找些临时的工作，然后又回到城市里来，重新加入失业队伍；伐木工人，金属工人，海员等等，他们生活没有保障，就是有工作的时候，也是最恶劣、最原始的条件下工作。

这一批范围不大、沒有定居、权利最少的工人阶层就成为世界产盟的大部分盟員。盟員們常常半开玩笑地說，他們的組織 297 的名称“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应该改为“世界漂泊工人联盟”。

西部地区日益扩大，流动性的劳工队伍日益扩大，但是，美国政治制度却沒有給他們留下任何参与政治的余地。沒有任何一种規定来照顧他們。通盘的計劃都把他們忽略了。他們不具备定居年限的条件，不能参加投票。在当地有利害关系的定居居民的各种政治民主权利，几乎也沒有他們的份。他們是流离失所的人，是无家可归的化外之民，是社会上的无根之草，无源之水，也沒有什么东西可以損失。

由于他們一点选举权也沒有，所以不費什么唇舌就能使他們相信，投票箱前的“政治行动”是一种欺騙，是一种圈套。他們凭着自己的痛苦的經驗已經深信，要使剝削者交出他們的大大扩大的特权，单靠紙做的选票是不行的。世界产盟拥有通过直接行动发动革命的大胆彻底的綱領，說出了他們心底的話，因此，他們很乐意听。

世界产盟成了可以完全滿足他們的需要的組織——它是他們的工会，他們的党；是他們的社交中心，是他們的家；是他們的亲人；是他們的学校；还可以說是他們的宗教，是他們賴以生活的信仰，只不过沒有鬼神罢了。应该記得，乔·希尔的一部分最优秀的歌曲就是模仿宗教贊美歌而写成的諷刺詩。在西部和中西部各城市的拥挤不堪的貧民区，当年有不少无事可干的流浪工人，世界产盟的对手就想利用宗教贊美歌，来同世界产盟爭夺这些流浪工人的灵魂。

这些流浪工人同今天住在这些貧民区的流浪汉不同。当时，他們大多数都是年青人，富有冒险精神。他們原先也在比較

298 安定的大工业中工作，后来才被排挤出来，或者是离开了那些地方去寻找好运和冒险。他们受到了严重创伤，失败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有勇气有决心为改善他们的恶劣境况而斗争。

等到他们参加了世界产盟以后，对他们来说，那就比参加一个工会来促进个人眼前的渺小利益有了更大意义。世界产盟告诉他们，通过团结，他们可以赢得一切。它向他们展开了一个新世界，鼓舞他们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普遍利益而斗争。

世界产盟通过宣传和行动吸收进来的流浪工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成了它的伟大而又极其简单的学说的传播者——这个学说表现在一些具有魔力的字眼中：团结，工人的力量，统一的大工会和工人解放。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他们都表示了他们的信念：“工人们，团结就是力量”，乔·希尔的歌词里就这样说，“这个力量一定要做天下的主人”。

他们觉得，他们是一支解放大军的先锋队，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个先锋队脱离了大工业中的主力部队，被孤立起来，被包围起来，不能不进行游击战争，以等待东部无产阶级主力军的增援。它是一支边走边唱的队伍，对自己的使命充满信心。当盟员们唱起愈来愈响亮的“坚守堡垒”的歌声时，他们“听见号角在响”，而且真地相信“依靠我们的团结，我们将战胜一切敌人”。

新盟员主要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吸收的。他们很快就成为世界产盟的主要干部；成为它在东部和西部的一切战斗中的突击队；并且把他们特有的政治思想带到队伍中来——这种政治思想一部分是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得来的，一部分是从世界产
299 盟的学说中得来的。这些学说仿佛是他们自己的意向的明确具

体的表现。因此，他们很乐于接受。

* * *

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世界产盟的工人，很快又带着红色盟员证和新找到的信念，继续前进，并且把这些信念传达给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里，劳工运动中一切进步和激进的部分都曾经受到世界产盟的重大影响。

左翼社会党人就是世界产盟的热烈同情者，其中有不少人还是它的盟员。劳联中比较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会会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双重会籍的人”是很多的。他们为了饭碗问题而属于劳联的工会，为了原则的缘故，又持有世界产盟的“红色盟员证”。

世界产盟在青年人的心中燃起了火把。这是我国以前或以后的任何别的运动都没有做到的。青年的理想主义者从四面八方来到世界产盟里，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它。这个运动有它自己的天才的罢工领袖、组织家和演说家，有它自己的诗人和烈士。

世界产盟依靠日积月累的不停顿的宣传工作的力量，依靠它在许多事件中的英勇行动的影响（它把这些事件都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终于把产业工会是工人力量最好的组织形式的思想以及必须通过革命手段解决阶级斗争的纲领，灌输到各种色彩和各种团体的整整一代美国激进分子心中。

* * *

从二十年代世界产盟在西部边疆流离失所的漂泊工人中间进行开拓活动，到三十年代他们在东部工业集中区大工业工人中开展不可抗拒的纠察和静坐罢工，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且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但是，产业工会主义的学说就是经过这 300

条道路,才最后到达它最适用也最能发挥效力的地步的。

七 轉折点

世界产盟的整个记录——至少是它的最好的部分,积极革命的部分——全都是用它在头十五年的宣传和行动写成的。这是一部有长期价值的历史。以后,就每况愈下了。

轉折点是 1917 年春天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同年俄国的发生革命。那时,世界产盟所否定和抛弃了的“政治”又从大門口闖了进来。

这两件大事——和 1905 年一样,在俄国和美国又是同时发生的——說明,“政治行动”不仅仅是一个重要性次于經濟领域中工会和雇主的直接冲突的投票箱問題,而且也是阶级斗争的实质。在两个不同阶级的敌对行动中,世界产盟想要加以忽视的“政治国家”已經証明是統治阶级的集中的政权;两国情况都表明,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就是实际統治的阶级。

有两方面的情况說明了这一点。一方面,美国联邦政府直接进行干涉,大批逮捕世界产盟的活动家,摧毁了它的集中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行动”摧残了世界产盟,使它不复成其为一个工会了。世界产盟被迫改变自己的主要活动方式,变成了一个保卫組織,力求用合法的方法和宣传,来保护它的成員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不受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侵害。

从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确凿地証明了政治行动的同一定作用。³⁰¹ 俄国工人把国家政权拿到自己手里,并且利用这一政权剝夺资本家和镇压一切反革命企图。事实上,这是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后来的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而且,胜利的革命的組織

和領導中心并不是一个大門敞开的工会，而是一群在綱領下團結起来，受紀律約束的精选的革命家所組成的政党。

* * *

时候到了，世界产盟應該想一想海伍德 1905 年在成立大会上的預言式的忠告了：美国工人應該把目光轉向俄国，学俄国的榜样。一切权威当中最不可抗拒的权威——战争和革命——告訴世界产盟：應該把它的理論概念革新一下；應該想一下，学习一下，改变一下了。

最初的迹象說明，事情会是这样；世界产盟的盟員們都热情地欢迎布尔什維克的胜利。就他們最初的反应而言，可以說，他們認為布尔什維克的胜利是他們自己的活动的典范和証明。但是，这种最初的冲动并没有繼續下去。

有些領導人，包括海伍德本人，想要从战争和俄国革命中吸取教訓，并据此改正自己的思想。但是，絕大多数人，在搖摆了几年之后，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这就决定了世界产盟的灭亡厄运。它沒有能观察、傾听这两件大事，并从中学习，这个悲剧注定它要遭到失敗和归于衰微。

在这里，理論的指导作用也极其有力地，而且是立竿見影地表現出来了。当世界产盟逐漸僵化瓦解，把它对于政治行动和政党的真正意义的不完备看法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反政治教条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紧紧地追赶着现实，追赶着世界上发生的伟大的新事件。这些年青的左翼社会党人很快就宣布他們是共产党人。他們虽然沒有世界产盟的久經战斗考驗的干部，却有 302 正确的綱領。它被証明是有决定意义的。

新成立的共产党很快就赶上了世界产盟，并且把它抛在后头。这一切全是在两三年的時間內决定的。到 1920 年，即建盟

十五周年的时候，世界产盟已經不可挽回地走上下坡路。它的力量耗尽了。它的大多数干部，在英勇的斗争中挑选出来的宝贵的人材，也随着这个組織沉淪了。他們英勇地忍受了迫害，但是，迫害和一切新的大事件所提出的問題却把他們压倒了。最优秀的战士不再活跃了，随后就消声匿迹了。第二流的人材出来领导，把世界产盟引入坟墓。

* * *

世界产盟的主要干部沒有能参加在俄国革命鼓舞下争取建立美国共产党的新运动，这是一件本来可以防止的历史憾事。

在行动中，世界产盟一直是我国工人先锋队中最富于战斗性、最革命的部分。世界产盟在它自称为工会的时候，比当时自称为政党的任何其他組織，都更接近于列宁所說的职业革命家的党。他們在实践中，部分地也在理論上，比我国任何别的团体都更接近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維克。

世界产盟和共产党本来应该合并。但是，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发生了許多不幸的情况，加以美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能，终于妨碍了合并的实现。

世界产盟沒有能在聚集于俄国革命旗帜下的新运动中找到一个位置，这不是俄国人的过错。他們認識到世界产盟是他們所代表的运动的一个应有部分，并且曾經多次努力把它吸引到新的統一組織中来。共产国际的第一篇宣言明确地宣布美国的世界产盟是它邀請入盟的組織之一。后来在1920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发表了致世界产盟的特別公开信，邀請它参加。

这封信用兄弟对兄弟講話的口气解释道，共产国际的革命議會政治同右翼社会党人的投票箱迷信和无聊的修正主义，并无任何共同之处。关于这封信，海伍德說：“我讀完以后，就把拉

尔夫·賈波林叫到我的写字台旁边,对他說:‘我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就在这里;充分发育成长的世界产盟就在这里!’”(《毕尔·海伍德文集》第 360 頁)

在战时的法国,托洛茨基在工团主义者中間找到了他的最好的朋友和共同反战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在俄国革命以后,在一系列著名的信件(后来集成一个小册子出版)中,他督促他們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提綱中,承認战前工团主义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方面,并且說,工团主义比第二国际的思想前进了一步。提綱同时企图用最富有耐心和友好的方式說明工团主义在革命党和它的作用問題上的錯誤和局限性。

妨碍展开耐心的有成果的討論,妨碍把世界产盟有秩序地推移到布尔什維主义的更高基础上去的主要客观原因,或許就是,世界产盟当时正遭到残暴的迫害。1917年11月俄国革命爆发时,世界产盟有几百个活动家正在獄中,等候审讯,要交納巨額保释金才能保释出獄。过了一年,在定罪以后,他們就被判处在联邦監獄中服长期的徒刑。

由于入獄的緣故,他們就同伟大的新事件断絕了联系,也难以同別人自由地交換意見。当时要是能自由交換意見,他們也³⁰¹許就能同爭取建立新的共产党的蓬勃发展的左翼社会党运动达成協議,实行合并。作为一个組織,世界产盟被迫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从法律上保卫入獄盟員的运动中。这个組織的成員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考虑其他問題,包括一个最重要的問題——从战争和俄国革命中吸取教訓的問題。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的世界产盟盟員看見了俄国指明的新道路,并且走上了这条道路。他們認識到布尔什維主义是他

們自己的革命觀念的最完滿的體現者，並且參加了共產黨。1921年4月，《解放者》刊登了海伍德對馬克斯·伊斯特曼發表的談話。海伍德就在這篇談話中言簡意賅地表達了這一思想傾向：

“他對我說：‘我覺得我好像一直呆在那里。你還記得吧，我平常總是說，我們只要有五萬名真正的活動家，再有一百萬會員支持他們就行了。這個辦法不也是這樣嗎？至少，我時時刻刻都認識到，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一個組織，由知道怎麼辦的人來組成。’”

世界產盟的活動家是具有階級覺悟的實行家，他們總是作為一個集體來協同行動，以影響更廣大的群眾。他們的辦法中包含着列寧主義的學說——關於黨和階級的關係的學說——所體現的基本思想。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他們的一切行動中也是理論家，他們把這一思想表述得更為明確，並且貫徹到底——把那些具有階級覺悟的分子組織成為他們自己的黨。

當時，在我看來，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我很希望世界產盟的活動家們至少有一大部分人能夠認識到這一點。我盡了一切力量來說服他們。我特別堅持不渝地努力說服聖約翰本人，而且差不多成功了；當時，我並不知道我是多么接近成功，等到後來知道了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305 當他從利汶沃斯聯邦監獄中保釋出獄的時候——大概是在1919年上半年——，聖約翰在堪薩斯城逗留了一下，前來看我。我們從白天到晚上不斷地談論俄國革命。我相信，當時他和我一樣抱着同情態度。這次革命是一個行動——而行動是他一貫主張的。但是，他還沒有開始領會到：俄國道路對於我國也是適用的，世界產盟必須認識這一點。

他根据他在我国的亲身經驗，一向敌視“党”和“政客”，頑固的障碍就在这里。但是，我注意到，他并没有反駁，而主要是听我談話。一年左右以后，我們在紐約又进行了几次討論，当时他仍然保釋在外，到1921年秋天才又重新回到監獄中去。这几次，我們談得很多；或者不如說是我談，圣徒听。

我所以想把圣約翰爭取到新运动中來，除了那些日子我改信共产主义的热情以外，还有强烈的个人动机。我出身于具有强烈反知識分子傾向的工团主义的世界产盟，以后又深深陷到年青的共产党的內部斗争中去，和它的领导人搞在一起。他們差不多全都是年青的知識分子，对于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直接行动”，沒有任何經驗或感觉。我在那个环境中很不自在，很寂寞，渴望找到同类的人。

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自己的“反知識分子的情緒”；但是，我确实知道，共产党如果只有一个純知識分子的领导机构，就永远也不能在工人群众运动中扎根。我想找援軍，以便增强无产阶级成分；我当时認為，如果我能把圣約翰爭取过来，事情就会有很大不同。这是我确实相信的。

我还記得我最后一次努力說服圣約翰的情景。我們两人一块到斯塔騰島海滩去，在卡洛·特勒斯卡和伊丽莎白·葛萊·弗林³⁰⁶的家中作客，在那里一块吃飯和过夜。我們几乎沒有注意海洋，虽然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海洋。在整个吃飯的时间，差不多是通夜，我們一直在討論我的論点：未来是属于共产党的，世界产盟的战士不能专讓知識分子去主持这个新党，而應該去帮助它确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質。

像在前几次一样，差不多全是我講。圣約翰听着，像其他人一样。長時間的討論並沒有明确的結論；他既沒有表示拒絕我

的建議，也沒有表示接受。但是，我對自己的努力已經感到精疲力盡，就讓它去了。

不久以後，聖約翰回到芝加哥去。芝加哥世界產盟中心的負責人是敵視共產黨的，並且同芝加哥世界產盟中的一個親共派發生了一些激烈的爭吵。我不知道直接原因是什么，事實是，聖約翰卷入這場沖突中去，並且站在反共派一邊。當時，他親自把事情抓了起來，開始把世界產盟明確地引向不同共產黨合作的方向去。在任何危機中，一旦他下定了決心，他總是這樣子的。

幾年以後——在 1926 年，當弗林終於轉到共產黨方面來，並且在國際勞工保衛組織中同我們合作的時候，她回想起斯塔騰島上那天夜里的討論，並且說：“你知道你那天晚上幾乎說服聖約翰嗎？如果你再努力一下，你本來可以把他爭取過來。”我當時一點也不知道；當她告訴我的時候，我對自己當時沒有“再努力一下”，感到非常後悔。

307 聖徒當時已經五十來歲，監獄把他折磨得精疲力竭。他有點疲倦了，他可能覺得，在一個新的領域中重頭做起，已經太晚了，因為在這個新領域中，他和我們一樣，都得學習。不管這次失敗的原因是什么，我回想起來仍然感到後悔。聖約翰和他可能帶來的世界產盟的戰士本來可以使二十年代的共產黨的內部情況大不相同。

八 遺產

世界產盟最後沒有能忠於它原來的理想，保持自己的傳統，但是，這並不是說，世界產盟在宣傳和行動方面對後來的革命運

动的伟大贡献，就可以抹杀。世界产盟在它的全盛时代，是正确的地方多于错误的地方，这一切正确的东西都是美国工人的永久性的财产。世界产盟也有一些论点似乎是错误的——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全部实现这些论点的时机尚未成熟。就是这些论点也会有一部分在未来的时期中得到证明。

世界产盟主张用建立在职业代表制基础上的劳工共和国来代替目前的区域代表制政治国家，这一主张是对于我国工人胜利后必然发生的发展过程的惊人预见。这一新的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在世界产盟成立大会上提出的，当时，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还没有承认在1905年的革命中自发产生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未来的政府形式。

世界产盟的产业工会制度纲领肯定是正确的，虽然它提出得太早，还不可能在世界产盟的旗帜下实现。产联的出现和巩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产盟关于革命工会的理论也提出得太早，在我国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不能为人普遍接受。在世界产盟的时代，它还308不可能大规模实现。但是，在今天的帝国主义腐朽的时代，改良主义的工会已经变成时代错误，历史已经向它们提出最后通牒，要它们要么改变性质，要么停止存在。

群众性的工人产业工会，按其根本性质来说，可以本能地走向社会主义。在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的领导下，它们是一个自相分裂的家庭，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这种局面是长不了的。把改良主义的工会变为世界产盟五十年前所倡导的革命工会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中。

今天的劳工运动的巨大矛盾就在于，拥有几百万有组织的会员的群众性工会和仍然只是一个核心的革命党互不相称，并

且互相分离。世界产盟曾經企图在单一的工会中达到先鋒队和階級的統一，这个統一所以遭到破灭是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而且这个公式也是不够的。这一分裂的“反命題”必然要讓位給新的“合命題”，这样的時間已經快要到来了。

这个合命題——階級和社会主义先鋒队的統一——将在未来的时期实现，但是，做法将和世界产盟的做法有所不同。它将不是通过单一的組織来实现。建立单独的社会主义先鋒队的党組織将是解决劳工运动目前矛盾的鑰匙。这将不是工人階級团結的障碍，而是它的必要条件。

309 只有当工人階級成为一个自为的階級，并且作为一个階級而自觉地同剝削者斗争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地团結起来。鼓吹和实行階級合作的当权的官僚主义者，事实上是工会内部的一个亲資本家的党。社会主义先鋒队的党代表着階級觉悟，組織这样一个党并不意味着工人階級运动的分裂，而只意味着这个运动内部的分工，目的是要在革命的基础上——也就是作为一个自为的階級——促进和实现它的統一。

世界产盟是一个革命家的組織，这些革命家不单是由通常把全体工人团結在一个工会里的眼前經濟利益联合起来的，而且是由学說和綱領联合起来的。作为这样一个革命家的組織，世界产盟即令不是在理論上，也是在实践上，远远走在当代这方面的其他实验的前面，虽然世界产盟把自己称为工会，而其他組織把自己称为政党。

这就是世界产盟对美国劳工运动的最伟大的贡献——在美国劳工运动发展的現阶段上和今后的阶段上都是如此。它所以值得后人感激怀念，它的永不褪色的功績，归根結底，就在于它是未来的革命党的第一个伟大的先行者，发挥了开路先鋒的作

用。美国工人先鋒队一定要建立起这样一个革命党，以便組織和領導解放他們的革命。

必須使这一革命家組織的观念更加完备和完善，必須承認它是帝国主义衰落和腐朽时代的一切計劃中最重要和最有力的計劃。因为，只有通过一次胜利的工人革命，才能結束这个时代。而美国革命将比任何国家的革命更加需要一个单独的、專門的革命先鋒队組織。它必須按照自己应有的名称，把自己称为一个党。

世界产盟在这方面的試驗活动，仍然是立志要建立这样一个党的人們的永久性資本。他們将不抛弃他們从原来的世界产盟那里得到的遺產，也决不低估其价值；但是，他們还要用我們国境以外的別人的經驗和思想加以补充。

未来一代負有結束階級斗争的任务，用世界产盟章程“序言”的話來說，就是完成“工人階級的历史使命”。他們必将从世界产盟老一輩領袖——德布斯、海伍德、德利昂和圣約翰——学会不少东西，并且使这些領袖的名字永垂不朽。但是，在吸取后来的一切巨大經驗的时候，他們还要从把这些經驗概括成为一个指导理論的人們那里，借用更多的东西。美国人将向俄国人学习，正如俄国人向德国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一样。 310

海伍德在世界产盟成立大会上的忠告仍然是有效的。俄国道路就是通往美国的未来、通往全世界的未来的道路。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党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最伟大的国际运动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最伟大的实行家。俄国革命无可置辯地証明了这一点。那个革命仍然是榜样；斯大林主义的一切歪曲和背叛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俄国的布尔什維克——首先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鼓舞了

1917年以来我国革命先锋队所采取的每一前进的步骤。在不断发展的解放斗争的下一阶段,美国工人正是应该向他们请教。美国工人的“俄国”思想和世界产盟的遗产的融合是美国工人胜利的药方。

第四編 西奧多·德萊柏历史 著作評介

311

一 “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①

《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

西奧多·德萊柏著

紐約維金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共計 498 頁，售價 6.75 美元

(一)

赫魯曉夫的揭露以及波兰和匈牙利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叛乱——清晰的迹象說明今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叛乱——已經在美国激进运动中引起紛紜的議論，在这个当儿，这本論述我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的严肃著作，的确恰当其时，因此受到了应有的注意。在这一年的危机期間，成千过去忠心耿耿的党员脫离了这个党，以表示抗議；不准自由討論的旧有的清規戒律被打破了。經過这段危机，传播非官方文献的条件更加有利了。西奧多·德萊柏的著作对于或多或少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切人士現在正在进行的討論，是一个重要貢獻。

《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一書是計劃中的一系列研究材料的第一本。这种研究工作正由一群学者进行中。他們立志要写一部完备的共产党历史。据說，德萊柏負責研究 1945 年以前的历史；戴維·香农在研究共产党战后年代的历史；此外，还有一些学

^① 轉載自 1957 年夏季号《国际社会主义評論》。

312 者正在研究共产党在各领域中的记录，他们将“尝试估计共产主义在美国生活中的影响”。支持整个这一工作的是福特基金会所设立的共和国基金会。福特是一位离奇古怪的富翁，生前曾经表示：“历史就是废话”。可是，研究美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的相当宏伟的工作却要依靠他的遗赠捐款来进行，这种情况的确具有讽刺意味。

在这第一本著作中，德莱柏叙述了1922年底以前的共产党历史。序论中有几章提供了必要背景材料，叙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左翼运动的演变情况。我国新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力量就是从这个运动中来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确受到俄国革命的直接启发；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德莱柏在简明生动、符合事实的序论各章中，从一开始就确凿地证明——如果还需要这种证明的话——，在1919年正式组成的共产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新党在先前的美国劳工激进主义运动中有深远的根源，并且是在先前的各种组织的队伍中找到自己最初的战士和领袖的。

德莱柏在序论中说明，他在五年前独立地开始搜集材料，五年来一直在做这个工作。而且，照他提供的材料来看，他一定还花了不少额外的时间。这本著作本身就证明，他为了调查研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萌芽时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惊人的劳动。这是一个很久以来一直被误解，被蒙蔽，甚至被歪曲的具有决定重要性的时期。因此，凡是认为工人运动历史的各个方面都很重要，并且认为发掘事实，如实加以报道的学者精神十分可贵的人们，一定会对本书作者感到钦佩，甚至肃然起敬。

今天的美国共产党，或者说美国共产党的残余部分，在名称
313 上仍然和原来的组织一样，但是在一切其他方面都不一样了。

这个党在开创之初，有一些严重缺点；这种缺点主要是美国激进传统遗留下来的，此外，在摸索时期，它也是无知和缺乏经验的。但是，它是一个诚实的党，它是心口如一的。德莱柏说：“有一个时候，一切都是新鲜的，朝气蓬勃的和自发的。每一个危机都是第一次遇到的危机。每一个行动都没有预习过。”它不像后期的共产党那样惯于肆意撒谎，出尔反尔，口是心非。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时期，“神秘和故弄玄虚的现象极少……反对派多多少少可以自由地进行活动。共产党人在进行他们自己的讨论时，对于外界的意见更不介意。他们对于前途充满信心，觉得不需要隐讳自己的意见。事实上，他们相信，他们愈是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就愈是能更快地把工人群众争取过来。”

共产党在早期得到极大多数美国激进工人的尊敬和支持，实际上已经开始独占这方面的领导权，直到后来，它当年的纯洁的光荣才最后消失。幻想破灭的共产主义工作者必须先知道和先了解共产党转变的历史，然后才能开始在目前包围他们的沮丧和失望的黑暗丛林中看到光明。同样，过去没有实际经验而希望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治运动的新一代社会叛逆分子，也肯定需要了解上一代为什么和怎样遭到这样可耻的失败。这些人学习一下德莱柏的这本著作，可以得到不少好处。这本著作中叙述了共产主义先驱者和他们所创立的运动的真相。

它并没有叙述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而只是叙述了它的开端；但是，开端是研究整个历史的很好起点。书名是《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顾名思义，可以知道它只谈到共产党的背景、起源和形成时期。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忠实准确地叙述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形成时期的实际情况，他们都是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人。许多人往往由于厌恶共产党而否定共产主义，在他们读完这本

314

書，知道了共产主义运动早期誠实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什么样的人 and 共产主义一詞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們将有充分理由来重新考虑他們那种輕率、錯誤的判断。

共产党从成立到現在，差不多有四十年了，但是，后期的积极的参加者很少有什么人对他們自己的組織的起源和历史有深刻的認識，他們所知道的一点点东西大部分也是不真实的。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魯晓夫在它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揭露的事实公布以来，全世界已經十分清楚地知道，除了誣害、逼“供”和屠杀老布尔什維克等罪行以外，斯大林政权还有一項罪行，那就是有系統地伪造俄国革命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这对富于求知欲的青年來說，是一种犯罪行为。

美共领导人过去用斯大林伪造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来填充好几代青年黨員的头脑，他們現在假惺惺地承認斯大林的“錯誤”——在俄国；但是，对于他們自己伪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錯誤”，他們却一字不提。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和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一样是歪曲的。相反地，德萊柏的著作則是一部具有誠实学者风度的真正卓越的著作。对于一切真正希望知道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从何处来以及其开創时期情况的認真的研究者來說，这本书肯定会成为主要資料来源。德萊柏不費吹灰之力就把福斯特的別有用心的伪造“历史”打落到廢紙簍里去了。

《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一書的作者并不掩飾他的偏見。这种偏見促使他提出一种我所不能同意的解释，我将在后面加以論述。但是，在陈述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从1917年到1923年的历史事实的地方，沒有人敢于非难他。他以一位認真的学者的客觀态度叙述了事实真相，并且在每一点上都用文献資料加以証明。作者探賾索隱，鉅細无遺，又用了新聞記者的高度技巧来

叙述当代的事件。就是那些亲身经历先驅时代各次战斗，但是没有充分了解或記得他們的所作所为的人，也将对此感到惊异。

(二)

特别富于启发性的是第四章，这一章叙述了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头几年起作用的“影响和影响者”。1917年的布尔什維克革命是促成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行动。现在，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因此，人們通常也就以为，从一开始，决定这个运动的就是俄国布尔什維克的思想。德莱柏确凿地証明——这是他对了解这个时期的重大贡献之一——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经过很长时间，布尔什維克的思想的影响才和他們的行动具有了同等的权威。

在新运动摸索的头几年中，別的思想也是存在的，甚至居于支配地位。早期的不成熟的理論，狂热的不现实性，执行到荒唐程度的宗派主义策略——德莱柏无情地列举出这一切并且用文献資料加以証明——都不是从俄国輸入的。这些花朵是本国出产的——带有某种荷兰的香味。

316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直接脱胎于在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中形成的社会党新左翼，并且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社会劳工党和无政府主义集团中得到一些补充。这些集团都先后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布尔什維克革命而陷入瓦解的状态。各派力量“重新組合”的结果，建立了共产党。参加“重新組合”的各种力量的优点就在于他們的革命精神和反战态度；他們在阶级斗争的原則問題上反对社会党改良派的坚定立場；以及他們支持产业工会制度，反对龔柏斯劳工貴族的保守行业排外性的态度。在走向一个革命党的完美政治綱領的道路上，这是一

个良好的开始,但也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除此而外,美国运动还不能依靠自己的理論前进。

“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左翼一直受到工团主义和半工团主义观念的支配。就連“政治派”也認為党主要是一个宣传机关,只是工会在經濟斗争中的附属品,而不是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各方面斗争中的领导組織。新左翼在早年繼承了这个传统。而且,传统的左翼还具有显著的宗派主义色彩,受到德利昂的理論的强烈影响,虽然德利昂的社会劳工党并不在运动的主流之内。新的左翼甚至在1919年成为共产党以后,还有好几年繼續保持着这个传统。

317 在传统的美国运动中,孤立主义思想居于支配地位;它太“美国化”了,以致害了自己。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开始受到外国思想的影响。这些对美国运动产生了强烈影响的外来思想,首先輸入的并不是俄国布尔什維克的思想,而是荷兰理論家安东·潘业枯和赫尔曼·戈特的思想。他們两人在同一个时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中也有很大影响。这些荷兰领导人采取了革命态度,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国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們的一般观念也是半工团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

美国左翼觉得他們的思想很合自己的心意。他們在当时左翼的两个机关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評論》和《新評論》上发表的文章,对形成美国人的政治思想起了很大作用。荷兰理論家对一位年青的美国作家起了特別深刻的影响。这位美国青年作家后来成为轉向共产主义的美国左翼的主要理論家和宣传家,并且对美国共产党的創立贡献特多。这人就是路易斯·弗雷納。福斯特在《美国共产党史》中一次也沒有提到他的名字。他也許从

来也没有听说过他。

弗雷纳最初受到德利昂的影响，后来又受到荷兰理论家的影响，再后来又受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影响。他把三种影响的因素在自己的思想中融合起来。他对美国左翼和正式成立时期的美国共产党留下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美国，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这些思想很快就传播开来。这些思想在最后闖入美国出版物的時候，主要是包含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些著作中。在早期，俄国人影响美国运动的力量是思想上的，而不是行政上的。他们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通过解释和劝告来改变和改造年青的美国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结果，美国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明确了，得到了启发。这对局处一地的美国运动是完全有利的。

318

美国人的传统宗派主义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企图在現存的劳工运动以外来建立革命工会；他们不肯在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过程中来为“眼前的要求”斗争；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排斥议会斗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美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綱領中只是略有改变。美国运动中的这一切极端激进主义的大杂烩在1920-1921年差不多被列宁完全肃清了。列宁完成这一任务的时候，并没有依靠以警察力量为后盾的行政命令，而是依靠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部分是针对荷兰理论家而写的。这些荷兰理论家在美国人中间和一部分德国人中间有强烈影响。）

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綱和決議”也在广泛的理論和政治問題上澄清了美国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并且在實質上消除了德利昂和荷兰領袖的宗派主义观念以前所造成的支配性的影响。

到 1922 年，旧的宗派主义已经被逐出其他领域，最后还盘据在“原则上的地下状态”的理论中，支持的人当然是愈来愈少了。不过，到这时，已有一大批本国的领导人来设法加以根治。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来把旧的宗派主义赶出最后一个堡垒。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经过共产国际中的俄国领导人的干预，才在 1922 年底取得胜利。当然，这一次也有一个共产国际决议。但是，它是在极彻底的讨论之后才作出的。在讨论中，绝大多数美国共产主义者都是心服了的。其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就统一起来，展开了一个新的时期，在阶级斗争中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并采取了适合当时美国条件的现实策略。

(三)

德莱柏关于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纪念碑式的著作并不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围绕一个他毫不关心的问题罗列一些事实的著作。这就使这本书更加有趣，更加生动。在白劳德以斯大林的总督身份实行统治，把二十年代的革命的党变成它的反面东西的悲剧时代，作者也全心全意地参加了共产党。德莱柏是被出卖的一代青年大学生叛逆分子之一。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中，他们就要毕业了，但是却无路可走。

这些青年叛逆分子和他们那一代大多数人不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关心社会问题，充满热情，毫不顾及个人后果。在我看来，青年人的这些品质是最可贵的品质。这些品质推动他们走向共产党，因为他们在共产党的背后看见了苏联和俄国革命的形象。他们把斯大林主义当做共产主义，涌进共产党内，为它服务，作为自己的事业。

他们是年青的发电机。他们在党的机构中任职，他们在出

刊物上发表文章，或者在无数外围组织中担任负责人。在这些来自大学的新党员中，有数目惊人的一批人在组织产联的运动中起领导作用，最后在共产党所控制和操纵的工会中成了大大小小的负责人。

德莱柏是担任党的新闻记者消磨了自己的青春的青年之一。这样一段经历不能不留下它的痕迹。他现在不单是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察者，而且也是作为一个受伤的参加者来写作的。尽管如此，他仍然用了一种学者的客观态度和严谨的公正态度，来叙述他不再效忠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我们根据这一点来判断的话，那么，在经过这段经历之后，他的诚实仍然没有受到损害。在这方面，他是一个例外，因为斯大林主义的机构不但是毁坏人的机器，而且也是一个毁坏人的性格的机器。

不幸的是，他目前的著作似乎证明，德莱柏在最后摆脱斯大林主义后并没有能改正他原先的错误——把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当做是同一的东西。这种在现实中毫无根据的看法使他的政治判断力模糊起来，并且促使他作出一种解释——事实上是一种论点，他在序论中和结束语中都有清楚的暗示——，而这种解释却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上，斯大林为了巩固他那种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曾经不得不首先诬害和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其结果，这本书就自相矛盾：一方面，它是一本极值得赞美的确实材料的来源，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研究这些材料的意义的话，这本书作为一本政治指南又是毫无价值的。共产党的蜕化经过了很长时期，并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那些想要洞察这个秘密的人，必须用另外一种衡量标准，而不能用德莱柏的衡量标准来估计事实材料。

(四)

德萊柏的論点就是：当美国共产党最初为了解决它自己无法解决的美國問題，而屈服于俄国的影响，請求并获得俄国帮助的时候，它的发展历程就决定了，它的灭亡也就注定了；使它后来不复成其为美国激进主义的真正体现的那个毁灭的种子，在早期就种下了。他在序論中說：“这个运动的基本性質是在开始时形成的。”在最后一章中，他談到了 1922 年美国共产党怎样在共产国际中的俄国領袖的帮助下完成一項困难任务——把党从地下孤立状态中解脫出来，并且把它引向工人的群众性运动，但是他又得出結論說，这样取得的胜利是得不偿失的。

321

他似乎是說，美国党在共产国际的列宁—托洛茨基时代仰賴俄国領袖提供政治指导和帮助的局面，不可避免地导向后来在各方面对斯大林的屈从。因此，“在襁褓期，这个运动中就发生了一种具有关键性的事件。它从美国激进主义的新表现被变成了俄国革命力量的美国附属品。它所有的遭遇中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五)

我們如果要詳尽地回答这个过分简单化的論断的話，范围就太广了。已經有无数文章、小册子和成書架的書来专门研究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的問題——这是我們当代最困难，大概也是最重要的理論和政治問題。想要从学者們提供的事实材料中探討其严肃政治意义的研究者，最好也把这批分析性的文献包括在他們研究的材料中。

但是，在这里，我認为，探討一下这个世界性問題同我国目

前的討論有关的一个方面,是值得的,也是切合时宜的。这场討論是一场极其热烈的討論,一定要繼續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对那些在晚年决定否定一切俄国东西的人们,也必须再一次指出,在这一次推动全部热烈討論的也是俄国人。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魯晓夫关于俄国斯大林政权的一部分恐怖和暴行的揭露,在美国激进运动的一切人士中引起了热烈的兴趣、討論和重新估价,其热烈程度不下于1917年的布尔什維克革命——那是一种不同的行动,但是仍然是俄国的行动——所引起的。许多人一开头是大感失望和震惊,这一次,他們的反应是要求建立一个純粹“美国的”党。这个党将自己单独干,并且要閉关自守,防止包括俄国在内的外国思想和影响,尤其是俄国的思想和影响的輸入。

322

这种初步的反应虽然在今天是情緒性的,而且不能不是曇花一現的,但是,它給某些七嘴八舌的人創造了暫时的市場。这些人大事鼓吹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德布斯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个办法是五十年前的老办法,已經大大过时了,而且就是在德布斯的时代也是不够的。德布斯的时代也是柏格和希尔魁特、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无政府主义者和德利昂的社会劳工党的时代。这些集团按照各自的办法尽了最大努力,并没有取得很多成績。它們当中任何一派或合在一块都不能够滿足当代的需要,今天重新建立这样一种运动,也决不会符合現时代的需要。

事实真相是,社会主义的和激进的运动在我国,像在俄国以外的一切其他国家一样,已經在1914年寿終正寢。当欧洲最大和最有力的社会党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运动一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驗下垮台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

前途就发生了很大疑問。当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黑暗中彷徨着，对他們过去的观点表示怀疑。

323 光明终于从东方射来。只有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党在自己的行动中表现出它有能力应付战争和革命的問題。因此，它就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革命工人重新奋起和重新組合的鼓舞中心。美国过去的运动当时是各国运动中最原始、最富于孤立主义傾向的和在政治上最落后的一个。

年青的美国共产党兴起了，它成为俄国的榜样所燃起的新的社会主义希望的表现。正是这个党，而不是任何别的党，扎下了根，成长起来，扩大起来，得到了車間和学校里差不多整整一代新觉醒的青年叛逆分子的拥护。的确，共产党后来屈服于斯大林主义——这也是从俄国来的——到后来变得丑恶不堪，面目全非。这说明，可以輸入好东西，也可以輸入坏东西，因此，必須有所选择。但是，那些一开始就拒絕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維克的影响的組織、集团和派別又怎样了呢？它們有什么成績可以証明他們的孤立主义是明智的呢？

社会党在德布斯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一个无用的空壳子，新一代的劳工战士都看不起它；今天，它是更加可怜，更加虛弱，更加沒有吸引力了，除非有人觉得“国务院社会主义”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社会劳工党早已未老先衰。世界产盟尽管有英雄的传统和出色的工人阶级战士，也退化成为一个虛弱的派別。它几乎看不出三十年代产业工会运动的巨大高潮，更談不上来領導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中起了光荣的作用，但是，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美帝国主义卑鄙妥协，因而也衰微了，终于消失于視綫之外。

在这个記錄之中沒有多少东西可以作为未来的建树的基

础；也沒有多少东西可以鼓舞新的一代把社会主义目标当做他們自己时代的现实前景，而为此目标斗争。如果我们想要从过去吸取一些鼓舞力量的話，沒有被斯大林主义敗坏的早期共产党的传统能比任何其他党給我們更多鼓舞。虽然它的领导有許多錯誤和缺点，这个直接响应俄国革命的党仍然是我国第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 324

共产主义先驅者宣布，他們深信我国也需要一次社会革命，也需要一个能够领导这场革命的党；而且这样的党建立得愈早愈好。这些命题至今仍然是有效的，它們是各种力量重新組合为一个新的革命党——一个不愧为革命党的新革命党——的必要起点。这个新的革命社会主义党将在各种力量重新組合的过程中，从目前美国激进运动各界的动荡局面中产生，它无疑地将承認英雄的形成时期的共产党是它的真正祖先。

后期的退化年代的共产党的主要特色，和它退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它变相地拒絕了共产党在形成时期所维护的美国革命綱領和革命前景。这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理論的腐烂的果实。必須先糾正这个巨大的“錯誤”，然后才有可能弥补損失，重头做起。为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退化而斗争的不怕牺牲生命的俄国布尔什維克提出了一个口号：“回到列宁去”。同这个口号相当的美国口号是，回到美国共产主义先驅革命时期去，在那里从头开始，重新建設。

当然，不可能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在这些岁月里，世界和我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其中的一切重大事件和經驗都必須加以研究和解释，必須得出結論，納入新綱領中去。但是，我認为，这些結論將不是代替早期共产党的基本論点，而倒是它們的补充、发展和繼續。

325 德萊柏的著作提供了充分証据，可以証明这一論断。它是每一个社会主义战士必讀的書籍。

326

二 “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①

《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

西奧多·德萊柏著

紐約維金出版社 1960 年出版

共計 558 頁，售價 8.50 美元

德萊柏在 1952 年着手写作美国共产党历史的时候，并不知道他要做的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

他在本文序言中說，他本来以为美国共产主义的“真正”历史是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的經濟萧条开始的，头十年可以草草地加以处理。“最初，我想把整个历史写在一本書里，只是在開場白中簡單扼要地叙述一下从 1919 年到 1929 年的共产党的‘史前期’。”結果并不是这样。

事实証明，这部“史前期”历史的写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因为头十年很难加以簡要叙述，头十年的資料也不容易找到。別人的历史报告，不管是斯大林主义的也好，反共的也好，都很不够，而且不可靠；都是肤浅的、別有用心的，甚至是橫加伪造的。德萊柏很客气地說明了推翻他原来計划的难题：“我发现具有学者风度的探討几乎完全沒有，史料也沒有搜集起来，常常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找，現有的材料大部分都充滿了个人偏見和政治宣传。”

^① 轉載自 1961 年冬季号《国际社会主义評論》。

因此，他不能不先去做一項根本性的工作——搜罗过去从来没有汇总起来的原始材料。他很快就发现，为了作真实的报道，必须深深挖掘。在开始这一工作以后，他就为其中无穷的乐趣所吸引，年复一年地做下去，到最后他才搜罗到大量资料！并且把它整理成书。 327

现在，八年已经过去了，他已经写出两大本引证广博的著作，但是，他还没有超出他最初所设想的“开场白”的范围。这一简单事实就证明了美国共产主义头十年的意义，同时也证明了广泛、详尽、准确地报道这段历史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多么严肃。

* * *

德莱柏的第一部著作《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于1957年出版，其中对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只能叙述到1923年。最近出版的第二部著作《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叙述到1929年。他还计划写第三部著作来叙述斯大林—白劳德时代，即他原来所设想的“真正”历史。为了写这段历史，他不能不首先去彻底研究和报道共产党发展的头十年。正是这头十年最后为白劳德式的怪现象准备了必要条件。

認真研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它的头十年的人，将对德莱柏这一出色的探讨和发现工作表示感谢。他的两本洋洋大观的著作第一次——同时也只有这两本著作这样做——详细地、全面地和有条理地叙述了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各种事实，从它在俄国革命鼓舞下为建立一个革命运动起，直到它在1929年向斯大林主义屈膝为止。到1929年，美国党已经逐渐屈服于国内的保守压力和苏联的深刻的反动逆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德莱柏的著作逐步说明了这个变化最后是怎样发生的。当

你一章一章地閱讀書中流暢的敘述時，事情似乎很簡單，很清楚，很容易——可是，你要看一看浩瀚的參考注釋，你要想一想作者花了八年艱苦的勞動才把這些材料匯集起來，你還要想一想這一研究始終是和行動中的活人有關啊。

共產黨逐漸失去它作為自治的組織的性質；它的內部民主逐漸縮小，到1929年就被完全窒息了；在頭十年建立黨和領導黨的大多數最有力和最富於獨立性的領導人，都被用某種方式消滅了。

這一切都需要時間，整整十年時間。這十年並不是平靜的很容易渡過的十年。這是活的人——美國共產主義的先驅者——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為在我國建立第一個革命工人黨而長期艱苦奮鬥的十年。他們失敗了，但是他們的失敗也不是那麼容易的。有些人死去了；有些人精疲力竭，在鬥爭中倒在路邊；有些人在時間和環境的殘暴壓力下改變了，變質了，在決戰的時刻到來時，已經成了另外一種人；還有一些人失敗了，又站起來了，不得不從頭做起。

而且，就是在那時，在1929年斯大林全部控制美國共產黨之前一年，領導機關中發生了兩次爆炸。在1928年秋天，他們不能不開除托洛茨基主義者，在1929年夏天，他們不能不開除洛夫斯東分子。

在沒有停頓的長期混亂和衝突中，他們所以不能不這樣做，是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够把黨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黨。德萊柏在第二本黨史著作的末尾證明，在頭十年結束時，共產黨已經變成了這樣一個完全不同的黨了。1929年10月股票市場風潮所觸發的經濟危機到來時，共產黨的稱名和正式綱領還和頭十年一樣，但是黨已經不是同一個黨了。

* * *

德萊柏的观点含蓄地包含在这本著作的名称中：《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他認為，美国共产党不該在一开头就讓自己服从于俄国革命和俄国领导人，它的不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种初期的錯誤——可以說是党的原罪^①——无情地引导它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最后走到失敗和出丑。 329

他这种悲观的原罪論貫穿在他对有罪者的活动及他們所創造或企图創造的运动的詳細叙述和簡短評語中，似乎也貫穿在——或許是无意地——关于这些有罪者的全部叙述中。这些貶損性的評價暗含在他的笔調和口吻中，而不是明白講出的。这样的笔調和口吻从头到尾，成为他的动人的叙述的重要特色。

如果我們把他的态度看做是他的意見的話，那就可以說，他似乎認為，整个事情是一次——用我們的英国堂兄的說法——吃人肉吃人血的大宴会，参加的人都是大坏蛋，沒有絲毫圣洁的气味。这部历史肯定不是一部圣徒列传。在一大批人物当中，只有脫党人和遭到开除的人被破格开恩，博得几句好話——在我看来，这无意之中有一种喜剧的味道。

* * *

德萊柏並沒有掩飾他的偏見。但是，他用一种在反共的历史著作中极其独特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偏見。他的自信的解釋和草率的断語渗透到他的著作的每一頁里，从序論一直到最后一句話，但是，他並沒有把自己的証据加以歪曲来支持这些解釋和断語。他按事实的真相来叙述事实，並沒有按照自己的偏見加以挑选，或故意加以遺漏或伪造。

^①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創造的一个人亚当的罪恶为全体人类所繼承，称为“原罪”。此处是借用，犹言是先天的罪恶。——譯者

他証明，俄国的影响——在一开始是列宁—托洛茨基时代的俄国革命思想的影响——到头十年的末尾才达到最高峰。这个最高峰就是斯大林政权在一切方面都完全控制了美国共产党，甚至强行选择、撤換和調整党的领导人員，而不管以前的决定或全体黨員的心意如何。

330

德萊柏根据档案材料証明了这一切，每一次都引了整章整段的文字。于是，他就認為并断定，这一俄国的影响从头到尾都是毫无好处的。但是，他却沒有能够証明这一論断。

这个問題直接牵涉到 1917 年的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牵涉到紧跟着革命的青春时期而来但又未能勾消这一革命的反动逆流問題，长期而深刻、錯綜而复杂的反动逆流問題；以及这一反动逆流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包括美国党和俄国党的影响問題。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問題，是現时代最复杂、最困难的問題。必須从苏俄在一个資本主义世界中处于孤立状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問題。这个問題不容忍我們在一国的基础上——不論是从俄国的角度，还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給予簡單的草率的解释。

* * *

从事实观点来看，德萊柏的叙述是无可非难的。他把美国共产党过去的真实情况以及这一情况发生的經過，告訴給我們。为什么，到何处去，以及它对未来的意义如何，这是另外一个問題。具有批評力的讀者必須自己来回答这一問題。大体上，这一答案将取决于一个人对于世界和美国正在走向何处去的基本看法如何。美国共产主义的先驅者和他們的努力，他們原来的希望和后来的失望，他們的成就和失敗，都只能从其在全面情况中所占的地位来判断。

照我看来，这是一个“或此或彼”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美

國資本主義已經、或者快要解決它的基本矛盾了；如果我們進一步認為，我們偉大的、無可指責的國家和它的盟友一道，在一個干脆的地地道道美國化男子擔任總統掌握機樞的情況下，很快就能開始扭轉由 1917 年的俄國革命所開始——請不要笑！——的歷史潮流，那麼，那些妄想走俄國道路的美國共產主義先驅者的作為——不論做對了的還是做錯了的——就同現在和未來毫不相干。

331

他們的历史就只能是一場事不關己的冒險的历史——只有喜歡獵奇的學者和更加喜歡獵奇的讀者才感興趣，這些讀者就跟那些喜歡寫作和閱讀各種烏托邦國家和過去各種奇特教派的故事的人非常相像。這樣一批讀者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也不會激動地來爭論它的意義。那對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認為，由俄國革命開始的歷史潮流現在實際上已經無法扭轉，而且有十分強大的力量足以擺脫斯大林主義的損害，在前進的過程中變得更加清白、自由和民主；如果我們認為美國也無情地註定要發生它自己的俄國式的革命，那麼，在我國組織一個革命黨的第一次嘗試就具有健全的動機，並且是一項英雄的事業，對於現在和未來都具有深刻意義和實際關係。

凡是這樣來看待未來並且為此展開有目的的活動的人們，都是四十年前抱有同樣觀點的早期共產主義者的直系後裔，並且需要了解那些早期共產主義者的一切情況。當時的局勢對我國共產主義先驅者是不利的，他們也沒有很好地掌握時機，他們也犯過別的錯誤，甚至還有一些荒唐的行為，最後，他們大多數人都迷失了道路。但是，這一切都是次要的。

他們原先對未來的看法是正確的，這才是主要的東西。這

就使他們的活动、失敗和 1928 年新开端的十年历史，对新一代的青年叛逆分子具有經久不衰的趣味。

* * *

332 研究德萊柏的历史著作的人将会注意到，起来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腐化并且作出新的开端的一小批美国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去寻找新的天启。他們号召回到被斯大林主义者所背叛的俄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去。

德萊柏以一章的篇幅来論述这一反抗和 1928 年秋天的新开端，并且断定——暗含有不以为然的意思——托洛茨基主义并没有給我們以“手段来找到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它最多只能把我們引到老路上去”。这就提出了革命的政党是什么，它从哪里开始以及它靠什么生存下去的問題。

一个革命党是从指明社会现实的思想开始的，沒有它們，就无法生存下去。而这样的思想像金錢一样，是不可能从树上长出来的。必須到可以找到的地方去寻找它們，并且必須按照它們本身的价值来評价它們，不管它們的来源如何。一个人要想干革命又不承認这一点，趁早別干。

包括俄国在內的世界各国的現代社会主义运动原来的思想，是从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得来的，而他們碰巧是德国人。俄国人，首先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把这些“德国思想”加以繼續并且发展成为革命的行动和胜利。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是国际主义者，也是那两位伟大的創始人的忠实的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各国兴起的革命党，都受到原来的德国思想——也即变成俄国的思想和行动的德国思想——的鼓舞，并且，在早年依靠这些思想生存。

1924 年列宁逝世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情况也是这样。对

于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复杂的新问题的分析,以及一个革命反对派应有的纲领思想,也都是从俄国人那里得来的,这一次是从托洛茨基和他在苏联的战友那里得来的。

* * *

用国产的新旧美国思想来组织一个崭新的“美国式”的党,那自然可以满足一个人的个人自负感和民族自豪感——如果在这个时刻,还有人抱有这种不合时代潮流的荒唐念头的話。但是,1919年在我国第一次尝试组织一个革命党的时候,并没有找到这种思想——已有的思想都不合用。1928年我们一些人作出新的开端的时候,也找不到这种思想。在此后的这三十多年中,也没有找到这种思想。

333

当然,过去也有很多人尝试建立一个纯美国式的党,但是,他们的尝试都像去年的冬雪一样融化了。事情也不能不如此,因为不存在一条离开国际道路的单独的美国道路。美国已经产生了一些伟大的工艺学家、工程师、职业篮球运动员和其他领域中的专家。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产生出任何适合于这个国际主义时代的富于创造性的政治思想家。

在这个国际主义的时代,那些认真地想在我国建立一个革命党的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到别处去寻找纲领思想。德莱柏说,我们在1928年赞助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帮助延续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各分支和支脉对俄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家的依赖性。”这是不错的。但是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个记者有一次问著名的匪徒威利·苏顿为什么专偷银行。这个有头脑的窃贼威利马上回答说:“因为钱就在那里。”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垮台到现在,在整整这段历

史时期中，各国的本国革命党都不能不把目光转向俄国革命和它的真正的领袖。因为思想就在那里。

索引

条目后所附为原书页码,原书页码已排在页边。

- Abern, Martin(马丁·阿勃恩), 67, 122, 127, 136, 150, 159, 221
- A Long Way From Home* (Claude McKay), («远离祖国», 克劳德·麦克凯著), 67
- American Com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共产国际美洲局),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1922年), 67, 70, 76;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1928年), 201, 209, 210; 第八次全体会议的(1927年), 179, 182
- American Communism and Soviet Russia* (Theodore Draper), («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 西奥多·德莱柏著), 14, 327, 328
- “American Exceptionalism”—theory of (“美国例外”论), 146, 183, 184
- American Labor Alliance (美国劳工联盟), 44, 171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 (美国劳工联合会), 98, 99, 105-107, 111-113, 123, 140, 142-144, 160, 163-164, 193, 197, 198, 201, 232, 245-246, 262, 280, 299
- American Question(美国问题), 在共产国际, 130;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 68;
在第四次全会(1924年), 128;
在1927年, 131, 171, 179, 182, 203;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 204
- American Railway Union (美国铁路工会), 249, 281, 285
- American Socialist Movement, The, 1897-1912* (Ira Kipnis),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 1897-1912», 艾拉·基普尼斯著), 96, 253
- Amter, Israel (以色列·阿姆特), 56, 75
- Anarchism(无政府主义)
- Anarchists (无政府主义者), 98-101, 163-164
- Anarchist groups (无政府主义集团), 316, 322, 323
- Anglo-Russian Committee (英—俄委员会), 196
- Appeal to Reason, The* («向理性呼吁»), 251, 253, 257, 258, 261
- Ashkenudze, George (乔治·阿什克努则), 70
- Ballam, John J. (约翰·巴兰), 45, 167, 177, 184
- Basky, Louis(路易斯·巴斯基), 181
- Batt, Dennis E. (丹尼斯·巴特), 55, 56
- Bedacht, Max(马克斯·贝达特), 54, 61, 67, 69, 70, 115, 133
- Bending Cross, The* (Ray Ginger), («弯曲的十字架», 雷·金格尔著), 231, 254

Berger, Victor (维克托·柏格), 231, 257-258, 262-263, 291, 322
Berkman, Alexander (亚历山大·白克曼), 100, 110
Beuhler, A. A. ("Shorty"), (波赫勒) ("矮子"), 110
Billings, Warren K. (华伦·比林斯), 163
Bittelman, Alexander (亚历山大·毕特尔曼), 43, 45, 52, 54, 56, 75, 90, 91, 92, 95, 101-104, 113, 115-116, 119, 121, 125, 127, 129-130, 133-136, 150, 186, 197-198, 207, 209-211, 213-215, 223
Bolshevism (布尔什维主义), 17, 294, 303-304, 320-321
Bolshevicks (布尔什维克), 16-17, 28, 46, 49, 66, 234, 268, 272-273, 275, 302, 304, 307, 310, 314-315, 317, 320, 322-323, 329
Bolshevik Revolution (布尔什维克革命) 参看 Russian Revolution, 103, 315, 316
Brandler, Heinrich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 179
Bridgeman Convention (布里奇曼代表大会) (1920年), 43; (1922年), 57, 74
Brissenden, Paul F. (保罗·布里森登), 279, 284, 288-290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英国共产党), 59
British General Strike (英国大罢工), (1926年), 196
British Labor Party (英国工党), 58, 59
Browder, Earl (厄尔·白劳德), 57, 88, 100, 109-114, 121-123, 125-126, 130, 136, 198, 209, 211, 213-214, 221, 319

Brown John (约翰·布朗), 256
Bukharin Nikolai (尼古拉·布哈林), 65, 67, 70, 129, 132, 147, 179, 196, 200, 202-203, 206-209, 217
Bulletin No 1 (Konikow Group), («第一号通报») (科尼可夫集团), 189
Butte Daily Bulletin («巴特每日通报»), 187
Calverton, V. F. (卡尔佛顿), 48, 49
Canadian Communist Party (加拿大共产党), 185, 204, 220
Cannon, James P. (詹姆斯·坎农), 9, 11, 12, 119, 121-122, 126, 133, 194, 200, 209
Cannon Group (坎农集团), 210
Cannonites (坎农分子), 184, 214 (还可参看 Foster-Cannon Faction, Group, Bloc)
Centralia Prisoners (IWW), (森特拉利亚俘虏), 163
Chaplin, Ralph (拉尔夫·贾波林), 303
Chicago Federation of Labor (芝加哥劳工联合会), 59, 62, 87, 106, 121
Christian Socialist Congress (基督教社会党大会) (1908年), 257, 264
Class Struggle, The («阶级斗争»), 21, 103
Coleman, McAlister (麦卡利斯特·科尔曼), 254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共产国际) Congresses of (历次代表大会): (第二次), 229, 303, 318; (第三次), 58; (第四次), 60, 61, 66, 85; (第五次), 192, 193; (第六次), 27, 113, 131, 146, 147, 180, 185, 188, 195, 199-209, 211, 216, 220-221
Degeneration of (退化), 30, 177

- Early role of (早期的作用), 20, 44, 57
- "Pan American Agency" of ("泛美局"), 46, 47
- "Parity Commission" of ("平衡委员会"), (1925年), 133-135
(还可参看 Parity Commission)
- Plenums of (历届全会): (1922年3月), 62; (1922年6月), 64, 67; (1924年), 128, 130; (1925年), 131; (1926年), 141, 142; (1927年), 202
- Senioren Konvent (元老会议), 207
(还可参看 "American Commission" 和 "American Question")
- Communist Unity* (Alexander Bittelman), («共产主义团结», 亚历山大·毕特尔曼著), 116
- Communist, The* («共产党人»), 58, 60, 198, 199
-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共产党) Central Committees of (历届中央委员会), 54, 77, 104, 111, 132-136, 167, 169, 179, 182, 203-204
- 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 of (中央监察委员会), 222
- Conventions of (历次代表大会), (1925年), 127, 130, 133-134, 148-150, 166, 175; (1927年), 145-146, 171, 174-175, 177, 179, 182, 184; (1929年), 147
- Plenums of (历届全会): (1927年), 172; (1928年2月), 182-185, 195, 198, 220; (1928年5月), 195-199, 202
- Political Committees of (历届政治委员会), 48, 88, 91-92, 119, 133, 137, 168, 222
- (还可参看 Workes Council Workers Party)
- Conference for Progressive Political Action (进步政治行动会议) (1922年2月), 62
-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产业工会大会), 25, 112, 124, 164, 238, 245, 247, 277, 278, 282, 307, 319
- Cooperative League of America (美国合作社同盟), 110
- Corey, Lewis (刘易斯·科里), (参看 Louis Fraina)
- Coults, David (戴维·考茨), 109
- Criticism of the Draft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eon Trotsky),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 列昂·托洛茨基著), 27, 131, 200, 204, 210, 212, 215, 224
- Criminal Syndicalism Laws (惩治工团主义刑事法), 163, 265
- Daily Worker, The* («工人日报»), 61, 126, 129, 176, 194
- "Dawson" (J. P. Cannon), (陶逊, 即 J. P. 坎农)
- Debs, Eugene Victor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 88-89, 97, 192, 230-231, 245, 257, 259, 263, 266, 276, 278, 280, 282-283, 285, 309, 322-323
- Decline of the IWW, The* (John S. Gams),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衰落», 约翰·甘姆布斯著), 291
- Deleon, Daniel (丹尼尔·德利昂), 278, 280, 283, 288, 291-292, 316-317, 322
- Democratic Party, The (民主党), 37, 40, 257
- Diary In Exile, 1935* («流亡日记:

- 1935»,列昂·托洛茨基著),228
- Dirba, Charles (查尔斯·杜尔巴),45
- Don, Sam (薩姆·唐),176
- Dozenberg, Nicholas (尼古拉斯·多曾堡),194
- Draper, Theodore (西奧多·德萊柏),
9, 12-14, 311-313, 316, 319-320,
325, 327, 329, 331-333, 336
- Dubner, A. (Jakira), (杜卜納,即賈基拉),192
- Dunne, Grant (格蘭特·邓恩),188
- Dunne, Margaret (瑪加丽特·邓恩),188
- Dunne, Miles (米尔斯·邓恩),188
- Dunne, Vincent R. (文森特·邓恩),188
- Dunne, William F. (Bill), (威廉·邓恩,
即毕尔), 51, 122, 126-127, 136,
150, 185, 187, 198, 200, 209, 215
- Dutch Leaders and Theoreticians (荷
兰領袖和理論家們),316,317,318
- Eastman, Max (馬克斯·伊斯特曼),45,
67-70,181,190,304
- “Emancipation of Labor” (“劳动解放
社”),191
- Engdahl, J. Lewis (刘易斯·英格达尔),
44,126
- Engels, Frederick (恩格斯), 25, 59,
294,310,332
- Epstein, Melech (梅勒赫·爱泼斯坦),
44
- “Europe and America” (Speech by
Leon Trotsky), («欧洲和美洲»,列
昂·托洛茨基的演說),196
- Ewart (Braun), (伊瓦特,即布朗),179,
182
- Farmer-Labor Party (农工党),59-60,
87,130
- Conventions of (历次代表大会),
(1923年), 62-63, 85-87, 98,
111,121;(1924年),130
- Federated Farmer-Labor Party (联合
农工党), 51, 79,85,86,88,90,93,
117,119
- Finnish Leaders (CP), (芬兰領袖們)
(共产党),95
-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eon Trotsky),
(«共产国际的头五年»,托洛茨基
著),58
- First International (第一国际),25
- Fischer, Ruth (魯思·費希尔),179
- Fisher (South Slavic Federation), (費
希尔)(南部斯拉夫分部),150
- Fitzpatrick, John (約翰·費茲帕特里
克), 62, 85, 86, 87, 105, 106, 107,
113, 117, 121, 218
- Five Year Plan (五年計劃),217
- Flynn, Elizabeth Gurley (伊丽莎白·葛
萊·弗林),306
- “Ford-Dubner Thesis” (“福特-杜卜納
提綱”),192
- Forging of American Socialism, The*
(Howard H. Quint), («美国社会
主义的形成为»,霍华德·昆特著),253
- Foster, William Z. (威廉·福斯特),
53-54,57,218,317
- Foster-Browder relationship (福斯
特-白劳德的关系), 113, 114;
On American Question (論美
国問題),128
- Foster-Cannon Faction (福斯特-
坎农派),61,79,86,92,94-95,
117, 191-120, 124, 127, 130,
136-137, 145, 149-150, 166,
175, 180-189, 192, 204, 207-
209
- Chairman, CPUSA (担任美共主

- 席), 126
- Trade Union Leader (担任工会领袖), 74-75, 78
- As an independent (作为独立的工会领袖), (1923年以前), 88, 89
- In the AFL (also Trade Union Education League) (在劳联中以及在工会教育同盟中), 105, 108-109, 111-112, 132, 142, 150, 158, 179, 193, 196-197, 202, 211
- Fosterites (福斯特分子), 109, 113, 141-142, 149-150, 154, 158, 176, 178-179, 184, 198-200, 202, 210, 213-215, 222-223
- On Trotskyism (论托洛茨基主义), 223
- Foster-Weinstone-Cannon (福斯特-伟恩斯东-坎农), 171, 202-203
- Fraina, Louis (Lewis Corey), (路易斯·弗雷纳, 即刘易斯·科里) 46-50, 55, 58-59, 61, 317
- Freiheit, The* («自由报»), 91, 92
- Fox, Jay (杰·福克斯), 108
- Fourth International, The* («第四国际»), 14, 36, 96, 97, 145, 196
- Gamb, John S. (约翰·甘姆布斯), 291
- Garvey, Marcus (马卡斯·加维), 236
- Gates, John (约翰·盖茨), 219
- Gebert (格伯特), 150
- German Communist Party (德国共产党), 130, 179
-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德国社会民主党), 317
- Ginger, Ray (雷·金格尔), 231, 254, 255
- Gitlow, Benjamin (班加明·吉特劳), 42, 44, 53, 56, 75, 92, 141, 145, 158, 168, 192, 209
- Goldman, Emma (恩玛·戈尔德曼), 99, 110
- Gomez, M. (戈麦斯), 150, 200, 209
- Gompers, Samuel (塞缪尔·龔柏斯), 22, 98, 105, 106-107, 112-113, 218, 249, 278
- "Goose Caucus" ("笨伯会议"), 56-57, 63, 74, 145, 192
- Gorter, Herman (赫尔曼·戈特), 317
- Green, P. (Gusev), (格林, 即古塞夫), 133-135, 137, 175
- Gusev (P. Green) (参看上条)
- Hammersmark, Sam (塞姆·汉穆斯马克), 109
- Hansen, Reba (吕芭·汉森), 14
- Hapgood, Hutchins (赫琴斯·哈普古德), 98
- Hardman, J. B. S. (Salutsky), (哈德门, 即萨鲁茨基), 44
- Hathaway, Clarence (克拉朗斯·哈沙威), 150, 200, 207, 209
- Haymarket Martyrs (秣市烈士), 100, 281
- Haywood, William D. (威廉·海伍德), 98, 159, 162-163, 265, 278-280, 283, 289, 301, 303-304, 309-310, *Bill Haywood's Book* («毕尔·海伍德文集»), 303
- Hearst, William Randolph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 145
- Hendon Case (赫恩顿案件), 235
- Herve, Gustave (古斯塔夫·赫夫), 107
- Hill, Joe (乔·希尔), 297, 298
- Hillquit, Morris (摩里斯·希尔魁特), 262, 291-292, 332

- Hillquit-Berger Wing of Socialist Party (社会党希尔魁特-柏格派), 97, 292
- History of American Trotskyism* (James P. Cannon),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 詹姆斯·坎农著), 27, 35, 46, 68, 131, 145, 185, 200, 204-205, 221
-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 The* (Alexander Bittelman), («美国共产党史», 亚历山大·毕特尔曼著), 101-102, 116
-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iam Z. Foster), («美国共产党史», 威廉·福斯特著), 109, 111, 314-315, 317
- Hook, Sidney (悉尼·胡克), 48
- Houdek, Julia (朱莉娅·侯德克), 14
- Hourwich, Nicholas L. (尼古拉斯·奥尔威奇), 42, 55, 70, 104, 116
- Hourwich Group (奥尔威奇集团), 49, 116
- Hungarian Communist Party (匈牙利共产党), 76
- Hungarian Federation (匈牙利分部), 181
- Hungarian Uprising (匈牙利叛乱), 311
- I Confess* (Benjamin Gitlow), («我坦白», 班加明·吉特劳著), 141, 145, 175
-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简称世界产盟), 31, 42, 96, 102, 106-107, 109-110, 111, 113, 142, 159, 160, 162-163, 192, 197, 198, 232, 260, 265, 282, 289, 292-293, 295, 309, 316, 322-323
- Conventions (历次代表大会); Founding [成立大会 (1905年)], 277-283, 288-289, 294-295, 301, 307, 309-310; (1906年), 283-284, 286
- “Wobblies” (世界产盟活动家), 99-100, 194, 225, 287, 296-298, 301, 304
- IWW: A Study of American Syndicalism* (Paul F. Brissenden), («世界产盟: 美国工团主义研究», 保罗·布里森登著), 279
- IWW The History, Structure and Methods* (V. St. John), («世界产盟: 历史、结构和方法», 圣约翰著), 283
- 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 (I.L.D.) (世界劳工保卫组织), 99, 159, 164, 184, 194, 195, 306
- International Left Opposition (国际左派反对派), 211, 213
-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Pro-War Organ of Socialist Party),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 社会党战前机关报), 258, 268, 317
-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Current Theoretical Organ of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 社会主义工人党目前的理论机关刊物), 14, 227, 311
- Investigation of Strike in Steel Industry: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 U. S. Senate-6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钢铁工业罢工调查: 第6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美国参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调查会), 105, 113

- Jakira, Abraham (Dubner), (阿伯拉罕·賈基拉, 即杜卜納), 192
- Jewish Federation (犹太分部), 90, 92, 95
- Jewish Labor in the U. S. A.* (Melech Epstein), («美国的犹太劳工», 梅勒赫·爱泼斯坦著), 44
- Johannsen, Anton (安东·約翰森), 98, 99
- Johnson, Charley ("Scott"), (查理·約翰遜, 即“斯科特”), 47
- Johnson, Oakley C. (奧克利·約翰遜), 216
- Johnstone, Jack (杰克·約翰斯頓), 67, 109, 113, 121, 126-127, 136, 209, 213-214
- Jones, Mother (馬瑟·琼斯), 282
- Kansas City Central Labor Union (堪薩斯城中央工会), 99
- Kaplan, David (戴維·卡普兰), 98, 99
- Karsner, David (戴維·卡尔斯納), 254
- Karsner, Rose (罗斯·卡尔斯納), 14, 159
- Katayama, Sen (片山潛), 47
- Katterfeld, L. E. (卡特菲尔德), 55-56, 62, 67, 70, 75, 77, 192
- Kautsky, Karl (卡尔·考茨基), 249
- Keracher, John (約翰·克拉彻), 55, 56
- Khrushchev, Nikita S. (尼基塔·謝·赫魯曉夫); *Revelations of* (他的揭露), 311, 314, 321
- King, Rev. Martin Luther (馬丁·路德·金牧师), 239
- Kipnis, Ira (艾拉·基普尼斯), 96-97, 231, 233, 253-254, 260, 263-264
- Knights of Labor (劳工騎士团), 251, 281
- Konikow, Dr. Antoinette (安托尼特·科尼可夫医生), 190, 191
- Konikow, Edith (伊迪斯·科尼可夫), 191
- Krumbein, Charles (查尔斯·克隆本), 122, 127, 136, 176
- Kucher (庫契尔), 193
- Kutcher, James (詹姆斯·庫特契尔), 165
- Labor Defender, The* («劳工保卫者»), 99, 159, 161
- Labor Herald, The* («劳工先驅»), 127
- Labor Party (劳工党)
- Labor Party Policy (劳工党政策), 58-61, 85, 129-130
- Labor Party Question (劳工党問題), 61-63, 70, 117, 132
- La Follette-Labor Party Question (拉弗勒特-劳工党問題), 128, 189
- Larkin, James Joseph (詹姆斯·約瑟夫·拉金), 55, 56
- Left Opposition in the Russian Party (俄国党內的左派反对派), 28, 181, 187, 196, 207-208, 217 (还可参看 Russian Opposition)
-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V. I. Lenin),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著), 59, 318
- Lenin, Vladimir I. (弗拉基米尔·伊·列宁), 23, 29, 58-61, 66-67, 69-70, 128, 175, 186, 201, 209, 217, 238, 240, 271-277, 294, 310, 317-318, 324, 332
- Leninist Letts (列宁主义的列特人), 184
- Lenin School in Moscow (莫斯科的列宁学校), 200, 207, 211
- Leninist Type of Party (列宁主

- 义式的党), 40, 271, 276
- Lewis, John L. (約翰·刘易斯), 112
- Lewis-Hillman-Murray (刘易斯-希尔曼-莫萊), 40
- Liberator The* («解放者»), 46, 110, 304
- Lindgren, Edward I. (爱德华·林德格伦), 56, 192
- “Liquidators” (“取消派”), 56-57, 60, 63, 66-67, 73, 75, 78
- Lore, Ludwig (盧德維希·洛尔), 95, 130, 181, 188-190
- Losovsky, A. (洛索夫斯基), 144, 198-202, 209, 214
- Lovestone, Jay (詹·洛夫斯东), 43, 45, 54, 62, 78, 85, 88, 95, 115, 121-123, 129, 133, 145-147, 155-157, 159, 168-169, 172, 175, 182-184, 193, 196-197, 200-202, 204, 208-209
- Lovestone-Cannon Combination (洛夫斯东-坎农联盟), 52-53, 56, 75
- Lovestone Faction (洛夫斯东派), 146-147, 159, 171, 174-178, 184, 195, 202-204, 209
- Lovestoneites (洛夫斯东分子), 146-147, 154, 158, 170-171, 175, 177-178, 181, 188, 195-199, 203, 207-208, 214, 221-222, 328
- Lovestone Regime (洛夫斯东领导), 184, 196, 198, 211
- Magil, A. B. (梅吉尔), 194
- Manley, Joe (約·曼萊), 108, 109
- Mark, Karl (卡尔·馬克思), 25, 29, 294, 316, 332
- Marxism (馬克思主义), 29, 115, 249, 285, 294
- Maslow, Arkadi (阿尔卡迪·馬斯洛夫), 179
- Mckay, Claude (克勞德·麥克凱), 67
- McNamara, J. B. (麥克納馬拉), 99, 110, 163
- Memories of Lenin* (Krupskaya), («列宁回忆录», 克魯普斯卡婭著), 272
- Michigan Group, The (密执安集团), 103, 104
- Militant, The* («战斗者»), 105, 147, 162, 181, 190-191, 206, 223
- Minneapolis Trial (明尼阿波利斯审讯), 206, 222 (还可参看 Smith Act Trial, 1941)
- Minor, Robert (罗伯特·米諾尔), 56, 75,
- Mooney, Tom (湯姆·蒙尼), 100, 110, 163
- Mooney Defense Committee (蒙尼保卫委员会), 100
- Morgan (摩根), 14
- Moyer-Haywood Case (莫耶-海伍德案), 225, 251-252, 162
- Muste, A. J. (莫斯特), 49
- My Life* (Leon Trotsky), («我的一生», 列夫·托洛茨基著), 103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231
- Nearing, Scott (斯科特·尼尔林), 147
- Neumann, Heinz (海因茲·紐曼), 132
- New Review, The* («新評論»), 317
- Notebook of an Agitator, The* (James P. Cannon), («一个鼓动員的筆記», 詹姆斯·坎农著), 228
- Novy Mir* («新世界»), 102, 103

O' Flaherty, Tom (托姆·奧弗拉赫蒂),
150, 159
Olgin, Moissaye J. (穆瓦塞耶·欧尔
金), 44, 91-92, 95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V. I. Lenin), («进一步, 退两步»,
弗·伊·列宁著), 272
Opposition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7-1928年),
(美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 1927-
1928年), 147, 173, 177, 210-211,
214
(还可参看 "Right Danger in
American Party, The"-July, 1928
年 Opposition Platform)

Packing House Workers' Organizing
Drive (1917-1918),
(屠宰业工人的組織运动, 1917-
1918年), 112, 121
Pages from Party History (Jay Lo-
vestone), («党史片断», 洛夫斯东
著), 146-147, 157
Parity Commission (of the Comintern)
(1925), (共产国际的平衡委员会),
133-135
Parsons, Lucy (露西·帕森斯), 281
Passaic Strike (1926), (巴塞克罢工,
1926年), 140, 142-144, 198
United Front Committee (Passaic),
(巴塞克的統一战綫委员会),
140-144
People's Front (人民陣綫), 40, 217, 221
Pepper, John (Pogany), (約翰·佩帕
尔, 即波加尼), 51, 54, 57, 59, 61,
62, 76-77, 79-80, 86, 88, 91-94,
117, 119, 121-123, 126, 129, 131-
132, 145, 147, 157, 177, 179, 189,
192-193, 196-197

Pepper Majority (佩帕尔多数派),
90, 95, 192
Pepper Regime (佩帕尔的领导),
79, 86, 89-91, 94-95, 119
Pepperism (佩帕尔主义), 117, 188
Pioneer Publishers (前鋒出版社), 58,
64, 206
Plekhanov, George (乔治·普列哈諾夫),
191
Polish Communist Party (波兰共产
党), 73
Political Affairs («政治月刊»), 216
Populists (人民党人), 251
Populist Party (人民党), 259
Pravda («真理报»), 226
Profintern (职工国际), 188
Congresses of (历次代表大会),
(1921年), 109, 111; (1928年第
四次), 199
(还可参看 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
Proletarian Party (无产者党), 31, 46,
55-56, 103

Quint, Howard W. (霍华德·昆特), 253

Radek, Karl (卡尔·拉迪克), 65, 67, 70
Rakosi, Matyas (拉科西), 68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 The (Leon
Trotsky), («俄国实况», 托洛茨基
著), 181
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
(RILU), (赤色职工国际), 65, 198
(还可参看 Profintern)
Reed, John (約翰·里德), 42-43, 46, 55,
56
Reinstein, Boris (博里斯·萊恩斯坦), 77
Retail Clerks Union (零售店員工会),
139

Revolutionary Age, The («革命时代»), 46, 58, 103, 110
Reynolds, Bud (巴德·雷諾), 150
Right Danger in the American Party, The (July, 1928 Opposition Platform), («美国党内的右傾危险», 1928年7月反对派綱領), 146-147, 209-210
Ripsaw, The («粗齿鋸»), 258
Roosevelt, Franklin D. (弗兰克林·罗斯福), 37, 39, 40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 The (Theodore Draper), («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 西奥多·德莱柏著), 14, 311, 314, 327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俄国共产党), 20, 29, 34, 70, 103, 128, 130, 151, 152, 330
Central Committee of (中央委员会), 70
Russian Federation (俄罗斯分部), 47-49, 50, 104, 116, 177
Russian Opposition (Trotskyist), (俄国反对派) (托洛茨基主义者), 26-27, 181, 187, 200, 223, 226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16-18, 28, 42, 46, 50, 100, 102, 110, 118, 127, 155, 231, 233-234, 238-240, 266, 268, 270, 272, 273-274, 277, 292, 300-305, 312, 314, 319, 323-324, 327, 329-333
Russian Revolution The (1905), (1905年的俄国革命), 277, 307
Russian Revolution, The (James P. Cannon), («俄国革命», 詹姆斯·坎农著), 64
Russian Revolution, The Fifth Year of (James P. Cannon), («俄国革命的第五年», 詹姆斯·坎农著),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俄国社会民主党), 273
Ruthenberg, Charles E. (查尔斯·鲁登堡), 10, 43, 46, 50, 54-56, 62, 74-75, 77-78, 80, 88, 116-117, 121-123, 125-126, 133, 146, 158-159, 166, 168, 171, 172-177, 182-184, 194, 196, 202
"Ruthenberg-Pepper Thesis" (鲁登堡-佩帕尔提綱), 119, 122
Ruthenberg-Pepper-Lovestone Faction (鲁登堡-佩帕尔-洛夫斯东派), 43, 129, 132-134, 140, 150-151, 153, 155, 157, 159, 175, 180, 189
Ruthenberg Group (鲁登堡集团), 130, 132, 134-135, 137, 157, 166-167, 183-184
Rykov (李可夫), 207, 217
Sacco and Vanzetti (薩柯和范齐蒂), 161, 163, 164
Sacco-Vanzetti Case (薩柯-范齐蒂案件), 161
Sacco Vanzetti Committee (薩柯-范齐蒂委员会), 161, 194
Salutsky, J. B. (Hardman), (薩魯茨基, 即哈德門), 44
Schlesinger, Arthur, Jr. (阿瑟·施勒辛格), 254
Schmidt, Matt (馬特·施密特), 98, 99, 163
Schmidt-Kaplan Case (施密特-卡普兰案), 110
Schneiderman, William (威廉·施奈德曼), 150
"Scott", Charley (Johnson), (查理·"斯科特", 即約翰遜), 194

- Scottsboro Case (斯科茲保羅案), 235
- Second International (第二国际), 30, 31, 188, 303, 317
- Shachtman, Max (馬克斯·沙赫特曼), 122, 136, 150, 159, 221-222
- Shannon, David (戴維·香农), 231, 233, 254, 260-261, 266, 311
- Sherman, Charles O. (查尔斯·薛尔曼), 283, 284
- Shoaf, George H. (乔治·休夫), 251
- Siskind, G. (西斯金德), 209
- Smith Act (史密斯法), 164, 222
- Smith Act Trial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1941), (史密斯法审讯) (社会主义工人党, 1941年), 240
-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人), 164, 188, 257
- Social Democratic Herald, The* («社会民主先驱报»), 231
-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theory of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23-24, 27, 37, 324
- Socialist Labor Party (社会劳工党), 31, 191, 257, 288, 291-292, 316, 323
- Socialist Party (社会党) (参看 Section I), 17, 30-31, 42, 44, 50, 55, 96-97, 102, 109-111, 127, 191, 231, 238, 245, 249, 253-256, 258, 259, 261, 263-264, 266-267, 269-270, 272, 274, 281, 291, 316, 323
- Conventions of (历次代表大会): (统一大会), 250, 257; (第二次, 1904年) 262; (1912年) 265; (1919年) 41, 103
- Left Wing (左翼), 16, 42, 44, 96-97, 103, 109, 127, 262, 263, 265-266, 268-269, 275, 316
- Left Wing National Conference (June, 1919), (左翼全国代表会议, 1919年6月), 41, 43, 46, 49, 54-56, 89, 103
- National Committee of (全国委员会), 272
-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The* (David Shannon), («美国社会党», 戴維·香农著), 254
- Socialist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 (Daniel Deleon), («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丹尼尔·德利昂著), 280
-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社会主义工人党), 140, 165
- Solidarity* («团结»), 160
- Solntsev (桑泽夫), 190
- South Slavic Federation (南部斯拉夫分部), 150, 176
- Spanish Revolution (西班牙革命), 101
- Spector, Maurice (莫里斯·斯佩克特), 185, 204, 211, 212, 220, 221
- Spirit of Labor, The* (Hutchins Hapgood), («劳工的精神», 赫琴斯·哈普古德著), 98
- St. John, Vincent (The Saint), (文森特·圣约翰, 即圣徒), 102, 283-284, 286, 288-292, 304, 306-309 (参看 Section I)
- Stachel, Jack (杰克·斯塔彻), 176, 223
- Stalin, Joseph (約瑟夫·斯大林), 20, 67, 113-114, 121, 128-129, 132, 157, 186-187, 195-196, 201-204, 206-209, 214, 217, 223, 238, 240, 314, 319-321, 328
- Stalin-Bukharin Bloc (斯大林-布哈林联盟), 203
- Stalin-Hitler Pact (斯大林-希特勒条约), 37
-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15, 22,

- 25-26, 37, 125, 188, 212, 218-219, 228, 310-311, 319-321, 323, 327, 331-332
- Stalinists (斯大林主义者), 35, 38, 157, 164-165, 237, 239-241, 243, 332
- "State Department Socialism" ("国务院社会主义"), 323
- Steel Strike of 1919 (1919年的钢铁罢工), 105, 112, 166
- Steel Workers Organizing Drive (钢铁工人组织运动), 121
- Stokes, Rose Pastor (罗斯·柏斯特·斯托克斯), 67
- Stoklitsky, Alexander (亚历山大·斯托克里茨基), 70
- Swabeck, Arne (阿纳·斯沃贝克), 67, 121-122, 127, 136, 150
- Syndicalism* (William Z. Foster), («工团主义»威廉·福斯特著), 106
- Syndicalism (工团主义), 101, 109, 256
- Syndicalists (工团主义者), 101, 109, 111, 256, 275, 303, 316, 322
- Syndicalist Wing of Pre-War Radical Movement (IWW) (战前激进运动工团主义派)(世界产盟), 101, 102
- Syndicalism, French (法国工团主义), 112, 288, 289
- Thalheimer, August (奥古斯特·塔耳黑默), 179
- Third International (第三国际), 207, 209
- "Third Period" ("第三时期"), 216-217, 221, 237
- Third Period of the Comintern, Mistakes of. The* (Leon Trotsky),
- («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的错误», 托洛茨基著), 217
- Toilers, The* («劳苦大众»), 43
- Tomsky, Mikhail (米海伊尔·托姆斯基), 207, 217
- Trachtenberg, Alexander (亚力山大·特拉腾堡), 67
- Trade Union Educational League (TUEL), (工会教育同盟), 74-75, 88-89, 101, 113, 119, 127, 166, 198
- Trade Union Unity League (TUUL), (工会统一同盟), 144, 198, 199
- Tresca, Carlo (卡洛·特勒斯卡), 306
- Trial of the Stalinist Leaders, The* (James P. Cannon), («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审讯», 詹姆斯·坎农著), 162
- Trotsky, Leon (列昂·托洛茨基), 23, 26-27, 48, 58-59, 66-70, 102-103, 128, 131, 138, 152, 181, 185-186, 188-190, 195-196, 205, 211, 213, 217, 221, 224-226, 228, 275, 303, 310, 317, 332
- "Trial for Trotskyism" ("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而受审"), 222
- Trotskyist Faction (American), (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派), 52, 222
- Trotskyism (托洛茨基主义), 147, 180-181, 186, 188, 212, 220, 222, 225, 226
- Trotskyist Movement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187, 190
- Trotskyists (托洛茨基主义者), 32, 164, 239, 328
- United Communist Party (统一共产党), 43, 197-198
- United Opposition Bloc (统一反对派

联盟), 178, 179
United Toilers (统一劳苦大众党), 46, 67
Valetski, H. (瓦列茨基), 66, 73, 76
Volkzeitung («人民新闻»), 190
Wagenknecht, Alfred (阿尔弗雷德·华根纳赫特), 55-56, 75, 192
Walling, William English (威廉·英格利希·华林), 231
Walsh, U. S. Senator (美国参议员瓦尔希), 107, 108
Washington, Booker T. (布克·华盛顿), 242
Wayland, J. A. (威兰德), 257
Weinstone, William W. (威廉·伟恩斯东), 43, 45, 52, 56, 75, 154-155, 157-158, 167-169, 175-177, 179, 184
Weisbord, Albert (艾伯特·韦斯波德), 141, 143, 146
Weiss, Murry (莫莱·魏斯), 99
Weiss, Myra Tanner (密拉·坦纳·魏斯), 99
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 (西部矿工联合会), 251, 279, 281, 283-284, 290
Whither England? (Leon Trotsky), («英国向何处去», 托洛茨基著), 196
Wicks, Harry (哈里·威克斯), 45
Wilkins, Scott (斯科特·威尔金斯), 260
Williams, Albert Rhys (艾伯特·里斯·威廉斯), 67
Williamson, John (约翰·威廉逊), 122, 150
Wilshire's Magazine («威尔雪尔杂志»), 258

Winitsky Trial (威尼茨基审讯), 54
Wolfe, Bertram D. (伯特拉姆·沃尔夫), 115, 146-147, 155-157, 173, 176, 182-183, 185, 196-197, 208
Worker, The («工人»), 60, 62, 87, 120 (还可参看 Daily Worker)
Workers Council (工人理事会)
Formation of (成立), 44, 45
Negotiations with Workers Party (同工人党谈判), 56, 62
Fusion into Workers Party (并入工人党), 91 (还可参看 Communist Party, U. S. A. and Workers Party)
Workers Party (工人党)
Formation of (成立), 91
Negotiations with Workers Council (与工人理事会谈判), 62
General references (before 1925 as "the party"), (一般地提及, 在1925年成立“党”以前), 45, 51-52, 54, 56, 62, 75, 80, 86, 118, 126
Conventions of (历次代表大会), (1921年统一大会), 43, 52, 54, 56, 250, 253, 257; (1923年) 93-95, 119-121, 125
Political Committee of (政治委员会), 48
Plenum of (1923), (1923年的全会), 93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14, 16, 30, 97-98, 100, 102, 105, 110, 186, 231, 234, 235, 249, 266, 292, 299-300, 304, 316-317, 322-323, 332-333, 338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39, 101, 240-241, 323, 332
Workmen's Circle (工人小组), 191

Workers World, The («工人世界»),
111, 187

Wortis, Rose (罗斯·沃尔蒂斯), 67

Wright, John G. (约翰·赖特), 186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ugene
Victor Debs* («尤金·维克托·德布
斯著作和講演集»), 254, 282

Zack, I. (扎克), 198, 199

Zelms, Robert (罗伯特·泽尔姆斯), 194

Zimmerman, Charles (查尔斯·齐美尔
曼), 130

Zinoviev, Gregory (格里哥里·季诺维
也夫), 65, 67, 69-70, 73, 128-129,
131-133, 181, 185-187, 189, 203